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五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五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www.mzdbl.cn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五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1.375 插页8 字数252,7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

统一书号: 11094·83 定价: (平)1.05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副主编：陈志凌 杨世兰

参加本卷审稿编委：胡 华 陈志凌 杨世兰 彭 明
南 岗 郭洛夫 郑洪泉 曹木清 范寅铮
卢 权 李育安 廖鑫初 房成祥 李振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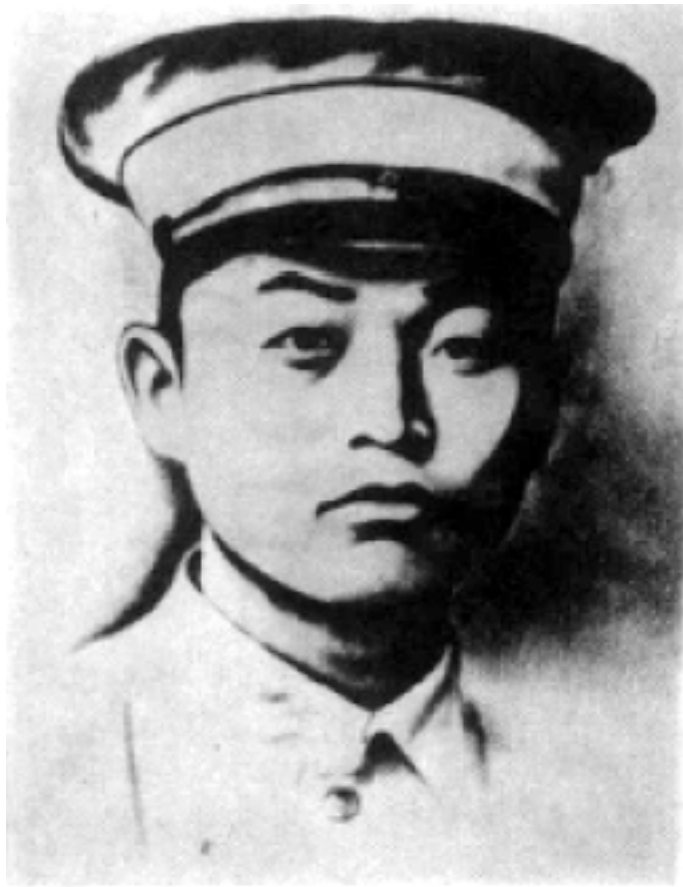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郭洛夫



英代 恽



刘 和 珍



曹 渊



杨 闾 公



魏 野 畴



罗 学 瓚



吴 焕 先



续 范 亭



古 大 存



冯 白 驹

目 录

恽代英	任武雄	李良明	田子渝	(1)
刘和珍	江西农大党史教研组	邓友梅	执笔	(48)
曹 渊			马子魁	(65)
杨闇公			郑洪泉	(83)
魏野畴	张守宪	董建中 梁星亮	王少民 徐超山	(131)
罗学瓚		罗立洲	范寅铨	(175)
吴焕先	侯志英	陈士农	尹俊忠	(204)
续范亭	药 英	续约斋	郝树侯	(241)
古大存	杨 清	杨苗丽	杨 森	(266)
冯白驹	胡提春	许春宏	王焕秋	(305)

恽代英

任武雄 李良明 田子渝

(一)

恽代英，又名莲轩，字子毅，笔名代英、英、但一、天逸、稚宜、FM等，祖籍江苏武进。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二日（旧历乙未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世家里。兄妹五人，他排行第二。其父恽爵三（号乐夫）为清朝“候补府经历”^①，常闲居在家，当恽代英出世时，家境渐渐穷困。

恽代英从小酷爱学习，他的启蒙老师是母亲陈葆云。陈氏出身于“士宦之家”，颇有旧学根底，经常教儿女读唐诗宋词。恽代英长大后能填词赋诗，即受其母亲的影响。他在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上学时，勤奋好学，文才出众，被国文老师誉为“奇男儿”。

恽爵三夫妇特别钟爱聪颖伶俐的恽代英，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但是时代的潮流，将恽爵三夫妇的希望淹没了。恽代英成了旧社会的叛逆者，新时代的开拓者。

^① <恽氏年乘>（残片）。府经历为知府下属正八品官。没有补授实缺的府经历，称为候补府经历。

一九〇九年，恽代英十四岁，其父恽爵三在鄂西老河口盐务局任职。恽代英随母从武昌迁居老河口。由于该处没有学堂，只好在家自学。在父母的指导下，恽代英读了《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战国策》等书。他从这些书籍中，吮吸着“修身”、“立志”之类的思想。经常萦绕在他脑际中的还是爱国兴邦的“中流击楫”和“揽辔澄清”的人格。后来他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受到了西洋新学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开始突破封建社会士人修身立志的樊笼。他推崇矢志变法的谭嗣同，经常吟诵谭在狱中写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激励自己爱国的志向。

一九一三年，恽代英随家回到武昌，考入中华大学预科一班。翌年他在《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三号上发表了《义务论》。这篇处女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他把“今之持论者”分为义务论和权利论，而权利论者是“天下争攘之泉源也”。他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是一伙权利论者。揭露列强标榜的“自卫”，实为“侵犯”的代名词；列强鼓噪的“文明”，是“巨大之军舰”、“猛烈之炸弹”、“杀贫贱以利富贵者也”。他怀着忧国忧民的激情呼喊：“天下之人，如真欲治平者，请自今无言权利，无言竞争，举天下之富贵贫贱，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矣。”

一九一五年恽代英进入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这一年陈独秀创办了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的《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恽代英欢呼这个进步刊物的问世。他经常给陈独秀和《新青年》写信，表达自己敬仰的心情和探索人生真谛的愿望。他称《新青年》是“传播自由、平等、博

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①他倾泻着革命的热情，在《新青年》、《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妇女时报》、《光华学报》等报刊上，撰写和翻译了约八十篇文章，热情讴歌新思潮，无情批判旧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斗士。他的文章涉及面相当广泛，有宣传近代唯物主义的《我之人生观》、《新无神论》、《物质实在论》等；有针砭时弊、纵论天下事的《原分》、《中国今日对于欧战之大任务》、《谁为造时势之英雄乎》等；有抨击夫权、张扬女权的《论女权》、《女子自立论》等；有宣传新教育观的《家庭教育论》、《改良私塾刍议》、《小学校职业教育实施法》等；还有介绍保健、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文章。虽然他那时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和俄国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影响，社会观还没有冲破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则是颇为鲜明的。

一九一五年，正当袁世凯急于黄袍加身，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时，恽代英组织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检查日货，号召国民抵制日货。

为了救国，必须组织进步团体。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恽代英和他的挚友黄负生、梁绍文、冼震商议，成立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不久林育南、刘仁静等同学陆续加入，年底便发展到五组十九人。互助社是当时武汉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

^①恽代英 1919 年 9 月 9 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24 页。

恽代英目睹当时不少同学沉醉于吃喝嫖赌之中，感到十分气愤和忧郁。他认为：“品德不好，即有学识也于社会没有好处，甚至学识反而成了作恶的工具。”^①所以他在互助社里提出了“夫智仁勇三者，一贯之德也，研究以广其智，实行以增其勇，于以求仁”的道德标准，制定了“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的戒约八则。^②社员们经常开会，自我反省，检查自己是否做到以上“八不”。他们互相鼓励、互相观摩，以振奋精神。恽代英还利用假期，邀约社员登蛇山，游黄鹤楼，泛舟月湖，旅行至青山、谏家矶等地。借以锻炼体魄，陶冶精神。

一九一八年五月，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屈辱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恽代英和互助社的社员，立即发动学生，举行抗议活动。他写了《力行救国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反动军阀卖国的勾当，呼吁民众奋起反抗。为了表示爱国的决心，这时他“始剃全头，不戴东洋头之义也”。^③在互助社的影响和发动下，健学会、日新社、仁社、诚社等进步小团体相继成立，从而推动了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向前发展。

同年春，恽代英遇到了很大的不幸，结婚不到三年的妻子沈葆秀因难产去世。他十分悲痛，给亡妻连写四封信，表现出他对妻子真挚的爱情和深切的怀念。他“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

① 洗百言：《恽代英烈士青年时代的片断》，原件存武汉文物管理处。

② 《互助社的第一年》，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19页。

③ 《恽代英日记》第686页。

娶”^①，要为亡妻守义。他这样做不只是个人私事，而是向“男尊女卑”的封建制度宣战。正如十年后，他在武昌珞珈山亡妻坟前说的那样：“葆秀，你离开人世已有十年，我为你守义也守了十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看：人间还有真情在”。^②

这年暑假，恽代英从中华大学毕业。校长陈时一向十分器重他，聘请他为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即校长）。恽代英因受“教育救国论”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切实的工具”^③，所以欣然受聘，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二）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的反帝爱国风暴，席卷了沉寂的武汉。

恽代英立即挺身而出，以互助社为核心，以武汉学生联合会为基础，和林育南、施洋、陈潭秋等先进青年一起，领导了武汉地区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以急进民主主义者的姿态，战斗在历史大转变的舞台上。

五月六日《汉口新闻报》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当天恽代英写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连夜和林育南赶印出六百余份，准备第二天散发。

①恽代英 1918 年 3 月 1 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 297 页。

②沈葆英：《忆代英》，见《长江日报》1981 年 8 月 31 日。

③恽代英：《敬告高等师范教职员及学生》，见《少年世界》第 1 卷第 4 期，1920 年 4 月 1 日。

五月七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怕学生闹事，实行了特别戒严。这天中华大学举行运动会。恽代英带着传单走向运动场，途中遇到互助社社友魏以新。

“代英，快看晓峰^①的信！”魏以新十分兴奋地扬起手中的信。

“是黄晓峰的信吗？”恽代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信中“叙京校学生示威及各界骚动事”^②，使他激动万分，热泪盈面。他立即请林育南将此信张贴在中华大学的“揭示栏”上，让全校师生了解此事，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

随后他到运动场上散发了传单。传单上写着：“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③这传单象革命的火种，点燃起了学生们心中的反帝怒火，一时学生们悲痛欲绝，振臂高呼，爱国口号响彻云霄。

从这天起，恽代英忧思国难的灼热的心，同武汉地区民众掀起的壮烈雄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九日，他代表武汉学界向北京学界发出声援电，同时联络武昌各大中学，筹备武昌学生团。十日，为武昌学生团拟了约四千字的《宣言书》。十一日，武昌学生团成立；他为学生团代拟了致北京军阀政府及各省、各机关、各学校和欧洲和会电，要求争回山

①晓峰，名绍谷，字啸峰、晓峰。湖北保康人。中华大学附中二班学生，后考入北京大学，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恽代英有书信联系。

②恽代英1919年5月7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537页。

③恽代英1919年5月6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536页。

东主权。十二日，又为学生团拟致督军、省长、教育总长、北京各校校长、各省议会公函，热情赞扬北京学生的爱国精神，痛斥卖国贼的罪行。十七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宣告成立。学联合会拟发行《学生周刊》。恽代英亲自为这份周刊拟定办刊宗旨。学联合会决定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游行。

五月十八日，武昌的大街小巷，从阅马场到草湖门，从巡道岭到粮道街，到处响起了爱国的口号。汉阳门上，黄鹤楼前，紫阳湖畔，到处飘散着五颜六色的爱国传单。爱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三五成群，有的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有的破指血书：“还我青岛！”……

为了推动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五月二十一日，恽代英和互助社的社员们，发起组织“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他拟定了《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办法大纲》。在他们的推动下，武汉地区迅速展开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活动。

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王占元的极度恐惧和不安。他多次传见各校校长，命令他们对学生要严加管束，不得再生事端，若学生胆敢罢课，扰乱治安，则“格杀勿论”。

面对反动派的恫吓和威胁，武汉学联决心以京、津学界为榜样，于六月一日实行全市学生总罢课。恽代英鼓励学生们的这种爱国热情，提醒他们在罢课斗争中，“则宜准备受捕，受捕之后，宜照常继续进行。”^①

六月一日清晨，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将各校门口堵围，主要街道巡逻的军警“首尾相衔、不绝于途，交通几为之断”^②，

①恽代英1919年5月23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549页。

②《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1日。

全市笼罩在恐怖中。但爱国学生毫不畏惧，大门出不去，有的从高二、三丈的墙上，一跃而下；有的毁垣冲出。他们从四面八方冲向街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一天，武汉学联公布了《武汉学生罢课宣言》，向全国人民宣布罢课的理由及严正立场。恽代英对爱国学生的革命精神高度赞扬，称颂这一天是“湖北学生与官厅宣战之第一日也”。^①

王占元凶相毕露，命令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旋即又采用釜底抽薪的毒计，勒令各校提前放暑假，限学生三天内全部离校。恽代英立即揭露王占元的阴谋，领导武汉学生坚持斗争。六月三日，爱国学生再次游行演讲，复遭镇压。在这两次血案中，数十名学生受伤，无数学生被拘捕。

事态的发展使恽代英认识到：爱国反帝运动单靠学生是不够的，必须和民众相结合。他和施洋律师等人，筹商武汉各界联合会。六月七日，他在武汉各界联合会上发言，号召商界罢市，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恽代英、黄负生还巧妙地在白纸折扇上写了《为什么罢市》、《罢市的目的与方法》，挨店挨铺传阅，号召爱国商人罢市。六月十日，汉口商人首先罢市。与此同时，武汉各轮船水手、伙夫举行同盟大罢工，使汉口上海间的交通“全然在杜绝状态”。^②罢工、罢市有力地声援了学生爱国运动。武汉地区的学生再次举行罢课，“三罢”斗争汹涌澎湃。

^①恽代英1919年6月1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552页。

^②《晨报》1919年6月13日。

武汉人民的坚决斗争，迫使王占元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向北京军阀政府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去电，提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要求。北京军阀政府也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在全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三)

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作为新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恽代英和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恽代英是在茫茫黑夜里探索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道路。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都如闪光的星体吸引过他。

早在一九一三年，恽代英就开始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传到中国后，恽代英又曾做过“共同生活”的“梦”。他幻想着在乡村找一个立足点，“盼望这样便可以全然共产，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主义的天国”。^①恽代英有这些思想并不奇怪，这是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现象在他思想中的反映。但他没有就此止步。为了救国，他在不断地探索真理，“常预备欢迎新学说到我心里来，亦欢迎他到我耳朵里来。能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更新的”。^②

^①代英：《未来之梦》，见《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

^②恽代英：《怀疑论》，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10期，1920年4月。

正是这种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使他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王光祈的信中说：“你们中间很是有能实际为社会做事的人，而且，我看你们的会员通讯，亦觉得真是充满了新中国的新精神。假如我配得上做你们的朋友，我实在诚心的愿做一个会员。”^①并希望全国进步团体联合在少年中国学会内。

一九二〇年二月，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设在武昌胡林翼路横街头十八号（今横街）。书社是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社员们把书社看成是“修养社会的结晶体”和“服务社会共同生活的鸟型”。^②当时武汉地区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了利群书社。书社是长江中上游宣传新思潮的重要阵地，它和《新青年》杂志社、湖南的文化书社等进步团体联系密切。

一九二〇年春，恽代英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建立了联系。四月，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他在致学会同人的信中，认为所编丛书“应为社会不可少的书”、“应为社会急需的书”。^③为此，提出了一个研究书目，并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布尔什维克等列入研究项目。尽管书目中仍有罗素及其学说、杜威及其学说、克鲁泡特金及其学说等，但他把马克思及其学说列为研究书目中的首位，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里，他的思想更迸发着明亮的火花。这篇文

①恽代英1919年9月9日日记，见《恽代英日记》第621页。

②《利群书社》，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24页。

③恽代英1920年4月22日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信，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会员通讯”，1920年5月15日。

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他曾信仰过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产生怀疑。他说：“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欲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投井救人的诬说。”他对马克思关于道德是随经济演化而演化的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表示“很信”^①，并准备另文陈述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具体意见。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逐渐摒弃无政府主义，开始了世界观的转变。

这年秋，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在《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九期上发表。他在《译者志》中写道：“英哲尔士（即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挚友，终身在宣传事业中联合努力。读马氏传的，无有不知他的。”这几句简洁的话，表达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崇敬心情。下半年，他受《新青年》杂志的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中期著作《阶级斗争》，由新青年社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出版。这本书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都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曾这样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②这本书对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成员影响也很大。据利群书社成员廖

^①见《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

^②埃德加·斯诺（美）：《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1页。

焕星回忆，恽代英曾将《阶级斗争》一书的主要内容介绍给利群书社的社员，使他们第一次懂得了要推翻黑暗统治，必须搞阶级斗争。

一九二〇年十月，恽代英在《未来之梦》一文中提出了建立“新村”的设想，说明这时他对新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还没有分清。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刘仁静从北京给他写信，宣传了俄国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提出乡村教育“难以收效”，乡村企业亦“不可靠”，“中国的社会也必出于流血一途，是无疑的。”^①一九二一年六月初，林育南在北京给恽代英写了一封信，对他们过去的思想提出了批评：“我们这种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查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久是个‘理想’，终久是个‘梦’呵！”^②这些见解对恽代英世界观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

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湖北黄冈八斗墩浚新小学，召开了利群书社及其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长沙文化书社的易礼容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在恽代英起草的文件中指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③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由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七月下旬，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恽代英闻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申请加入党的组织。从此，他就在党的领导下

^①刘仁静1920年12月2日致恽代英的信，见《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

^②林育南致恽代英的信，见《我们的》第6期，1921年。

^③《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

为共产主义而战斗。

(四)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夏，恽代英从江城到皖南宣城，从泸县到成都，以学校为阵地，教书为职业，开展革命活动。他走到哪里就将革命的种子播到哪里。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恽代英应章伯钧的聘请，到安徽宣城第四师范任教。宣城师范的学生得知恽代英前来执教，都异常兴奋，纷纷跑到码头去迎接。恽代英却脚著草鞋、自挑行李，带着李求实、吴华梓两名附读学生从芜湖经旱路到达宣城。他们进校门时，门房工友以“脚夫”而拒之门外，费了一番口舌，方得进门。

皖南的宣城，远离大都市，消息闭塞，旧的教育制度戕害广大学生。恽代英任宣城师范教务主任兼教国文和教育学。他力主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提倡学生走向社会，他将全校三百多名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学生自治会。在学生中组织进步团体，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宣城先后成立了“求我社”、“觉社”、“新群社”等进步团体。他还亲自为学校中和县和含山县籍学生组织的“和含学会”写祝词，鼓励学生到农村去，改造乡土，改造自己。

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宣师举行国耻纪念大会，适逢两位朝鲜流亡志士来到宣城，应邀参加了大会。他们在大会上用亲身经历痛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朝罪行和国土沦陷的朝鲜人民的悲惨遭遇。恽代英接着发言，他说：“朝鲜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如再醉生梦死，帝国主义就会很快的来侵略我们。中

国腐败政府，只知仰赖帝国主义，任其宰割，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捆锁四万万人民的一条大铁链。”他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扣动了听众的心弦，激发起他们爱国的热情。爱国学生在恽代英的领导下，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走上街头，开展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活动。古老的宣城顿时沸腾起来了。

恽代英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宣城地方反动势力的憎恨。他们联名打电报给安徽省反动当局，密告恽代英“组织党羽、煽动学生、图谋不轨、大逆不道”。安徽反动军阀闻讯后，令宣城县政府逮捕恽代英。恽代英得到消息，离开了宣城。

七月一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年会。围绕着少年中国学会方向问题，大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坚决主张学会应确立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政治性的团体。这些正确的主张，却为不久就成为国家主义派头子的曾琦所坚决反对。一些改良派则主张把年会变成脱离政治的纯学术的团体。这场斗争教育了恽代英。为了避免学会分裂，起初他“曾力为学会作调和派”。^①随着斗争的发展，他感到再也没有调和的余地了，在大会结束时，作了题为《学会前途的危险，应讨论如何分裂》的演讲，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不久，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钟健的信中写道：“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的团体”。^②

同年十月下旬，在金风送爽的日子里，恽代英由陈清^③介绍，风尘仆仆来到四川泸县川南联合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

^{①②}恽代英 1921 年 11 月致杨钟健的信，见《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讯录》第 1 期，1921 年 8 月——1922 年 3 月。

^③陈清，字愚生。四川泸县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其时，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传播到川南师范，学生中思想十分活跃。有的学生将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作为新思想而加以吸收。为了将学生们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恽代英深入学生中，用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循循善诱地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他还利用教外文的机会，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常把自己翻译和保存的马列经典著作秘密地在进步师生中传阅。在他的组织下，川南师范不久便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在四川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党团组织播下了种子。

这年寒假，恽代英将教员六人、学生二十四人组织成讲演团，徒步旅行川南隆昌、内江、自流井、富顺、南溪、宜宾等县巡回讲演，“往返一月，行近二千余里，讲演二十余次，沿途考察社会状况”。^①每天清晨，恽代英背着行李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脚板起了血泡，但他总是精神振奋，经常哼起他所喜欢的“梅花三弄”的曲子。他们每到一处，向广大民众进行爱国宣传，传播革命思想。

一九二二年四月，恽代英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他进一步对学校进行改革，聘请一些具有新思想的教师到校，解聘了一些顽固守旧的腐儒。他主张师生平等，组织学生参加校务委员会，鲜明地提出“择师运动”、“经济公开”，打破了陈腐的教育制度，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新四川通讯社一篇报道所说的那样：“该校教师，大多是富有新思想之教育家。教育制度上采用新学制，适合新教育原理，教材采用适

^① 《四川会员近况》，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7期，1922年2月1日。

应新思潮之课程，校内组织采取委员制，委员会由学生与教职员共同组织，凡事均由委员会决定。凡有束缚学生之思想、身体的一切不良管理，必须打破。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对于校内外秩序极端遵守。学暇时，常与教职员互相探讨关于学生之讨论，教职员偶有错误，学生每而（面）斥其非，教职员不以为违，而学生每有意见，教职员亦竭诚容纳交付委员会。”^①

川南师范的教育改革影响是很大的，在四川各学校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广泛的赞扬，但也遭到了守旧派的攻击。

这年暑假，军阀赖心辉乘泸县杨森东下之机，攻占了泸县，任旅长张英（挺生）为永宁道尹。^②泸县的反动势力勾结张英，趁恽代英在上海为学校置办图书仪器之机，抢占了学校地盘。他们造谣诬蔑恽代英：“他是外省人，挟重财远离泸州，又值换防，一定不会再回来了。”张英借此撤了恽代英的职，委任了新校长，撤换了进步的教师。

反动军阀的行动，激怒了川南师范的师生，他们举行了罢课。九月一日，全校二百六十四名学生，又发出了“快邮代电”，向全国揭露张英的罪行，强烈要求恢复学生自治的权利，将新校长和私聘教员请出校外，由学生另行推举，坚决表示：“非到目的，宁死不止。”

恽代英在上海办完公务，即给川南师范回电，告知不久将返学校。全校师生接电欣喜万分。当他回到学校时，师生们含

^①转引自张至皋：《恽代英同志在泸州》，见《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永宁道管辖川南25县，道府在泸县。永宁道尹为永宁道的最高行政官，相当于明清时的道台。

泪相迎。恽代英的返校戳穿了反动派的谎言，更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张英气急败坏将恽代英扣押起来。张英这一举动，使得愤怒的师生将监狱团团围住，要求释放恽代英。张英见事态严重，一方面被迫宣布撤掉新校长，由自己兼任；另一方面开除罢课学生一百余人，并嘱省内各校不许收留被开除的学生。这些学生到河北、江苏等省，到成都、重庆、合江、巴县等地，揭发张英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重庆、川东、巴县、成都等地学校纷纷行动起来，声援川南师范学生的正义行动。泸县二百余所学校也一致起来声援，一场“择师运动”波及全四川。

色厉内荏的张英，慑于革命学潮的威力，只好请求知名人士吴子俊出面斡旋，并请他出任代理校长，以求缓和矛盾。同时请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和吴子俊出面，保释恽代英。十一月八日，恽代英回校。

一九二三年初，恽代英辞去了川南师范学校的职务，应吴玉章、王右木^①的聘请，经重庆到成都，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任教，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初夏，他离开了四川。恽代英虽离川，但在他辛勤教育、帮助和影响下，张霁帆^②、余泽鸿^③、曾润白^④等一批革命战士迅速成长起来。他

①王右木，四川江油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时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务长。

②张霁帆，字洵卓，四川宜宾人，川南师范第14班学生，由恽代英介绍入团，后参加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1936年8月在徐州被捕，后病死于南京狱中。

③余泽鸿，字世恩，笔名晓野、性因，四川长宁人，川南师范13班学生，1925年入党。曾任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等职，1935年在四川江安县被敌杀害。

④曾润白，四川泸县人，川南师范第15班学生，经恽代英介绍入团，入党后曾任中共万县县委书记，1928年牺牲。

们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郭沫若后来回忆恽代英这段历史说：“代英在四川泸县做过师范工作，四川的青年受他的影响的，因此也特别多。……四川那样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①

（五）

一九二三年夏，恽代英应邓中夏之约，来到了东海之滨的上海，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执教。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恽代英出席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团的宣传工作。

十月二十日，在邓中夏、恽代英的精心筹划下，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半月刊问世了。《中国青年》是广大青年最喜爱读的革命刊物之一，发行量很快激增到三万册。它犹如闪烁在中国夜空上的启明星，指引广大革命青年前进的方向。

恽代英是《中国青年》的主要编委之一。为了引导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呕心沥血，精心编辑，并亲自撰写文稿，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和四、五十封通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广大青年，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正确对待和处理理想、前途、学习、工作和婚姻恋爱等问题，在广大革命青年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①郭沫若：《由人民英雄恽代英想到“人民英雄列传”》，见《中国青年》1950年第38期。

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路线，用具体材料，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相勾结，镇压中国革命，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进一步宣传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恽代英在《何谓国民革命》、《农村运动》等许多文章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唯一可靠的力量”。^①农民“是革命的大力量”，中国革命“若不是能得着大多数农民的赞助，不容易有力量而进于成功”。^②小资产阶级有其革命的一面，但“每是怯懦而自私的”^③，只有依附于无产阶级才有出路，否则将坠入反革命的泥淖。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必须保持警惕，要“善于应付”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④大商买办阶级则“一定是反革命的”。^⑤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我们不打倒军阀，便不能组织革命的人民政府，以引导全国的民众，以反抗帝国主义；同时，我们不打倒帝国主义，便不能灭绝外国

①但一：《上海日纱厂罢工所得的教训》，见《中国青年》第70期，1925年3月14日。

②但一：《何谓国民革命》，见《中国青年》第20期，1924年3月1日。

③代英：《农村运动》，见《中国青年》第37期，1924年6月28日。

④代英：《五四运动与阶级斗争》，见《中国青年》第103期，1925年11月28日。

⑤代英：《与李瑛卿君论新国家主义》，见《中国青年》第73期，1925年4月4日。

的经济侵略，便不能求本国实业的发展。”^① 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质只“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② 他特别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同于以前的任何革命，要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必须要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根基“必须建筑在被压迫的农人工人的上面，他一定是代表着农人工人的利益，而且一定要简直是农人工人的团体”。^③ 党的组织则是“各种民众中的进步分子所组成”。^④

恽代英的这些思想有益于增强广大革命青年的斗志，明确前进方向，也为形成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恽代英关心青年、热爱青年。他在《中国青年》上撰写了许多文章，引导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和“切实的路上”。^⑤ 他教导青年，要硬起自己的脊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他针对有些青年受胡适、梁启超“学术救国”论的影响，以为社会科学没什么用，建设国家靠自然科学，因而埋头读书，不关心国事的错误倾向，先后写了《学术与救国》、《再论学术与救国》、《怎样研究社会科学》等文章，耐心地引导青年，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他指出，中国将来能够有足够的本国技术家，自然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们并不

①代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见《中国青年》第35期，1924年6月14日。

②④代英：《怎样进行革命活动》，见《中国青年》第54期，1924年11月22日。

③代英：《评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见《中国青年》第53期，1924年11月15日。

⑤《中国青年〈发刊词〉》，见《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

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国家不独立，纵有几千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①所以，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②他号召广大青年研究救国的学术——社会科学，并为青年详细列了应研究的书目，还提出三项具体的要求：（一）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业；（二）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时事与社会改造理论与办法的研究；（三）有收入时至少捐出十分之一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③这个倡议立即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两个月后，成都的张霁帆给恽代英写信，向他汇报了自己按三个要求实践的情况。

恽代英主张青年研究社会科学，但极力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的研究，他说：“我想与其从理论的书籍入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入手。”^④要求青年在实践中改造自己。“五卅”运动中，他号召学生队伍走上南京路，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阶级的罪行。他带领青年学生深入厂区工棚，与工人相结合。他经常勉励青年知识分子要在爱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锻炼自己，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各种弱点和缺点。他还不辞辛苦地奔波于沪、宁之间，点燃起反帝爱国的星火，发动学生走出课

①②代英：《学术与救国》，见《中国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1日。

③代英：《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见《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

④代英：《怎样研究社会科学》，见《中国青年》第23期，1924年3月23日。

堂，做上海工人阶级的后援，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作斗争。在他的发动和领导下，沪、宁一带的爱国学生，积极投身到“五卅”运动的洪流中。

恽代英对青年的学习、工作、婚姻等切身问题极为关切。有的青年不满当时社会现实而烦闷忧愤；有的青年为封建包办婚姻而苦恼伤心；有的青年学生为毕业即失业而惆怅茫然。他满腔热情地写文章，帮助这些青年认识和分析产生这些社会弊病的根本原因，给他们指明出路。有位青年读者因经济困难，怕随时有失学的危险，写信给恽代英，希望能帮助他找到职业。恽代英复信给他，希望他安心读书，在学校中团结同学，共同参加革命。只有整个国家改造了，青年中的普遍的失学失业问题才能解决。他一个人是无法替青年代荐职业的。他循循善诱地开导那个青年：“至于我们怎样能改造国家，还须要我们随时随地组织民众，民众是改造国家的军队，只有这可以改造国家，只有这可以救自己，你要自救吗？不是请求我乃至任何人，是要靠你自己努力。”^①恽代英就是这样善于抓住青年的思想苗头，启发他们将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结合起来，投入到工农群众的伟大斗争中去。

恽代英不仅用文章与青年交朋友，而且还通过书信与广大青年保持密切联系。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青年读者的来信。对于这些来函，他不管多忙，都和其他编辑一起写信回复。有典型意义的则在刊物上刊登，以期引起讨论。还有许多青年不远千里登门求教。对于慕名来访者，他都是热

^①代英：〈复托荐职业者的信〉，见《中国青年》第56期，1924年12月6日。

情接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一九二四年，革命青年杨闇公为了探讨马克思主义真理，从四川到上海，与恽代英晤谈，收益非浅。他在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称赞恽代英“谈话时很有一部分真理在，他所研究的方法都是从实际入手，……故我很有动于中。”^①杨闇公上海之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返川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恽代英还通过《中国青年》指导各地青年建立进步团体，帮助一部分进步青年与青年团建立联系。例如湖北黄梅的宛希俨、浙江宁波的卓恺泽等，都是曾受过恽代英的影响，找到党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后来都成为党、团的重要干部。

恽代英主编《中国青年》期间，反动的国家主义派掀起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阵阵恶浪。恽代英和肖楚女等以《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对他们展开了坚决斗争。

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曾琦、李璜等，原是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右翼分子。一九二三年当他们初次出版《国家主义的教育》，开始鼓吹国家主义的时候，恽代英就敏锐地“感觉他们有‘唯心’的弊病”。^②继而在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南京年会上，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国家主义派以《醒狮周报》为喉舌，祭起“全民革命”的黑旗，以“国家民族”为幌子，鼓吹“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恽代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主义派要“抗”的是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要“除”的是中国共产党。他痛斥道：“今日

^①《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18页。

^②代英：《评醒狮派》，见《中国青年》第78期，1925年5月2日。

有眼睛的人都看见苏联是最以平等待中国的国家，共产党人最艰苦奋斗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过他们的革命生活。”他质问国家主义派：“今日不努力攻击现在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卖国军阀，却专来无理取闹想出苏俄怎样侵略中国，共产党怎样卖国的话，攻击苏俄和共产党，究竟有何道理？”他针对国家主义派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事实，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如《醒狮周报》在被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通行无阻，便在这一点，醒狮派诸君亦当反躬自省，不好随着流俗悠悠之口，被识者耻笑。”^①几句幽默的绝妙之笔，将国家主义派充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工具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国家主义派拿国家的观念来压阶级观念，疯狂反对阶级斗争，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欺骗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恽代英在文章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劳资阶级的严重对立，阐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论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了抵御国际资本主义压迫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要更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我们要求全民族的解放，自然没有反转让人民中大多数工人农民受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求解放的道理。”^②这就彻底驳倒了国家主义派散布的抽象的反动的国家观。

由于国家主义派打着爱国的旗帜，喊着迎合民众心理的革命词藻，故在一部分青年中颇有市场。恽代英和肖楚女以记者

^①代英：《评醒狮派》。

^②代英：《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见《中国青年》第82期，1925年7月18日。

的身份，在《中国青年》上撰文分析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实质。

“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一种极反动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大战的损害，逼得他们发狂了，……甘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工具，作反共反俄争斗的最凶猛的后备军。”“中国的国家主义也是乘中国工人在国民革命中渐取得领导地位而兴起的”，“是仇视无产阶级，企图征服无产阶级的主义。”^①这一针见血的揭露，给予国家主义派以致命的打击，使广大青年和革命群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

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培育和影响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整整一代青年，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和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恽代英为中国青年革命运动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六)

一九二三年六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月十五日，恽代英在致施存统的信中，表示坚决拥护党的这一政策，并提出在统一战线中，须注意“为无产阶级势力树根基”^②的意见。国民党“一大”后，他与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恽代英担任宣

^①记者：《国家主义是什么？》，见《中国青年》第133期，1926年9月7日。

^②代英1923年6月15日致施存统信，见《先驱》第23期，1923年7月15日。

传部秘书，负责编辑《新建设》月刊，为促进统一战线作了许多工作。

国民党的改组，引起了国民党内一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的激烈反对。一九二四年六月，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人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书”，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妄图分裂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打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活动，恽代英写了《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等文章，阐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十分尖锐地指出：所谓排斥共产党，不过是国民党右派“威胁异己的一个武器，根本便是扫灭国民党中一切比较进步的势力罢了。”^①

恽代英清楚地看出，改组后的国民党，逐渐起了左、右的分化，这“是国民党自身的一种进化。”我们在这种进化过程中，必须以党建国，“所以要改造国家，首先要改造党。今天与国民党右派的奋斗，便是改造党的必要步骤。”他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要不顾一切困难，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为了改造国民党，为了改造中国而奋斗”。^②

恽代英在与国民党老右派作斗争的同时，又挑起了批判戴季陶主义的重担。他写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族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阶级斗争》、《真三民主义》等论文，痛斥戴季陶的反动理论。

戴季陶标榜相从孙中山十余年，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

①但一：《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见《中国青年》第41期，1924年7月19日。

②FM：《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见《中国青年》第57期，1924年12月13日。

徒”。他在所著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中鼓吹“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借以反对中国共产党。恽代英针锋相对，首先从分析什么才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入手，揭露戴季陶的反革命本质。他说，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一定要无论如何艰难危险敢与帝国主义相奋斗（民族主义）”；“一定要打倒军阀为全体人民争回政权，不许政权落于资产阶级少数人之手（民权主义）”；“一定要很有切实有效的方法，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不许在中国有资本家地主压迫工人农民的事（民生主义）”。而戴季陶之流既不敢提打倒帝国主义，也不敢提打倒军阀，连“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都不敢说，这种人哪里配得上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呢？“只是有意作践三民主义，有意作践我们的总理与我们的国民党罢了。”^①这就彻底戳穿了戴季陶“真正三民主义信徒”的画皮。

戴季陶大肆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根本否认中国存在着阶级的对立，说什么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与不觉悟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所以中国革命根本不需要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只要用“仁爱”之心，“诱发”资本家、地主和统治者，使其觉悟，幡然改进，尊重工农利益、为工农谋福利。恽代英驳斥道：“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从古已然的，只要一天还有资本家地主剥削工人农民的事，这种斗争亦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为这种资本家地主做走狗的人应当反对这种斗争。”^②他严正指出：要

①恽代英：《真正的三民主义》；见《三民主义讨论集》，三民印刷所1927年3月初版。

②FM：《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见《中国青年》第89期，1925年8月22日。

统治阶级为被统治阶级谋利益，抛弃他们的阶级地位，这只能是“空想”。①

戴季陶主义的核心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鼓吹“单纯的国民党运动”，狂叫共产党的运动不适合中国的需要，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

恽代英痛斥这种反共的叫嚣，尖锐指出说这种话的人，“一定连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亦不了解”，或者“根本不懂革命是什么东西。”他质问戴季陶一伙：“共产党因见到渐进于共产主义，必须先联合各阶级打倒帝国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加入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这是他们的主张，亦便是国民党的主张，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用国民党的名义作各种活动呢？”②他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进一步揭露：“季陶等自己不在革命的前线上奋斗，反躬亲导率反革命势力掀起党内大波”。③

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恽代英在上海十分沉痛地写了《悼廖仲恺先生》，号召中国青年继承廖仲恺先生的革命精神：“哪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不为反革命派所忌恨呢？哪一个真正革命家能够免于反革命派所污蔑诬陷暗算的呢？革命的青年，勇敢些罢！他们有他们的鬼鬼祟祟的计谋，我们有我们堂堂正正的战斗。”④

廖仲恺遇害后，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之流纷纷麇集

①代英：《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见《中国青年》第87期，1925年8月8日。

②FM：《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

③恽代英1925年底致柳亚子的信。

④见《中国青年》第90期，1925年8月25日。

北京，于十一月在西山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并设立伪中央党部于上海。

恽代英对西山会议派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十二月十八日，他和张廷灏等联名在《申报》上刊载启事，严正指出西山会议派将“中央委员会”移设在上海是非法的。并写信给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希望他能发表“公正之谏论，以壮我声势”。^①柳亚子立即仗义执笔，力持正论，痛斥西山会议派，沉重地打击了右派的猖狂活动。

西山会议派视恽代英等为眼中钉、肉中刺。十二月二十日，上海伪中央党部公然声明将恽代英等“共产派分子”开除党籍。同年底，恽代英、沈雁冰等人奉命组织国民党左派的上海特别市党部，与西山会议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作为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恽代英和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等七名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时，恽代英发表了重要演说，再次痛斥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工农民众的种种诽谤，义正辞严地说：我们“要真正为总理的主义来奋斗，那才是真正的国民党”，“如果国民党有一天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和大多数的农工反对……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②

①恽代英 1925 年底致柳亚子的信。

②恽代英：《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执会 1926 年 4 月印行。

恽代英的演讲博得了大会的热烈掌声。他铿锵有力的话，不仅是对国民党右派的当头一棒，也是对那些还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分子的严厉警告。

国民党“二大”后，党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领导，派恽代英担任军校政治总教官，兼任军校中共的党团书记。是时，蒋介石正加紧搜罗喽啰阴谋篡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黄埔军校内扶植孙文主义学会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恽代英和熊雄等领导军校内的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进行斗争。

针对蒋介石企图将军校变成个人篡权的工具，恽代英强调：一个革命的军队，既要服从党纪，又要服从军纪。服从党纪“是要明了而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服从军纪“是要能够有充分作战的能力，为党的主义有切实把握能够杀敌致果”；“任何一个高级长官想引导军队走到反革命的路上，我们军队中的同志都应当拿出党纪来制裁他。”^①

七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后，恽代英留守广州，为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做了大量的工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大好形势下，恽代英提醒人民：“我们必须预防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及其他恶势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借北伐时机摧残农工的行为，必须预防他们借一切小题目来进行他们多年梦想的破坏本党^②与C P合作的阴谋。”^③强调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联

①恽代英：《党纪与军纪》，见《革命军》第10期，1926年2月20日。

②本党指国民党。

③代英：《北伐期中怎样巩固后方》，见《黄埔日刊》1926年8月4日。

合国内被压迫各阶级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必须注意‘被压迫’各阶级”，必须加强左派的势力，反对右派的势力。他指出，对于国民党右派是必须反对的，但只要统一战线还没有完全破裂，“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间，工作上若还有可以合作的地方，仍旧要尽力取得合作的机会，我们与他们革命的一方面合作，与他们反革命的一面反对，这是并行不悖的。（若他们本无革命的一面，借这种合作亦可以暴露他们的虚伪的面孔。）”。^① 这些论述，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

（七）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恽代英奉令回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简称武汉中央军校）的工作，后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

一月十六日，恽代英与沈葆英^②结婚，结束了为期十年的“守义”生涯。

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革命阵营也在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收买下叛逆日著。在南昌控制中央政治会议，拒不服从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非法扣留途经南昌赴鄂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二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

①恽代英：《国民党与国民革命》，见《革命军》第13期，1926年12月30日。

②沈葆英是沈葆秀的四妹。沈葆秀和沈云驹先生（沈葆英的父亲）相继病歿后，沈家陷入困顿窘迫之中。恽代英常鼓励沈葆英在艰难生活的环境中自立。在恽代英的教育帮助下，沈葆英进步很快，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和特别市党部成立时发表演说，狂叫“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恽代英和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团结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在临时联席会议上提出“提高党权”、“集中党权”、“反对独裁”等口号，展开了一场提高党权^①的运动。

三月十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正式开幕。恽代英出席了大会，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为大会提案委员。他在大会上愤怒谴责了反动派制造的赣州惨案^②和阳新惨案^③，要求将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杀害陈赞贤的刽子手倪弼“解送中央”。必须“追究”阳新惨案的“凶手”。他和吴玉章、邓演达、毛泽东等人一起参加了《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的修改和审查工作。恽代英坚决支持农民运动，他说：“农民运动不止是帮助党的，也即也（自）行改善与解放，解放须农民自行起来组织，以及以自己力量来拥护党；有人以为战时须要农民帮助，而战后不要农民的思想皆属荒谬。”^④

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通过了

①此节的党是指国民党。

②赣州惨案：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密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的党代表倪弼，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制造了赣州惨案。

③阳新惨案：1927年2月27日，湖北阳新县以朱仲忻为首的一伙匪徒，在国民党右派的旨意下，对县农民协会和县总工会突然袭击，将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成子英和县总工会秘书曹树光等九人绑架，堆起干柴浇上煤油，活活烧死，这一反革命事件，史称阳新县惨案。

④《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录》。

废除主席制、改选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和恽代英提议的“将军人部裁撤”^①等决议案，免去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确认武汉为国民政府所在地，沉重打击了蒋介石。

三月十日，蒋介石在武汉中央军校的爪牙制造“三·十”反革命事件。这天湖北省总工会在血花世界（今汉口民众乐园）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当与会工人群众高呼“打倒军事独裁”、“提高党的威信”、“一切权力属于党”的口号时，武汉中央军校中的反动学生以维护蒋（介石）校长威信为名，闯入会场，擅自拘捕了四名工人。事件发生后，恽代英立即进行调查处理，召集武汉中央军校的国民党员举行临时紧急大会。会后派出学生代表慰问被捕工友，过江到总工会道歉，并以军校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宣言，谴责反动分子的罪行，同时还要求蒋介石速来武汉表明态度，向民众解释。武汉中央军校在恽代英领导下进行了整顿，逮捕了十三名蒋介石的忠实爪牙，拘留十五人，开除（国民）党籍十八人，还给其他有关人员六十余人以不同的处分。

为了进一步削弱蒋介石的势力，三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决定武汉中央军校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取消校长制（原校长为蒋介石）改为委员制，正式委任恽代英和谭延闿、徐谦、邓演达、顾孟余为委员，实由恽代英负责。恽代英立即大刀阔斧整顿军校，将隐藏在学校内的孙文主义学会、民社和壮年团等反动分子清洗出去。把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招收到军校工作或学习，壮大了革命力量，使这所学校变成“革命的

^① 《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录》。

大本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恽代英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于二十日领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织讨蒋大会筹备会，在《武汉同志同胞公鉴》中，愤怒谴责蒋介石为“党贼”，号召革命同志对蒋不容“丝毫之姑息”，誓“与蒋贼作百倍之奋斗！”^①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恽代英和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四十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联名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恶阴谋，指出如不去此“民众之蠹贼”，“革命群众将无噍类”。同日，中央军政学校各期学生和武汉群众，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参加大会的达三十余万人，会上群情激愤，高呼“打倒叛党的蒋介石！”武汉三镇掀起了反蒋高潮。

在讨蒋声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恽代英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恽代英和瞿秋白、毛泽东等站在一起，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批评，迫使陈独秀作了检查。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危机开始表面化，汪精卫的叛迹也日渐明显。五月十七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首先在宜昌叛变。由于国民革命军主力调往河南前线，武汉后方空虚，情况十分危急。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动广大民众保卫武汉。恽代英将中央军政学校的学生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整编为中央独立师，亲任党代表，率部参加了讨夏斗寅的战

^① 《革命生活》第63期，1927年4月26日。

斗。二十二日，经过激战，讨夏军队克复咸宁。重见天日的咸宁人民当天举行了五千人的祝捷大会。恽代英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热情称颂叶挺和国民革命军，并分析了胜利的原因，指出：“我们所以胜利，是因为不怕死，人人都有死的决心，而且我们每次打仗都得着工农的帮助，……我们很自信为保护人民利益而战一定是胜利的，无论那一个再要来压迫人民，我们是仍要继续打倒他的。”^①

继夏斗寅叛变，又发生了“马日事变”，接着汪精卫举行了“分共会议”，开始镇压革命，武汉三镇沉浸在白色恐怖中。

疾风知劲草，岁寒识松柏。反革命的屠杀，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还在七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代行中共中央政治局职权。“七·一五”事变后，临时中央派恽代英和李立三、邓中夏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前往九江、南昌，到叶挺、贺龙部组织革命力量，准备南征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

(八)

恽代英到达九江后，形势突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决意“清共”，令二方面军中“著名的同志退出C.P”。^②是坐以待毙，还是举行武装起义？在这紧要关头，恽代英和李立三、邓中夏等商议，并征得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5日。

^②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意，向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暴动，树起武装斗争的大旗，回击反动派的进攻。

周恩来接到恽代英等的建议后，立即向临时中央报告。临时中央常委会分析了敌我形势，同意在南昌举行暴动，派周恩来赶赴南昌，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

正当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七月二十七日，张国焘来到九江，传达所谓“国际来电”，企图阻止起义。恽代英、贺昌、关向应等立即反对。恽代英愤怒地说：“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当张国焘继续鼓噪时，他警告张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①

三十日清晨，恽代英和张国焘一同乘车到达南昌。前敌委员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继续散布机会主义的调子说：起义有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能动，要持慎重态度。他甚至要贺龙、叶挺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部离开部队，把军队交出去，免得树大招风。张国焘的发言遭到委员们的反对。周恩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起义不能拖延，更不可停止！恽代英气愤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②张国焘十分孤立，迫于形势只得同意起义。

八月一日凌晨，“叭——叭——叭”，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一队队身穿灰色军装，胸飘红色领巾的起义部队

^①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93页。

^②《八一南昌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7月版第36页。

冲上南昌街头，向反动军队展开了猛攻。黎明时分，枪声停息，城楼上，起义部队的战旗光彩夺目，迎风飘扬，南昌沉浸在一片胜利的狂欢中。

这一天，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参加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未到）、周恩来、贺龙、叶挺、恽代英等二十五人组成，内设主席团，由宋庆龄、邓演达（未到）、恽代英、郭沫若等七人组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执行机关。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八个单位，恽代英担任宣传委员会的代主席。同日南昌的《民国日报》刊登了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委员签署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说：“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实殊途而同归。”

南昌起义使反动派惊慌失措，汪精卫反革命集团诬蔑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叛党叛国”，“均著开除党籍及褫夺职权”，并下令“缉拿讯办”。^①南京、武汉的反革命势力纠合起来扑向起义军。

面对强大的敌人，前委决定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北伐。八月三日至五日，起义部队按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开始南征。

这时正值三伏天气，骄阳似火。部队艰难地行进在赣南山区。天气酷热，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同时宣传工作又做得很差，士兵们不明行军的意义，有一部分部队士气低落，不少人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9日。

开了小差。行军仅几天，部队就几乎损失了实力的三分之一。

“怎样才能振作士气呢？”恽代英认为必须加强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他对起义军宣传队的女同志们说：“你们要善于把我们的革命任务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才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战争就会得到胜利。”^①行军途中，他身先士卒，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战士们，激起他们的革命激情。他身患肺病，组织上照顾配给他一匹马，但他将马让给生病和体弱的同志骑，自己与战士一起行进在山间小道，战士们深受鼓舞，他们说：“既然恽代英同志都不怕苦，我们还怕什么苦！”^②

九月下旬，起义军进到广东潮汕地区，不幸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终因众寡悬殊而遭受了挫败。起义军被打散后，恽代英从海滨小镇——甲子港乘船到达香港。周恩来、叶挺、彭湃等领导人也陆续抵达香港。

十月十五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会议改选了广东省委，仍由张太雷任书记，恽代英被选为省委常委，主编省委机关刊物《红旗》。随后，恽代英回到广州，协助张太雷工作。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正式作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十二月初的一天，省委又召开紧急会议，解决起义准备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恽代英在会上宣读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以及事先草拟的政纲、宣言、告

^①胡毓秀：《第一批女兵》，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初选稿第1卷第1集。

^②1979年8月13日访问胡毓秀记录。

示等，经讨论，大会依次通过了这些文件。会后，代表们各赴工作岗位，迎接革命风暴。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一时许，原由叶剑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官教导团一千多人，在驻地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会上，恽代英继张太雷后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了帝国主义，叛变了革命，撕毁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穷凶极恶地屠杀我们工农群众。他们是新军阀，已不再是革命的了。全国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和希望都落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肩上，我们要把这重担坚决地担当起来。”^①

恽代英讲完，由叶挺布置战斗任务。

三时三十分，起义的士兵和工人纠察队，冲向伪公安局、军营、邮电局……。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广州城，起义取得了胜利。

当天，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炮火中诞生了，恽代英担任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这时国民党的军队，在英、美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蜂涌而至，猛攻广州。十二日张太雷牺牲。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恽代英的身上。他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他坚信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鼓励周围的同志们说：“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我们干它三十年，革命决不会一事无成！”^②

①刘政：《广州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58页。

②陈同生：《恽代英同志给我的教导》，见《老共青团员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十三日深夜三点钟，恽代英和最后一批战士撤离了总指挥部，迎着晨曦踏上了新的征途。

（九）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撤退到香港，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寻找、接待广州起义后流散在港、九的同志，将他们安全转移到上海或其他地方，保存下这批革命的火种。同时继续负责编辑广东省委的《红旗》杂志。不久，沈葆英从汉口也来到香港，协助恽代英工作。

当时，由于坚持地下斗争，党的经费常常中断，因此他们的经济很困难，生活异常艰苦。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恽代英身体更加消瘦了，沈葆英心中十分难过。恽代英却非常乐观地对沈葆英说：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他们互相鼓励，把真挚的夫妻感情建立在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中。

一九二八年六月，恽代英化装成风水先生，从香港赴广西贵县，作为中央代表出席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在他的指导下，会议决定将广西特委改为广西省委，选举新的省委，并通过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决定。

党的“六大”以后，恽代英被调到上海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主要负责编辑党刊《红旗》。他在该刊上撰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宣传党的“六大”路线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

祸国殃民的罪行，鼓舞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这一时期，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目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尤其对蒋介石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残杀民众，实行个人独裁的罪恶行径深为不满，但又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政策，因此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辟一条中间道路。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则迎合这部分人的心理，打出将国民党改组为“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党”（即改组派）的旗帜，作为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资本。当时不少人没有识破汪、陈的反动实质，赞同并积极参加改组派，其组织一度发展上万人。

恽代英为揭露改组派的实质是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新旗帜”^①，并驳斥改组派的种种谰言，撰文强调中国民主革命“一定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为主力”，才能获得胜利。而所谓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纯是汪精卫等辈欺骗民众的“一句鬼话”。小资产阶级若脱离无产阶级，必然“投降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一九二八年底，英国公使乘英国军舰到南京，与蒋介石缔结了中英关税条约。恽代英写了《英国的船又在南京开炮了——又是一个“南京条约”》，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新阴谋。他写道：“英国的船又在南京开炮了！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卖国贼

^①代英：《新的军阀混战与改组派的作用》，见《红旗》第22期，1929年5月21日。

^②代英：《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见《布尔塞维克》第4期，1929年2月1日。

为庆贺他们双方的成功而开炮，然而每一炮都打在我们中国工人农民的身上。每一炮都打在我们中国工人农民的心上。”^①

当时新军阀混战，烽烟四起。恽代英指出这种因“分赃不均而相打”的狗咬狗的战争，使人民“陷入困苦颠连之境”，他大声疾呼：只有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建立我们工农兵士贫苦民众自己掌握政权的国家”，“才可以永远灭绝国民党的毒害，灭绝军阀战争！”^②

恽代英以饱满的政治激情，歌颂了工农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迫害、屠杀。恽代英愤怒地抗议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针对帝国主义的法权调查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当局应改良监狱的谰言，鲜明地写道：“革命群众所要的，是根本毁坏现在的监狱，根本打倒反动的统治阶级，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决不仅仅是要求监狱改良——改良一点，然而仍旧保留着这种东西，好让人家来关禁他们自己。”^③

恽代英在这个时期的文章，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评价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第三党等方面，也还存在一些“左”的情绪。

一九二九年末，恽代英被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他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各省书记来上海汇报工作，周恩来无法分身时，均由恽代英去接谈，并直接作出决

①见《红旗》第7期，1929年1月2日。

②代英：《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绩》，见《红旗》第17、18期合刊，1929年4月13日。

③稚宜：《打破中国的监狱》，见《红旗》第45期，1929年9月16日。

定。恽代英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总是表示同意或照办，从未提出异议。当时大批干部从莫斯科回国，为了使他们尽快熟悉国内情况，明确工作任务，党中央举办了干部训练班。恽代英担任班主任，主持班务工作。他和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同志担任教师。训练班源源不断地向各地输送了大批得力的干部，使党的各级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那时，沈葆英生了一个男孩，恽代英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作管仲那样的人，便给他取了希仲的名。沈葆英身体很弱，奶水不足。恽代英每天工作到深夜，还继续开夜车译书，得来一点稿费，给孩子买奶粉。他经常鼓励沈葆英说：“目前困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阶级敌人存在，目前要打击敌人，就要面对着困难，不在困难面前徘徊，却步。……我们艰苦奋斗，也是为了换取下一代光辉的未来。”^①

（十）

一九二九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军阀又重新开战。中国革命力量乘时发展起来。这时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李立三头脑渐渐膨胀起来，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主张全国暴动。

恽代英首先觉察出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作了抵制。一九三〇年春，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厦门召开，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指导。福建省委“在中央代表恽代英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很顺利完成了大会的任

^①1981年7月访沈葆英记录稿。

务”。^①这次大会决议虽然也有“全省总暴动”之类“左”的词句，但在制定具体任务时，却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决议”强调福建省委的主要任务是深入与扩大土地革命，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的工作。特别是“决议”明确指出闽西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闽南方向发展，而不是按照李立三的主张向敌人力量较强的广州方向发展。这些正确的意见遭到了李立三的严厉批评。他在以中央名义给福建省委的信中，指责恽代英犯了“策略错误”，强令福建省委推行左的冒险主义策略，要红四军“出击梅县、大埔，向韩江下游发展”^②，作为他将全国红军集中夺取武汉、广东的左倾冒险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会后恽代英视察了闽西苏区，亲眼看到“闽西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他们驱逐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军阀，分配了土地，改良了工人的生活”。^③这一切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他饱含激情地写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两文，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二、三月《红旗》第八十三、八十七期上。

四月初代英回到上海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了李立三左的错误。李立三不仅没有接受他的正确意见，反而给他扣上“调

①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福建党代大会向中共中央报告，转引自连尹：
《恽代英同志在福建二、三事》，见《理论与实践》1981年第2期。

②中共中央1930年3月11日给福建省委的信。

③代英：《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见《红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先后调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

五月六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今上海第五毛纺织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突遇上“抄靶子”。①他虽然装扮成工人模样，机智地称自己是“王作林”，但巡捕见他“带眼镜，有水笔、手表及四十元钱”②，遂生疑心。随后又在他的附近搜得传单一包，便将他押至巡捕房。后以共产党嫌疑被引渡到上海伪公安局，复又转押到龙华伪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一年二月被押往南京江东门外的伪中央军人监狱，关在“星”字监房。反动派虽没识出他是恽代英，但仍以“工人擅自开会，也有罪”，判了他五年有期徒刑。

狱中生活极其恶劣，饭不足量，里面还夹杂着砂粒和其它脏物，有时甚至从饭里拖出老鼠尾巴来；开水也不够喝，经常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为了改善狱中生活，反抗虐待，恽代英领导难友们起来与反动当局作斗争。“八一”纪念日那天，他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和意义，鼓舞难友们的斗志。他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了一本解释党的“十大纲领”的工人读本。

在狱中，恽代英还写下了不朽的诗篇《狱中诗》：

浪迹江湖数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拚忧患寻常事，

①抄靶子，即搜查行人。

②恽代英1930年5月在狱中给党中央的信；见《来鸿去燕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73—274页。

留得豪情作楚囚。①

这是恽代英的绝笔。这气吞山河的诗句，蕴含着他对战友深厚的情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坚强信念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一九三〇年八月，周恩来、瞿秋白相继从莫斯科回国后，积极设法营救恽代英。当事情有些眉目，组织也通知他准备提前出狱时，不幸被叛徒顾顺章出卖。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他为了活命，除了将党中央的组织情况密告敌人外，更首先供出恽代英化名王作林尚在南京狱中。蒋介石得此确讯后，又惊又喜，急令伪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查对。

四月二十八日，王震南来到狱中，洋洋得意地拿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向恽代英劝降。恽代英轻蔑而自豪地说：

“我就是恽代英！”敌人劝降碰壁，便立即将恽代英加上镣铐，关进了“智”字单人监房。

蒋介石见劝降阴谋失败，亲下手令立即将恽代英就地枪决。

四月二十九日中午，难友们正在吃饭，忽听过道里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这歌声震撼了每一个“犯人”的心，他们停箸

①恽代英的《狱中诗》原件尚未发现，解放后发表的均为后人的回忆。对这首诗有两个出处，一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的狱中诗；一为周恩来1953年亲笔录的狱中诗（见《中国青年》1978年第2期）。这两首基本相同，但有两个字不同，第1句第5个字，前者为“忆”，后者为“数”；第3句第2个字，前者为“挨”，后者为“拊”。我们取周恩来抄录的狱中诗。

望着过道。

“啊，代英！”难友们看到刽子手们押着恽代英走过来，热泪夺眶而出。恽代英神色泰然，拖着沉重的脚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牢房，来到狱中菜园地边。

“恽匪代英跪下受刑！”前来监刑的王震南嚎叫着。

“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下跪的！”恽代英严词拒绝。他面对黑暗阴森的监狱和国民党士兵们，发表了演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恶果！……”

他慷慨激昂的演讲使敌人惊恐万状。王震南急令执刑。可是执刑者两手哆嗦，好久也扳不动枪机。伪执刑官无奈，只得换一个姓朱的看守开枪。

恽代英临危不惧，振臂高呼：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砰，砰……”枪声响了，恽代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恽代英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周恩来在他逝世十九周年时曾题词赞扬说：“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附记：本文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注明出处者外，还访问了沈葆英、吴华梓、郑南宜、恽耀苍、恽希仲、胡治熙、夏之栩、温济泽、易礼容、刘仁静、魏以新、胡毓秀等同志。

刘和珍

江西农大党史教研组邓友梅执笔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中的光荣牺牲者——刘和珍烈士，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步学生的优秀代表，是站在反帝反封建最前列的英男女战士，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①

(一)

刘和珍生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江西南昌人。祖籍河南。其父六岁时，随其祖父母从河南逃荒到安徽，中途失散，流落在合肥，被一个名叫阮贞瑞的举人留下来做儿子，改名阮豫。阮贞瑞的妻子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又把阮豫当成义子，复改名刘鹤鸣。阮贞瑞出任江西省袁州知府时，把刘鹤鸣当作亲信带到江西，管理内衙事务。刘鹤鸣来到江西以后，积蓄了一点钱，在南昌市毛家园买了一幢房子，前后两进共十间。一九〇〇年，刘鹤鸣同何氏结婚，生了两女两男，刘和珍居长。一九一八年，刘和珍父亲病故，家里生活一天天困难起来，一弟一妹也不幸夭折。由于家境清贫，母亲何氏每天绩麻纺纱到深

^①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夜。和珍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母亲挑水、劈柴，或从事其他家务劳动，从小就养成了生活朴素，好学上进的品德。一九一八年秋，刘和珍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免交学杂费和伙食费的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她性格爽朗，乐于帮助同学，深受同学赞扬。熊元芬同学家在农村，每逢星期六见别的同学高高兴兴回家时就掉眼泪，刘和珍便把她带到自己家里，象亲姐妹一样款待，在校几年，一直是这样。杨銓同学整天埋头读书，不问国事。刘和珍便温和地对她说，读书要立志救国救民，为改造社会作准备。帮助杨銓正确认识读书的目的。熊元芬同学爱看小说，不认真学习功课，刘和珍劝导她要认真学习治国救民的本事，掌握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本领。刘和珍对自己的学习要求很严，不仅刻苦攻读各门功课，还利用课外时间，阅读大量进步书报。如《新青年》、《新潮》、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南昌各校爱国学生纷纷响应。五月十二日，南昌学生组成联合警告团，十七个中等以上学校三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南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冲出校门，也走上街头，刘和珍手拿大卷传单，跑在队伍的最前列。^①当天午后，各校学生分别组织宣传队，沿街逐巷，散发传单，演讲反帝爱国的重要意义。刘和珍一面散发传单，一面在街头讲演。她痛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侮和宰割，指责袁世凯为了登上皇帝宝座，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她大声疾呼：国

^①参见《五四运动在南昌》，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要靠全体民众。她的讲演激发了广大听众的爱国热情，在场的兵士有的很有感触地说：不是先生的演说，我们还不知道小日本如此欺侮我国，我们一定要加紧操练，准备奋死报国。在南昌学生联合会的支持下，刘和珍积极参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活动。在她的带领下，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组成宣传小组，和全市学生汇合在一起，沿街逐店搜缴日货，凡各种日货商标尽行撕毁，查出的日货堆在皇殿侧体育场焚烧。从此，刘和珍开始了她革命的生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锻炼成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真正勇士”。①

(二)

刘和珍在女师带头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被誉为“江西妇女运动的火车头”。当时的南昌女子师范学校，有各种各样的束缚学生的“校规”：每个学生发两块红白纸牌牌，在校时红牌牌挂在学监的房里，离开学校必须由家长持白牌牌交给学监，然后学生领取红牌牌，随家长一同离校，否则不准出校门半步。学校还严格规定：学生在校不准会客，不准与外界通讯联系，不准参加校外活动。否则，轻则记过，重则开除学籍。学校当局企图用这种强制手段，把学生囚禁在牢笼里，使她们同外界隔绝，脱离社会革命运动。刘和珍和南昌学生联合会联系，成立了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成立后，发表了宣言，散发了告家长书，矛头指向“三从四德”，抨击学校和教育当局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束缚学生。在声势

①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浩大的学生运动面前，在南昌各校进步师生的支持和声援下，迫使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金振声取消了多种束缚学生的禁规。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刘和珍这个带头人却受到了“记大过”的处分。学校的布告是这样写的：“查戊班学生刘和珍，目无法纪，不遵守校规，聚众要挟学校，本应开除学籍，姑念初犯，着记大过一次，以儆效尤。”^①布告贴出，全校哗然。心软的女友悄悄地为她落泪，许多同学纷纷去安慰她。她说：“我们从此能和男生一样自由地进出校门，能参加校外许多活动，这就好了。学校不敢开除我，记个过算得了什么？”^②刘和珍勇于自我牺牲、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深受女子师范进步师生的敬佩。

一九二一年，刘和珍率领女师同学又一次向封建势力挑战。她带头剪发，剪得同耳根一样齐。她的母亲担忧地说：“这是冒险的事，学校怕容不了你，准备回家吧！”^③她向母亲表示：“事情总要有人带头，开除不开除现在不管，准备同校长斗争到底！只要大家齐心，很可能开除不了。”^④在刘和珍的带动和影响下，很多同学也跟着剪成短发，两三天之内，剪短发者不下百人。其他女校的学生也纷纷响应。这件事，震惊全女师，轰动南昌城，开创了江西女子剪发的新风，推动了社会改革，但也遭到封建势力控制的一些舆论界的攻击和谩骂。江西《和平报》为此刊登了一则讽刺、指责剪发的新闻，说：“女人剪发成什么体统，弄得这样不象男不象女的！”^⑤

①②③江西文史资料选辑《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1981年10月出版。

④⑤江西文史资料选辑《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1981年10月出版。

由此可见那时发动女子剪发，的确是一场严重斗争。刘和珍在积极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妇女民主的同时，大力组织男女青年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后，方志敏在九江组织反对教会学校压制学生的民主自由，强迫学生做礼拜、读《圣经》的斗争。教会学校竟无视学生的要求，蛮横无理地开除方志敏。南昌学生联合会闻讯，立即号召全省学生起来同迫害学生的反动教会学校作斗争，并在各校代表倡议下，组织了江西各界反基督教大同盟。刘和珍作为学生联合会的女师代表，参加了反基督教大同盟。她积极扩大这个爱国组织的成员，大力开展反对教会推行奴化教育的斗争。就在这个时候，南昌一所教会学校——豫章中学有些学生，因“圣经”考试不及格，被学校当局宣布不准升级，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洋校长”大发雷霆，扬言要开除为首的代表。刘和珍率领女师同学，声援豫章中学学生的斗争，义正辞严地驳斥“洋校长”说“在中国的国土上，外国人无权开除中国学生！”^①学生们集体前往教育厅请愿，强烈要求废除不合理的制度，教育厅长理屈词穷，不得不命令各教会学校，外国人只能当董事，推选中国教员当校长，取消圣经课和强迫做礼拜的规定，斗争取得了胜利。事后，反动教育当局授意学校，通知刘和珍的家长：“近查贵子弟刘和珍旷课甚多，望贵家长严加约束。经决定学期考试成绩如不及格，即令休学一年。”^②妄图用考试来压服她。学期考试时，刘和珍门门得了优秀，反动当局的阴谋又宣告破产。

^{①②}江西文史资料选辑《南昌学生运动回忆录》，1981年10月出版。

为了联合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力量，一九二一年冬，孙师毅、钱鸿伟、刘和珍等人发起创办“觉社”（觉悟青年之社）。“觉社”开始只有十三个社员，后来发展到三、四十人，是五四运动后江西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它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对男尊女卑，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它组织青年传播新思想，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与媚外卖国的封建军阀作斗争，在江西青年中起过良好作用，有一定的影响。一九二二年四月，经袁玉冰提议，由“改造社”、一平印刷局、“觉悟”、《大江报》等进步团体发起，在南昌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并追悼黄爱、庞人铨两烈士大会。大会在江西教育会举行，有二十多个团体、两千多人参加，其中五分之一是工人。会议大厅正中悬挂着“劳工神圣”四个大字，两旁是黄、庞两烈士遗像，四周挂满挽联和挽词。“觉社”的挽词是：“血花染赤湘江水，烽火烧红漆黑天”。有一次，刘和珍谈到，中国女子长期受封建压迫，深藏绣阁，坐井观天，要赶上时代潮流，求得自身解放，需要办个刊物，以便与各地学校交流思想，研究学问，陶冶品德，抨击时弊。她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一致推选她担任《江西女子师范周刊》的主编。一九二二年九月，袁玉冰写了篇《江西的出版界》，对刘和珍主编的《江西女子师范周刊》作了高度的评价，赞扬它很能表现江西女界，“不单是女界的‘明星’，就是在江西的出版物中，也算是很不容易看到的”。^①文章特别指出，“刘和珍的《装饰与人格》，很可以为一般欢喜装饰的女学生当头一棒”^②，

^{①②}见《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

并且希望她们能够言行合一。

一九二三年三月，江西军阀蔡成勋封闭南昌文化书社，逮捕了江西民权大同盟和马氏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袁玉冰，通辑赵醒侗和方志敏。刘和珍闻讯后，非常焦急和愤慨，千方百计营救袁玉冰。她一面发动江西舆论界，集中火力揭露和谴责军阀侵犯人权的罪行；一面写信给北京的进步同学，要求他们呼吁北京方面的报刊，予以披露，对江西军阀施加压力。经多方营救，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袁玉冰被保释出狱。

(三)

一九二三年秋，刘和珍得到师友的援助，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预科，后升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进入女师大后，刘和珍一面勤奋学习功课，一面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她经常抽空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讲《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并在同学中广为传播。她很喜欢读鲁迅的文章。鲁迅编辑的《莽原》半月刊发行后，她虽然经济比较困难，但节约其它开支，预订了全年的《莽原》。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出版时，她是第一个到“未名社”的购买者。由于她思想进步，成绩优秀，性格刚毅，态度和蔼，热情洋溢，办事干练利索，又善于团结同学，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信赖。因此，入学不到一年，就被选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并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一九二五年，她还被选为北师大、女师大江西同乡会职员，负责联络交际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领导和全国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

大好形势推动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五年，北京爆发了女师大风潮。这一革命风潮是为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封建反动统治而引起的。杨荫榆是外国资产阶级教育和中国封建教育共同培植起来的。她在学生面前常常以“婆婆”自居，认为学校好比封建大家庭，校长就是家长，有权对学生严加管教，在学校极力推行封建礼教，因此学生对她极端不满。直接引起女师大风潮的导火线，是杨荫榆包庇饭桶教授雷某。雷某教书很不称职，学生多次要求学校辞退这个“教授”，但杨荫榆置之不理。学生们不得已，要求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向校长交涉。杨荫榆不仅不接受学生会的合理要求，反而污蔑学生会职员刘和珍等人有意捣乱，叫嚣要严加处理。于是一场风潮在女师大爆发了。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以刘和珍为主席的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讨论驱逐杨荫榆的问题。会议通过决议，从当天起不承认杨为女师大校长。学生们把这一运动称之为“驱杨”运动。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的阻挠、破坏，结果风潮闹了数月，呈文递了无数，部里也派人来过几次，经过三个总长而校事毫无着落。这期间，杨荫榆则施展种种卑劣伎俩，破坏女师大的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女师大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杨荫榆窜到学校，图谋主持大会。学生早已不承认她是校长，即派学生自治会职员刘和珍、许广平、郑德音、张平江、蒲振声、姜伯缔等六人为代表，同杨荫榆交涉，请她退出会场。杨恼羞成怒，对学生施行报复。当天下午，她在西长安街西安饭店宴请女师大评议会会员七人，密谋开除学生。五月九日，她在女师大公告栏小黑板上贴出一张布告，污蔑刘和珍等六人“不守本分，违背校规，鼓动风潮，

扰乱秩序，侮辱师长，败坏学风，怙恶不悛”^①；并决定开除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许广平、姜伯缔等的学籍，立即出校。这张非法开除学生的布告，引起全体学生和进步教师的无比愤慨。同学们取下了公告牌，查封了杨荫榆的办公室和寝室，贴出了禁止她进入女师大校门的布告：“杨荫榆先生注意！同人等早已否认先生为校长，请以人格为重，幸勿擅入校门。学生自治会五月十一日。”^②于是，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五月二十一日，杨荫榆在太平湖饭店召开校务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她滥用女师大名义连续印发《告诫学生函》、《致学生家长函》、《对本校暴烈学生之感言》，污蔑学生，开脱自己，并将开除六个学生的非法决定呈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要求给以支持。针对杨荫榆的造谣生事和专横跋扈，五月二十七日，鲁迅、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李泰恂、周作人等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公开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五月二十八日，刘和珍等六人到教务处质问教务处长薛培元，为什么将点名册上刘和珍等六人名字用墨涂掉？薛培元语无伦次，颠倒是非，学生便将其逐出学校，而由进步师生共同维持校务。六月二十七日，以刘和珍为首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在《京报》刊登紧要启事：“启者，敝校早已声明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及否认其对校事之一切行动，兹闻杨氏仍在校外用校长名义滥聘教员及招考新生，殊属离奇。现敝校各系主任一概照旧，在教育部未派继任校长以前，所有聘请教员，招考新生以及一切校务，概请各

①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第106期。

②见1925年6月3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杨运动特刊》。

系主任会同负责办理，恐外间误会，特此声明。”^①

在女师大风潮期间，杨荫榆把刘和珍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无法无天的暴烈分子”。刘和珍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但她革命意志坚定，不畏强暴，从不为势利所屈服。当杨荫榆密谋将她开除时，她也毫不畏惧，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开除不足惜，有恨杨不去，校务不能改进。

一九二五年七月，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指使杨荫榆制定一个捣毁女师大，迫使学生离开学校的计划。为了保护学校，刘和珍和护校同学坚持夜间睡在校门口的石阶上。八月一日，在军阀政府的支持下，杨荫榆带领一队武装军警及其私党一百多人，占据女师大，并用断绝学生饮食、水源、关闭电源等恶毒办法，迫使学生离开学校。刘和珍率领全体同学，针锋相对，宣布绝食，坚持不出校门。杨荫榆唆使军警殴打学生，刘和珍等二十余人被侮辱和殴打，受重伤者五人。当天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各校、各界人士发出紧急呼吁：“同人等为教育界争人格，为学校争存亡，为女子争人权计，誓全体饿死于女师大，绝不出校门。数百生命危在旦夕，切望援救，有如饥渴。”^②

八月六日，段祺瑞反动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决定解散女师大，由教育部接管。八月十日，教育部正式颁布女师大停办令。八月十七日，教育部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由章士钊兼任筹备处处长。八月十九日、二十日及二十二日，章士钊命令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领武装警察和男女流氓四百人，三次打进女师大，强占校舍，逼迫所有学

^①1925年7月8日《京报》。

^②1925年8月2日《京报》。

生离校。刘和珍带领全校同学同刘百昭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学生自治会发出通电，向各界庄严宣告：“此身可死，此志不渝，苟威武之再加，决誓死以殉校。”^①二十二日，男女流氓第三次打进女师大时，刘和珍和同学聚集成团，手挽着手，誓死抵抗。刘百昭命令“男女武将”强拉学生出校，七、八人挟一人，或十余人挟一人，拳足交加，恣意凌辱。许多学生的头发被扯断，衣服被撕破，财物被抢走，呼号啼哭，惨状目不忍睹。在军警流氓摧残下，女师大学生受伤多人，重伤两人，失踪七人。共产党员李桂生与军警流氓搏斗中，被打得多次昏死，经抢救才苏醒过来。反动教育当局把劫持的刘和珍等同学，关在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里，百般折磨，但刘和珍始终坚贞不屈，她说：“同学们！受挫折不要灰心，要重新团结起来，我们要有信心，真理是会战胜强权的。”^②刘百昭扬言要派武装押送刘和珍回南昌。她听到这个消息后，轻蔑地说：这事倒有趣，押回去我又来，其将奈我何！

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领导和鲁迅等进步教师的大力帮助下，女师大学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进行复校斗争。她们在宗帽胡同租赁房子，积极筹备开学。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女师大在新校舍举行开学典礼，鲁迅也赶来参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死亡，但看今天有许多同学教员来宾可知压力是压不倒人的。”^③许寿裳在会上说：“为校长而解散一校，为文明国所无，解散后怕

①1925年8月20日《京报》。

②《刘和珍烈士传略》，载《不朽的革命战士》，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5月版。

③1925年9月22日《京报》。

骂，又另挂一块招牌骗人，简直是中国之耻辱。”^①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北方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段祺瑞政府的要员纷纷逃离北京。章士钊于三十日去职，到天津去了。当天下午五时，女师大学生六十余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兴高采烈地由宗帽胡同返回石驸马大街原校舍。鲁迅冒着风雪，喜气洋洋，亲自护送女师大学生返校。刘和珍和学友们将笤帚绑在竹竿上，蘸上墨，把章士钊书写的“女子大学”招牌涂掉，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牌重新挂上，并发表了女师大复校宣言。宣言指出：“我们为了反抗强权，为了伸张公理，为了保全人权，不得不恢复女师大；我们为了援助被压迫的同学，与维持正义与人道，我们不得不取消章士钊所办的监狱式的女子大学，而恢复我们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②女师大复校的第二天，刘和珍、许广平等二十四名在这次斗争中的骨干，曾在校门口合影留念。鲁迅在照片上端题词：“民国十四年八月一日，杨荫榆毁校，继而章士钊非法解散。刘百昭率匪徒袭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蒙从来未有之难，同人等敌汽同仇，外御其侮。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此之谓也。既复校，因摄影，以资纪念。十二月一日。”

刘和珍在“驱杨”运动和复校斗争中，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干练坚决，百折不回；而对老师和学友却总是面带笑容，态度亲热温和。她的这些优秀品德，深受女师大师生的赞扬。许广平回忆刘和珍时说：“如果当时没有刘君融洽各人，笑咪咪的温和感动各人，我知自治会早当拆散了！就这一点，也可

^①1925年9月22日《京报》。

^②1925年12月2日《京报》。

算是自治会损失了一个‘柱石’。而且这一点实在不容易修炼到，我相信，这种笑咪咪的，在全体的急激的颓丧的心，一起向前奔的人，就是做首领的才具，就是刘君的伟大不可及处。”^①女师大林语堂教授也说：“女师大被章士钊、刘百昭摧残，所以能坚持抵抗，百折不馁而有今日者，实一大部分是刘女士之功，可称全校革命之领袖。”^②

复校斗争胜利后，不少人松了劲，以为从此太平无事。刘和珍则不然，认为斗争还没有结束。她忧虑女师大的前途，更加勤奋地学习和紧张地工作，断然放弃寒假回南昌探望寡母、弱弟的机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刘和珍倡议、主持下，女师大学生和原女子大学的学生举行联欢会，到会的教职员和同学三百三十余人，刘和珍等四人演说，一致强调这次女师大复校，乃为全国女界争人格，不要再分谁是女师大学生，谁是女子大学学生，共同携起手来，“为建设一完备的女子最高学府而努力。”^③不久，刘和珍听到新任教育总长阴谋摧残教育的消息，她满腔义愤地用英语写了一篇作文，指出：“人常说，学生时期为最快乐之日，但我不敢赞同。……譬如吾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自我进校以来，即未见宁日，我不敢回忆我在校过去之生活。现在吾校已比较安宁，我正准备静心求学。但是又闻新任教育总长马君武氏又阴图扰乱教育界。若今日之安宁，我们又不能享受了。”^④刘和珍就是这样时刻忧

①许广平：《刘和珍和杨德群二君给我的印象》，1926年3月24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

②林语堂：《悼刘和珍与杨德群女士》，载《语丝》第七十二期。

③1925年12月13日《京报》。

④林语堂：《剪拂集》。

虑着女师大的前途。

(四)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军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冯玉祥的部队——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日本帝国主义反而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三月十六日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北京各界的无比愤慨，刘和珍强烈要求拿起枪来，反击帝国主义。她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非有枪不可”；“军阀不倒，教育事业就搞不好，打倒军阀后，我再当教师不迟。”^①

在党和李大钊的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立即展开了。三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北大、女师大等二百余所学校、团体的代表四百余人，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

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京总工会、总商会、学生总会等一百八十余团体和各校学生五千余人，按原订计划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抗议八国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正午十二时，两千多群众开始示威游行，经东长安街、东单、东四，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国务院请愿。游行群众高唱《国民革命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党的负责同志参加

^①1926年3月25日《世界日报》。

了示威游行。那天，刘和珍正患感冒，并且呕吐。为了动员和组织女师大学生参加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和请愿，她不顾自己的病痛，一大早就爬起来，急奔各寝室，通知各班同学作好准备。对于那些不太愿意参加这次游行、请愿的同学，她耐心地作了说服工作。出发前，刘和珍发表了简短而激昂的演说，然后带病走上街头，并亲自担任女师大队伍的指挥。下午一时，请愿队伍来到执政府的东辕门，段祺瑞丧心病狂，命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实行镇压。卫队有的开枪射击，有的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被打死和重伤事后致死的群众达四十七人，受伤者二百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年仅二十一岁的刘和珍在这次惨案中不幸遇害！鲁迅以极大的悲愤，记述了刘和珍牺牲的情景：“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实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①“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②刘和珍中弹牺牲前，对救护她，仍想扶她走的同学说：“你们

^①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②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载《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快走吧！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①她这种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是多么可贵啊！

“三·一八”惨案反映了中国人民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坚强意志，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打倒段张吴，中国才有和平可言。否则苟安就是送死。”^②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抗议段祺瑞军阀政府倒行逆施的反革命罪行和哀悼“三·一八”死难烈士的高潮。就在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的当天，北京一百五十三个团体组织北京惨案后援委员会。二十一日，北京一百九十余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各界废约驱段大同盟。二十二日，北京一百五十余团体集会，组成三月十八日惨案北京各界昭雪会。二十三日，北京学生总会发出紧急通告，决定北京各校自即日起一致罢课，下半旗，缠黑纱一星期，以志哀悼；同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北大三院召开“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哀悼刘和珍等牺牲的烈士。二十五日，女师大师生和北京各界人民隆重追悼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上午十时追悼大会开始。首由主祭许寿裳宣布开会，致哀词；次由刘和珍和杨德群之同乡，报告二人生平事略及十八日遇难详情；继由全体同学公祭。当学生代表宣读祭文时，会场上抽泣声四起，宣读者放声大哭，全体学生都哭起来。

弥天碧血溅京华，

① 春影：《回忆刘和珍》，《红灯》周刊第6期。

② 《向导》周报第147期。

风雪正凄迷，
哀我和珍，
悼我德群，
千古渺归期。①

.....

这是北京祭悼刘和珍等烈士的悲壮挽词。

在刘和珍烈士的家乡，江西女青年社于三月二十六日在南昌女子师范学校举行追悼大会，有一篇祭文中说到：“君身黄泉，君名青史，谁杀害君，千夫所指。”②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鲁迅用愠怒而悲愤的笔调，写出了《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感人肺腑的文章。指出：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证明了。

刘和珍就是这种“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少数中的一个。她的壮烈牺牲充分显示了中国妇女先锋的“勇毅”。她的英勇事迹，永远激励后继者的革命斗志。

附记：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访问了徐先兆、黄野萝、刘和理、杨奎、熊元芬、徐梅、陆晶清等老同志，查阅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收集的刘和珍烈士生平资料，《语丝》杂志和《新江西》杂志。

①1926年3月26日《京报》。

②共青团南昌市委编，《南昌青年运动大事记》，未刊稿。

曹 渊

马 子 魁

(一)

曹渊，原名新宽，字溥泉，安徽寿县曹家岗（现属小甸公社三岗大队）人，一九〇二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曹子修，是一个勤劳敦朴而富有反抗精神的农民。

曹渊自幼勤奋好学，深得父兄器重，由二哥带着他读私塾。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哥曹少修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家乡起兵讨伐袁世凯，攻打合肥。年仅十一岁的曹渊，跟随二哥为讨袁军递送信件，传达消息。讨袁战争失败后，曹少修被通缉，家中几间草房被烧毁，牲畜被抢光，一家大小流离失所，并遭到本族豪绅地主的歧视和辱骂。

讨袁失败及其家庭的不幸遭遇，对年幼的曹渊影响很深，他开始意识到敌人的残忍。这时二哥过着流亡生活，曹渊转到邢家岗，跟一位旧民主主义者、著名的书画家张树侯先生读书。曹渊不仅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而且喜欢谈兵论剑，曾手抄孙子兵法十三篇，不时阅读学习。

一九一九年冬，曹渊的父兄为了使他得到深造，又送他到芜湖补习英语和算术，准备投考中等技术学校。

一九二〇年上半年，芜湖教育界人士高语罕等人募款创办

了一所工读学校，不收学杂费。曹渊闻讯，欣然考入该校读书。这所学校系半工半读。曹渊入校后，既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又积极参加工场劳动。当时的工读学校被一般纨绔子弟歧视，认为是一个劳动场所。曹渊不然，他把劳动当作学习技能和培养自己革命精神的好课堂。当别人问他劳动苦不苦的时候，他爽朗地回答说：举世图快乐，谁辛苦？无数亿万人挣扎于轧轧机声间，汗血流干，尚不能获一饱，我等较之已无异天堂矣；且青年劳苦尚畏惧，更何言牺牲乎？“五四”爱国运动中，芜湖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曹渊入校后被选为学联会的代表，不久，便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六月，安庆学生、教员为了增加教育经费，向安徽省政府请愿，遭到镇压，发生了“六·二”惨案。芜湖学联积极声援安庆学生的斗争，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在这一斗争中，曹渊始终站在最前列，组织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次，曹渊和王逸常等人在芜湖大街上张贴标语时，发现反动警察在撕标语。他们把警察扭到警察局去讲理，质问警察局长：“我们贴的标语，你们警察局为什么要撕？这是破坏学生运动！”警察局长狡辩说：“凡是广告，不经警察局许可的，都不准张贴！”曹渊怒斥道：“这是革命的传单，是广告吗？”在群众力量的威摄下，警察局长只得认错。

曹渊既是芜湖学生联合会的骨干，社会活动日益增多，自然要影响到学习和做工。工读学校学监余小宋以曹渊等人考试不及格、未完成生产任务为由，强迫他们补考、补工。曹渊等人先是解释说：“补考可以，补工事实上办不到。”后因解释无效，同余进行辩论。余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竟张贴布告，

勒令曹渊等数人退学。全校学生大哗，要向校方提出严重抗议。曹渊等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学校实际负责人高语罕是当时全省闻名的进步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如果同余斗争下去，会使不明真象的人认为是对高语罕不满，使亲者痛，仇者快。因此曹渊致函高语罕等，指出余某不顾事实，不讲道理，偏听偏信，勒令许多青年退学，是处置失当。同时，表示自己愿意离开学校，对其他同学，望收回成命。结果，只有曹渊、陶久访二人离校，其他同学则继续留校学习。

一九二一年秋，曹渊考入芜湖安徽公立职业学校。入学不久，便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

一九二二年三月，芜湖人力车工人发动了反对封建军阀政府增加牌照税和资本家擅加车租的第一次大罢工。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罢工斗争，雇了一批流氓打手，包围人力车工人临时办事处，强迫复工。工人奋起反抗，将流氓打手们击伤二、三十名。工人也有多人受伤。事后，资本家向伪警察局控告，诬蔑工人聚众闹事，打伤他们的“长工”，要求逮捕闹事工人。警察局和资本家串通一气，立即要封闭人力车工人临时办事处，同时声言要传讯拘捕工人代表十余人。曹渊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向学联提出：“支援人力车工人斗争，如果让他们单独斗争，有被警察局镇压下去的可能。”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曹渊的提议。于是学联一面派代表同罢工工人会商应付警察局的干涉；一面致函警察局，提出“要传讯双方，不能单传讯一方，因为双方都有人负伤，谁打了谁，不能单凭资方一面之词。”警察局迫于当时学生的力量，不得不接受学联这一建议。传讯那天，学生乔装工人代表，当场摆出大量事实证明：所谓打伤的“长工”没有一个是工人，全是有名的流氓、惯窃犯、赌

痞。此时曹渊取出一张贴满了负伤者相片和犯罪事实的红纸，边指边读，某个是流氓，某个是惯窃犯，某个是赌痞，大声斥责资本家雇佣流氓，打伤工人，制造事端，蓄意闹事等罪恶行径。曹渊等人的这一勇敢行动，大大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大家一致高呼：“要求审判官逮捕所有罪犯！”“要求审判官逮捕资本家代表！”搞得警察局和资本家狼狈不堪，偷偷溜走。工人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在芜湖第二甲种农业学校青年团员薛卓汉、王逸常等人的帮助和组织下，职业学校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曹渊是该会的负责人。读书会的任务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传阅团刊《先驱》，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等进步书刊。

同年秋天，芜湖安徽职业学校发生时疫。由于校长李子寿、学监董质坚平日压迫学生，延长劳动时间，对学生健康漠不关心，致使一名学生病死，因此激怒了全体学生。学生会不顾校方阻挠，决定停课、停工一日，为死者开追悼会。追悼会场的两旁挂满了挽诗、挽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曹渊自撰自书的一副挽联：

子寿如此，人皆气死；
质坚不灭，我亦贪生！

在追悼会上，曹渊登台演说，揭露旧教育制度的弊端，痛斥学校领导人之罪行，声泪俱下。同学们在悲愤中开完了追悼会，突然有人动议：“不准散会，把李子寿、董质坚拖来，叫他们在死者遗像前默哀半点钟！”大家一致响应，立即有许多

人把李、董拖来。李子寿默默无言。董质坚大喊大骂：“反了！反了！这还了得！”同学们怒斥道：“反了又怎样？”“把他们赶出学校去！”于是李、董鼠窜而去。李、董被赶出学校以后，曹渊主持开了学生会紧急会议，决定邀请王坦甫、陈元溟等进步教师和学生代表组织校务委员会，主持学校工作，照常开课、开工；同时报告校董董事会，说明驱李、董的原因。

但李子寿、董质坚一面向校董董事会报告，要求开除曹渊等人；一面又报告警察局，说曹渊等人是过激分子，要求予以逮捕。芜湖学生既是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伍，警察当然不敢干涉，但校董董事会少数人却作出了开除曹渊等人学籍的决定。决定还未公布，王坦甫等教师已有所闻，认为处置失当。因为改革教育是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驱逐李、董也博得社会好评，现把“罪过”加在曹渊等少数人头上，与事实不符。他们一面要求董事会重新考虑，一面电告驻校委员朱蕴山。朱自上海复电支持。董事会经过复议，只开除曹渊、李坦（校学生会秘书）二人。校学生会不服，决定发表宣言，继续坚持斗争。曹渊、李坦认为这次的行动已获胜利，不能因个人的问题妨碍同学们的学习，表示愿意离校。离校前，他们发了一份宣言，说明驱逐李、董的原因和经过。离校时，该校全体师生及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安徽省立第五中学等校共四、五百人，挥舞旗帜，唱着歌，喊着口号，前往送行。曹渊、李坦告别了共同学习、战斗的战友、同学，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二）

一九二二年秋冬，曹渊怀着学习革命理论的目的，离家到

了上海。当时他有一位同乡同学胡萍舟（允恭）在上海阜丰面粉厂的资本家家作家庭教师。曹渊原指望通过这个关系，先谋个工作，然后找机会学习。哪知到了上海，想找个工作很不容易。在谋生无着的情况下，他依靠家中微薄的接济和胡萍舟的帮助，节衣缩食，租了一个灶披间（即楼下厨房）住下。他从胡萍舟那里借来《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书刊，如饥似渴地潜心阅读。一九二三年春，胡萍舟等人进上海大学学习，曹渊便和他住在一起，有机会就到上海大学去听课，并日以继夜地钻研马克思主义。他先后阅读了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等编撰的《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概论》、《社会进化史》、《世界工人运动史》等讲义，对革命理论和国内外形势，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革命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

一九二四年五月，曹渊考入黄埔军校，与许继慎、王逸常等共赴广州参加学习。曹渊进黄埔军校后，学习用功，训练刻苦，“常带典范令及社会主义书籍于袋中，在勤务休息时间，则精心研究，不稍怠忽。”^①曹渊不仅自己学习刻苦，而且处处关心帮助其他学员。有的同学对严格训练有畏难情绪，他便耐心劝告他们。他说：“中国革命现渐入正规，组织薄弱之民众，不能徒手毙敌人，正期待黄埔健儿作为先锋队。我辈到此，生命已献于革命，胥当帝国主义军阀之前，慰民众之殷望而完吾人之天职。日愁叹于操 溅血于作劳苦，岂革命青年之态度哉？”^②同时，曹渊还善于团结和帮助别人。同乡同学王

^{①②}王逸常：《曹渊烈士传略》，载《广东各界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大会特刊》，1927年4月。

逸常的爱人在上海病逝，要请假赴沪料理丧事。曹渊安慰他，劝他要节哀，不要向组织请假，不要影响学习。曹渊并商同许继慎、杨溥泉等军校同学，将所发的月薪汇集起来，交给王逸常汇到上海，托友人代办丧事。中学时代的同学李坦，在安徽屯溪警察局任秘书，曹渊闻讯后，写信劝告，请他不要为反动政府服务。李坦颇有悔意，不久便脱离了警察局，后来在曹渊等人帮助下，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曹渊在军校毕业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参加了接收曹渊入党的党小组会，并语重心长地说：“曹渊在学校读书期间，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现在入党了，今后更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政策，站稳党的立场，做党的忠诚战士，做革命军队的优秀指挥员！”^①周恩来的谆谆教诲，对曹渊的教育极为深刻，他当即表示：今后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好好学习，起先锋模范作用，决不辜负党与同志们的培养和关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曹渊以优异的成绩，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随后便被党派往黄埔军校教导团学兵连任党代表。

一九二五年二月，党为了加强黄埔军校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由周恩来领导，在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曹渊是“青军会”的骨干分子。可是，在“青军会”成立不久，蒋介石为了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与进步力量，指使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一伙国民党新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同“青军会”对抗。他

^①王逸常：《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载《长江日报》1980年1月6日。

们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政策，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妄图用封建反动的政治观点，把孙中山先生曲解成中国封建道统孔丘的继承人，并恬不知耻地到处兜售他们的反动谬论。曹渊等人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对那些自称孙中山的所谓“信徒”，加以揭露。他指出：中国革命正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你们连孙中山的革命目的都不理解，还要把孙中山拖入孔庙，吃冷猪头，这正是孙中山的叛徒，不是信徒。为了进一步揭露贺衷寒、鄧悌等人反动谬论的实质，“青军会”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设计了一幅漫画：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十分吃力地背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塑像，从公园里朝着阴森破败的孔庙走去，旁边站着洋人、军阀、党棍、财东们，都在拍手称快。这副漫画很快贴满了军校内外，反应强烈。曹渊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

（三）

一九二五年初，盘踞在广东惠州、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积极策划进攻广州，反对革命政府。二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这次东征的主力是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学生军。在出征前，周恩来召开了在黄埔军校工作的共产党员会议，进行思想动员。他讲述了这次东征的重大意义，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以身作则，起骨干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曹渊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按照党的要求，率领学兵连随教导第一团参加东征军的右翼作战。

三月上旬，教导一团攻占潮州。作为友邻的滇军，却由河源、老隆撤兵，使一团孤军深入。三月十二日，陈军林虎部万余众，乘机向我驻地棉湖猛烈反扑。一团官兵奋勇迎敌，损失惨重。此时曹渊和连长曹石泉（共产党员）率领学兵连勇猛出击，象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入敌人的纵深，击退了敌人的反扑。三月底，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关于棉湖一仗的战斗情况，据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记载：学兵连“自零时三十分与敌开始战斗，时而冲锋陷阵，时而白刃相接，时而绕攻侧击，斩杀无算，屡摧强敌，颇能得到战斗胜利，无奈该连人数仅六、七十名，虽然在上北湖东北河岸与敌耐战，而上北湖东南方仍有敌人密集部队向该连左翼包围。此时，总预备队早已用完，所余者惟特务连二十余人及机关枪一架，团长乃命机关枪迅速增援学兵连左翼，并以特务连一班为掩护队，令学兵连无论如何都要死守阵地。……敌乃不敢越雷池一步。”可见曹渊、曹石泉及他们率领的学兵连，在这次东征中，是建立了卓越战功的。

同年五月，隶属于广东政府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发动叛乱，形势异常紧张。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坚决主张下，六月调回东征军镇压叛乱。此时曹渊已调任一团三营八连连长，率全连官兵参加了战斗。六月十一日抵龙眼洞，与敌发生激战。黄昏，曹渊率第八连由山脚绕到敌人左翼，至十二日拂晓向敌发动攻击。时第三营副营长唐同德（共产党员）负重伤，曹渊复率全连由右翼策应，“卒以制胜，追击敌众得战利品颇多，当日进达广州市，杨、刘遂被截击潜逃沙面矣。”东征军在工农群众支持下，六月底取得了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后，国民革命军于当年十月一日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十月中旬，东征军占领了惠州后，曹渊随一师追击敌洪兆麟部，至河婆。洪兆麟见我第一团孤军深入，率六千余人反扑。激战半日，敌未退。时曹渊所率第八连为预备队，奉命增援。曹渊身先士卒，冒弹冲锋，全连随进，将敌击溃。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曹渊以战功卓著被调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第一营营长，驻扎于潮州、汕头铁路之南段庵埠。曹渊悉心训练部队，不图一日安逸。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东征军到达潮州时，蒋介石在一天下午，以东征军总指挥的名义，召集连以上的青年干部，在西湖公园一家餐馆里开会。会上，他宣布以不偏不袒的态度（自然是欺骗之词）听取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和左派青年军人对革命前途的意见。会上，缪斌等反革命分子发表了一大套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谬论，意在拥护蒋介石，排斥共产党。左派青年军人以蒋先云、曹渊、许继慎等为代表，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辩论，给予缪、贺等人以有力的驳斥。曹渊严正指出：革命是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而进行的，不是哪一派、哪一党可以包办的，而且你们所说的共产党人“篡夺”政权、军权有什么根据？事实恰恰相反，共产党员不争名，不图利，他们吃苦牺牲精神，在两次东征战役中，都表现得十分鲜明。例如唐同德的阵亡，蒋先云的负伤，其他任连、排长的牺牲更多，这都是中共党员的光辉典范。除此之外，又有哪些营长战死，哪些营长负伤？这不是表功，而是证明共产党员忠实于革命。曹渊等同志的言论，博得绝大多数青年军官的同情。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强迫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退出第一军。此时，曹渊因父病请假回家探亲，闻讯后，立即赶回广州。他对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反革命事变非常气愤，曾说：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了，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个新军阀。他坚决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主张对蒋介石让步，不予反击。对此，曹渊心中十分焦急。

(四)

一九二六年五月，党派曹渊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工作，任第一营营长，并被选为一营党小组长。他在党小组会上说：此次北伐战争的成败，关系到革命人民的生死存亡问题，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的成败问题。我们共产党员在此次战争中，要决心牺牲自己的一切，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五月上旬，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出师韶关。第一营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数十万发枪炮弹给友军唐生智部。当时从广东韶关到湘南的郴州，约三百余里山路，且粤汉路上沿线都有叶开鑫（军阀湘军总司令）的反动军队，任务异常艰巨。曹渊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他和连、排长等共同研究完成任务的办法。大家认为：这是党交给的任务，我们不能损失一颗炮弹，一粒枪弹，损害共产党的荣誉，而完成任务的关键在于依靠运输工人群众和全体官兵的谨慎和努力。因此，在出发的前一天，曹渊以党的负责人名义集合全营官兵，以清茶点心招待了参加运输的全体工人，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时把政府规定的工资，先发一大部分给工人，让他们安家，免除后顾之忧；并向工人说明任务的重要和艰巨，鼓励大家努力完成任务。运输工人

受到鼓舞，斗志倍增。行军途中，曹渊和连排长对运输工人随时随地给予帮助。有疾病的劝其休息，另雇零工代替。工人称赞说：曹营长同我们是一家人。曹渊经常教育大家说：“革命军为民众之工具。民众帮助革命军，是为其本身利益而热忱帮助；我们革命军应站在为民众利益的观点上，接受民众之帮助，不得稍有利用民众之心理。”^①由于军民团结，协同战斗，一营按期到达郴州，如数交点了枪炮弹药，没有丝毫损失。对此，友军感到惊奇和佩服。

此时，敌军正准备向衡阳方面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发动总攻，另有敌谢文炳四个团、唐福山两个团，在攸县集结，准备分别向安仁、耒阳进攻，企图切断唐部与广东方面的联系，瓦解第八军，占领湘南。当时，第八军仅有三十九团一个营在安仁淶田警戒；另有一个连在黄沙铺警戒；安仁实际上是一座空城。第八军迭电独立团告急，叶挺令第二、三营冒雨驰援，六月二日赶到安仁县城。未及休息，叶挺立派第二营赴淶田，第三营赴龙泉湾，分别派出一个连到黄沙铺警戒。三日下午，独立团同时接到二、三营报告，敌军各两个团分别进攻淶田及黄沙铺，友军退走，我军单独作战，处境十分危急。当时团部仅剩特务队、侦察队、机关枪连等直属部队，势难同时分兵增援。这时，曹渊运送枪炮弹药刚到郴州，未及休息，即率部冒雨赶到安仁。独立团党支部立即开会讨论，决定由第一营和团直属队全部增援二、三营，并于次日拂晓集中兵力向黄沙铺、淶田之间出击。党支部号召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第一次战斗中作出贡献，保证在战斗中起模范作用。曹渊首先响应

^①王逸常：《曹渊烈士传略》。

党的号召，并将支部决定在党小组会上作了传达，党团员表示：要勇敢战斗，坚决打败敌人。随后又召开军人大会进行动员，全体官兵也一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不怕牺牲，决心打败敌人。第一营在团长叶挺和营长曹渊率领下，连夜从安仁冒雨前进，下半夜便赶到黄沙铺。时第三营正与敌激战，飞弹如雨，不易辨别敌我位置，而全营官兵正急待上级下达攻击令。经过观察，叶挺和曹渊断然判定：“东面是我军，西面是敌军”。遂派侦察组寻找，果然与第三营取得联系，一营立即投入战斗，至四日四时左右，即将敌军全部击溃，俘获甚多。同时，团部机枪连、特务连将渌田敌军全部击溃。五日晨，独立团占领攸县县城，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首战胜利。这一胜利，解救了第八军的危机，稳定了湖南战局，提高了国民革命军各军对北伐的胜利信心。据周士第后来回忆说：“在此次战斗中，曹渊同志吃大苦、耐大劳，指挥作战很英勇。”

广东革命政府在独立团初次告捷之后，接着宣布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七月上旬，第四军和独立团开始准备攻取长沙。要取长沙，必先占醴陵、夺浏阳，当时敌人在醴陵西南泗汾有重兵把守，因此夺取泗汾乃此役关键。七月十日一时左右，独立团开始攻泗汾。拂晓时，曹渊率第一营向豆田之敌攻击，占领河南岸敌之阵地。接着，在敌前强行渡河，敌人向龙山铺方向退却，第一营尾敌追击。不料途中突遇敌谢文炳部约两个团前来增援，将第一营包围，情势甚为危急。一营面对强敌，有的同志建议停止前进，迅速登山，据险扼守，以待援兵，否则有极大的危险。曹渊经反复考虑，判断这是遭遇战，敌人对我虚实不明，我若退却，恰好暴露了弱点；而且距团部远，附近又无友军，与其退而失败，影响整个

战役，不如出其不意攻敌不备，争取胜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命令集中全营火力，向龙山铺一个山头的敌人冲锋。全营官兵勇气倍增，象猛虎扑羊群似地向敌人冲击。在农民协会的支援下，经过两、三小时的激战，将敌人全部击溃。俘敌数百名，缴获枪枝弹药无数。泗汾之敌既溃，独立团猛打猛追，七月十日下午二时占领醴陵城，并配合友军攻下浏阳，长沙震动，敌人纷纷溃退。中共湖南区委领导工人、农民、学生于七月十一日占领长沙。战后，聂荣臻和叶挺指出：“这一仗，曹营长判断敌情正确，机动敏捷，指挥有方，又能认真地贯彻党的指示，是致胜的主要因素。全营官兵奋不顾身和农民协会给予莫大的援助，也是致胜的重大原因。”^① 高度赞扬了曹渊的指挥才能。

我军占领醴陵、浏阳、长沙后，敌人大为惊慌。吴佩孚集结重兵，沿汨罗江布置防线，以平江为防线的支撑点，由吴佩孚的心腹、素称“健将”的蒲平镇守使、平通防御司令陆运防守。八月十九日，第四军攻打平江的战斗开始，曹渊率领第一营配以团部机枪连为前卫，在当地农民群众引导和支援下，由汨罗江南岸隐蔽处偷渡，以急行军从小道进至平江城北。敌人惊慌失措，掉头向城内逃窜，在独立团和三十六团快速追击下，敌军不能进城，只得投降。一营立即迫近城下，下午二时，协同友军攻下吴佩孚自诩为金城汤池的平江，陆运自杀，所部大都被击溃。平江的占领，对于攻破汨罗江防线，起了决定性作用。

^①胡允恭：《曹渊烈士革命斗争纪实》，载《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锋，继续攻击前进。八月二十五日，曹渊率一营首先赶到中伙铺，和敌军一个团发生激战。不久，团部赶到，下午即将敌击溃，占领中伙铺车站，拦腰切断粤汉铁路，将吴佩孚的军队南北隔开，其汨罗江防军陷入南北夹攻中。

吴佩孚为挽救败局，亲自布置汀泗桥的防御，妄图利用汀泗桥的有利地形，歼灭我北伐军先头部队。八月二十六日上午，第四军在友军配合下开始攻打汀泗桥。因无重炮，一整天无进展。敌挑选千余名“奋勇队”，冲过桥直打到四军司令部附近，情况甚为危急。叶挺派曹渊率全营驰援。一营冒着敌人的炮火，几经冲杀，终将敌“奋勇队”击溃，军部转危为安。曹渊受到军部传令嘉奖。八月二十七日，独立团由农民带路绕到敌后攻击，协同友军攻破了天险汀泗桥。上午十一时占领了咸宁城，为攻打贺胜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八月三十日，北伐军攻打军事要隘贺胜桥。独立团担任沿铁路线向贺胜桥攻击的任务。许继慎率第二营攻破敌第一道防线，正继续前进，忽遇敌刘玉春部增援，将第二营包围，许营长受重伤，不能指挥。曹渊率第一营赶到，立即指挥对敌冲锋，救出了许继慎，接着连续冲锋多次，终将敌人击溃。第一营、第二营、机关枪连又合力攻破敌第二道防线。独立团随即向敌猛打猛追，敌人象山崩一样垮下去，死伤遍野，吴佩孚逃回汉口，贺胜桥遂被占领。

九月五日，北伐军、武汉工人和郊区农民组织了攻击武昌城的战斗。规定攻城部队每个团组织一个营为奋勇队，首先爬城。独立团担任宾阳门与通湘门之间的爬城任务，第一营为攻城奋勇队，曹渊为奋勇队队长。接受任务后，曹渊召开党的小

组会议，号召党团员在战斗中起模范作用，又召开军人大会进行动员。全营官兵一致表示愿以生命换取胜利的决心。该营有一个班长是共产党员，拿着一封信、一包衣服和几块钱，到营部交给曹渊，说：“昨天第二师、第十师、第七师离城一千多米就停止了，他们是怕死。怕死是攻不下武昌城的。我们明天攻城，大家一定要不怕死，才能把武昌城攻下。我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不怕死的。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衣服和钱寄给我母亲。”曹渊说：“你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怕死的精神是很好的，我同你一样的不怕死，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你的家信和东西不要交给我，可以交给周廷恩书记代你保管。”曹渊叫来营部书记周廷恩，让他保管这个班长的家信和东西。周廷恩说：“我要同你一起去攻城，怎么可以保管东西呢？”曹说：“你不要去。”周说：“没有营副（副营长符克振在贺胜桥战斗中负伤住院），我去了能帮你做很多事。”曹说：“后面的工作和前面的战斗是有关系的，把你留下来处理后面的事情。”周廷恩还是坚持要同曹渊去攻城，经曹渊再三解释，他才将这个班长给母亲的信和东西收下。这个班长给母亲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国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剥削，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中国人民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为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死，虽死犹生。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着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死，是光荣的。儿的躯体虽死了，但精神是不死的。儿是永生在母亲面前的。恳求母亲保重，勿过悲哀……。”第一营大部分官兵都和这位班长一样，自动地写了家信和留下给家里的东西。这种留下家书，誓死攻城的动人事迹，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和武汉人民中广为传颂，他们说：“古有抬棺出阵的故事，今

有留书攻城的壮举。”①

九月五日零时左右，曹渊率部向攻城地点疾速前进，临近城壕时为敌发觉，敌猛烈向我射击。一营三个连齐头并进，冒着敌人的炮火逼近城边，竖起云梯，登城与敌肉搏，消灭了部分敌人。但是，由于友军的奋勇队，有的离城很远就停止了，有的在城壕外边踌躇不前，没有积极爬城与第一营配合，致使敌人的预备队能够不断地向第一营登城地点增援。第一营陆续登上城头的官兵，以无比的英勇气概与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敌人搏斗，全部壮烈牺牲。

曹渊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指挥这场英勇搏斗。天已破晓，眼看登城已无胜利希望，他打算请求团部增援，站在一个小土包后写了一份报告给叶挺团长：

团长：

天已拂晓，进城无望，取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

曹 渊②

刚写到最后一个“渊”字，不幸头上中了一弹，“渊”字的最后一笔，失去了控制，竖拖了三、四寸长。

曹渊身负重伤后，连长卢德铭组织抢救，曹对卢说：德铭同志，我已无救了，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

①②周士第：《北伐先锋》，引自《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78—80页。

啊！卢派战士将曹渊背下火线后，曹即牺牲了。^①

曹渊牺牲的消息传来，聂荣臻、叶挺和周士第等，以及广大官兵都感到非常悲痛，认为是党和革命的一大损失。

曹渊等烈士的牺牲精神，激励着独立团广大指战员奋勇攻城。十月十日，武昌城终被占领，敌湖北督军陈嘉谟、守城总司令刘玉春等一万多人被俘。战后，独立团党支部决定在洪山建立一个公墓，将攻城以来各次战斗中牺牲的官兵与曹渊合墓。为了表彰烈士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付出自己生命的英勇事迹和高贵品质，在墓的前面竖立了一个牌坊，上面横额刻着：“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墓近前竖立一个墓碑，碑上横刻“精神不死”四字，中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左边刻曹渊等一百九十一位烈士芳名，右边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四句话。解放后，武汉市人民政府对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公墓，拨专款进行修葺，现在墓碣一新。墓前新植树苗，亦已茂密成荫。春秋佳日，广大人民群众络绎不绝地前往祭扫、瞻仰。

^①蒋杰、段家作：《卢德铭》，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0页。

杨 闇 公

郑 洪 泉

杨闇公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七年四月，在重庆壮烈牺牲。

(一)

杨闇公，又名杨尚述，一八九八年三月十日（戊戌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一个封建大家族中。曾祖父杨世绥有七个儿子，号称杨氏七大房。第七房是杨定九，有两个儿子，杨闇公的父亲杨淮清是他的长子。杨氏家族拥有数以千亩计的土地，在双江镇上有几座深宅大院。但杨定九这一房已趋于没落，传到杨淮清时已是每况愈下。由于是么房，人微言轻，在掌握族权的别房眼中，他们的地位自然是低下得多了。杨闇公排行第四，自小便过继给叔父杨霞峰承祧。

杨氏家族很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几乎每一房都聘用了家庭塾师。杨闇公少年时曾从塾师吴仲儒就读。吴仲儒遂宁人，是位副榜举人，学识渊博。他虽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课目，但却喜谈“太平天国”、“义和团”掌故及《水浒》、《说岳》等故事。对杨闇公说来，后者更具有吸引力。杨淮清喜好读书，

娴熟经史、常对儿辈谈论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高风亮节。这对杨闇公亦颇有影响。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虽然屡遭失败，但是，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却是不容阻遏的。杨氏家族的新一代就已经有人转向于对新的时代激流的追求。杨闇公的大哥杨剑秋于光绪年间远涉重洋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在日本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二哥杨衡石亦去成都进了铁道学校。堂兄杨宝民（尚懿）于一九〇六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一年三月，在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去湖南与程潜等组织湘桂联军，辛亥革命后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他们的事迹对杨闇公教育很大。此外，族中还有人去法国留学。外出参加革命或求学的年轻人常于家书中介绍天下大势和救国救民的道理，这成了杨闇公接受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渠道。

杨闇公有兄弟姊妹多人，生母、继母对他都很喜爱。他倔强、好动，不愿受封建礼教羁绊，好打抱不平，喜欢同穷苦人家的孩子玩耍；还常随族中雇请的武术教师练习拳法，尤其爱好使枪舞棒、骑马射箭。杨氏家族在镇上办了“团练”，杨闇公因此有机会接触枪械。有一次，他拿了一支步枪在家中比试，使家人惊骇不已。^①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闇公对虚伪的封建礼教日益不满，对族人中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越来越厌恶，对处于危亡中的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非常忧虑。一九一一年，清朝的四川总督在成都凶残的镇压参加保路运动的群众，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杨闇公经常听到人们议论这件事，对国家大事更加关心。正在

^①1979年9月访问杨绍中的谈话记录。

这时，双江镇福音堂的学校里来了一位语文教师杜焕堂。这人二十来岁，身材高大，为人耿介，性情开朗，既有学识，又关心时事，且喜打抱不平。因此，不久就在镇上出了名。杨闇公平时对“洋人”是很反感的，对读圣经、做祷告，更不屑为，故不愿到教堂去。然而，由于他对杜焕堂十分仰慕，便特地去听杜先生讲语文课并请其指导作文。杨闇公第一次晤见杜焕堂时，便颇有些愤世嫉俗的言论，给杜焕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学校里已不作八股文了，但杜焕堂还是习惯于从经传中选取名言为学生的作文命题。他从《尚书》、《周官》中选出了“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两句话，作为给杨闇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想要杨闇公写出一篇论述时事的文章，他解释题意说：一个国家在未遇乱时就应该治理好，不要到天下大乱时才去治理；而且，要在未经危难时就保卫好，不要等到危急了才去保卫。杨闇公听后表示异议说：“我的看法则不然，国家没有动乱，能治理好，这不算啥，要是能把一个乱极了的国家治理好，才算有真本事；国家没有危险，能保卫它，也算不了啥，要是能把一个危亡的国家挽救过来，那才算有真本事。”杜焕堂听了暗暗吃惊。他想，这一席话说得多么切合国家的现状啊！看来，这个学生的志气还不小哩！不久，杜焕堂又一次为杨闇公命题作文。这回选用了韩愈《进学解》中的一段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略略解了题意，杨闇公稍加思索便陈述自己的见解说：“这个题上句很好，下句应改动两个字，即‘行成于勇而毁于庸’。没有勇气，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庸庸碌碌，就成不了事。”杜焕堂大加赞赏，他想，这两个字改得真好，可谓切中时弊。杨闇公见老师在沉思，又补充说：“我要从勇字上去做文章。”杜焕堂从此

对杨闇公十分看重。夏季的一天，气候十分炎热，学生们在教室里不住的摇扇子。杨闇公从一位同学手中借过一把来摇，打开一看，见上面印着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禁怒火中烧。他气愤地说：“这是国耻？”随手将纸扇往课桌上猛然一击，纸扇被搅坏了。这举动使得杜焕堂十分惊讶。他非常佩服这个学生的强烈的爱国热忱。课后，他为杨闇公赔偿了一把纸扇。①

这个时期，杨闇公已深深感到周围的空气令人窒息，他渴望有机会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二)

一九一三年七月，报载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兴兵讨伐袁世凯。这时，杨闇公的堂兄杨宝民正在江西讨袁军中任总参议。杨闇公决定去江西投奔革命。②

杨闇公要去外地的举动，遭到家族中守旧势力的阻挡。他们一方面唯恐他房子弟外出留学做官的多了于本房不利；另一方面是由于思想顽固，反对革命。杨闇公不顾刁难，奋然离乡，经重庆乘轮东下。

轮船在湍急的川江中行驶了几天，在宜昌码头停泊。此时却传来了赣宁之役失败的消息。江西讨袁军虽初战告捷，但在北洋军阀优势兵力夹攻下，先失湖口，再失南昌，其余各地讨袁军亦纷纷失利。“二次革命”于此告终。杨闇公已不能按原

①杨绍中 1980年4月访问杜焕堂谈话记录。

②1980年2月访问杨肇甫谈话记录。

计划去江西，便决定径直前往上海，与不久前从日本留学归国到达上海的大哥杨剑秋相会。堂兄杨宝民于湖口起义失败后也避居上海法租界，以行医为掩护，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杨闇公见到杨宝民时表明自己的来意说：“我是来革命的。”杨宝民便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当杨闇公得知国民党正在进行秘密活动，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便向杨宝民提出了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的迫切要求，由于考虑到杨闇公尚未成年，需要继续学习，经杨剑秋与杨宝民商定，建议杨闇公攻读军事，以便将来从事武装斗争。杨闇公欣然同意。当时冯国璋任江苏都督，在南京开办军官教导团。杨宝民便托军官教导团少将教官彭维翰保介杨闇公进入该团学习。^①

杨闇公进入军官教导团后，频繁往返于沪宁之间。他每次到上海都要打听反袁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一九一五年，杨宝民要去新加坡参加国民党的“南洋会议”，临行前在上海寓所与杨闇公商讨今后行动计划，相约于反袁起义军打到长沙流域后，由杨闇公联络军官教导团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军官积极响应。^②军官教导团的学生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冯国璋系部队选送的在职军官，二是从社会上招收来的青年。杨闇公在学习期间，同一位选送入学的姓肖的年轻团长相结识^③。肖团长富于革命热情，杨闇公与之过从甚密，两人意志相投。肖团长后来被调往江阴炮台任要塞司令，杨闇公亦准备毕业后去江阴任职，以便按照与杨宝民的约定行事。杨宝民离沪后，杨闇公仍

①②1980年2月访问杨肇甫谈话记录。

③四川省潼南县县志编纂领导小组1981年4月22日给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信。

常到上海，与长期住在杨宝民家中的国民党人赵锡昌联系。为了准备进行反对袁世凯的军事行动，杨闇公在上海秘密筹集和运送军火。外国巡捕为此追捕他，他穿弄堂、越屋顶，机智脱险。^①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在北京上演复辟帝制的丑剧，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首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兵讨袁，宣布云南独立。这时杨宝民亦被派往云南，任护国军财政厅长兼民政厅长。护国军很快进攻四川、贵州和广西，贵州和广西亦相继宣布独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云南护国军的讨袁通电发表后，杨闇公遂于一九一六年初赶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升起义旗，因事机不密，起义遭到失败，杨闇公遂与要塞司令逃亡上海。^②一九一七年，十九岁的杨闇公渡海去日本。当时，杨闇公二哥杨衡石亦在日本明治大学专攻经济。

杨闇公到日本后，先就读于成城学校补习日语，一九一八年转入日本士官学校，仍攻读军事。在成城公学读书期间，杨闇公积极参与组织留日同学读书会，学习进步理论。日本警视厅却以读书会未经学校当局批准为借口，拘留了杨闇公。几天后，以无罪释放。^③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潮流已在日本兴起，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传播开来。杨闇公亦开始阅读《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神髓》等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使他的革命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①杨尚昆：《我早年的革命引路人——忆闇公四哥》，载《忆杨闇公同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

②1980年2月访问杨肇甫谈话记录。

③程子健：《杨闇公同志战斗的一生》，载《忆杨闇公同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进步的青年学生为先导，中国人民掀起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日本，留日中国学生和华侨举行大规模集会并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示威。为了参加爱国活动，杨闇公连夜奔走，四处联络。当时，中国公使馆留学生监督江庸，监督署职员杨肇焯，都是杨闇公的亲戚。江庸见杨闇公在爱国活动中十分活跃，便嘱杨肇焯面见杨闇公，希望他看在亲戚份上，设法缓和学生的示威活动，杨闇公却不予理会。^①当日本宪兵队的马队向请愿示威队伍冲闯，日本警察挥舞棍棒毒打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时，杨闇公怒不可遏，奋不顾身救护被殴打的同胞，并与日本宪警进行搏斗。东京警视厅遂以所谓违反治安罪，将杨闇公逮捕入狱，判处八个月徒刑^②。这是杨闇公在日本第二次身陷囹圄。出狱后，杨闇公于一九二〇年被迫离开日本返回祖国。

(三)

一九二〇年秋，杨闇公经上海回重庆。在家中，他说服父亲解除对子女的封建礼教束缚，允许姊妹和侄女们跨出家门，走向社会，接受新思想。他购买了许多新书报给弟妹们阅读，引导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在他的提倡下，几天之内，从老母亲到年轻的姊妹，都把裹脚布扔掉烧毁了。

一九二一年冬，杨闇公去成都，参加了成都留日学友读书会。当时，有一些留日学生在成都教育界工作，杨闇公通过读

^①1980年2月访问杨肇焯谈话记录。

^②程子健：《杨闇公同志战斗的一生》。

书会同他们联系，以便发现志同道合者。一九二二年，他结识了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一的童庸生，不久，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闇公与童庸生关系十分密切，童庸生到重庆后，杨闇公仍经常与他通信。杨闇公还认识了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的吴玉章。吴玉章在四川有很高的威望，深受进步青年的仰慕。杨闇公非常尊敬吴玉章，认为他学识有根底，绝非一味大言欺人，口上挂招牌之辈所能比拟。^①杨闇公和吴玉章等人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基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们组织进步学生深入工厂，发动工人罢工，并组织工会；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这时，恽代英因在泸州进行革命活动被军阀赖心源扣押，吴玉章便去电泸州保释恽代英，后来又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经吴玉章介绍，杨闇公与恽代英相识。恽代英在成都教学很受青年欢迎，他团结教育了更多的进步青年。一九二三年秋，吴玉章介绍杨闇公与刘伯承相识。刘伯承于这年八月，作为川军第一军第二混成旅的团长，率部队在大足县同吴佩孚派来侵川的黔军王天培部激战受伤，正在成都就医。杨闇公对刘伯承十分钦佩，认为他机警过人，且很勤学，头脑异常清晰，又兼有远大志向，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故把他当作是自己最折服的朋友。^②杨闇公常常同吴玉章、刘伯承在一起谈论时事，研究革命问题。

辛亥革命后的十多年间，大大小小的军阀把持着中央和地方政权，争权夺利，内乱不已，把国家的政局整得“愈趋愈下”，整个社会呈现出“祸乱相寻，民穷财尽”的悲惨景象，

① 《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40页。

② 《杨闇公日记》第26、27、64页。

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这使杨闇公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已经失败，中国虽有“民国”之名，实际上“与共和相去甚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明确地指出：对掌握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大小军阀，绝不能抱有幻想。“如要望这一般幸运儿整治清平，真是俟河之清。”他认为，不能“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因希冀是自杀政策”，“不能解决我们的苦痛。”因此，革命者必须“努力奋进”，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进行斗争。而要担负起这个无可旁贷的历史使命，就必须“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与工具”，“择优秀分子为中坚的骨干”，使之成为解放运动的“中坚人物”。^①基于这种认识，杨闇公便同吴玉章等筹建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一个叫做中国青年共产团（开始简称C·Y，不久改为Y·C）的共产主义组织，在成都市娘娘庙街二十四号杨闇公的寓所里宣告成立。在一间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画像的房间里，二十来个人举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会议，大家热烈地讨论并通过了一周以来已经过两次研究的中国Y·C团的纲领、章程和各种议案，推选出吴玉章、杨闇公等六人为负责人。^②

中国Y·C团是按照“横的方面少数服从多数，纵的方面下级服从上级”^③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它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它有明确的纲领，这个纲领发表在一九

① <杨闇公日记> 第25—28页。

②同上，第32—33页。

③ <中国Y·C团章程> 第4章第20条，<赤心评论> 第二期（1924年6月1日）。

二四年五月一日出版的中国 Y·C 团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创刊号上。可惜的是，现在尚未查到这个纲领的原文，然而，从中国 Y·C 团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杨闇公一九二四年一月的日记中，可以窥见这个纲领的大致内容。杨闇公在中国 Y·C 团成立前后的日记中写道：

“欲指导群众，究竟从哪条道路走的好？……刻已认定马氏为主。”（“马氏”，指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杨闇公日记》编者注）

“社会的进程是循序渐进的，有自然的定律。”

“社会主义是为一般人各得其所，都有发展天才的机会，不致受经济的压迫，得真正的自由。”

“吾……必须为他人尽力，使彼第四阶级者得一反其生活与地位。”^①

从杨闇公这期间思考的问题看来，中国 Y·C 团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谋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

在筹建中国 Y·C 团的过程中，杨闇公十分重视使组织具有战斗力。他主张中国 Y·C 团采取“三级制”^②，使工作任务能够落实，避免发生只好空谈，什么事也不能做的现象。中国 Y·C 团成立的当天，杨闇公就决定对团员“当设法接近，藉以考察其办事能力及品格。”^③ 当有的团员因受“社会的魔

① 《杨闇公日记》第 78、25、30 和 62 页。

② 《杨闇公日记》第 27 页。《中国 Y·C 团章程》第二章第五条规定：“本团组织纵的方面分三部，中央、干部部、支部，”并规定了中央大会、干部大会和支部大会召开的期限和职权。

③ 《杨闇公日记》第 33 页。

力”的影响而精神不振时，他就积极进行教育，对之“投以补剂”，并“觅医与他注射点兴奋剂”。当其经过教育，精神振作起来并有了“发奋为雄”的决心时，杨闇公又“全力扶持他，并不时的告诫他。”有的成员因恋爱观不正确陷于情网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时，他就“大力相劝”。总之，他很注意在革命组织内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主张革命组织的发展应持慎重的态度。他在与童庸生通信时，“力说不宜滥收同志。”^①

中国 Y·C 团成立的初期，在吴玉章、杨闇公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革命活动。

一是积极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鼓动工作。中国 Y·C 团刚成立时，由杨闇公担任编辑，出版了油印刊物《微波》，揭露封建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一九二四年五月，由成员集资创办了十六开铅印月刊《赤心评论》。杨闇公积极参与筹办，把它看作中国 Y·C 团的化身。《赤心评论》第一、二期分别刊载了中国 Y·C 团的纲领和章程，第一期是纪念列宁特刊。这个刊物连续几期刊登了《列宁年谱》，宣传列宁的革命业绩。中国 Y·C 团成员吴玉章、曾凡觉、郭祖劼、张克勤和吕渺崖等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介绍苏俄情况和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暴行的文章。他们呼吁联合国内被压迫的人民，建立国内统一战线；向军阀官僚和资本帝国主义施行总攻击，实行国民革命；联合世界各被压迫的人民，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向国际帝国主义施行总攻击，实现世界的社会革命。他

^① 《杨闇公日记》第 65 页。

们热情地表示：愿做警世之钟，助战之鼓和红军之急先锋，拚尽同仇之血，组织二十世纪之文明。^① 杨闇公曾积极为《赤心评论》撰稿，后来，他离开成都，仍长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

二是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从各方面罗致人才，培养群众运动的骨干。中国 Y·C 团成立后，就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决定。这个研究会是以王右木领导的成都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为基础扩大而成的。四月十三日，社会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这天是星期日，风和日丽，春意盎然。上午九时，杨闇公赶到会场，见七十多人，济济一堂，这显示了中国 Y·C 团三个多月来的工作成绩，他十分高兴。特别使他兴奋的是到会的人中有五名是工厂里的职工。他想，这些“被压迫而欲待救于人的，也因自身的关系出而奋斗了。此后善于指挥，会内必能物色些人才来。”^② 开会时，吴玉章以《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为题发表演说，指出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是“普遍于全世界”的“最伟大最新颖的潮流”，“经过苏俄的试验，人人已知道它有实现的可能性。”“实行社会主义以扫除资本阶级，消弭国际战争，也是时势的要求”。他号召中国人民“对于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明辨而后笃行”，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③ 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玉章演说词甚

①蜀民：《人类生活问题当如何解决》（续），《赤心评论》第二期，本文在《赤心评论》第一期刊出时署名为树人。树人即是吴玉章的表字。

②《杨闇公日记》第 81 页。

③吴玉章的这篇演说刊登于 1924 年 4 月 17 日成都的《国民公报》和附于《赤心评论》第二期后的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刊行的《追悼列宁纪念号》上。

善”。①

三是同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一道派人到工厂、农村和学校去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中国 Y·C 团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区的组织在成都少城公园联合举行盛大的纪念“五一”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会前，杨闇公、吴玉章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进行了积极筹备，他们派了许多进步青年到工农和学生群众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当时，驻守成都的川军第二军军长、四川军务督办杨森曾表示欢迎大会召开。但在大会召开的前夕，杨森又凶相毕露，立即调兵回城，实行戒严。政治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五月一日早晨六点钟，杨闇公拿出前一天夜里准备好的演说词，又重新琢磨了一遍。八点多钟，他同几个中国 Y·C 团的成员一道赶赴会场。看到杨森的军队荷枪实弹地把守着少城公园的大门，他非常气愤。他想，杨森的假面具终于取下来了，这无异于宣布他自己的罪状。杨闇公轻蔑地从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面前走过。这时，汇集在会场中的群众已有两万多人，其中一大半是工人。看到被压迫的工人已经团结起来并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看到中国 Y·C 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深入工农群众已取得一定成果，杨闇公高兴极了。十点钟，大会开始，杨闇公满怀激情登上讲台，发表了题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的讲演。他说：“创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列宁逝世了，世界人民得此噩耗莫不痛悼。这不正因为列宁是实行经济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成功者吗？不正因为列宁是人类推倒资本帝国主义的急先

① 《杨闇公日记》第 81 页。

锋吗？当我们还在痛苦地呻吟于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急盼解放的时候，忽然失去这样一位革命的巨人、劳动界的救星，我们怎么能不痛哭呢！？”杨闇公热情洋溢的言词，深深地打动并有力地吸引了广大群众。接着，他历数了日、美、英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戾行径和封建军阀投降媚外、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最后，他呼吁可敬可爱的青年志士们，加速团结，“顶天立地竖建民族精神与国民革命的大义，系统的宣传，严密的组织，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进攻，为继承列宁未竟之志而奋斗。”^①杨闇公精采的富于鼓动性的演说，博得了全场群众的热烈掌声。讲演结束后，群众正准备游行，四川军务督理署秘书秦正树突然跑来对大会主持人杨闇公等说：“军长有命令，阻止游行。”这个消息传开后，大家十分愤慨。杨闇公等为了使群众避免遭到无谓的牺牲，遂决定停止游行，但组织人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揭露军阀压迫人民的罪行。直到午后一时，参加集会的群众才散去。

“五一”群众大会是对中国 Y·C 团和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反动派用武力威胁的办法进行破坏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中国 Y·C 团和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活动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对反动派的威胁。杨闇公在五月一日和二日的日记中写了这样几点感受：“以很纯洁的运动，被三四无赖加以流言，真是可叹！但不如此，不足以表白他们的罪恶。”“我很笑这些无识的军阀和他的走狗，何苦作此无谓的举动来惹起反感啊！愚呀！愚呀！”

^①这篇讲演刊登于附在《赤心评论》第二期后面的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刊行的《追悼列宁纪念号》上。

“昨天的运动，我们可以证明，‘自由’不是空谈可得来的，非血、泪、汗，不能得真正的自由。前途的障碍还多得多，非对此三种有最大的决心，哪能说得到其他，我很希望大家努力。”^①这是对中国 Y·C 团成立以来的革命活动的深刻总结。

杨闇公十分勤奋好学。他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一早一晚都要刻苦攻读。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拟从事学业，晨起须读二、三小时的书，……以免将来应用时生多少缺憾。”^②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探索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看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蹂躏下，中国呈现出“国破家亡”的惨象；另一方面他又看到革命的新生力量在不断成长，所以，他乐观地预见到，我们伟大的祖国“终有复兴的一天”。他指出，面对旧社会的黑暗，“更足以使人坚牢意志”，得出了“非奋斗不能实现人生的真义”的结论。^③杨闇公在阅读各种书籍时，十分注意取法前人的长处和经验，作为自己向“恶社会”抗争，与“恶魔”奋斗的精神力量。他说，我“当从事读书，以免学业日益退化，……并应当注意身心精神的强健，……因我辈所负的责任甚大，若无真精神，将来何以能达光明之域啊！”^④他又说：“古人过人的地方，不惟遇事探求其真理所在，无论如何受环境的压迫，都必与之奋斗，且作事有恒，毫不苟且，真是深堪取法。”^⑤杨闇公读书，注意联系实

① <杨闇公日记> 第 89—90 页。

②③同上第 56、26 页。

④同上第 71 页。

⑤同上第 61—62 页。

际，并善于对照和解剖自己。他在日记中，常常记叙自己读书的情况：“今晨读了三时半的书，饭后回忆一切，心为之惶惑不安。……世界果何物乎？人生的意义又安在乎？苦唉！我之思考力。”^①

在成都的这段期间，杨闇公在生活上是相当困难的。他的一家分住潼南、成都和重庆三处，成、渝两处的生活费用均来自潼南，而在潼南经理家务的两个哥哥，当时生活相当放荡，弄得家事日非，经济颇为拮据，以致于要变卖掉一些田产。一九二四年春，他们竟有五十多天不给成都家属以银钱接济，使家中生活陷于困窘，欠债无法偿还，房租不能支付，弟妹学费没有着落，有时候甚至要闹到“陈蔡绝粮”的地步。这使杨闇公感到非常苦恼。他自日本归国后，一直投身革命活动，没有找到适当职业。有人亦曾为他在军阀部队中谋得一个差事，但他认为：“吾川的军人寡廉鲜耻到了十二万分”，所以他“不愿与若辈为伍。”^②这就使得他在生活上要仰赖于家庭。为了解除当时家庭经济的困境，家里准备变卖应由杨闇公继承的胞叔杨震峰的二百亩田产，杨闇公毅然表示放弃对这份遗产的继承权。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对变卖遗产，他没有丝毫意见，即使把应由他继承的全部产业都卖掉，也异常赞同，绝不阻挠。杨闇公感到苦恼的是，父亲并不了解自己。他已树立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大志，还有什么必要继承遗产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何人斯，岂能因区区遗产变我初志？人若恃先人遗产为生，只可名曰吃饭虫，失了人生的意义。我即不学

① <杨闇公日记> 第62—63页。

②同上第56页。

无术，宁饿死亦不受遗产，何况我早有归宿点的目的和进行的方道，哪里把遗产的有无存于心中啊！”^①放弃对遗产的继承权，是杨闇公背叛封建剥削家庭，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事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五一”群众大会后，吴玉章的安全受到威胁，被迫与刘伯承一道，经贵州、湖南去上海。这时，杨闇公亦决计出川一行。五月三日，中国 Y·C 团在杨闇公寓所开会，推举曾凡觉接替杨闇公的职务，并研究了今后的工作。这是杨闇公最后一次参加中国 Y·C 团的会议。四、五两日，团员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杨闇公合影留念并宴请他。杨闇公非常珍惜这种在革命斗争中结下的战斗情谊，对于这些青年伙伴们亦寄以很大的期望。他想，这些青年是多么可爱可敬啊！只要不断加强团结，并加以训练，必能达到光明之途。

在成都这几年的峥嵘岁月，给杨闇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与中国 Y·C 团的青年伙伴们握别时深情地说：“我不久就要回来的。”^②

可是，杨闇公毕竟没有再回到成都，伟大的中国革命向革命战士发出了战斗的召唤，他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四)

一九二四年五月七日，杨闇公离开成都，经乐至、遂宁回到潼南双江镇。由于交通不便，这段旅程花了四天的时间。他

^① <杨闇公日记> 第 43 页。

^② 同上第 91 页。

在家里只住了一个星期，便乘轮经合川到重庆。

一出成都，杨闇公就见遍地种着鸦片，而军阀政府还公然贴出收烟捐税的告示，对种烟不但不加禁止，反而藉此大发横财。杨闇公感到“真是可恨极了”。他看到，即使在偏远的乡村，帝国主义也设立了福音堂，以此来麻痹和奴役中国人民，他不禁感叹这真是“可怕的一件事。”他又目睹军阀军队到处横行霸道，坑害百姓，沿途遍设关卡，敲榨勒索。仅从土沱到相国寺这一段只有一二十里路的航程，就有十三道关卡。杨闇公就这个问题在日记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吾国对于入口的关税取的是轻而又轻，只有入口一次就可以在全国到处贩卖，国内反而层层剥削，处处留难，无怪外货充斥，外人得自由往还，吸收经济的命脉啊！这真是可痛的事。”^①他越是注意考察社会现状，就越是感到应当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最使他感到烦恼的是在双江度过的那一个星期。他看到杨氏封建大家族呈现出一派窘困衰败的样子。两位兄长不务正业，族中不少纨绔子弟非嫖即赌，坐享先人遗荫，花天酒地，利之所在，便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难以忍受那腐败的环境，很快便离开了。

杨闇公到重庆后，立即去找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区组织的负责人童庸生。他们交换了成、渝两地革命活动的情况并研究了今后的任务。五月三十一日，他应邀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区组织在巴县国民师范学校举行的欢迎会，作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讲演，强调青年不要漠视政治。他说，如果我

^① 《杨闇公日记》第93、94和99页。

们不努力从事政治活动，就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①端午节的前一天，杨闇公与童庸生在巴县国民师范学校附近一个前临长江的幽静处所，一面远眺对岸雄伟葱翠的南山和真武山，观赏江面上龙舟竞赛，一面纵谈天下大事。童庸生用深沉的目光看着杨闇公说：“我们这些‘清教徒’若只努力于宣传，不与‘受洗’的朋友觅一乐地，那将会使他们失望的。”杨闇公认为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看法，同自己的见解完全相同。^②他们都认识到，不仅要努力于宣传工作，还必须组织群众进行实际斗争。六月初，重庆市的一些中小商人组织商业共进会，并举行全市性罢市以抗议军阀刘湘的压迫。杨闇公立即找童庸生商量，决定组织青年团员去帮助中小商人开展这一斗争。他认为这样做既声援了缺乏组织力量的商业共进会，使他们的斗争收到预期的效果；又可使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在这个问题上，杨闇公初步显露了革命活动家的才华。

在童庸生的热忱赞助和支持下，杨闇公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初，乘轮东下，前往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寻求党的指导。杨闇公在上海会见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恽代英。恽代英与之谈话时，非常强调革命工作要从实际入手，重视行动，反对只唱高调而漠视现实的一切。由于恽代英所谈的问题同杨闇公的主张颇相一致，故谈话十分投契。杨闇公对恽代英十分推崇，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的感想：“此君谈话，很有一部分真理存在。”“故我很有动于

① <杨闇公日记> 第 101 页。

② 同上第 105 页。

中。”^① 在上海期间，杨闇公还访问了一些川籍的国民党人士，谈论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的状况。七月底，离沪返渝。归途中，他在轮船上抓紧时间学习了《唯物史观浅释》等书。轮船在中途停泊时，他便下船与劳动群众接触。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午后停船，与土人谈甚久，心甚安适。”“江边群立而观轮船的人，约有二三十，我因欲知他们的生活状况，遂与之交谈。……农人们的生活着实太苦。”“那般乡民的亲切和友爱的样子，着实令人心感得很。社会上最苦的，也没有他们那样可怜，不觉又令人鼓舞起为人流血的雄心来了。”^②

杨闇公回到重庆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领导工作，任组织部长。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 一九二五年初，他被选为团地委书记。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后，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亦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这段期间，杨闇公全力以赴做团的工作。他同中国共产党特派员肖楚女取得了联系。肖楚女曾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来重庆、万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秋，再度奉派来重庆领导青年团的工作并筹建党的组织。一九二四年秋，童

① 《杨闇公日记》第118—119页。

② 同上第145、147页。

③ 据1981年3月在四川荣县发现的张克勤同志在解放初期写的自传中说，1924年杨闇公去上海回川后，“在渝为童庸生说服，加入了共产党。”关于杨闇公入党问题，还有一种说法：1979年12月19日，杨尚昆同志在广州矿泉宾馆接见出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的四川代表时说：“我估计他入党是这样的，因为他在四川成都已经搞了一个组织（指中国Y·C团——笔者注）同党中央联系上以后，党中央承认了他这个组织，就没有再要介绍人了。”

庸生一度离渝去涪陵，但杨闇公经常与之在书信中商谈革命工作。在青年团的活动方面，杨闇公还以罗世文为骨干，并得到了他的密切合作。

杨闇公十分重视在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中加强团的建设。他认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因而无论哪一派军阀后面，都有外国帝国主义作背景。因此，无论哪一派军阀掌握政权，国家都得不到好结果。但是“军阀自身有绝大的破隙，不久自然要崩溃的。”所以“我们目前所要努力的，是在宣传和组织两样上，尤其是要使敌我的界限分明，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就谈不上革命。”^①他提出的这个团的工作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他很重视从组织和思想两个方面来进行团的建设。在组织建设方面，他批评了发展工作中“收人太随便”和组织涣散的不良倾向。要求发展成员时，“要考察他的过去的历史和他目前的动作、人格。”^②“对于团员要有训练和有严格的纪律。”^③要将“扩大组织与严整组织”“二者并施”，即是将发展组织与巩固组织结合起来，“二者万不可偏废。”^④然而，他尤其重视思想建设。他指出，革命组织之所以产生涣散的现象，全是由于有些人“脑海中空无所有”，对于精神涣散的人，“非有一种强烈的兴奋剂不能惊醒其迷梦。故今后应当注意他们的弱点，切实的训练其人格，培养其意志。”^⑤这就

① 《杨闇公日记》第202—203页。

② 同上第156页。

③ 同上第159页。

④ 同上第259—260页。

⑤ 同上第179页。

是要加强思想教育，使团员都能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对领导者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他说，领导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躬行实践，以身作则”，“一切的行动，皆要有最高的目的。”^①他早就说过，个人利益不要拳拳于心，一切均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这样才能做到“使团体支配人，不要人来支配团体。”^②这样才有利于组织的巩固而不致使组织遭到削弱。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重庆地区团的工作颇有起色，杨闇公也更加为同志们所信赖。

一九二四年秋，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掀起爱国反帝运动新高潮。杨闇公和肖楚女等也发动重庆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建立了四川反帝大同盟，开展爱国反帝的宣传。同年十一月，在他们的领导下，又组织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四川平民学社，总社设在重庆。杨闇公在该社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组织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鼓励大家要努力工作。四川平民学社开办了平民学校，出版了刊物——《曙光》，广泛地联系并发动了群众。杨闇公和肖楚女还发动各校进步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或读书会，引导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社会问题，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日本商船“德阳丸”在重庆私贩劣币，扰乱市场金融。重庆军警团督察处派员上船搜查，竟遭日船人员殴打，其中四名检查人员还被抛入江中淹死。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德阳丸案”。事件发生后，重庆各阶层爱国群众纷纷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提出强烈抗议。肖楚女、杨

① 《杨闇公日记》第191页。

② 同上第105页。

闇公等四出奔走，联络各团体组织了抗议“德阳丸”暴行的重庆人民外交后援会。他们还通过四川平民学社广泛动员群众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四川军阀展开斗争。杨闇公多次在各团体的集会上慷慨激昂的发表演说，进行宣传鼓动。十二月十三日，重庆市各界人民举行声讨“德阳丸”暴行的群众集会，肖楚女发表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演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到军阀政府请愿，杨闇公被推举为请愿的总代表。当队伍行进到省长公署时，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一个个都溜之大吉了。这个运动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革命群众运动正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重要表现之一。正如杨闇公所说：由于这次群众运动的兴起，使“死气沉沉的渝中，因此顿现生气。”群众“精神因之大振”，“群众受此大训练后，必易于激动。”^①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自广州北上，呼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反对军阀专制，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于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在全国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杨闇公非常敏锐地看出了国民会议运动的重要性。他说：“国民会议是中国目前政治上所必需的”^②，是“对症的良药”，我们的责任是从团结民众着手，对外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列强的经济羁绊；对内铲除封建的割据，实现平民政治，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③为此，他提出了“向民间去”的口号。他嘱咐同志们要努力以种种方法去唤醒民众，纠正一般人向来对政治毫不过问的倾向，使他们深切的感觉到政治与自身的问题是离不开

① <杨闇公日记> 第 217—218 页。

② 同上第 225 页。

③ 同上第 220 页。

的，政治非归入人民之手，便无摆脱压迫的可能性^①。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指示，多次与童庸生、罗世文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确定了在重庆地区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策略，这就是，发动青年团员积极投入运动，尽力掌握各进步团体，早日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对国民党右派，要有分寸地向他们开展斗争，先是监督他们对运动的不努力，第二步才攻击他们向右的倾向。^②

这段期间，杨闇公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写文章、作讲演、主持会议、指导基层的活动，简直忙个不停。为了抵制段祺瑞企图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政客参加的所谓“善后会议”来取代国民会议，他决心用“积极的手段”，“拼命的做去”^③，以便迅速地把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即使在身染疾病的情况下，仍四出奔波，甚至在病榻上还与来访者研究问题。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杨闇公曾多次带领团员和积极分子，在一九二五年的春节期间到南岸真武山向群众宣传。原来，每逢春节，到真武山进香和游览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和一般市民。杨闇公便利用这个机会，把团员和积极分子编成小组，向群众散发传单和发表演说。这年正月初二，杨闇公一连讲演了八次，声音都嘶哑了。这样的宣传活动一连搞了数次，杨闇公讲演的内容是《被压迫者与国民会议》，也讲了破除迷信问题。开始时，他讲的道理深了些，群众不甚了解，他发现后立即加以改进，注意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尽量避开名词术语，并着重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越讲越有

①《杨闇公日记》第 225、230 页。

②同上第 221 页。

③同上第 222、228 页。

吸引力，听的人个个点头称是。有人称赞说：“国家大事象这样做就好了啊！”有位老农民问杨闇公：“我们可以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吗？”群众听讲时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恨得咬牙切齿，有的人当场哭了。大家还把杨闇公围在中间，要他再讲。群众的热情使杨闇公深为感动。①从多次宣传所收到的良好效果中，杨闇公感到，只要热忱地向群众讲清道理，就能启发他们的觉悟，并推动他们积极投入革命斗争。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前他们何尝知道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啊！以为只是几个所谓伟人的人，是应当来支配他们的。”②

由于有了杨闇公等的周密筹划和几个月来群众工作打下的基础，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正式成立。杨闇公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接着，杨闇公又排除了国民党右派人物的干扰，使国民会议促成会顺利地选出了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重庆地区的代表有童庸生等四人。与此同时，綦江县也推选出邹进贤、危直士等四名代表。二月二十七日，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有一万四千多人，其中工人占一半以上。杨闇公是大会主席，他报告了促成会成立的经过并阐述了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重大意义。去北京的代表也发表了演说。接着，大会顺利地通

①赵宗楷：《忆闇公》，载《忆杨闇公同志》；《杨闇公日记》第237、243页。

②《杨闇公日记》第238页。

过了由杨闇公提出的增选两名女代表的提案。^①至此，在选举代表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取得了对国民党右派的完全胜利。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当队伍行进到夫子池时，杨闇公再一次向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这一天，他虽然很疲劳，但却十分兴奋。他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的狠处就只有一个‘干’字，有团结，有组织而已。”^②这事实上是对党领导重庆人民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三月初，去北京的代表先后分两批启程。行前，肖楚女和杨闇公教育他们一定要认清自己的重大任务，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开好会议。那时外出开会得自筹路费，到北京一趟，每人大约需八十大洋。经济困难的代表不仅要放弃自己的工资收入，还要借钱做盘川。杨闇公向代表们作临别赠言时说：去北京开会“是‘势事使然’，要‘有眼光，有勇气’去克服困难，不能‘因小而舍大。’”^③肖楚女也对代表们说：“你们去北京开会，既是参加斗争，又是去受教育，再困难也要去。”^④代表们深受鼓舞。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期间，突然传来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的噩耗。三月十四日，杨闇公在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会议上提议为孙中山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他认为：孙中山是“国民革命的导师”，“在孙文主义上，我们虽只能同得到一半儿的路程，但他的伟大人格，和中国目前的需

^①1980年10月1、2日访问危石顽（即危直士）时，他回忆说：重庆选出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童庸生（党员）、邓懋修、何星辅、斐子琚、雷兴政（女）和丁秀君（女），綦江选出的代表是：邹进贤（党员）、危直士（党员）、霍步青、朱凯。

^②《杨闇公日记》第256页。

^③同上第253页。

^④1980年10月1、2日访问危石顽谈话记录。

要，是我们应该表示尊崇”的。他主张通过开展纪念活动来激励群众的爱国情绪，提高人民的革命警觉。^①在党的领导下，各进步团体组成了重庆市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筹委会，肖楚女、杨闇公等被推举为负责人。四月七日，各界群众八千多人在打枪坝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肖楚女、杨闇公等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热情颂扬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宣传他“以俄为师”的指导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们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党团组织还动员大批学生与工人组成宣传队，在市中区、江北和南岸等地的大街小巷向群众讲演。当时杨闇公在重庆二府衙街七十号的寓所，经常是宣传队员聚集和休息的地方。富于爱国心和同情革命的杨准清，十分热情地赞助青年人的革命活动，他高兴地对来到家里的宣传队员们说：“孙中山先生死了，我当孝子。你们离学校、工厂太远，宣传完了，就请到我家里吃饭。”^②

由于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和追悼孙中山的纪念活动，扩大了革命的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影响也愈来愈大。

自从国共合作以来，肖楚女、杨闇公和童庸生等在党的领导下，利用统一战线这个有利条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初步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发展了共青团的组织，并为筹建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这样，就为迎接大革命风暴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到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杨闇公已担负了党的组织工作方面

^①《杨闇公日记》第261页。

^②程子健：《杨闇公同志战斗的一生》。

的任务。这时肖楚女把自己介绍的新党员带去会见杨闇公。这年三月中旬，杨闇公还利用与赵宗楷举行婚礼的机会，接见了新党员。他对被接见的同志说：“从今天起，你的组织关系和工作上的接头，都到我这里来。”^①

（五）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生了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开枪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消息传到重庆，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义愤。杨闇公同冉钧、罗世文等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一道，领导各进步团体成立反抗英人惨杀上海华人重庆外交后援会，并组织共青团员和爱国学生到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经过杨闇公等的筹划和发动，重庆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于六月二十五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并散发传单，向帝国主义提出强烈抗议。英、日帝国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开展了罢工斗争。自七月一日起，重庆市人民对英、日等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码头工人拒绝为英日商轮装卸货物，广大群众坚决抵制仇货。英帝国主义者恼羞成怒，竟派水兵登陆，在龙门浩隆茂洋行一带，破坏爱国反帝宣传，拘捕爱国学生数名。次日，残暴的英国水兵，又刺死中国群众数人，制造了“龙门浩血案”。全市人民怒不可遏。杨闇公和党团的其他负责人当即决定领导全市人民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坚决把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打下去。于是，提出了惩办凶手、赔款和要英帝国主义者向中国人民道歉的正义要求。至此，愤

^①郝谦：《新长征路上的怀念》，载《忆杨闇公同志》。

怒的群众迫使外国企业和洋行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状态，并停止了对外国领事馆、企业和洋行人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使帝国主义者遭到沉重的打击，为了向中国人民炫耀武力而开往重庆江面的两艘英国军舰，也不得不夹着尾巴离去。

革命形势的发展，亟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培养大批骨干。一九二五年八月，吴玉章由广州返回重庆，着手整顿四川省的国民党组织，同时，同杨闇公、冉钧等商量筹办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由于吴玉章一九一六年在法国同蔡元培发起组织过法华教育会，一九一七年又在北京参加开办留法预备学校，所以便将拟议中的学校定名为中法学校，其大学部名为中法大学。不久，杨闇公租得通远门外大溪沟谭家花园内一幢旧式楼房及其附近的几处民房作为校舍，首先办起了中法学校附属高初级中学，招收了两百多名因闹学潮而被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开除的进步学生与闻风而至的进步青年作为第一批学员。九月四日，中法学校正式开学，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年底由肖华清接替），杨伯恺任训育主任，张克勤任事务主任，杨闇公、冉钧、周贡植和漆树葵等为兼职教员。学校开办不久，杨闇公亲自布置第一期学生到磁器口的几个丝厂去组织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条件很差，学生们只能在一些竹木捆绑的四周通风的房子里办学，给工人上课，晚上就在这里住宿，伙食问题也是自己解决。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学生们在思想和工作能力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锻炼。①这所学校到一九二七年初发展到一千多人，教育了大批进步青年，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其中有些人加入了

①1980年10月1、2日访问戴觉非谈话纪录。

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有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创办中法学校的同时，杨闇公还领导开办了党团员训练班，培养党团基层组织的骨干。训练班每周开两三次会，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传达党的指示。主要由杨闇公、冉钧上课。杨闇公派任煜^①为这个训练班的教务长。

经过几年的筹建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建立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的统一组织机构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一九二五年冬，全省共产党员聚集于重庆中法学校举行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②，选举杨闇公为书记，冉钧为组织部长，吴玉章为宣传部长（因吴玉章当时不在重庆，遂由周贡植代理，后来为钟梦侠接任），加强了党对全川革命工作的领导。

在筹办重庆中法学校期间，吴玉章、杨闇公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四川的国民党组织作了进一步整顿，并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移至重庆莲花池。杨闇公负责省党部的实际领导工作。十月底，省党部通知各县、市党部就地选举四川省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选的有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廖兰君（廖苏华）、廖划平^③和黄复生等。除黄复生外，其余

①任煜即任白戈同志。

②1926年9月20日《中央局报告》谈到四川省党组织时，简称“川地方”，同年12月5日的《中央局报告》又简称为“重庆地”、“重庆地委”，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84、118、124页。任白戈认为：正式成立党的全省组织时，叫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见《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4、5期合刊第10页。

③廖划平后来成为叛徒。

五人都是共产党员。选举结果表明，两个多月以来四川省国民党组织经过整顿，左派已占据很大优势。

十一月，杨闇公和吴玉章等离渝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杨闇公参加了大会秘书处的的工作。大会从一九二六年元月一日开幕至十九日结束，杨闇公始终密切注视大会的动向，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作了细致的观察，并给予中肯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二大”所采取的拥护左派，拆散右派，遇事主动让步，但以不动摇根据地有限度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适应了客观环境的需要，有利于目前进行的工作。^①他拥护大会发表的重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目标和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宣言，对大会通过的《弹劾西山会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并将谢持、邹鲁、石青阳、马君武等右派开除出国民党表示十分欣喜，以为这是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大会选举中央机构时，杨闇公担任唱票工作，他对于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各部感到很高兴。大会期间，杨闇公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察觉出汪精卫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暗示了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不满，是“有用心的”，他的革命是不彻底的。阴险狠毒的反革命野心家蒋介石，这时正装出一副革命的面孔，一些人还为他的“左”的言词所迷惑，在他讲话时，竟出现了与会代表“起立致敬”的场面，杨闇公却轻蔑地认为这简直是“笑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报告抹煞一切工农援助的事实，而表示自我太强”，也是“有用心的。”^②他对毛泽东所作的关于

①② 《杨闇公日记》 第 267 页，第 168 页。

宣传工作的报告十分推崇，认为较其他报告都“有系统些，他能把具体事实指得出来，并对于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①对恽代英的报告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颇多中节”^②。杨闇公在会外也很活跃，他除参加各种群众集会外，还发起成立四川革命同志会，并亲自起草章程。他想通过这个团体，把在粤的四川革命同志组织起来，使之具有正确思想，以免受到反动派的迷惑，便于他们将来返川进行革命工作。杨闇公在广州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对四川党的工作曾作指示，要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对四川军阀采取“前顶后拖”的办法。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也向杨闇公说：“将来北伐一定成功，要取武汉，驻守万县的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四川同志要负起这一方面的工作。”^③

国民党“二大”以后，杨闇公、童庸生先期回川，不久，吴玉章亦来重庆，当时，刘伯承也住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经杨闇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杨闇公曾要他去广州看一看，并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们遵循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国民党“二大”的精神，讨论并研究了当前的工作，决定由杨闇公负责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和开展工农运动，吴玉章负责继续整顿四川国民党的组织并在中上层人物和军队中进行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许多县、市都成立了国民党党部，重庆、成都等地均组织了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三——四万人，营山、南川等地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兵运工作亦有相当进展，党已争

① 《杨闇公日记》第269—270页。

② 同上第276页。

③ 刘伯承：《纪念杨闇公同志》，载《忆杨闇公同志》。

取并掌握了部分军阀部队，使之有的同情革命，有的在后来参加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

杨闇公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四川地区进行革命工作的同志应当认识，“扩大四川的民众力量，才能使全国革命成功。而加入革命的人们，才能变为真正的革命者。”他特别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说：“应扶助在全川人口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民的发展才能得到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四川的革命基础巩固，不致于为假革命所动摇”，“不致因环境变迁而动摇本党在政治上的地位。”^①杨闇公经常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②为了开展全川的农民运动，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派了一些干部到各地去组织农民协会，此外，还派遣二十多人去广州到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

当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向革命人民发动猖狂进攻时，杨闇公坚定地领导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给予坚决回击。

“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时，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通过莲花池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在打枪坝召开各界群众纪念大会，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但是在国家主义派骨干分子徐孝匡、杨叔明把持下的重庆联合中学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却不参加大会。国家主义派分子还大放厥词，辱骂革命群众是“卢布虫”，胡说“五卅惨案”是共产党制造的。会后，重庆《新蜀报》在报道大会消息的特稿的标题中，标明了

^①杨闇公 1926 年 11 月 27 日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

^②《吴玉章回忆录》第 163 页。

“惟联中女师不参加大会未免美中不足”。国家主义派遂以此为借口于次日纠合几十名学生到《新蜀报》社起哄，要挟报纸刊登启事赔偿两校名誉损失，并强使主编周钦岳到二女师，要他向学生鞠躬赔礼。杨闇公闻讯后立即赶到报社问明情况，并布置“全面反击”。各报社成立了重庆新闻界雪耻大会。第二天各报均辟专栏揭露国家主义派的暴行。各进步团体纷纷发出“快邮代电”，各方面进步人士亦发表谈话支援新闻界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不久，成都、泸州、顺庆（即南充）等地的新闻界亦起而响应，这就形成了全川舆论界对国家主义派的总进攻。这个斗争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使徐孝匡、杨叔明处境十分狼狈而孤立。他们不得被迫托人出来调处，并在各报刊登道歉启事，最后只好夹着尾巴离开重庆教育界。在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和杨闇公领导下的这场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大获全胜。^①

这时，国民党右派已在重庆总土地另立伪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同设在莲花池的省党部相对立。总土地的右派省党部经常肆意挑起冲突，对莲花池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大打出手。有一次，中法学校的一支学生宣传队在街头向群众宣传北伐胜利的消息，却遭到右派的袭击。一些学生挨打受伤，鲜血直流。杨闇公闻讯后，立即赶到刘湘军部（北伐军进入两湖战场后，捷报频传，声威大震，刘湘迫于形势，将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面见刘湘，痛斥了右派的罪恶行径，并严正指出：“实在不能容忍伪省党部再存在下去了。”这时，几百名革命群众

^①周钦岳：《闇公同志领导的几次重要斗争》，载《忆杨闇公同志》。

用滑竿抬着受伤的学生来军部请愿。群众高呼：“打倒伪省党部！”“请刘军长严惩凶手！”等口号，要求刘湘维持社会秩序，缉拿凶手，并取缔总土地国民党右派省党部。刘湘此时既以易帜改号，当然也就装出“革命”的样子，他当众下了一道查封总土地伪省党部的命令，并派人去取下了伪省党部的吊牌，伪省党部就这样被查封了。

九月初，正当北伐军打到武汉时，发生了英国军舰在万县向中国军民开枪开炮，造成数百间房屋被毁，近千人伤亡的“九五惨案”。事件发生后，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立即发动全川人民掀起反英浪潮。九月七日，成立了万县惨案重庆国民雪耻会，杨闇公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和各进步团体相继发出“快邮代电”，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号召人民奋起斗争。九月九日，“雪耻会”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反英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十多万人。杨闇公强调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彻底实行对英帝国主义经济绝交。党组织还通过“雪耻会”组织了纠察队，严禁英货行销，并防止奸商的破坏活动，使市面上“洋油”、“洋烟”很快绝迹。愤怒的群众又查封了大量英国制造的哈德门香烟和布匹。这期间，党还组织英国企业中的华工，开展了罢工斗争。

杨闇公在革命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然非常关心弟妹和侄儿侄女们的进步与成长，热情地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经常向他们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革命道理，鼓舞他们走向社会，参加实际斗争。在他的教育帮助和带动下，仅重庆二府衙家中的弟妹和侄女中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就有六、七人。杨闇公的五弟杨尚昆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回忆当时的情景

说：“那时我家可以成立一个支部。”^①一九二四年，杨尚昆还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时，杨闇公就介绍他同一些进步青年结识，并参加他们组织的读书会。一九二五年，杨尚昆到重庆后，杨闇公经常叫他从事刻腊纸、印文件、给党内同志送信当“交通”等实际工作，党的地委常在杨闇公家中开会，有时作记录的同志不在，杨闇公在征得与会同志的同意后便叫他作会议记录。杨尚昆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迅速成长起来。一九二六年，杨尚昆将要去上海求学，父亲和二哥认为国家贫穷落后，只有发展工业才能救中国，主张让他去学工，杨闇公却不同意。他说，国家惨遭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压迫和剥削，靠“工业救国”只是幻想，惟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杨闇公力主五弟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上海大学。结果，杨尚昆进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行前，杨闇公把五弟托付给一位地下党员，并给五弟带去了给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一封介绍信。不久，杨尚昆即被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杨尚昆为中国革命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他认为闇公四哥是自己早年革命的引路人。^②

(六)

一九二六年秋季以后，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一面继续大力

①杨尚昆 1979 年 12 月 19 日在广州接见出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的四川代表的谈话记录。

②杨尚昆：《我早年的革命引路人——忆闇公四哥》，载《忆杨闇公同志》。

发展工农运动，一面又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大抓军事斗争，以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

这年十月，吴玉章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图，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提议，派刘伯承到四川做军事工作，建立革命武装或策动部分军阀部队起义。刘伯承回四川后，向朱德^①、杨闇公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随后，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了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决定，一方面努力争取四川所有军队都倾向国民革命而反对北洋军阀，以此抑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另一方面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部分军队起义，建立革命武装，配合北伐战争。这时，我们党在四川也已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其一是驻合川的江防第二区司令黄慕颜的部队。党曾对黄慕颜进行争取教育，经杨闇公、童庸生介绍，黄慕颜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中有党派去的政治工作人员，还开办了培训骨干的学生队，并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国民党的区分部。其二是驻顺庆的川军第五师何先烈部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其三是驻泸州的赖心辉部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此外，共产党员李蔚如在涪陵掌握了数千人的团民武装，邝继勋在彭县、崇宁掌握了部分江防部队，潼南、蒸江等地的共产党员亦掌握了部分团队。这说明，党要从军事方面在四川开创一个局面是有一定基础的。一九二六年秋，由杨闇公主持，在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召开了倾向革命的川军师、旅、

^①北伐战争开始后驻守万县的四川军阀杨森要求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广东国民政府遂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并派朱德赴万县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团各级十二个单位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杨闇公在会上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会后，杨闇公将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袁品文、陈兰亭和皮光泽（驻泸州部队）等六个部分的代表留下，向他们正式公布了关于举行顺庆、泸州起义的决定，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军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任副总指挥。刘伯承当时尚不在重庆，但他来渝后便立即到合川向慕颜作有关起义的军事部署。他们筹划由黄慕颜伪称调防成都，率领所部开赴顺庆与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会合，挟持何光烈就范，先在顺庆举事，再由袁品文、陈兰亭等在泸州发起响应，并迅速率部到顺庆与黄、秦、杜三部会合，以顺庆为根据地，将起义部队整编为六个师，向绥定（今达县）进击，消灭刘存厚部。然后挥师入陕，接应已由甘肃开入陕西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中原与北伐军胜利会师。商定后，刘伯承返回重庆。党组织又派遣童庸生持刘伯承亲笔信去泸州，指示袁品文、陈兰亭等按计划行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四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山学校举行。大会代表大都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杨闇公和刘伯承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杨闇公代表省党部作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和《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报告》。大会通过了杨闇公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杨闇公的报告和大会宣言分析了全国和四川的形势，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提出了充分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争取全国革命成功的任务。杨闇公强调革命事业的发展，要以充分发动群众为基础。他说：只要“以农民为后援，以有主义之军队为先锋，将来倾之覆之亦易

若反掌。”^①大会通过了制裁国民党右派的决议案，选举了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杨闇公、刘伯承、朱玉阶（朱德）等当选为执行委员。这次大会是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团结国民党左派和各界群众不断同右派进行斗争的胜利成果，对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发展四川的革命形势具有深远影响。

在这次大会期间，杨闇公坚持党的原则，正确处理了联合成都的“赤心评论派”的问题。早在一九二四年秋季，杨闇公就力促中国 Y·C 团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合作，他曾多次写信给傅双无等，要他们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一九二五年春，吴玉章在北京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即写信给杨闇公，请他宣布取消中国 Y·C 团，其骨干分子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②杨闇公入党后，亦曾多次写信给成都的中国 Y·C 团成员谈及这一问题。^③但是，吴玉章、杨闇公离开成都后，中国 Y·C 团即为傅双无所控制。傅双无好搞分裂活动，他和一些人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赤心评论》在思想上亦转入社会民主主义。傅双无等人常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区组织发生冲突。这一次，赤心评论社的傅双无和吕寒潭作为成都方面国民党左派的代表，趁来重庆开

①杨闇公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杨闇公日记》第 291 页。

②《吴玉章回忆录》第 160 页中说：“1925 年春我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即写信请杨闇公同志等宣布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个别地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处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即指中国 Y·C 团。——引者注。

③据 1981 年 3 月在四川荣县发现的张克勤同志的自传说：“杨闇公入党后“曾多次来信，叫同人（中国 Y·C 团成员——引者注）加入共产党，同人的认识不够，竟拒绝了。”

会的机会，向杨闇公提出了赤心评论社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杨闇公派遣任煜和党的成都地区组织的负责人刘愿安等为我党代表，与傅双无、吕寒潭进行谈判。杨闇公指示我党代表坚持党的组织原则，拒绝傅双无的集体入党的要求，只同意按党章规定，个别地吸收够条件的分子入党。由于傅双无坚持错误，在吸收赤心评论社成员入党的问题上没有谈妥，但是，我党代表在谈判中说服对方在革命运动方面与我党合作，达成了统一战线的协议，尽可能团结了赤心评论社中坚持革命的分子。^①

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进行的过程中，袁品文、陈兰亭于十二月一日在泸州兰田坝扣押了赖心辉的师长李章甫，宣告起义。起义部队在当天晚上击溃了李章甫三个团的兵力，占领了泸州城，接着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五路军（袁品文部）和第四路军（陈兰亭部）。十二月三日，顺庆方面的秦汉三和杜伯乾亦率部起义。这些行动都突破了原定计划。消息传来后，杨闇公忙将主持大会的任务交由其他人接替，他自己便与刘伯承等赶赴合川，负责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决定由刘伯承和黄慕颜率合川江防部队开往顺庆。十二月九日，黄部与秦、杜的部队在顺庆会合。次日，在顺庆城内果山公园召开起义军誓师大会，宣告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刘伯承就任总指挥之职，他在大会上号召起义军团结一致，打倒万恶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群众掌声雷动。顺庆方面起义部队改编为第一、二、三路军，一路军司令由

^①任白戈：《怀念杨闇公同志》，载《忆杨闇公同志》，《杨闇公日记》第173—175页。

副总指挥黄慕颜兼任，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担任二、三路军司令。这时，杨闇公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中共四川地委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立即向顺庆集中，嘱刘伯承、黄慕颜等人率部坚守顺庆。^①另一方面，杨闇公又派人送信给武汉的吴玉章，请求设法对顺泸起义予以支持。吴玉章便在武汉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按军事序列给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番号，委派刘伯承为军长。会议通过了这个提案。但右派谭延闿竭力阻挠这个议案的贯彻执行，幸有吴玉章力争，武汉国民政府终于公布起义部队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②

顺泸起义的爆发震惊全川，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之动摇，搞得军阀神魂不定，一部分军阀如邓锡侯等立即公开出兵镇压，另一部分军阀如刘湘、杨森等暂时采取观望态度，窥伺时机，再下毒手。四川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邓锡侯企图在起义军立足未稳时，一举将其扼杀，于是下令“克日戡定，以免蔓延”。他派遣罗泽州部的六个营，李家钰部的两个团和陈书农部的两个团，将顺庆城团团围住。这时，刘伯承提出了放弃顺庆，乘虚攻入绥定，消灭刘存厚的兵力，待泸州起义军前来会合后再整编入陕的作战计划。但是，顺庆起义部队中的团营级军官眷恋妻子儿女，力主坚守顺庆；泸州起义部队将领则贪图地方盐税而滞留原地，不按预订计划行事。这就迫使刘伯承改变作战方案，决定集中火力攻破敌军一路。十二月六日，刘伯承亲自指挥起义军向李家钰部猛攻，不料顺庆城内起义军一个连突然倒戈，敌军乘虚入城，顺庆陷落敌手。起义部队遂被

①戴迎春：《顺（庆）泸（州）起义中的刘伯承同志》，《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②《吴玉章回忆录》第166页。

迫转移开江。此时，刘湘慑于北伐军的声威，尚不敢轻举妄动，然而，他已投靠蒋介石，正待机猛扑。杨森由于侧击武汉被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正假意表示悔改，作出倾向革命的姿态，以求喘息。

十二月下旬，杨森假意邀请杨闇公、刘伯承和童庸生赴万县主持国民党党务并进行会商。利用这一机会，杨闇公、刘伯承和朱德等军委负责人在万县进行了会晤，他们讨论了全川的革命军事问题，决定将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移往泸州，委派刘伯承带领十多名政工人员立即赴泸，以加强对该地起义部队的统一指挥。刘伯承在杨闇公掩护下到达泸州后，整顿了部队，密切了军民联系，加强了防卫，大大提高了起义部队的战斗力。

到一九二七年春季，四川的反动军阀已经和反革命野心家蒋介石进一步勾结起来，他们一方面处心积虑要将泸州起义部队置于死地，一方面加紧策划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正当北伐军占领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竟然无理炮轰南京城，造成二千多军民伤亡的大惨案，对中国革命进行横蛮的武装干涉。南京惨案发生后，重庆市各界人民无不义愤填膺。杨闇公等党的四川地委负责人议定，并同国民党左派负责人商妥，于三月三十一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全市群众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暴行，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

召开群众大会的消息传出后，重庆地区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斗争已达白热化的程度。反动势力下决心要向人民开刀。三月下旬，刘湘在他的督办公署召集秘密会议，决定在召

开群众大会时，暗中布置军队，以调停“工学冲突”为名，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负责人下毒手，并拟定了大屠杀的黑名单。刘湘还派人把蒋介石派到四川来的爪牙杨引之等请来充当大屠杀的指挥。

这时，社会上谣言四起，什么“共产党要暴动”啦，“工人学生要打洋人”啦，“打枪坝的群众要冲外国领事馆毁教堂”啦，闹得满城风雨。反动派就利用他们自己所制造的这类谣言作为镇压群众的舆论准备，并以保护侨民和领事馆、洋行为名，进行大屠杀的军事部署。三月三十日，刘湘指使人对杨闇公进行恫吓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的大炮已脱了炮衣。”杨闇公予以严词拒绝。当天中午，杨闇公又得密报，说刘湘在军部召集秘密会议，准备破坏大会。针对这种险恶的形势，党组织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并设法采取安全保卫措施。晚上，杨闇公在党的秘密机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为党团地委的负责同志冉钧、钟梦侠、程志筠、刘成辉、蔡铭钊、任煜和程仲苍等。^①会议决定，为了不向反动派示弱和不失信于人民，群众大会仍如期举行。杨闇公严肃而坚定地讲，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反动派要杀我们，不取决于我们这个会开与不开。要革命就不怕牺牲，怕牺牲就不是共产党人。与会同志一致采取宁愿牺牲也要开会的态度。^②接着研究了会场的警戒问题，决定了几项安全保卫措施：由工人纠察队负责在场内巡查；各校童子军携带木棍和绳套在会场四周警戒；各单位整队入场，不许闲杂人混入队伍等。杨闇公还说他已找过杨

^① <任白戈同志谈大革命时代四川地下党的一些历史情况>， <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 1981年第1期。

^②任白戈： <怀念杨闇公同志>，载 <忆杨闇公同志>。

森部的向时俊，要他带卫队入场维持秩序。那天晚上，党的负责人还在川东师范学校召集工人纠察队员开会，要他们严守会场大门，并作好主席团的保卫工作。深夜，杨闇公去黄慕颜寓所（当时黄慕颜正在重庆，请党的四川地委向武汉国民政府求援，并筹集款项接济驻开江的起义部队），嘱其次日一早赶到会场。^①然后，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三月三十一日，杨闇公很早就起床了，他对妻子赵宗楷说：“今天召开市民大会，我要早点去主持。”刚下楼，杨淮清就来劝阻儿子不要赴会。这几天来出现的种种迹象，使老人对闇公的安全十分担心。但是，杨闇公还是说服了父亲。正待出门时，却接到在刘湘军部当参谋长的一位亲戚派人送来的信，信中说：“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音。”杨闇公冷笑道：“威胁和利诱，对我都无济于事，我们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是为了个人利益，难道还有错么？！你们收买不了我也阻止不了我。”说罢便慈爱地搂抱着不满一岁半的女儿赤化，亲昵地说：“爸爸死了，你可要给我报仇啊！”接着又深情地亲吻了睡在摇篮中的刚满月的小儿子共产，喃喃地说：“儿啊！你还在朦胧地睡着，可爸爸走了啊！还能再见吗？”杨闇公给两个孩子取这样的名字，表示他同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此刻，家里的人正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听着杨闇公对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说话。出门时，杨闇公转向结婚刚两年的妻子说：“我走后，你赶快去妇联集合，如消息不好，即作准备。”他

^①黄慕颜：《“三·三一”惨案纪实》，《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还叮嘱弟妹们都要去开会。然后，向家人挥一挥手，大踏步走了。^①

杨闇公赶到会场后，中共四川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负责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冉钧、李筱亭、程秉渊（程子健）和漆树棻等均陆续来了。任煜也在主席台上准备作记录。各界群众队伍正举着队旗，敲着锣鼓，高呼革命口号，歌声嘹亮地涌入会场。这一天，虽然满天阴霾，革命群众却热情高涨。沿途虽然军警林立，赴会群众却无所畏惧。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在认真地维持秩序，会场警戒很严密，杨闇公在主席台上密切注视着会场动静，并嘱咐纠察队提高警惕。这时，军阀刘湘已按照他们的既定计划，命令王陵基的部队包围会场，堵住了各个出口通道。而蓝文彬和巴县团阀曹燮阳、申文英的反动兵士和团丁，则扮作工人模样，暗藏凶器，混入群众队伍，或摊贩周围。当黄慕颜告诉杨闇公沿途所见情况和场内发现形迹可疑分子时，杨闇公非常镇静，要大家沉着应付，并增调童子军参加维持会场秩序的工作。当大会即将开始时，会场周围突然响了一串鞭炮，接着场内外枪声四起，混在群众中间的暴徒，一齐大打出手，他们抡起铁条，见人就打；抽出砍刀，见人就杀。顿时，会场秩序大乱。混乱中，匪徒们开始向主席台上的大会主持人冲击。正在台前制止反动派暴行的《新蜀报》主笔漆树棻首先被打倒并被拖出会场，惨死于两路口的荒冢之中。主席台上的其他负责人只得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由会场一角跳下高高的城墙。许多跳墙群众在城外又遭敌人伏兵袭击，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跳墙时摔死跌伤的也不少。这一天，被杀害

^①赵宗楷：《忆闇公》，载《忆杨闇公同志》。

的革命群众有四五百人，受伤者在千人以上。杨闇公由于跳墙后潜藏在通远门外一户农民家中，才得以脱险转移到江北。这就是反革命野心家蒋介石指使四川反动军阀制造的惨绝人寰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四月一日清晨，杨闇公毅然从江北回到城里，联络同志，布置工作。这时，反动派仍在继续实行白色恐怖。家里的人劝杨闇公暂避一下。他却用深沉的语调对亲人们说：“敌人虽然十分残酷，但我岂能顾及个人安危！？”他抓紧时间勇敢机智地进行工作。晚上，杨闇公在妻子赵宗楷哥哥的家里召集党团负责人钟梦侠、任煜和刘成辉开秘密会议，说他要到武汉去向中央请示报告，叮嘱其他几位党团负责同志做好善后工作。^①

四月二日，杨闇公与黄慕颜及六妹杨毅君搭上去武汉的“和平”号轮船。由于发现便衣特务跟踪，当夜又返回家中。次日，他化妆偕妻子赵宗楷及一位党员登上“亚东”号轮船。但遭叛徒告密。四日凌晨，“亚东”轮行至江心，特务便开出快艇和木船将轮船包围。杨闇公临危不惧，神色自若，迅速将身边隐藏的秘密文件吞咽下肚。特务以检查为名逮捕杨闇公时问道：“你是不是杨闇公？”他说：“我是，你们又怎么样？”那人说：“那你就不要干什么共产党了，跟上我们才有命。”杨闇公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是什么东西？！你们是一伙凶恶的强盗，无耻的卖国贼，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你们眼看就要无立锥之地了。”当特务要将赵宗楷和同行的同志一齐逮捕时，杨闇公机智地掩护了那位同志。他故

^① <任白戈同志谈大革命时代四川地下党的一些历史情况>， <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

意问道：“我是共产党员，他们要逮捕我，你先生为什么也要被逮捕呢？”特务们以为那位同志不是共产党员，立即把他放了。特务们将杨闇公、赵宗楷带上了围船，杨闇公向周围群众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反动派制造“三·三一惨案”的罪行，他大声疾呼：“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列强！反对蒋介石独裁！铲除军阀！”当特务强行将杨闇公、赵宗楷分别带走时，杨闇公沉着地对妻子说：“宗楷！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转告同志们，我会斗争到底的。孩子大了，要他们为我报仇！你要好好抚养他们。”接着又说：“敌人眼看就要无立锥之地了，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在全中国胜利的。① 围船上群众越聚越多，他们不顾特务阻拦，聆听杨闇公慷慨激昂的话语，目睹了这悲壮的一幕。

两天以后，赵宗楷经党组织和杨淮清多方营救获释。杨闇公被关押在蓝文彬的监狱里受尽折磨。反动派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丝毫动摇不了杨闇公坚定的革命立场。审讯时，敌人用乱棍猛击杨闇公的双腿，强迫他下跪，杨闇公宁死也不屈膝。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问他：“难道你不怕死吗？”杨闇公愤怒地说：“只有你们才怕死。你们也必然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未能得逞，于是便在四月六日深夜，将杨闇公押至浮图关一个山岩边秘密处死。临刑前，杨闇公大义凛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动军阀害怕暴露了杀害杨闇公的罪行，便布置刽子手围着杨闇公刀刺棒打。为了阻止杨闇公

①赵宗楷：《忆闇公》，载《忆杨闇公同志》。

继续呼喊革命口号，匪徒们首先割去他的舌头，可杨闇公仍用鼻子哼斥，用眼睛怒视，用手指比划，以表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这位英勇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全身都迸发出战斗的火花。暴徒们的兽性发作了，他们丧心病狂地挖掉了杨闇公的双眼，砍断了他的双手，最后还向他射出了三发罪恶的子弹……^①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书记，英勇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杨闇公壮烈牺牲了。他以二十九岁的壮丽青春，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惊天动地的正气歌。

^①赵宗楷：《忆闇公》，载《忆杨闇公同志》。

魏野畴

张守宪 董建中 王少民
梁星亮 徐超山

魏野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和宣传活动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创建和发展陕西党团组织，建立党的统一战线，领导陕甘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创建皖北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曾经深情地说：“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读过，写得有水平。”^①

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魏野畴，原名魏凤标，号明轩，一八九八年三月八日生于陕西省兴平县板桥乡魏家村。祖父魏兴德、父亲魏焕章和两个叔父都是农民。全家九口人，有土地六十余亩，大都是坡地，一家人终年辛勤劳动，打下的粮食仅可勉强糊口。

野畴不满三岁丧父。祖父母和母亲对他很疼爱，尽管家里经济困难，在他七、八岁时，还是把他送进本村私塾里念书。

^①孔从洲：《魏野畴二三事》，《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私塾先生康玉堂对野畴也很喜爱，常夸他学习用功，尊敬师长，友爱同学。一九一二年冬，野畴同农村姑娘何玉杰结婚。

一九一三年春，野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①三秦公学的教职员中，有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有的曾到国外留过学，他们分别接受过一些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思想，所以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吸收了若干新的东西。野畴对这些新东西很感兴趣，他刻苦学习，考试常名列前茅。在各门课程中，他尤其喜爱国文、历史、地理和英语，阅读了不少经史子集和报刊。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张贴在教室内。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逐渐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竟然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消息传到陕西，野畴义愤填膺，在进步教职员的支持下，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同学一起，积极地投入了反日反袁的斗争。他们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谴责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与此同时，还揭露了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祸陕的罪行。

一九一七年春，野畴在中学毕业。恰在这时，他家里分了家。孤儿寡母虽然分得土地二十二亩，但由于没有劳力耕作，生活更加困难。母亲急切地盼望他找到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亲友也劝他回家乡任教。但野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

^①1915年三秦公学与西北大学中学班合并，改称陕西省立第三中学。

心想继续升学深造。他说服了母亲和妻子，又取得了亲友、同学的同情和资助，赴北京报考高等院校。

盛暑炎热，野畴从家乡出发。为了节省身上为数不多的铜板，他靠两条腿长途跋涉数百里，到河南省观音堂才搭乘火车到了北京。当时，京都各大学正在招考新生，野畴报考了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四所院校，均因成绩优异而被录取。野畴因家庭经济困难，选定公费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学习。

野畴到北高师上学不久，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传播到中国。野畴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对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热情赞扬。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野畴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和同学们一起到街头讲演，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慰问北高师被捕和受伤的同学，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野畴看到了苦难祖国的希望，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五四运动后，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北高师进步师生组织的讲演团活动，担任平民学校、夜间补习学校的教学工作，决心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为了把新文化、新思想及时传播到自己的家乡，一九二〇年初，野畴和北京大学陕籍同学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

《秦钟》的宗旨是：“（一）唤起陕人自觉心；（二）介绍

新知识于陕西；（三）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①野畴在《秦钟》第一期上发表了《潼关外之新思潮》一文，明确提出陕西青年要学习新思想，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改造社会。指出“科学的态度就是研究的态度，凡遇着各种现象各种问题，总要问：‘为甚么？’‘这是甚么？’‘要做甚么？’若得不到这些‘甚么’，即不肯赞成或反对‘甚么’。”^②严厉批判了把孔子当“圣人”、“男女界限要严”、“以古为好”、“以偏为全”、“以变为不变”等论调。这表明野畴已开始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现象，说明社会问题。

这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日，陕西省教育厅长郭希仁命令各校师生，一律赴文庙朝拜孔子。省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王授金，拒绝参加朝拜，并召集全校学生对孔子作了评论，揭露孔子思想麻醉中国人民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号召学生起来学习新文化，反对尊孔读经。事后还把讲演内容在报上公开发表。对此，郭希仁极端憎恨，将王授金无理免职。这一消息传到北京，野畴等人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现象，必须揭发反对。十一月中旬，野畴和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刘含初、呼延震东等十一名旅京陕籍同学，支持王授金的革命行动，上书郭希仁表示强烈抗议。信中写道：“顷闻九月三十日，北京晨报载，对于陕西女子师范讲演训令一则，不胜骇异……孔子是否当照厅令崇尚，兹不具论。在中华民国法律之下，学术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人人皆知，而教厅何能不知，乃竟非法干涉，妄施阻挠，似此藐视国法，贻祸教育，殊属荒唐绝伦，若不设法挽救，遗害何堪设想。同人等认

^{①②}《秦钟》第一期，1920年1月20日出版。

为陕西近年教育，所以日退一日，全由教育厅倒行逆施而致，早应根本解决。所以绝不惜开罪于教厅，而使吾陕青年永沦于黑暗。先此函达，速将真象据实报告，以减罪戾。否则笔诛所及，名誉扫地，尔时后悔，勿谓言之勿预也。”^①

一九二〇年冬天，野畴在北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野畴撰写了长达十五万字的《中国近世史》，初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他在这部书稿中，历数了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肯定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功绩，歌颂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论述了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和方法。该书第一章导言中说：“我们做历史，并不是为古人留名声、传不朽，是要把人类过去的阴影投到现在，要人们知道他们的现在是怎么来的。既知道现在是怎么来的，便可预料将来了。”“新历史的目的是：为解释过去，明白现在，指挥将来；不是死记过去的”；“新历史的方法是：合各种有关系的科学的原理、材料，来搜集、考鉴、整理、概括他自己的各种材料；就是作历史实验。”该书还倡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要“使人民都参加政治活动，并对于政治有兴味，肯负责”；“使人民都享有均等教育的机会，都得着完满的物质文明，无饥寒的困迫。”^②当然，由于野畴接受马列主义的时间不长，书中还难免留有旧史学观念的一些痕迹，如对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爱国反帝斗争的进步作用，就

^①转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5—21页。

缺乏正确的估价等。

野畴的大学生活，是极其清贫的。寒冬腊月，连棉裤也穿不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虽系一所公费学校，但只管吃饭和住宿，书籍、文具、日用品等花费全要自理。他那连温饱也顾不住的家庭，不可能给他什么接济。他就利用课余、假日，为学校制作教具，或搞点翻译，挣来几个钱，又大半买了书。就这样克勤克俭，坚持把大学的课程学完。

把马列主义传播到陕西

一九二一年夏，野畴在北高师修业期满，回到陕西，应华县私立咸林中学校董、教育界知名人士杨松轩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他热心教育事业，立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除主持教务，每周授课二十四小时外，还抽空在华县、西安等地调查教育状况。野畴认为旧的教育制度从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必须彻底改革。他提出要缩短学制，精选教材，用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用马列主义和自然科学去代替封建主义的一套教学内容。他尖锐地指出：若继续使用旧教材对学生是浪费光阴，是宣传封建主义毒素，是“无异把粪给学生吃。”^①“历史教科书不良，实在可烧。”^②在野畴的倡导下，咸林中学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文字学、农学、簿记等课

①魏野畴：《给克强（杨钟健）的信》（1922年2月5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②魏野畴：《给克强的信》（1922年2月11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程，加强了英语、体育和音乐的教学，改革了国文、历史课的内容。他在讲授历史课中，使用自己编写的《中国近世史》，以熟练的腹稿讲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在讲授社会进化史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教育学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勿作时代的落伍者。为了加强学校的进步力量，在野畴的倡议下，先后聘请了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王复生（中共早期党员，北京大学学生）、曹彦生、韩叔勋、张凯堂、誉久等人到校任教。为了锻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的能力，野畴指导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青年会、读书会、体育会等组织，开展学术、体育、文娱和社会等有益活动。他导演的新剧《木兰女士》、《孔雀东南飞》，轰动了华县县城和附近各县。

野畴还提倡妇女解放，参与了创办华县模范女子学校的工作。开始虽然只有四名教职员的女儿报名上学，但野畴并不灰心，坚持给四名女生上课。不久，其他六名教员也积极支持女校的开办，使女校很快发展起来。

野畴回陕以后，同在北京进行革命活动的陕籍同学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九二一年秋，天章、钟健、子洲等人创办了《共进》半月刊，并计划出版《共进丛书》，写信给野畴征求意见。野畴回信说：“我极端赞成，只望大家努力好了，读书做功夫好了。若果我们能做出来成绩，就是（恶）势力把刀搁在颈上，也痛快，也幸福，休说有什么反对我们的话。”^①

^①魏野畴：《给克强的信》（1922年2月5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野畴在咸林中学倡新摒旧，精心育人，受到大多数师生的崇敬，但也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排挤，于一九二二年夏被迫离开华县。恰在这时，他接到杨钟健的来信，大意说：你回陕时留下的《中国近世史》书稿，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现，认为写得不错，希望你加以修改，他准备帮助出版。野畴认为自己刚辞去咸中教务，正是个好机会，便离陕赴京，修改、补充自己的著作。遗憾的是，由于蔡元培辞职离开北京，这部《中国近世史》稿，当时未能出版。直到野畴为革命牺牲之后，才由他的好友南汉宸、杨明轩、王子休等，把这部书稿连同他翻译的另一部《美国史》稿，一起找出，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申江书店、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野畴此次进京，一边修改书稿，一边从事革命活动。这一年的十月间，他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杨晓初、赵国宾、呼延震东等人在《共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以《共进》半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团结进步青年，同混沌污浊的社会开展斗争。共进社成立后，将《共进》半月刊的宗旨，由原来的“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①摆脱了狭隘的地方观念，注意了世界革命潮流和国内政治局势，开始了《共进》的新阶段。野畴既是共进社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共进》半月刊的积极撰稿人。他先后在《共进》上发表了《学校的编制与课程》、《解决陕西问题的一个最低限的方法》、《新学校系统在陕西施行时要注意的几点》、《敬告陕人不要

^①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2页。

迷信神童江希张》、《北京最近之轩然大波》、《威尔士的将来主义》、《告陕西青年》等十余篇文章，宣传反帝反军阀，宣传马列主义，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号召青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野畴热心社务，旗帜鲜明，被大家誉为共进社的“健将”。^①

马列主义的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使野畴由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青年，逐渐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一九二三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春，野畴应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的邀请，由北京经山西赴榆林，任该校国文和英语教员。当时陕北经济文化落后，消息闭塞，榆中虽为陕北最高学府，但由于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仍沿袭着封建教育那一套内容和方法，师生读经尊孔，校园死气沉沉。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魏野畴，一到榆林，便决心致力于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改造这种摧残青年、令人窒息的环境。课堂上下，他为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介绍《向导》、《新青年》、《共进》等革命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他对学生们说：“人家拿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不起来救国，国亡了我们还有书读吗？”^②野畴善于团结群众，富有组织才能，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利用课余饭后的点滴时间，到学生宿舍谈心，或与学生们一起散步聊天，讲述革命道理。学生们视他亲如兄

①刘天章：《给克强的信》（1923年11月26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②李力果：《皖北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载《红旗飘飘》第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2月版。

长。在他的指导下，学校整顿了学生自治会，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话剧研究会，学生走出校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欺骗人民的斗争，开展破除迷信，反对苛捐杂税和拉伕拉差的斗争，还积极开办贫民学校，利用假期到农村宣传，激发人们投入火热的革命洪流。

为了唤醒民众，他曾编写了历史话剧《爱国贼》，描写一位爱国青年深入军阀巢穴，盗出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密约，揭露了军阀卖国的丑恶嘴脸。话剧演出时，他亲自扮演主角，把那位爱国青年机智、勇敢完成任务的义举，生动地表现出来，使观众很受感动。

野畴在繁忙的教学和革命活动中，还抽出时间从事译著，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原理》^①和《美国史》^②两部著作。

野畴在榆林时，还结识了杨虎城将军，二人过从甚密。野畴经常向杨虎城讲解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对他后来参加国民革命，同共产党合作，走上逼蒋（介石）抗日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野畴在榆中的革命活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发觉，也遭到校内封建遗老遗少的敌视。他们阴谋迫害野畴。杜斌丞很关心野畴的安全，但也无能为力。是年暑假，野畴被迫离开榆林。

野畴在华县和榆林任教不到两年，两次被迫离职，但却影

①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不详，魏野畴翻译后没有公开出版。

② 《美国史》约 85 万字，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俾尔德和巴格利二人编著。魏野畴翻译后，经向达校订，1929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响和培养了许多进步青年，指引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刘志丹、吉国桢、潘自力、高克林、阎揆要、王子宜、曹力如、苏士杰、霍世杰、白怀林、刘文蔚、张秉仁、杜松寿等都是他的学生。这些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西地区党团组织和革命军队的骨干。

野畴在咸中和榆中任教期间，每月薪金几十块银元，收入并不算少。但他将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进步书刊、接济贫苦学生和资助了《共进》半月刊。对于自己，花每一文钱都要仔细盘算。那件布袍、长衫，已经穿了多年，也不肯更换新的。至于家庭的困难，他更很少照顾。一次放寒假回家，快过春节了，衣食无着的老母，开口向他要钱。他很难为情地掏出了仅有的两块银元递给母亲，惹得母亲把钱扔在地下，痛哭了一场。野畴这种一心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艰苦奋斗、严以律己的品德，至今仍深深的留在亲友们的记忆中。

野畴身在陕西，仍然时刻关心着革命团体共进社的成长。随着形势的发展，共进社的发展也很快，在陕西的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共进社内部因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章程，在共进社的性质、任务以及与青年团、共产党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加之不少骨干社员大学毕业到外地工作，组织上也有些松弛。为了加强党对共进社的领导，一九二三年秋，野畴去北京和刘天章一起，对共进社进行了整顿。他同留京的许多老社员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并积极地介绍了一些革命青年加入共进社和共产党。一九二四年春节期间，他和天章主持召开了共进社的年会，上海、天津、陕西等地均有代表参加，共同总结了共进社成立一年多来的工作，决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决定修改共进社的纲领和章程，并推定野畴和天章担

任起草工作。野畴和天章起草的纲领和章程，放弃了原来“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比较空泛的宗旨，而把政治问题看作“是目前最急切的问题”，把经济问题看作是“一切问题中之根本问题”；主张以“一致的努力，反抗国内封建的旧势力及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终必使之解除武装而投降。”还提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后，对经济要实行彻底改造，以达到使“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劳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①同年四月，共进社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野畴、天章起草的新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野畴当选为自治委员会的委员。从此，共进社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更为严密的组织原则。共进社经过整顿，在社内建立了党团支部，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组织，社员达数百人，遍及陕西、北京、天津、上海、开封、南通等地，在日本和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有共进社的成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较大、历史最长的进步社团，是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得力外围组织之一。共进社办的《共进》半月刊，畅销国内外，发行量高达三千五百多份。

当时的北京，住着一批准备报考大学的陕西青年，其中有一些就是野畴在咸林中学和榆林中学任教时的学生。野畴对他们非常关心，指引他们走革命道路，亲自给他们补习功课，指导复习，介绍各个高等学校的情况，帮他们选择报考志愿。这些人感动地说：“魏先生在校时是我们的好老师，离开学校仍然是我们的好老师。”

^① 《共进社纲领及章程》，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39页。

创建西安党团组织

一九二四年春至一九二六年春，野畴先后在西安市省立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与教员。在此期间，他除搞好教学外，主要精力都倾注在建立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工作上。

一九二四年春天，正当陕西省教育厅长马凌甫因打击进步势力、拖欠教职员薪金而激起西安各校师生强烈愤懑的时候，野畴应他的老同学、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刘依仁的聘请，从北京回到西安，就任该校教务主任兼公民教员。他立即联络教育界的进步分子，广发宣言和传单，揭露马凌甫摧残教育的言行，开展索薪斗争，并要求民选教育厅长。很快迫使马凌甫下台。

野畴根据过去的教学经验，教育学生采用启发式。他向学生大量推荐马克思、卢森堡、高尔基、托尔斯泰、易卜生和鲁迅、瞿秋白的著作，让学生先自己阅读，提出问题，然后由他加以辅导。为了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理论和我国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他在全校组织作文比赛，题目有《中国向何处去？》和《你理想的社会》。进步学生陈永棻在作文中提出：要救国救民，必须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野畴对这篇文章倍加赞扬，并向全校推荐，评选为第一名，给予奖励。

是年暑假，他同共产党员崔孟博，在崔的家里举办了暑期讲习会，吸收西安各个中等学校的几十名进步学生参加，学习马列主义，讨论如何开展学生运动。

讲习会期间，适逢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武止戈回陕建立团组织。野畴和止戈一起，多次召开

进步学生座谈会，讲解团的性质、任务和入团的条件。所以，这次讲习会，时间虽然不长，收效确实不小，不仅培养了一批从事学生运动的骨干，而且也为建党建团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不久便在西安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这个团支部归团中央直接领导，先后发展的团员有张秉仁、高克林、刘子温、张含辉、焦启凯、许乃谦、张汝慎、宁克齐、秋步月、党维荣、任致远、师守命、张金印、何挺杰等。

为了便于团支部和团员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同年七月，野畴又领导发起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文学社，出版《青年文学》旬刊。团支部通过青年文学社组织青年学生学习进步书刊，开展文体活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教育的罪行，唤醒青年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青年文学社和《青年文学》旬刊吸引了广大的青年，影响日益扩大。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同年十一月将青年文学社改名为青年生活社，次年二月又将《青年文学》旬刊改为《青年生活》旬刊。野畴亲自起草了《青年生活社纲领及章程》和《青年生活》创刊宣言，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全国青年联合起来”、“全国妇女解放”等口号。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社员发展到一百四十余人，遍及西安各个中小学校，成为进步学生的核心，有力地配合了团组织的活动。

一九二五年初，为响应党中央和孙中山先生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号召，野畴和共产党员雷晋笙、吕佑乾及教育界知名人士王授金，联合西安各人民团体经过协商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通过了野畴参与起草的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国民会议促

成会三电文。宣言指出：民国成立后“十三年中，战乱频仍，工商凋敝，人民颠连困苦，备极惨劫，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军阀政客蝉联重位，而又变本加厉’。美、英、日等帝国主义之列强各扶植其在吾国之政治、经济等特殊势力，以利诱挑唆军阀、政客等互相战争，而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我则重困陷于殖民不如的地位，此又根本原因之根本原因也”；“鉴于十三年来之显明教训，有联合全国民众之势力，作打倒帝国主义以根本铲除军阀专政之大运动，外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内绝一切黑暗肮脏之乱政，真正实现全民政治，而登吾国民众于最大幸福之乐域”。^①宣言号召全陕民众乘此良机，起而追随拥护民众利益之国民会议，并望国人作一致之主张。时任陕西督军兼省长的刘镇华，一面支持军阀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同国民会议相对抗；一面阴谋破坏陕西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假工会，派遣侦探，冒充代表，从中捣乱和破坏。野畴领导团组织、青年生活社，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同刘镇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还通过在《青年生活》上撰写文章、编印宣传小册子、散发传单、举办讲演等方式，揭露和反对段祺瑞及其走狗企图召开善后会议的阴谋，掀起拥护我党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正当全国促成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走向高潮时，孙中山于三月十二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陕西，野畴和王授金、雷晋笙、吕佑乾、张含辉等，于四月十五日在西安主持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野畴等在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世界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他热心革命

^① 《新秦日报》1925年2月2日、6日、7日。

四十年如一日，深知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现在革命未成，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诚然哀痛，但更重要的是继续奋斗，务必于最短期间，告成中国之革命。会后，出版了《追悼孙中山大会会刊》。追悼大会和会刊起到了动员群众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作用。

这一年，陕西全省掀起的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也是在野畴领导下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五月四日，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怂恿匪军毆伤省立一中学生数十人，激起了一中和西安各中等学校师生的极大愤怒。野畴这时已转到一中任教。他立即抓住这一严重事件，领导团组织 and 市学联，组织西安各个中学举行罢课，通过进步教师王圣域、程东川成立教职员临时委员会，组织教职员罢教，要求严惩肇事元凶。广大学生从各学校到街头巷尾，到处贴标语、画漫画、散传单，组织街头讲演，广泛开展驱吴宣传。还在《新秦日报》、《共进》等报刊上，发表声讨吴新田罪行的宣言，呼吁各界声援学生。一贯残害人民、鱼肉百姓的吴新田，竟下令派兵到各个学校弹压，并密布岗哨，监视学生行动，企图把学运的领导人魏野畴和学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野畴为避敌锋芒，遂带领团组织和学联负责人张秉仁、张含辉、高克林、任致远等撤出西安，移驻三原，同当地的团组织及学联领导人李子健、张仲实、赵宗润、王云等一起，继续领导驱吴运动，浪潮波及全省，各地爱国师生纷起应援。陕西著名的共产党员王尚德、耿炳光、严信民、关中哲等，都由省内外云集三原，共商驱吴大计。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野畴等又把驱吴斗争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领导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表示“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

界，完我国权”。^①野畴在三原还多次应邀参加当地团组织召开的座谈会，提出“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口号，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分赴关中和陕北一些县，动员学生、农民和国民军投入“五卅”运动和驱吴斗争。他自己也亲率驱吴请愿团赴耀县，吁请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将军率部参加驱吴斗争，还给官兵作报告，宣传驱吴和“五卅”运动的伟大意义。杨虎城欣然应允参加驱吴斗争，并积极提供驱吴活动经费。不久，野畴又应杨虎城的邀请，担任杨部咨议兼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为革命培养军事干部。

野畴在三原时，还指导渭北学联举办暑期讲学会（又称夏令讲学会），亲自为学员讲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近代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号召青年学生投身到火热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行列中来。参加讲学会的一百多名学员，经过培训，大多先后加入了党团组织。

七月上旬，野畴在三原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成立省学生联合会。大会讨论通过了驱吴斗争和谋求学生永久利益等十三项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有三：（一）保证学生本身利益。改良学校课程，革除思想腐败的教职员，增买新书报杂志，添加种种设备，减免学费、体育费及住宿费；（二）力谋改造教育。促进教育经费独立，破除宗法社会的思想，废止专制教育制度；（三）注重社会运动。扭转学生关门读书不问政治的倾向，对于种种爱国运动、平民运动、各纪念节，学生应参加并向民众宣传，学校及政府不得干涉。接着，野畴又出席了共进社在三原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作了共进社纲领

^① 《新秦日报》1925年6月17日。

及组织案的报告，批判了主张解散共进社的错误意见，还同各地代表共同商讨，提出了开展农运、工运、学运、妇运、兵运等议案，特别提出了“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进而取得政权”^①等口号。

在野畴等同志的领导下，陕西人民的驱吴斗争不断高涨。吴新田见群情激愤，又有国民军的援助，恐遭歼灭，遂于七月中旬率部向西撤退。吴军行至虢镇，遭杨虎城部队的截击，被歼两个团，残部狼狈地逃往汉中。驱吴运动至此取得了胜利。

革命者总是把已经取得的胜利当作新的斗争起点，野畴也是这样。同年七月下旬，他怀着驱吴斗争胜利的喜悦，带领省学联和团组织的负责人，从三原回到西安，根据省学代会的决议，立即同省教育界顽固保守势力展开斗争。野畴派代表到省教育厅，要求从速改良现行教育，并组织学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一怒之下，把省立一中校长侯景贤（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与其他学校几十个思想陈腐的教职员，统统赶出学校；还在省议会门前，把一些反动议员责骂了三个钟头。教育厅长郝朝俊怕学潮酿大对自己不利，满口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三项要求：“（一）谋教育经费独立；（二）今后教育方针应顺着世界潮流去办；（三）教育人才今后当以思想新颖、学识丰富、品格纯洁，以教育为终身事业而感着教育有兴趣者为合格。”^②郝朝俊根本不准备实行自己的诺言，

^① 《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总报告》，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8页。

^② 张含辉：《陕西学生运动之经过及今后教育当局者应觉悟之点》，原载《共进》第96期，1925年12月16日出版。

几个星期过去了，不仅教育经费未曾独立，连本学期的开学费用也未筹妥；不仅没有把品学兼优的人才聘入各校任教，反而把一个披着宗教外衣散布封建毒素的康寄遥，从神庙里拉出来，派往西安女师当校长，还授予他有随时解散学校的大权。凡此种种，激起了西安学生的极大愤怒。野畴及时组织省学联和三原、西安、合阳等地学联的代表，去省教育厅当面质问郝朝俊，并发动教育界，驱逐郝朝俊。在学生们的强大压力下，伪省长刘治洲被迫免掉郝朝俊的教育厅长职务。郝朝俊滚蛋以后，野畴又指导学生乘胜追击，把刚刚走马上任的康寄遥赶出了女师。这次斗争，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陕西教育界的反动分子。野畴因此被誉为“学生司令”。

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运动，是野畴的一贯思想。为了指导陕西地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运动，他从三原返回西安不久，就征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创办了《西安评论》三日刊。这个理论性的刊物创办初期，从组稿、写稿、审稿，到编排、送印、校对，以至发行，只有他和关中哲两个人去干。后来，编辑、发行人员虽然增添了张秉仁、高克林、任致远等，但重要文稿仍由他亲自撰写。野畴以他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特别是陕西地区的实际情况，为《西安评论》撰写了《本报的使命》、《西安学校大写真》、《农民的苦痛》、《敬告西安工友》、《陕西之政治经济状况》、《西安青年与反动势力决战》、《国民军与陕西解放》、《双十节敬告陕西各界同胞》、《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等三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以鲜明的观点，磅礴的气势和流畅犀利的笔触，深刻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恶，热情讴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野畴在他的文

章中指出：“帝国主义存在总是全世界各弱小民族及反帝国主义国家的势不两立之敌”，“目前世界之历史就是这两个营寨的对峙与冲突，被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吧！赶快联合以平等待我之苏俄”，“打倒帝国主义”。^①他提出“陕西有百二十分国民革命之需要”^②，号召全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向帝国主义反攻”，“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③由于野畴和他的战友们的辛勤努力，《西安评论》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创刊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共出版三十六期。它反映了陕西人民的革命心声，指导了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深受省内外各界群众的欢迎，发行量高达二千余份。被称之为陕西“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④人民群众因此更加崇敬野畴，称他为陕西青年的“导师”。^⑤

但是，《西安评论》和它的创办人魏野畴却不断地遭到反动势力的诬蔑、敌视和迫害。“九七”国耻纪念日^⑥之前，野畴在《西安评论》上发表文章，历数帝国主义强迫满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经过，赞颂义和团爱国反帝的英雄气

①魏野畴：《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见《西安评论》第22期，1925年10月20日出版。

②魏野畴：《陕西之政治经济状况》，见《西安评论》第8期，1925年9月2日出版。

③魏野畴：《双十节敬告陕西各界同胞》，见《西安评论》第十八期，1925年10月9日出版。

④《陕西省委通讯》第1期（1927年9月），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⑤杨明轩：《魏野畴同志与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思潮的启蒙运动》，原载《群众日报》1951年7月2日。

⑥1901年9月7日，是英、德、法、美、日、意、奥、比、西（班牙）、荷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满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日子，我国历史上称为“九七”国耻纪念日。

概，声讨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残暴罪行。九月九日，野畴等人领导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的学生、各业工人及市民达数万人。野畴在演说中，讲了“九七”纪念的意义，号召各界群众勿忘国耻，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斗争。会后，各界群众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军阀的御用组织——冒牌省工会门前时，砸碎了悬挂在大门旁的招牌，并冲入大门，捣毁了一些杂物。在野畴等领导下，工人们又于当晚筹备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西安总工会。西安的反动分子早就把野畴和《西安评论》视为眼中钉，正苦于找不到打击的借口。此事一出，他们就相互串联勾结，由冒牌省工会会长邓丽生出面，以“煽动捣毁省工会”的罪名，把野畴上告到法庭，并迫使《西安评论》停刊。法庭曾三次传讯野畴。他每次出庭都以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冒牌省工会欺瞒、愚弄、压榨工人的丑恶行径，义正词严，斩钉截铁，驳得工贼邓丽生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在群众与社会公正舆论的压力和野畴等的坚决斗争下，法庭只好宣告魏野畴等无罪，《西安评论》也经过进一步的安排调整，很快复刊了。

还在“九七”纪念之前，即一九二五年八月间，野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李子洲等共同发起成立陕西国民党党员聚乐部。不久，又同上述同志一起，在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共产党员安存真的指导下，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野畴在临时党部里担任领导工作。临时省党部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以焦易堂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九七”纪念之后，共青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到西安。野畴和雷晋笙、吕佑乾与吴化之一起，整顿了西安的团组织，成立了团的特别支部和西安地委。接着又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吴化之任书记，野畴、晋笙等任委员。这是在西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一九二六年初，经中共中央和豫陕区委批准，中共西安地委正式成立，黄平万任书记，野畴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这期间，野畴除积极为整顿团组织、建立党组织奔波操劳外，还曾负责选派青年学生中的党团员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和去北方国民军作兵运工作。

一九二六年一月，野畴和王圣域、师守命作为陕西代表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相当比重。中共中央决定，在会议期间成立由张国焘、林伯渠负责的出席国民党“二大”党团，野畴被指定为党团的西北组组长。在大会上，野畴同其他代表一起，揭露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①背叛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反共、反苏，破坏革命的罪行，要求将其骨干分子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人开除党籍，并吁请国民党中央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早日铲除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以及《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等。明确指出西山会议纯属违法，是破坏国民

^①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主要成员有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人。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共、反苏的反革命决议案。

革命的反动行为。大会对参加西山会议的骨干分子分别给以开除党籍和警告的处分。

在这次大会期间，野畴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彭湃、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他抓紧时间，学习广东党组织和毛泽东、彭湃等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学习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时作政治工作的经验。大会闭幕后，正值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筹办，党派野畴去北方为农讲所选拔学员。他立即赶到北京，与李大钊、陈毅等一起，选拔了五、六十名党团员和有志青年去广州。这些学员中有乔国桢、李维屏、霍世杰、杜松寿、马致远、刘友珊、李波涛、亢维恪等十六人结业后返回陕西，对开展陕西的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六年四月，被陕西人民驱赶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镇嵩军八师之众，卷土重来，由潼关直驱西安城下，企图重霸陕西，再次统治陕西人民。刚刚由北京回到陕西的魏野畴，立即前往三原参加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介绍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形势和准备消灭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的战略计划，共同研究抗击镇嵩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决定同国民二军分兵坚守重镇西安、三原、咸阳，进行长期的军事斗争，决不让刘镇华的阴谋得逞。会后，野畴和杨虎城率国民三军的三个旅从耀县、三原进入西安，同国民二军李虎臣共同组织了军事守城，设立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和军警联合处，并订出防守计划，决心抗击镇嵩军的军事进攻。在刘镇华兵围西安城的艰苦日子里，野畴和中共西安地委的其他领导人黄平万、吴化之、雷晋笙、吕佑乾、张秉仁以及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王授金、张含辉、王芾南等人一起，积极帮助李虎臣，杨虎城筹划军需和民食，加强军队的

政治工作，坚定军民守城必胜的信心，还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五月，野畴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去陕东临潼、渭南、华县等地视察工作。他动员说服驻守在临潼雨金镇（不久移，防三原）的陕军旅长甄寿珊率部参加抗击刘镇华镇嵩军的斗争；指示地方的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配合国民军抗击刘镇华匪军。八月，野畴又到三原，帮助国民军田玉洁、李子高和甄寿珊等部队坚守城池，并派党团员去周围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由于军民合作，击败了匪军的多次进攻，保卫了渭北重镇三原。十月，于右任、史可轩、许权中率领的国民军到达三原。野畴组织宣传队，欢迎国民军，并同于右任一起筹建国民二、三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准备进军西安，解西安之围。在此前后，野畴和王圣域等共同草拟了一个打倒镇嵩军、解西安围的《解围运动草案》，分发关中地区，主要是渭北和省东的党团组织，以求统一认识，积极支持入陕的国民军。在冯玉祥、于右任率领的国民军联军的支援下，西安军民终于在十一月底赶走了刘镇华的镇嵩军，使坚持达八个月之久的守城斗争，获得了胜利。

领导陕甘人民进行大革命

西安解围之后，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大好的革命形势，急需大批骨干领导群众斗争。野畴由三原随国民军到达西安后，根据中共西安地委的决定，领导举办了党员骨干训练班和政治队。政治队设农民运动班和军事政治班，学员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各地党组织选送的。政治队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榜样，学员过军事化生活，学习十多

种政治理论课和军事技术。农运班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调查农村情况。军事政治班在城市帮助组织工会，对学生进行操练，召开大会时负责维护治安。政治队经常举办报告会，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和国民联军政治部主任、著名共产党员刘伯坚以及李子洲、刘天章、杨明轩、刘含初、王授金、赵葆华等到队作报告。野畴常到队讲课，关心学员的生活，和学员一起吃饭。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为党培养了一批既懂马列主义理论，又懂军事技术知识和会搞工农运动的干部，在陕西的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于右任、邓宝珊任总、副司令，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编《新国民军》报。共产党员史可轩、杨明轩、葛弄云、王陆一、杨晓初、王授金、王尚德等也担任了重要职务。野畴利用政治部的名义，选派大批共产党员到驻陕总部所属各军、师、旅、团、营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秘密发展党员，仅驻陕总部政治保卫师（又称队）就有近百名共产党员，少数党员还担任了上至师长下至排长的职务，使它成为一支由我党控制的军队。野畴负责的政治部为驻陕总部起草的《政治训练大纲》，提出要教育官兵了解“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结合及军阀的反动政策”；熟悉“中国的农民状况”和“农民的要求”；明确“中国革命运动最后的目的，不独是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要在国内脱离本国的剥削者的压迫。”^①野畴特别重视开展农民运动，他在驻陕总部政务会议上所作的《农民运动之标准及其活动范围与政府行政之沟

^①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10日。

通》的报告，提出要：“保护农民组织：一保障农民利益减轻农民担负；二使农民参政”。会议通过了野畴的报告，并决定“建立农民事务委员会办理关于农民的如统一土地税则、减轻佃农田租、改良水利、保护森林、设立农民银行……”^①等。报告和决议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一月底，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野畴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又兼任宣传部长。他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利用国民党这个组织形式，广泛的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大政策，动员民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二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任书记，野畴和李子洲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三月中旬，野畴和炳光、子洲一起主持召开了陕甘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制定了《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口号是“党到农民中去！”^②党代会根据形势发展，决定改组西安、绥德、渭南等三个地委；新建三原、延安、榆林等地委；成立直辖区委的特别支部六个、属各地委领导的特别支部三十多个。区委还以国民党省党部和驻陕总部的名义创办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野畴常应邀去作报告。这两所院校为革命培养了近千名政治军事干部。野畴负责的宣传工作搞得更是出色。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大量出版发行，各类学校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焕然一新，每逢重大节日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实际由共产党领导创办的《国民日报》，广泛宣传了革命道理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每日销售量达二千余份。五月一日，野畴亲自

^①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月6日。

^②《陕西省委通讯》第一期（1927年9月），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主编的区党委机关刊物《西北人民》正式创刊，成为指导西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喉舌，被陕甘人民誉为“西北革命的急先锋”。^①在陕甘区委的领导下，全陕各地的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犹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农民协会遍及六十余县，会员达三十七万余人。^②在陕、甘两省的四十多个县市建立了党团组织，其中党的地委七个、特别支部四十多个，党员两千余人；团的地委六个，特别支部三十多个，团员发展到二千四百多人。许多当年投身于这场大革命的老同志说：陕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野畴和他的战友们，付出了最大的心血。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陕甘区委领导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陕西《国民日报》发表讨蒋社论，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背叛革命、实行个人军事专政、摧残工农运动、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蒋介石”。^③野畴、李子洲和国民党省党部的其他负责人、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史可轩、张含辉等，以省党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自去岁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实行植党树私，引用

此残民以逞之反动行为，何异于万恶军阀”。通电号召陕西民众与“全国各界共同申讨”。^①五月五日，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西安各界群众十余万人举行了纪念“五一”、“五五”^②和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大会，彻底揭露了蒋介石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来的各种反革命活动，指出其“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张作霖无任何区别”。大会通过了要求武装工农；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蒋介石罪状；改善工农生活反对苛捐杂税等决议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野畴等高举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组织起来！”“打倒一切反革命！”“世界革命万岁！”^③等口号。在野畴领导下的宣传部门还出版了揭露蒋介石反动面目的各种小册子，散发到群众中进行宣传。

这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尚未公开反共，口头上仍然高喊“维护工农利益”、“进行世界革命”等口号，但私下却怂恿其部下反动师长何经纬屠杀户县农民协会干部。他在率部东出潼关后，污蔑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幼稚”，“过火了”，公开限制工农群众运动。陕西各地的土豪劣绅也在蠢蠢欲动，伺机反扑。野畴为了回击敌人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教育党员提高革命警惕，在《西北人民》上接连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工农群众运动，抨击冯玉祥的两面派作风。

一九二七年六月，出师河南的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七月上旬，冯玉祥致电在陕西留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

①转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五五”为马克思诞辰纪念日。

③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5月6、7日。

军参谋长石敬亭，提出反共“三原则”。^①西安警备司令部按照冯玉祥和国民党反动中央的指示，于七月十五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发出严禁共产党人活动的命令，强令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并缉捕共产党的领导人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天章。七月中、下旬，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被解散，成立了以石敬亭为主席的反动的陕西省政府。与此同时，冯玉祥连电急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负责人是中共党员史可轩、许权中）和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李林为正副校长）一千多人由西安开赴河南前线，妄图乘机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革命军队。一时间，黑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全陕，陕西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遭到了失败。面对逆转的时局，新任中共陕西省委^②军委书记的魏野畴，不悲观，不气馁，英勇地同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同省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决定，拒绝执行冯玉祥的反动命令。指示史可轩、许权中等乘部队离开西安的机会，经渭北开赴陕北，同我党掌握的另一支军队——石谦旅李象九营会合，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后由于该部途经富平县美原镇时，史可轩遭敌人杀害，未能实现去陕北的计划。但这支军队在许权中（时任旅长）、高克林（时任旅党委书记）等同志的率领下，历尽艰辛，保存下来，参加了次年春党领导的渭华暴动。七月底，省

^①冯玉祥提出的反共三原则是：“一、现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范围内作为顾问不许兼其他职务；二、跨党共产党员即声明脱离共产党；三、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反三民主义宣传。”见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7月7日。

^②1927年7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中共陕西省委。

委派野畴和军委成员唐澍、白乐亭及冯文江（团省委特派员）去陕北巡视工作。他们先后在延安、清涧、绥德等地，了解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的阶级斗争状况，向党团干部讲解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要求党团组织迅速改变活动方法，转入地下斗争，保存革命力量，待机发动新的革命运动。这次巡视结束时，根据省委的决定，野畴留冯文江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重建被敌人打散了的党组织，并负责和榆林、神府、三边的党团组织进行联系；还决定将唐澍、白乐亭留在清涧，在石谦旅李象九营中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做好武装反抗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准备。这支部队在是年十月举行了起义。野畴由于在关中、陕北从事革命活动多年，誉满全省，敌人的严密侦缉，使他在陕西难以立足，省委同意他接受杨虎城将军的邀请，去河南到杨部开展工作。

开展艰苦的兵运工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野畴由绥德到吴堡县宋家川东渡黄河，经山西转赴河南省归德（今商丘市）附近的马牧集，与杨虎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相遇，受到杨将军和许多老相识的热烈欢迎。

在此以前，杨部在陇海铁路东段沿线与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部作战。由于直鲁联军兵力强大，杨部兵员损失较重。杨虎城曾请冯玉祥派兵增援，可是冯派来的刘镇华的第十一军姜明玉部在柳河叛变，更使杨部处于两面夹攻、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在此紧急情况下，野畴来到马牧集。他立即和杨虎城将军一起研究，认为固守归德难免被歼，沿陇海路西撤亦无可

能，只有向南撤退到豫皖边境比较安全，于是决定全军移向皖北休整。部队经归德、柘城、鹿邑、亳县、涡阳向安徽的太和县进发，一路上，野畴向官兵讲形势，鼓士气，同吃同行，深受官兵热爱。到太和后，杨虎城将军任命野畴为军政治部主任（又称政治处长）。野畴在帮助杨虎城整顿部队的同时，整顿了杨部的中共党组织，并在杨部建立了党的军事委员会，野畴任军委书记。

太和原驻有高桂滋的第十九军，这次由陇海线撤退来的除杨虎城的第十军外，还有河南杂牌军肖之楚的四十四师和皖北杂牌军王金韬的一个师。这四支部队既不属于南京的蒋介石，又不为武汉的唐生智所辖，还同受冯玉祥的歧视，均暂无归属。他们中的领导人一时倾向革命，表示愿同共产党合作。根据这种情况，中共皖北特委书记曾晓渊（公开身份为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在太和县城召开了有杨、高、肖、王四支部队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野畴应邀出席，共同商讨出路和前途问题。当时，党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还没有传达到皖北。因此，晓渊、野畴在会上只提出反对军阀混战，待机参加北伐，希望中国早日实现统一，成为民主自由国家的主张。会后，野畴和皖北特委取得了联系，沟通了几支部队中党的组织关系，并派人与陕西省委进行联系。十月，杨虎城部与高桂滋部接受了皖北特委和野畴的建议，联合出击阜阳驻军奉系军阀秦庆麟师。两军协力作战，秦部被一举歼灭。战斗中野畴派出的十军政治部宣传队和特委派出的十九军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深入阜阳前线，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后，高桂滋于十一月上旬，率十九军移往阜阳，十军继续驻守太和。

高桂滋部到阜阳后，投靠了蒋介石，被改编为四十七军。

蒋介石即派大批军政人员到高部进行“清党”，使我党公开身份的同志在高部已无法立足。曾晓渊将一些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关系转交给野畴，他和特委其他负责人先后离开阜阳，去外地工作。曾晓渊（后脱党）离去后，杨、高、肖、王四支部队中党组织的工作就统由野畴具体负责。他先后派交通员与党中央和党的河南、安徽省委取得联系，并把在高部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蒋听松、张友清、李力吴等安排在杨部工作，将王世英等派往亳县筹建党的县委，还派一部分党员干部到肖之楚部发展党组织，开办学兵连，训练军事干部。

是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先后派南汉宸、高望东、昌绍先、刘仲华、谢祥荫等到太和、阜阳，向驻军党组织传达“八七”会议文件；陕西省委也多次派陈云樵等与野畴联系，送文件，传达省委的指示。野畴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多次与杨虎城将军谈心。在他的帮助、劝导下，杨虎城表示欢迎共产党同他继续合作，并邀请共产党员南汉宸等留在十军工作。为了改造十军，征得杨虎城同意，野畴、汉宸从部队基层干部中挑选了一些进步军官，又从地方招收了一批革命知识青年，共四百余人，在太和县城开办了革命军事干部学校，野畴任政治指导员，汉宸任校长兼党的总支书记（汉宸离开后吴岱峰任书记）。野畴常到学校上课，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形势任务。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讲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特征；从蒋介石、汪精卫反动集团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讲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教育青年认清形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有条有理，深受学员欢迎。军干校里，《工农兵大联合》的歌曲，

到处可以听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到处可以看到；革命气氛十分活跃，成了我党在皖北培养革命武装干部的大本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别委员会在太和成立，南汉宸任书记，野畴负责组织工作，蒋听松负责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党的太和县委也正式成立。不久，阜阳、亳县、涡阳、蒙城、寿县、霍邱、颍上、凤台、鹿邑（属河南省）、黄口等地，亦先后建立了党的县委或支部。特委把工作重心放在太和、阜阳驻军和地方党上，还在太和县城开办了青年革命干部训练班，成立了太和青年革命研究会，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党的力量。野畴常应邀去青训班和研究会作报告，讲解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论述革命青年的责任。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大革命的失败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并且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热情洋溢地号召青年们行动起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军阀的斗争。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野畴还在杨部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民运工作队，派大批党团员到附近农村进行革命活动，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派党员谢葆贞（后与杨虎城将军结婚）等组织了太和妇女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举办妇女识字班，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派党员杜聿德去阜阳四十七军高建白的教导团，通过陕北同乡关系作党的兵运工作。阜阳县党组织根据野畴、汉宸的指示，在四十七军党的军委帮助下，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团组织，在城内领导工人和学生进行斗争。在特委的领导下，

杨、高、肖、王四支部队中的党组织和各县党的力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不到一个月，党团员由百余人发展到近千人。

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为了镇压革命，十军军法处长兼太和县长李天午，勾结当地的反动地主豪绅向革命群众猛扑过来。南京反动政府头子蒋介石也在一九二八年一月派韩振声到杨虎城部侦探，网罗军内右派势力，准备进行“清党”反共。他们威逼杨虎城逮捕南汉宸、魏野畴等著名共产党员，受到杨的拒绝后，韩振声又胁迫杨虎城同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杨虎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只好于二月初和韩一同离开太和南去。杨虎城走后，十军军长由孙蔚如代理。孙虽表面上接受了蒋介石在十军中实行“清党”的命令，但并没有杀害共产党人。他先将南汉宸送出太和，接着又通知魏野畴等共产党员离开部队，使野畴、汉宸等许多共产党人免遭捕杀。

领导皖北武装暴动

此时，皖北形势已急骤恶化。为了研究对策，二月九日夜，野畴在太和县城主持召开了有七十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对特委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检查了一度过分利用地方军阀发展革命力量的单纯军事观点，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精神，通过了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建立豫皖平原根据地的决议案。会议明确指出，在农村要积极宣传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差、抗租的“六抗”斗争，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为武装暴动打下基础；在城镇工

人和手工业者中要宣传他们所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号召成立工会进行反抗；在军队中要继续进行兵运工作，向士兵和下级军官宣传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军官任意打骂士兵和对士兵的非人的待遇，号召他们参加兵变。会议决定将党在十军和四十七军以及肖之楚师、王金韬师的工作立即转入地下。抽调身份明显的党员到各县搞农运，未暴露身份的党员继续留在部队作秘密的兵运工作，发展党员的重点是士兵和下级军官。会议最后宣布了中共皖北临时特委的组成人员，野畴任书记（化名韦金），胡景陶任副书记，高望东任组织部长，胡英初任宣传部长，昌绍先、李端甫、李力果、蔡甲午、刘仲华、曹力如等任委员；下辖太和、亳县、寿县三个特分委。这次重要会议，在野畴主持下一直开到次日拂晓才告结束。二月十日天亮以后，野畴立即向党中央和党的安徽、河南省委作了书面报告，并请求上级派得力干部来皖北加强领导。

一切安排就绪，野畴带领特委机关人员开始行动。他们离开太和，转移到党所掌握的据点——阜阳市的王官集小学。野畴一到这里，就着手对王官集、行流集一带的党组织进行整顿，帮助成立了十几个党的支部和党的行流集区委，并指示党组织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和赤卫队，使这里的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二月中旬，野畴等同志到阜阳城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乔锦卿取得联系，将特委机关秘密迁到城内贡院后街一个党员家里，代号万德胜，通讯处是县立高等小学。特委迁入阜阳后，创办了秘密刊物《皖北通讯》，并成立了中共阜阳临时县委（李端甫、乔锦卿任正、副书记）。野畴还整顿了党在四十七军中的工作，指示四十七军中我党的秘密军委，利用高建白教导团招兵之机，吸收党团员和进步农民入伍，抓紧训练，准备

兵变。二月二十日夜，野畴在阜阳城内主持召开了有部分特委委员参加的会议，讨论进一步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即刻发动土地革命的问题。次日，他向党中央写了《关于皖北政治经济及党之组织经过现在策略》的报告，分析了驻皖北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指出皖北党组织已经迅速壮大，经过党的工作，农村中的革命条件已经具备，特委“一致同意即刻发动土地革命，必能扩大至于全皖北，破坏十军及十九军^①，引导五、六百万农民^②”走上革命道路。这个报告反映了野畴和他的战友们，没有被蒋介石国民党的残暴镇压所吓倒，在全国革命处于暂时低潮的时候，看到了皖北正在好转的革命形势，反映了他们坚决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坚定决心。但是，由于受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报告中也明显的反映出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对革命力量估计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倾向。

为了贯彻特委的决议，野畴于二月下旬亲赴阜阳城西老集（现属临泉县），指导四十七军地下党负责人杜聿德作好招兵工作，尽量多吸收党团员，以扩大革命武装。他还深入到吕寨周围进行农村调查，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六抗”斗争。在特委和野畴的领导下，阜阳地区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不到一个月时间，仅在王官集、行流集周围五十余里的百十个村庄内，农民协会会员就增加到两万多人，赤卫队员也发展到三千多人，农协和赤卫队的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不断地向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展开斗争。阜阳的兵运工作经过野畴的整顿，也

①十九军已于1927年冬被蒋介石改编为四十七军。

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很有成效。高建白教导团的九个连都建立了党支部或小组，大部分连、排、班长由党员担任。在军司令部和梁文铤教导一团内亦发展有党员。县城内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也有了新的起色。

为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野畴废寝忘食，日夜奔波。三月中、下旬，他又接连在王官集、阜阳城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和各县县委负责人会议，介绍了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海陆丰农民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分析了皖北地区的革命形势，指出农民运动已出现高潮，党在农村中的力量正进一步地迅速壮大，提出以我党掌握的太和十军军事干部学校和阜阳高建白教导团及农民赤卫队为基础，举行武装暴动。会议通过了举行皖北工农兵武装大起义，成立皖北工农红军，建立皖北苏维埃政府等决议。鉴于阜阳地区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较好，计划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在阜阳首先举行起义，各县随后响应。

四月初，野畴接到党中央三月二十五日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央指示：现在的策略是“发展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强调必须“给工农群众、党员以武装的训练”，创造“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须条件”。^①四月五日，为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野畴在阜阳城主持召开该县各区委负责人及四十七军军委负责人会议，听取了起义的部署和群众发动情况的汇报。野畴指出：为了保证起义取得胜利，必须进一步作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加紧军事训练。四月七日晚，野畴在阜阳城外的西湖亭主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持召开了地方党委和军队党委的联席会议，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高桂滋率主力北上，阜阳城驻军只有两个团，城防空虚，高建白教导团的兵力绝大部分为我党所掌握，留守司令部和梁文铁教导团内也有党组织的实际情况，提出以阜阳驻军高建白教导团作为起义的骨干，城内工人、店员、学生响应，城外农民赤卫队攻打各地税局和民团，配合起义军攻占县城；待阜阳暴动胜利后，太和、旧县集、界首、亳县、鹿邑等地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及各地农协即相应起义，建立豫皖平原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野畴任总指挥，胡景陶任副总指挥，昌绍先、杜聿德、乔锦卿、李端甫、李力果等任委员，昌、杜负责领导高建白教导团，乔负责组织城内工人、店员、学生及城郊农协，二李和吕盘铭等负责组织行流集、王官集和插花集地区赤卫队、农民协会，分别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四月八日，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特委突然获悉十军代理军委书记宋树勋叛变，将我党的阜阳暴动计划和十军军干校的党员名单向敌人告密，几十名党员被驱逐出部队，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是同时，又发现阜阳党内也出了叛徒，党员名单落入伪县长康欣之手中，党的力量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在此紧急时刻，特委为防止太和、阜阳两地驻军和地方反动势力串通一起镇压革命，当即确定以火烧敌留守司令部厨房为信号提前起义。野畴派王官集的赤卫队截断阜阳至太和的电话线，实行地区性戒严，令乔锦卿绘出阜阳城关地图，标明敌我力量分布情况和进攻路线，任命曾在杨部工作的党员申明甫、胡怀西为敢死队队长，执行攻城时的点火任务；并令行流集、王官集地区的赤卫队第一、二大队和插花集、

北苗集农协会会员携带武器到阜阳城汇合。当晚，按照特委的部署，行流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首先暴动，解除了伪税警局的武装，缴获了长短枪十九支，成立了宣传大队和给养总处，决定由赤卫队负责协助农民斗地主、分财物。与此同时，李端甫、李力果等受特委的委托，在王官集小学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根据野畴的指示，一面派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贯一去界首发动肖之楚师的兵变，一面布置赤卫队当夜攻城。除按原计划布置行动外，又派人去鹿邑、亳县等地通知驻军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立即发动起义。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在阜阳城内外爆发了。

暴动失败，壮烈牺牲

四月八日晚上，滂沱大雨彻夜不停。敢死队长申明甫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以棉被浇上煤油，点燃了武装暴动的信号。但火势未炽，即被附近之敌发现。申明甫等遂采取果断措施，强行解除了门岗武装，夺得敌枪四支。这时，由于天雨阻碍视线，在城内外各处集结的起义人员没有看到火光信号，未能按时攻城，守卫东门的教导二团第六连党员排长吉超、祝永会虽打死了反动连长苗霞飞，打开东门，但遭到了敌人的反扑，使军委总指挥部在城东南文峰塔下集结起义部队的原计划不能实现。一小时以后，驻东门外三里湾师范学校的教导二团，在副营长杜聿德的领导下开始暴动，在“活捉高建白”的喊声中，击伤敌团长高建白，击毙反动官兵二、三十人。杜聿德率起义部队赶到文峰塔下，但未见到野畴。野畴这时在东门听到三里湾师范学校一带枪声大作，一面派六连前往接应，一面亲率少

数部队把守东门与敌战斗。恰在此时，城内留守司令部内由我党掌握的武装亦开始暴动。枪声传来，野畴等误以为是敌梁文铁团向我反攻，遂带领部队向三里湾撤退，途中又与三里湾的起义部队发生误会，待把情况搞清楚时，天也快亮了。这时，敌教导一团梁文铁部将城门紧闭，对我实施反扑，城西之敌设伏待我，加上大雨仍然下个不停，我起义部队相互失去联系，行流集、王官集的赤卫大队也因雨未能及时赶到阜阳城，插花集农协会会员二千人在车寺虽已集中，但未能动作；北苗集、城关以及老集等地农协会会员未能集合起来。在此紧要关头，少数领导人又思想动摇，顾虑重重，因而阜阳城未能攻下。

野畴等根据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为摆脱敌人的追击，决定参加起义的五个半连分路向外线转移，一路由昌绍先、杜聿德率领三百五十多人渡颍河向阜阳城以北三十里的行流集、王官集方向挺进；一路由野畴、胡景陶率领一百多人前往阜阳以西的老集一带接应行流集、王官集的起义队伍。

野畴率部冲出阜阳西郊敌人的伏击圈，向西区迂回转移。九日清晨，部队行至新村集时，被国民党第十二军收编的土匪部队发现。匪团长谈万国伙同副官周建中，副营长刘永太率部尾追我军，并密谋一面派人以要求谈判麻痹我军，一面到老集串通李成祥（匪军营长）、刘明桂（“红学”师爷）调动地主武装“红学”企图截击我军。

这一天，正是老集镇逢集之日，镇子西头还唱着戏。赶集的群众忽然看到一支高唱战歌的部队开到镇上，不明真相，大部散去，一部分群众上前围观。这支部队正是由野畴率领的星夜兼程行军七、八十里的一部分起义部队。趁群众围观的机会，野畴在老集东头槐树下向军民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

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要帮助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斗地主、分田地。穷人受尽了苦难，应该赶快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野畴还宣布了我军的纪律：买卖公平；为民除害；不打扰群众。

经过连续作战行军，部队十分疲劳。正在准备开饭的时候，叛徒勾结匪军将我流动哨兵缴了械，集镇四面被敌包围，大街上也出现了一些匪军和“红学”分子。野畴判断了敌情严重，遂决定马上撤离老集向行流集、王官集一带转移。须臾，即发现匪军和“红学”分子有千人之多，其中一股匪军骑马打旗，高喊“谈团长来啦！”并要我军派代表接洽。由于情况尚未全面掌握，野畴遂决定一面由胡景陶和连长蔡澄波前去交涉，一面整理部队作应急准备。胡景陶、蔡澄波向匪军阐明我军的政策，希望他们弃暗投明，参加起义。谈匪则要我军交出武装接受改编，并欺骗说我军领导人如接受改编，可以担任副团长和营长。胡、蔡二人返回向野畴作了汇报，野畴严肃地指出：我们是革命的军队，决不能交出武器和土匪混在一起干坏事。此时，匪军和“红学”分子狂喊“缴枪！缴枪！”野畴当即命令我军集中在两个院子中准备突围，同时向匪军声明：谈判可以；若强行缴械，我军将坚决还击。狡猾的谈匪一面虚伪地表示要继续谈判，一面又鸣枪要挟，并利用我军尚未来得及还击之机，将野畴、胡景陶（后脱党）、蔡澄波、胡怀西等六人先行逮捕，随后解除了我起义人员的武装。

野畴虽然被俘，但他领导的另一支起义部队，在昌绍先、杜聿德等同志的率领下，于九日晨到达王官集，同当地的农民武装胜利会师。会师之后，该部队即派人与野畴联系，但没联系上。经部分特委委员商量决定，当天下午在王官集大寺庙前

召开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皖北工农兵起义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皖北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由野畴事先提出的李端甫、李力果担任，皖北工农红军总、副指挥由吕绍先、杜聿德担任。大会还通过了事前由野畴主持起草的《农民协会组织章程》、《临时土地法》和《临时工会法》等三个文件。农协章程提出：农民协会是为解放劳动阶级、集合被压迫的贫苦农民而组织的；其目的在谋农民自卫、改良农村组织、改善农民生活，凡年满十六岁的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农村的手工业者及农村中的其他个体劳动者不分男女，都可参加农民协会。农协内部设军事、农业改良、雇农、佃农、手工业者、妇女、青年、教育、合作等组织，领导会员向一切封建势力作斗争。土地法明确提出：消灭封建的不合理的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使贫苦农民真正翻身。工会法对工会的性质、任务、入会条件及领导机构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会后，皖北苏维埃和皖北工农红军积极领导农民开展了打土豪、分财物、镇压恶霸和扩充红军的运动，仅在一、两天内就斗争了周围二十里内的大地主和土豪劣绅二十余户，将财物、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红军迅速扩充到近一个团，农民赤卫队发展到近万人。

四月十一日拂晓，敌四十七军留守司令王守义，纠集梁文铁教导团和高建白教导团余部以及伪阜阳县的团队两千余人（其中骑兵一个营），对新生的皖北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发动突然围攻，起义部队仓促应战，虽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我军缺乏战斗经验，力量悬殊，且处平原地区，掩护困难，弹尽援绝，被敌打散，起义遂告失败。

野畴被捕以后，匪首谈万国多次封官许愿，进行劝降，均

遭野畴和胡怀西的严厉拒绝。敌人便对野畴、怀西严刑拷打。金钱官位的糖衣炮弹打不中共产党人，毒打又有什么用呢？野畴正气凛然，厉声骂道：“你们这些土匪，把老子枪毙了，老子也不会归顺你们！”

当晚，匪军将野畴、怀西二人押在老集东头被称为“陕西会馆”的房子里看管起来。野畴、怀西趁匪军看守人员懈怠之机，决定出逃。他们咬断捆在身上的绳索后，野畴考虑到两个人同时脱逃目标太大，不易走脱，便令胡怀西立即逃走。野畴用绳子系住怀西，忍痛用尽全力将怀西拉到房梁上后，怀西跳出天窗脱了险。此时，看守发现已经逃走一人，立即报告了匪首。谈万国、周建中等恼羞成怒，命令刘永太等三名刽子手，将野畴带到老集东边的凹地里加以杀害。野畴临刑时骂不绝口。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魏野畴献出了一腔热血。时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深夜，年仅三十一岁。

附记：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参阅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7—1921年）、《陕西日报》（1925年）、《民生日报》（1925年）、《新秦日报》（1924—1925年）、《西安评论》（1925—1926年）等报刊，杨钟健、南汉宸、王世英、高望东、刘仲华、王冶秋、霍仲年、王铸九、戴映东、耿炳光、田伯荫、师守命、张秉仁、赵葆华、刘光智、马致远、孙一君、冯文江、马青苑、李百朋、申明甫、高敏夫、蒙加福、胡复初、杜李明等写的回忆材料和胡景陶、曾晓渊、高建白等人写的交待材料。编写过程中，还先后访问了高克林、方仲如、张仲实、吴化之、屈武、阎揆要、王子宜、刘贯一、赵伯平、孔从洲、吴岱峰、米哲沉、杜松寿、王超北、王炳南、张宗逊、楚图南、罗章龙、关中学、王圣域、陈云樵、刘威诚、王云、张光远、刘依仁、张耀斗、马文彦、刘尚达、曹志麟、王子休、郑自毅、赵鹏九、田涵荣、韩志颖、

杨慰祖、梁俊琪、王芾南、李波涛、张北海、任致中、周益三、呼延震西、胡景儒、彭淑贞、王爱玉、方向知、陈永莱、刘印初、张秀逸、陈子敬、冯润璋、韩俊生、窦荫三、张文华、罗成运、陈洁生、易厚菴、李瑞阳、李德新、刘占元、李起云、孙井吾、徐广彬、李秀芝、李伯恂、刘友珊、李天笃、史卓生、顾洲三,以及烈士的遗属何玉杰、王玉章、魏中信、魏北京、魏汉京、魏长京、魏淑敏等。

罗学瓚

罗立洲 范寅锋

(一)

罗学瓚，号荣熙，湖南湘潭县人。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马家河南岸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居长，但在叔伯兄弟中，他排行第二。九岁时（一九〇二年），祖父罗谨菴送他去私塾念书，想把他教养成一个能写会算的人。两年后，祖父为了让所有孙儿都能读书，请来一位塾师，在家设塾课读。在私塾中，他是一个肯用功的学生，成绩好，很得祖父的欢心。十三岁时（一九〇六年），又特地送他去离家八里的青龙桥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校读书，并在校寄宿。这是罗氏族姓进步人士用祠产办的一所学校。这里的老师，大都是赞成社会改革的人，学校风气较为开放。他在这里读了六年，学习了语文、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等课程，初步打下了现代文化知识的基础，成了家里第一个有学问的人。

一九一二年，罗学瓚在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毕业时，已经年满十八岁，祖父不肯让他再读书了。但他求学心切，私自考取了县立湘潭中学。旋因祖父不肯为他拿出每年六、七十块银元的学费，以致不能入学。于是，他去长沙报考了不要学费、还

能给学生补助生活费用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才得以实现继续求学的愿望。不久，第四师范并入省立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一师范第八班，与毛泽东同班同学。

罗学瓚能来长沙读书，得力于老师罗拔卿等人的赞助。这是他从事真理探索的一个重要起点。在一师读书的五年期间，在良师益友的切磋熏陶下，他的思想境界上升到比较高的程度，这在他写的文章、日记、书信和诗词中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学校新思潮的影响，他在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校时，开始理解个人与天下国家的关系。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当视天下犹一家，视中国犹一身。故天下有息，曰：我家之患也；中国有难，曰：我身之难也。我身家之患难，我必思有以排去之，义务也。”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曾经促使他关心社会政治，促使他探索一些事理，而不只是满足于知识的追求。到了第一师范后，他的写作尤多，从现在保留的遗墨来看，无论在“治学”、“持身”、“交友”、“感时”等方面，都反映出他忧国匡时的抱负和志向。他曾坚决表示：“人不为颓俗所移，遂可以转移颓俗”。

罗学瓚治学勤奋，孜孜不倦。在一师写的日记中，有许多关于自己怎样读书的记载：

“晨起读国文，熟读新受者，然后温习前读者。读书必先阅过一次，细考其中章句、段落，与解释其难字难句，然后再读，不然则囫囵吞枣，与不读无异。”

“午后功课完毕，照每日所授之功课有欲练习者，即日练习完毕。不可今日等待明日，明日等待后日，致日积月累，练习既难，记忆又忘，且心常念虑，废日旷时，莫此为甚。”

为了鞭策自己努力求学，他还给自己的课余时间，定了一

张每日必做的“功课表”，“在家时切实践履之”。

“晨起 往野外行呼吸运动

早餐前 读韩文

早餐后 阅史十页

中餐前 写大字一张

中餐后 读英文

晚餐前 野外游息或谈诗

晚餐后 写日记

有余暇，阅杂志。有事缺课，须补读。”

这种发奋读书的习惯，曾引起他的视力衰退。他在日记中批评自己说：“余读书不好运动，不知休止，虽是好处，亦最是不好处。盖所益者知识，所损者身体。”又说：“余近来自力甚薄弱，蒙昧不堪，此由于黄昏时阅读不止之故。私念学问所以发达吾人之心思材力，若是者益少而害多，失为学之道矣。”于是他决定早起晚餐后“不阅书”，因为这时的光线不足或光线渐暗的缘故。

他很注意学以致用，认为“吾侪受教育之人，亦即救吾国之人。”“维持国本，改良风俗，普及教育”，“此固吾人之任，责无旁贷者也。”为了担负起这一责任，他认为应该：“伤心家国事，勇猛直前行，不知今日乐，不顾后来身。”他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正是为了要把自己锻炼成为“救吾国之人”，才这样发奋求学的。

他持身严谨，尤注重身志之锻炼。他认为：“身体之不强，不足以为事，意志之不强，不足以成事。”他表示要在身志两方面“力加注意，必求有以护奉之。学以求其方，守以定其志。”但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达到“求方”、“定志”的身

志锻炼呢？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有次天气寒冷，他没有穿长袍御寒而得了病，因此想到：“朋辈衣服多有薄于余者。尝观市井中乞丐，于冬雪纷降盈尺之时，每有薄衣如吾侪夏秋者。彼何人也，何以能如是，我亦人也，又何以不能如是？”他认为这是“不知练习筋肤之故”。不注重锻炼的人，“岂独不能寒，且又不能暑。寒暑犹人之大敌，今日不畏寒暑，即后日不畏大敌，其事甚微，其关（系）甚大。”基于这种认识，他于是“虽病不忧，虽寒不顾，不数日而病愈。”他由此体会到身志锻炼之重要，认为“医药没有这样的灵验”。“是知吾人之病，由吾人自长之，而又惟吾自医之，此中自有良法，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他还用两句话概括这件事的心得，叫做“习惯成自然，改过患不勇。”

另一件事是学游泳。他的日记有初学游泳情况的记述：“今日下午，与同学游泳，初在浅水，颇以为难；继学没泗，能没泗斯不畏难矣，继即可以浮矣。”还有一段在秋末冬初游泳的记述：“今日往水陆洲头游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谓非运动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还有一节坚持冬天冷浴的记载：“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君泽东等往河干洗擦身体一番，大好畅快。”

在身志锻炼方面，尤注重克服畏难情绪。他认为：“畏难之心，万不可有，畏难之人，不可以为人。”但怎样做到不畏难呢？在于勤劳和力行。他认为：“身体安逸，惮于行役，议论有余，力行不足。所以，事当为而莫之为，或为之而不尽其

力，此事之所以失败也。”因此，他认定：“夫士贵乎勤劳，勤劳岂止于读书？练达世情，识清世务，在所当勤也。”在日记中，他记载了用勤来克服“惮于行役”的一件事：“吾在校已五年，前往返省垣，惮于行役，无不行路坐车。此次年假，见诸同学有百里之路程，多能徒步以归者，遂因亦徒步归，至校亦如是，并不知其苦，且较闷坐舟中，反觉爽快，是畏难之心，万不可有也。”

克服畏难情绪之另一要诀，在于要有决断。他常说，为人应当“忘所当忘，断所当断，行所当行，住(止)所当住(止)。”又说，这是“养身的要诀”。他最反对那种“志气萎靡，举止卑下，既无忧世忧民之心，复无有作有为之毅，教既非为人之教，学亦非为己之学”的学风。认为学校“有数种人最无用：如终日低头读死书之人，不好运动之人，不阅报之人及一味消极之人。”认为这样的人，“即是社会一废人，或为害社会之一人。”他为这些人感到“惶然增惧”，告诫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并随时用“而已则如何？不可不勉”来责问自己。他认为“圣贤豪杰，别无过人处，只在能行所知而已。”用知来指导行，坚持知和行的统一，这是当年进步知识青年可贵的情操之一。他在持身方面是坚持这样的标准的。

在求学过程中，他非常重视朋友的交往，认为这是人“欲有为社会”的重要基础。他在日记中写道：“人将欲有为社会，安能特立独行，不求助于人乎？异日多望于人，今日岂能不交友乎？不化于人可矣，不交于人，非所以处世也。”但选择什么样的朋友？他给自己定了“三不交”的原则：第一是有势利的人不交，不但不交，而且应当远离他；第二是品行卑污、无远大志向的人不交；第三是好谄谀之人不交。他还特别

提出对那些好谄谀之人，要倍加警惕，以为事情往往败在那些谄我者的手里。他说：“荀子谓谄谀我者吾贼也。吾尝思之，凡教师朋友，告我以过者，未尝不加惧，谀我以善者，未尝不加喜。惧者成事之基，喜者败事之由。大凡人心莫不好谀而恶过，又莫不败于好谀，此则谀我者，败我者也，岂非吾人之贼乎！”至于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品质，他认为：“观人不必枝枝节节，只可观其志向如何。尤不可使人以言，使人以言，鲜有不受其欺者。”对待别人，他认为：“好人当知其所短，恶人当知其所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说人尽善尽美，或穷恶极罪，可乎？要之，我非好恶于其人，实好恶其善恶。能如此，足以言好恶矣！”他还认为朋友交往之间，不应当“嫉才”，他说：如“我立志为救世救民，彼有才能救世救民，彼即是为我做事情，为我担忧，即我得一助手，易于成功。若是，则当敬其人之不暇，何有于嫉？”在这里，他是把交友放在立志救国救民这个总目标下的。他在一师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的密切交往，以至后来共同组成新民学会，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标，才走到一起来的。

在他的作文和日记中，对于时事多所抨击。起初，他对于帝国主义虽然深恶痛绝，但对政府尚抱有希望。一九一四年，当他阅报得知“日本兵又有侵掠济南之消息，心甚不快”之后，曾大声疾呼，“政府其预为备，国民其预为备！”然而，当时袁世凯当权，是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复辟帝制的政府。对于这样的政府，是不能期望它领导国民抵抗侵略的。过了两年，他看清了这一现实，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七日的日记中，抒发了“时局不可为”的感叹。他说：“今日为阳历五月七日，去年日本以二十一条向我下最后通牒之日也。去岁当此

时，举国若狂，抵制日货也，救国储金也，演说国耻也，怀耻发奋，拟若有为。今日仅踰年耳，国人尽忘之矣。耻而可忘，安望其有救于国乎？”他认为军阀都是一些“不仁不义的豺狼”，而国会的议员，大都不过是一些“种祸之媒”，是一些“人品不齐，不审国家情况，徒以学理嚣张，捭阖纵横，睥睨一切”的家伙，因之给国家酿成许多大祸，所以他主张再搞革命。当他“最敬佩的人”康有为支持张勋搞复辟时，他也不禁发出“不识康氏何以乖谬至此”的慨叹！

上述是他求学时代的日记的一小部分。在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他还不能辨别什么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可以看出：同毛泽东等同学一样，他是一个有思想、有志气的青年。只要他认为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他就认真去做，而且敢于否定过去的某些看法，认真探索新的事物，提出新的见解，这是十分可贵的。就拿“教育救国论”来说吧，有个时期，他也曾赞成过，如写文章进行改革教育的探讨；写信给家乡父老提倡办乡校族校，发展国民教育；同塾师商讨改进教学方法，适应时代需要等等。但结果怎样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教育救国，人人言之，然我国从事教育已十余年矣，而不收良好效果，其故又安在哉？”他研讨的结果，认为首先要改革社会，社会不改革，谈教育救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过去有过各种各样的救国理想，也设计过许多种救国方案，虽然在实践的检验中，感到行不通，而被自己否定掉，但他并没有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退却下来，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事实也正是如此。经过许多周折，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里还要着重提及的，是他在求学期间，写了许多篇抒发

豪情、脍炙人口的诗篇，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他那种“不言家与身”，“赤胆为将来”的崇高思想和革命精神。如他的《自勉》诗写道：“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何言乎富贵，赤胆为将来！”这不是对他们那种舍身为国的精神的最好的歌颂吗？他还有一首《咏怀》诗，这样写道：“龙蛇争大地，豹虎满寰瀛，蹂躏无余地，巢空草木惊。安得异人起，拔剑扫妖氛，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一同登乐国，万世庆升平。”这就把全国人民在内忧外患的痛苦熬煎下，渴望革命的迫切心情完全表达出来了。至于自己应该怎样奋斗呢？他在三首《随感》的诗中，有一首这样写道：“我心如不乐，移足晤故人，故人留我饮，待我如嘉宾。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冤孽根。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这首诗写于一九一八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这时，他正在实践自己的诺言，同毛泽东等革命志士一道，正以“勇猛直前行”的精神，大踏步走向革命洪流的前列。

把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联合在一起，共同从事走向社会、创建“为社会谋改革”的事业，这是他同毛泽东等同学的重要活动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间，毛泽东曾倡导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他积极赞助这一筹备活动。在一则日记里，他这样记着：“毛君泽东发起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余甚赞成，盖有数利：一、谋求湘潭教育，宜有团体；二、吾人以文会友；三、有团体不致特立独行，为世所遗；四、异日为小学教师，应兴应革，互策进行，不致孤陋寡闻，此于人于己，都有利益。”另一则记载了湘潭校友会的成立情况。这是农历十

二月十四日，他写道：“点名后，在本校成立湘潭校友会，到会共二十人，先由毛泽东报告筹备之手续及开会之理由，然后将本会所拟之规约，逐一报告，互相商榷、通过。公举周名弟为干事，罗学瓚为文牍，商同掌理事会内事务。时已三更，即散会。”全体会员还照了一个集体像。一直到赴法勤工俭学以后，他还与“校友会”保持联系。

一九一七年下半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酝酿筹组新民学会，作为以实现“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团体组织。这个学会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长沙岳麓山溁湾市蔡和森家正式成立的。他参与了这件事，同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等，都成为新民学会的骨干。他在给祖父的家信中，陈述了他为什么要参加新民学会的想法。信中写道：

“孙近几年来，颇研究世界各国之事，故晓得外国人打我中国人的主意。孙推测将来不久，中国难免不为外国所分割，百姓难免不为外国所杀害，故近日青年多为此惧，思组合同志，结成团体，为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以谋中国之富强，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以图异日起死回生。孙窃思此事，既是为国，又是为家，又是为自己，不觉心动。已经加入，此孙出身之志愿，一也。”信中还谈到其他一些志愿。很显然，他是把加入新民学会，同为中国谋富强，同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的志愿，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单是为了“改革学术，砥砺品行”而已。

(二)

一九一八年六月，北京有些教育界人士，发起一个勤工俭

学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去法国半工半读。新民学会首先派蔡和森去北京联系。罗学瓚积极赞助这件事，并决定自己也赴法勤工俭学。但当他回家去筹措旅费时，曾遭到家里的反对。尤其是祖父，不同意他去法，也不给路费，但没能阻止他去法的决心，他曾把此事写信告诉了蔡和森。对于他的赴法，毛泽东有不同意见，认为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比赴法勤工俭学对于革命工作要好得多。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说：“……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仁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近周君世钊就修业主任之聘，弟十分赞成欣慰。前闻兄有担任黄氏讲席之说，不知将成事实否？往保（定）固是一面，然不如从事教育之大有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质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有此诸层，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冒然从事。”很显然，毛泽东是因为他长于教育，不赞成他去法，而是要他担负起为学会培养后备人才的教育重任的。他之所以要赴法，是为了“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他的决心，得到蔡和森的支持。蔡在给他的复信中，除了告诉他已经将他的名字列入赴法名单外，表示愿意帮助他解决旅费问题。信中说：“兄似乎现在难得家庭同意，预备费无从索取，此则舍却来否问题外，弟可为兄解决之。弟已与李石曾先生再三交涉，现侨工局已答应借五、六千元，与吾辈限额二十五名，兄业已在二十五名之列，此全可解决兄之所难也。”此外，蔡和森还要他去长沙时，同肖子升、毛润芝商量，决定另一名青年黄守垣要

求来京的问题。并希望他能组织一个初级班，自费赴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罗学瓚同罗章龙、肖子升、陈绍林、陈焜甫、欧阳玉生等二十余人去北京。他在北京的情况，当时同他住在三眼井的罗章龙有一段较为详细的回忆：

“罗学瓚分在北京大学预备班学习。当时重点是学法文。法文比英文难一些，特别是发音比较难。这对口音重浊的罗学瓚来说，尤其困难。但他并不畏难，学习十分刻苦。那时，我们八个人每天都是很早起来学习。罗学瓚几乎每天早晨都是读法语。一个单词，别人读几遍就熟了，发音也准了；可是他不行，他就继续读，直到自己认为熟练了、准确了为止。他常对我们说：‘我学法文困难多，只能人家念一遍，我念十遍。’他这种苦学的精神，给我与同住的几个同学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住在三眼井，生活上所有的事，都要大家分担起来。室内卫生，环境卫生，清除垃圾，罗学瓚总是带头干。本来这些工作是轮流值日，可是，他看蔡和森几个人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就主动替他们干。我们几个人自己办了伙食，上街买菜，买煤球，这些跑腿出力的事，罗学瓚总是积极干。我们劝他轮着来，他笑着说：‘我身体好，应该多干一点。’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一方面是愿意为大家多出力，一方面是让别人省下时间来学习。”

罗学瓚在北京时，曾几次给家里及族叔辈写信，一是赞扬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说“毛泽东组织预备班，出力最多，他的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二是商请叔辈帮他

筹款，说明他的赴法，已“万不能不去”，“祈老叔至我家，向我大人说项，家中能办更好；不然，则不能不向各公借办。李先生（指李石曾）说于正月内动身，（借款）如十二月底得到最好，否则亦须正月上半月办到。此事关系重要，祈老叔特别尽力，感激无既。”信中还说，他这次赴法须要早去，“至要之志愿”还在于：（一）听说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急需劳动力，他想先去“调查一切”，如果属实，就想从湖南组织一批劳动人民出国谋生；（二）想为已在法国作工的十五万工人尽“教导”之责，而为自己求学，“尤为次着”。

罗学瓚在北京期间，还拟了一篇《戏代各省‘匪首’致北京总统电》的电文。这篇电文是针对大总统及国务院公布所谓“剿匪”之法而写的。它以犀利的笔锋，尽情揭露官即匪，官逼民为“匪”的罪恶行径。现照录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及各省督军公鉴：近闻公等会商剿匪之法，或数省联防，或指使督办，或清乡团练。纷纷扰扰，必使我等无所隐藏而欲尽行除戮。究不知诸公果何用意？

“匪等本属良民，安居乐业，伏处乡里。乃诸公攘权夺利，好争好斗，以致连年用兵，战祸不止。兵所行过，庐舍为墟，鸟兽绝迹。匪等室家流离失所，呼吁无方，此不得不为匪者一也。且匪等本属士农工商，各居各业，诸公厚饵诱我为兵，使学战争之术，习掳掠之方，奋勇当先，为公尽力，舍死不渝。乃一旦成功，公等首居大位，坐享功名，命我等抛戈解甲，淘汰还田。岂知我等职业已失，谋生无路，此不得不为匪者二也；又公等师出不和，一旦溃败，逃之夭夭，弃我如遗，使我等陷于危险，无所依归，不得不自行集会，仍结团体，以谋出路，此不得不为匪者三也。

“要之我等之为匪，不过期保生命，以避危害而已。窃思公等亦复与匪相同。抑有甚者，一登大位，便成富翁，削民脂膏，浚民骨髓。且还要倚仗外国人势力，扰乱社会，杀戮人民，使人民生不能生，死不能死，以视我等所掠之货财，不知几万倍也。公实为之，谓之何哉！乃公等太不自量，更欲假公督剿，荼毒生灵，匪等心实不平，敢披诚相告，幸垂照鉴。”

在北京近半年时间，除了在留法预备班进行艰苦的学习，作好赴法的准备外，罗学瓚还对北京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考察。他在给族祖罗拔卿的一封长达四千五百字的信中，就这些考察作了阐述。这封信是一九一八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写的，首先叙述了留法预备班情况，说自己“留京入大学预备班”学习，“功课专重法文（每日三小时），次之为制图（此预备往法求工者）外，尚有工程数学（此预备往法入学校者）诸科，每周约四十小时”；他谈到自己“乃是研究教育之事”，“功课为法文、哲学、伦理、教育、社会诸学”。“在此研究一年，即往法国办华工教育。”其次，谈自己在京的生活情况，谈到同住一起的毛泽东等八位同学，“皆敦品力学之人”，是他“素所钦佩者，朝夕与处，时有受益。”谈到北京的情况，如政治、风俗、建筑、交通、名胜、教育、户口、气候、商务等方面，凡他所见到的，都作了介绍。在信的最后，还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尽管他自己说这封信写得字迹潦草，言语夹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知他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生活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总是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罗学瓚和同乡包光溢等，起程赴

法，于九月二日到达巴黎。在途中，他写了几篇游记，后来寄给毛泽东送《湖南日报》刊登。到法国后，他先进了蒙达尼公学，读了三个月，然后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施乃德钢铁厂作电工，被分配在法国南部的克鲁佐总厂。他身体壮健，能胜任工厂的繁重劳动。他给国内朋友写信谈到这些情况时说：“虽然过的是很低水平的生活，心情却是很愉快的。”他从事革命事理探索，每有所得，即给国内朋友写信。他是给国内会员通信最多的一个。他在一封给毛泽东、周世钊、陈启民、蒋竹如的信中，曾简要叙述了这一时期的情况：“自入工厂以来，每日要作八小时的工，工后又上半小时的法文课，又要回朋友的信，要看阅书报（此处各同学定阅书报甚多），几乎有日不暇给之势。”他对工学的勤奋，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誉，说很敬佩他那种“奋勉的志气”，并建议他利用去工厂做工的条件，对法国社会情况，“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在法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认为观察事物必须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他在一封信中，分析当时一些青年不善于观察和分析实际事物的错误表现，认为这是由于思想认识上有某种“迷”的缘故。

他说，中国人有四种“迷”。第一种叫“感情迷”，就是遇事“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新定事物的是非。譬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军国主义，就说法国爱好和平为不正当；看到中国一点小事小物比外国好，就说中国人胜于外国；一时在法国找不到工做，就说勤工俭学不行。第二种叫“部分迷”，就是遇事不作普遍的考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部。并认为这种推理在思想界很危险，连托尔斯泰之反对工业，无政府党之倡导废金钱、废商贾之说，都是这种不普遍考

察之误。第三种叫“一时迷”，就是对事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的现象推断结局。如看到工人罢工没有结果，就说工人罢工无效力，正如康有为说中国贫弱和有战争，是不能共和之证一样。第四种叫“主观迷”或“信仰迷”，这是遇事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比如：从前有人说欧洲的机械比中国好，中国的道德比欧洲强，到了法国，也不从各方面去比较是不是真的，而是开口就说西人无道德之类。他认为这四种“迷”，几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也有，是造成思想混乱的原因。

他在法国还同李和笙（即李维汉）等学友组织了“工学励进会”。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对这一学会的情况有所叙述：

“我们在法组织一工学励进会，先本定有章程。现在人数日多，章程不够用，拟到年底去修改，故现在不能作具体的报告。大概来法的同学，有才略、有志气和见解的，或有能力和品行纯正的，都想联络入会。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划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信中还谈到七月初的蒙达尼会议，就如何组织会员向国内通信作了研究，并且由他负责征集通信稿。信中说：“昨日蒙达尼所议之事，有组织通信社一项。即由会内推人主持信稿，各会员每月担任写信一封，或寄稿一篇，材料由各人自择。大概不外：（一）工厂情形；（二）工人生活；（三）华工情况；（四）勤工俭学情况；（五）法国社会各种情况；（六）旅法感想。此外还有译书报所载的。……现在法信稿，由我征集，我已一概寄至长沙，由你处置；或投长沙报，或投上海报，或附登会务报告，

都可以，不过要寄一份或两份报来。又会员如欲零寄一份回家或朋友者（登他自己的稿子的报），亦请照办。此事并不烦难，并且在此地各会员，因欲尽留心调查的责任，也可得考察求学之利益。拟自八月起，每月分三期寄来，拟用留法工学励进通信社名义，并请你们派人选择或校正，因我在此太无时日，不能做这种事的缘故。”

罗学瓚在参加蒙达尼会议以前，还写了一篇题为《法兰西工人》的长文，详细记载了他在施乃德工厂做工五个月的调查情况，约一万六千余字；此外，还翻译有法国拉法格著的《共产主义与经济进化》一文（刊《新时代》第一卷第三号），约三万三千余字。在《法兰西工人》这篇文章里，他就工人情况、工人生计、工人习惯、工人身体性情、工人智识思想、工厂里对工人之设备及待遇等方面，按次作了详细的说明，这是一份详尽的有关法兰西工人情况的调查报告。在“工人生计”一节里，他谈了自己对当时罢工的看法，他说：“以前的罢工，都是一场空把戏。因为以前法国工人罢工，所要求的不过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价而已。现在工资比以前要增加多两三倍了，时间也减少了，但是工人的困难，非惟没有减少，并且还增多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就是工人罢工的事，常落在百物腾贵的背后；二、就是工人所要求增加的工资，常不能与增涨的物价成正比例；三、就是工资既然增加后，而各种货物，因生活费加重，于是价值又随即加涨，互相影响，仍是工人吃亏。”至于资本家的情况，他说：“虽有时因罢工要受损失，其实，他所损失的，不过成本外的余剩，就是所掠得工人劳动的价值。并且，最后还是资本家占优胜。……所以，我说这种罢工是空把戏，仍不能达到解决生活的目的，是不能求安

全生活的。”文章接着提到当时工人把罢工斗争的目的，转到“要求矿山、铁路及别的重要工业收归国有”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有点觉悟”的表现。但他又指出：这种“收归国有，把资本家垄断的势力，转移到国家身上，是不是能达到目的，还是一个疑问？因国家与资本家，原来都是一种同性质的东西。据我看来，资本家害人，还有限量；国家害人，更是无限量。”他在这里说的“国家”，是指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垄断，不是说的国家本身。但怎样才能解决好工人的生计呢？他认为：“要从经济制度根本上改造着手，就是要变财产私有制为均有制，就是一方面都做工人，一方面都有财产。”“不然，我就只望见工人一天天向那困难的境界去罢了。”这种触及所有制的精辟见解，是他有心于改革社会探索真理的一个重大成就。至于法国工人的思想，他说法国工人“痛恨战争”，痛恨资本家的剥削，“常因事举行游行示威，和资本家及政府抗衡，……有常掷破工厂里的器具和对着工厂里的东西发怒的。”但由于生活压迫的种种原因，他们又不得不长期忍受这些痛苦，“所以，人人都怀着息业的思想，这是他们无可如何的事”。他还谈到法国工人多表同情于布尔塞维克，说“布尔塞维克好”，这是工人思想觉悟的一种表现。文章最后谈到自己今后还要对法国情况作“精密的考查，普遍的观察，来校正我自己的错误”，有利于今后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文章还总结了他自己在考察中的体会：“可以晓得，要求精神生活，非从物资中去求，是不能达到的，是枉费神力的。”这种对精神、物质关系的辩证见解，可以看出他在法国能观察和思考问题之一斑，因而受到参加蒙达尼会议的许多同志的赞同。

罗学瓚在法国还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斗争。如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四百多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向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请愿示威的斗争；同年六月，旅欧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派专使朱启铃到法国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斗争；同年九月，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反对校长吴稚晖等人不招考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的斗争。这些斗争，他都积极参加。据肖杰五老人的回忆：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他同赵世炎、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志，“都起了积极的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后来，他和蔡和森等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强行遣返回国。一起被遣返的还有张昆弟、贺果、刘明俨、颜昌颐、唐灵运、肖拔、郭春桃等，共一百〇四人。

罗学瓚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从法国回国，到达上海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历时四十多天。来到上海，即找到了党中央，并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当时正在南京读书的周世钊解放后回忆说，一天，“我忽接蔡和森、罗学瓚两同志从上海来信，说他们刚从法国回来，要我去上海相会。我就赶到上海，当晚，我就到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居处。……第二天，我和蔡和森、罗学瓚同志在半淞园中畅谈了半日。我们三人谈的很多，但主要是他们两位动员我参加革命（即参加党）。我当时以现正研究学问，将来可殊途同归为辞。”周世钊还填了一首“南歌子”纪其事，其中有“半淞园里对晴晖，长记蔡（和森）罗（学瓚）教我撷芳菲”之句。此外，据贺培真（贺果）老人回忆，罗学瓚回国后，他们同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罗学瓚离校时，那种整理行装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罗学瓚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了将近一年，然后回到长沙，从事党的工

作。

(三)

一九二二年初秋，罗学瓚回到长沙，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做人力车工人的工作。在此之前，毛泽东也在人力车工人中活动过。他针对人力车工人租税、兵差负担过重，封建行规束缚很严，工人生活极端困苦等情况，用办夜校等方式，向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把工人组织起来，向车主资本家作斗争。通过同很多工人的了解和交谈，他成了工人“亲密的朋友”。在发动、组织、教育工人的过程中，他培养了谭汉俊、宋万龄、贺友盛、李盛初、沈保田等先进工人入党，成立了行业工人中第七个党支部。他还通过积极分子用分区组织十人团的办法，把将近一千八百多名人力车工人都组织起来。并于这年十月八日，在仓后街正式成立人力车工会。这时，他已经是人力车工人信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了。十一月，他还被选为人力车工会代表，出席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同任树德、朱少连等人，被任命为联合会有关部的正副主任。

人力车工会成立后，罗学瓚几次领导工人同官厅和车主进行斗争，坚决维护了工人的利益。有些行业的资本家，因害怕工人运动的高涨，曾勾结官府，阴谋对各个工会进行破坏，并在理发、机械、缝纫、笔业等行业制造了一系列的事件。长沙西区警察署也借口人力车工会不合法，突然派出警察把人力车工会的牌子强行摘了下来。为了反击反动政府对各个工会的挑衅，他随同郭亮、任树德等人，以省工团联合会代表的身

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就各个工会的事件，先后同省长赵恒惕、警察厅长石成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等进行了斗争。他们不仅迫使石成金承认人力车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而且还迫使西区警察署送回工会牌子，重新挂了起来。

一九二三年四月，人力车行主把每台车车租从五百六十文，猛增到六百四十文。为了反击人力车主的高利盘剥，罗学瓚组织人力车工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经过周密的组织和部署，人力车工人在一天清早，从四面八方涌到教育会坪集合，然后整队游行示威。这支一千五百多人的队伍，沿途高喊着“反对业主私擅加租”，“我们要减租金”，“工人要自由”的口号。游行队伍来到警察厅，由罗学瓚带领代表向警察厅请愿，提出五条要求：“一、要求将各栈人力车收归公有；二、要求将车租仿照民国六年每日只交三百六十文；三、要求将车主每日浮收的车租一律退还；四、要求以后无论关于车工各项事件，以及加租等事，均要得到工会同意；五、要求自罢工之日起至解决之日止，免除每日车租。”由于代表坚持斗争，终于迫使警厅答应了部分要求，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当时长沙《大公报》曾就此事作了报道。同年八月，工会还要求警察厅贴出布告，制止往来军队给人力车工人乱派军差，警察厅被迫答应了工人这一要求，贴出了不许再派军差的布告，车行老板也被迫减少被派军差的部分车金。

湖南人民为了进行支援收回旅大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斗争，于一九二三年四月成立了湖南外交后援会。罗学瓚是这个后援会的文书主任，还担任了青年救国团的主席。为了推动湖南的反帝斗争，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常带领学生工人群众，进行查抄焚烧日货的斗争；代表青年救国团与各团体一

起，警告教会办的福湘女校当局，不许阻挠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迫使该校取消开除七十多名学生的决定，将学生全部请回学校；特别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如《劝大家速起立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的旗帜下来作战》、《帝国主义者加紧为中国制造内乱》、《日本人应该觉悟了》、《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华侨——一片排华声浪》、《不平等条约的概述》等等。他还写了一篇《我们办教育者应有的觉悟》，批判当时教育界某些人士阻挠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错误行为。这些文章，先后登在当时省委办的《新民周报》和后援会办的《湘江半月刊》上。至于由他担任主席的青年救国团的活动情况，当时的长沙《大公报》有一些较为详细的记载。如在四月八日刊登的开成立大会前致各公团函，鲜明地揭示了这个团体的宗旨，是“专为（对付）日本鬼子欺害我们中国人而组织的。我们专想抵制日货的方法，专做抵制日本的事业……”但在实际斗争中，他们的活动范围，比这要广泛得多。例如，他们进行抗议日本领事馆横蛮逮捕广益学生钟振翻的斗争；质问省政府交涉司等。特别是为了扩大青年救国宣传，他们还决定利用暑假，以县为单位组织讲演团，每团人数五至二十人不等，由各县推定主任带领，分赴各县沿途进行广泛的宣传，目的在于“讲演国耻，冀引起同仇敌忾之心，而为救国自卫之计”。并以驻团干事罗学瓚、周仲彝，宣传部主任姜梦周的名义，向各县发出公函，请其协助讲演团开展活动。这对于反帝救国宣传，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这期间，一九二二年冬到一九二三年春，罗学瓚还在毛泽东举办的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任教。这所补习学校，是专为那些有志于学习而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人而设的，实际上是一所

为党训练革命干部的学校。学生人数最多时达二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自修大学被赵恒惕查封，中共湘区委员会另筹办了一所湘江中学。原补习学校的学生都转入湘江中学读书，他仍到湘江中学教授历史和地理。一九二五年春，湘江中学迁到浏阳门外，就近吸收一些农民入学。学校与当地农民相处得很好，当时的《湖南通俗报》，还有关于学校与周围农民召开“农民同乐会”的报道，其中提到“有罗学瓚的演说，夏明翰的笑林，并有魔术多种及火棒电影等。”湘江中学学生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大都由教师介绍入团入党，或派往广东参加革命。

对于罗学瓚在这两所学校任教的情况，贺尔康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四年写的日记里，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有次，贺尔康从街上买回几根针，向他请教这些针尖为什么能够相互吸引的道理，日记写道：“罗先生就详详细细告诉我，这些针和指南针一样，都是磁石做成的，……接着他拿了一本书来，将磁石的形状、特性、用途等详细说明，于是我就明白了。”他很关心贫苦学生，当他知道贺尔康家里很穷，没钱读书，打算退学时，他把贺尔康找到家里，劝其继续入校读书，并答应借钱给贺解决生活困难。贺在日记里还详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他听到贺说自己“素有不喜与任何人来往讲话”的“大缺点”时，他就要贺抄写一遍《孙中山先生略历》，终于使贺领悟到“孙先生宣传力之大”，是因为“孙先生于革命事业，是随时随地宣传，找同志……”然后联系到自己的“缺点”，懂得应该怎样克服。他就是这样耐心帮助每一个学生。为了使学生熟悉时事，他不仅经常向学生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而且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同中国订立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

俄协定，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他要学生把这个协定全文抄出来，贴在壁上，让大家观看。这在贺尔康日记里也有记载，说“罗学瓚先生要我抄一张《中俄协定》所订条约全文，贴在壁上，使同学参看……抄写完后，其大意也很记得了。”贺的日记还记载有罗学瓚同学生去湘潭县参加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的情况；有他在“五四”纪念会上作“五四”的历史和起因的讲演情况；有给学生上公民课时，应学生之请，讲《金佛郎案》问题的情况；这些虽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但也可以看出，在培养学生方面，罗学瓚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罗学瓚热心教育事业，除任教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和湘江中学外，他还随着工作的需要，先后在长沙女子师范、湘潭女中、醴陵渌江中学、开联女校、山东齐鲁大学任过教。至于举办工农夜校，农民干部训练班，更是悉力以赴。应该说，在党的教育事业上，他是较早有过贡献的。

在自修大学期间，罗学瓚挤时间从事教育改革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他先后在《新民周报》上发表了《实业与教育》、《为什么要办平民教育》等文，指出旧教育是宰割平民的工具，而新教育应该“含有反对贵族教育与改造社会的性质”。他说：“归根结蒂，必先消灭军阀，排除国际侵略主义，才有振兴实业之可言，也才有振兴教育之可言。”他还写了一篇《环境与教育》的长文（见《新时代》第一卷第四号），提出了改造社会，才能搞好教育的观点。这一观点，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意义。

在这一期间，罗学瓚还参加过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工作。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后，李维汉接替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委

员会书记，他是区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后来湘区党委改为湖南区委，李维汉仍任书记，他改任区委宣传部长。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他除了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爱国反帝运动和革命教育工作外，还以省特派员身分经常去湘潭、醴陵等地活动。他在湘潭家乡一带进行的革命活动：有推动那里的工运、学运、妇运等群众团体，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抵制英、日货轮在湘潭码头卸货的斗争。有带领学生宣传队到农村宣传群众，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向农民讲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有联络国民党左派，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陈大榕阴谋把湘潭女中迁省，企图破坏湘潭妇女运动的斗争。有组织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的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及其制定的三大政策等事。

罗学瓚去醴陵从事农民运动，是一九二五年冬。在此以前，他曾多次去醴陵活动，与在醴陵工作过的党员李立三、汪泽凯、陈章甫、李石溪、傅剑英（女）、孙小山、易足三、宋华轮、易胜良（女）、胡雪怀等，都有过联系，参加过醴陵群众迎送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烈士遗体过境的追悼活动。这次来醴陵不久，就接替李石溪任醴陵县委书记，以县立开联女校和淶江中学教员的身分公开活动。他发展党员、团员，在各区建立起党支部；开展同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李味农、潘疆爪、廖谈空、张晓霞等左派人士建立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在学生中，则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团结大批进步青年，并以他们为骨干，进行开展禁止仇货的斗争。

为了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罗学瓚在接到党的通知后，从淶江中学搬到了醴陵县城关镇先农坛居住。同其他县委成

员，积极进行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平民救国团、农民武装队的组织工作，共有三百余人参加，配合北伐军作战。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十九期，对醴陵工农武装在泗汾桥战役有如下的记载：“七月十一日，北伐军开始分三路进攻，我们有平民救国团（工人、学生共同组成）和农民武装队三百余人，分布于栗山坝、泗汾一带。北伐军进攻时，……武装队乃以鸟枪、梭镖等直接进攻敌人阵线，复以革命军旗帜招摇其四周，以惶惑其军心”，最后，“掳敌团副一名，营长两名，连长四名，士兵三、四百人。毙团长一名，营长两名，拾弃枪二、三百枝。”接着，很快攻克了醴陵县城，在城关镇召开了庆祝胜利的军民联欢大会。

北伐军攻占了醴陵，这时的农会已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农会会员人数猛增二十余万。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更快的发展，罗学瓚举办了五、六批农民干部训练班，亲自给训练班讲课。各种基层组织如工会、农会、妇联、商民协会、教职工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均以各自的团体名义，在城乡从事宣传。但党的组织没有公开，只是在十月革命节的大会上，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公开了罗学瓚、孙小山、易足三三个主要领导人。

由于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对反动派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起来。当时，驻在醴陵的湘东保安司令罗定，妄想收缴浏、醴、攸等县农民武装的枪支。为此，醴陵县委决定解除罗定的武装。罗定闻讯，率部离开醴陵，来到攸县，同当地的豪绅地主勾结，阴谋捕杀了攸县东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罗震。罗学瓚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浏、醴、攸三县工农武装，讨伐罗定，迫使罗定远窜江西莲花等地；接着，又解除了团防局长、恶霸地

主彭志藩的武装，并将彭逮捕，押送长沙，经过省特别法庭的审判，处以死刑。

一九二七年春，毛泽东去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情况时，同罗学瓚住在先农坛的房子里，一共住了八天，同许多办农运的同志座谈，收集了有关农运发展的情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热情地称赞了这一地区的农民运动。

(四)

继“四·一二”事变在长沙发生的“马日事变”，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在省委工作的柳直荀，以郭亮的名义号召组织农军围攻长沙。罗学瓚接到这一通知后，立即以醴陵县委、县工会、县农会的名义，发出“打到长沙去”的紧急号召。他还和易足三、孙小山、潘疆爪联合安源朱少连等同志，组成湘东赣西工农义勇军总指挥部，将醴陵各乡组织来的二万余农军集中到阳三石车站，与从萍乡安源来的工人纠察队汇合，乘火车西驰株洲。为了支援农军，醴陵的广大群众在沿途设置了兵站，组织了运输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支队伍到达株洲后，与湘潭东一区、东二区的工农义勇军协同作战，对盘踞在株洲至易家湾一带的许克祥部进行了战斗。这次战斗由于领导上的错误而失败。当地的土豪劣绅则乘机反扑，把醴陵的革命人民置于血腥屠杀之中。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罗学瓚不得不同孙小山、潘疆爪等同志，带领一部分农会负责人、学生及工人纠察队三、四百人，百余支枪，退到安源，并在安源工人的掩护下，避免了敌人的追捕。

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当时，罗学瓚和一些同志，同有着

右倾思想倾向的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工农义勇军得到了整顿，提高了战斗力，在安源一带，有力地打击进攻的敌人，并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转战醴陵、萍乡等地，使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成为秋收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秋收暴动前，罗学瓚被调到长沙，与夏明翰、罗章龙等人，准备武装起义。他们当时住在肇嘉坪。对于这段时间的情况，罗章龙有如下的叙述：“在当时血腥的白色恐怖中，人人都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罗学瓚每天坚定沉着地开展活动，从未流露出丝毫恐慌、畏惧和动摇。当时，罗学瓚和夏明翰共同负责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工作，这是省委工作最繁重的一个部门了。从物色干部，派出党员，恢复破坏的党组织，到组织长沙城里的秋收起义，破坏敌人的铁路、电讯等各种各样的工作，罗学瓚都要出面去干。有时，真忙得他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但从没有见他为自己的安全发过愁。后来，省委组织部也被敌人破坏了，有人离开了长沙，但罗学瓚临危不惧，坚持在长沙工作。”

一九二七年九月，罗学瓚以湖南省委委员兼湘潭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来到湘潭。随即与罗哲、肖晃、张忠廉等同志组成县工委，县委机关设在湘潭五里堆鸡公嘴一处公屋内。他经常三更半夜外出，联络同志和组织群众。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使得易俗河、茶园铺、中路铺、朱亭、株洲、铁江坝、石潭、姜畲等地的组织，很快恢复起来，共建立了三十多个支部。农民武装也有了发展。仅东一区（株洲）就组织了四百余人的工农武装，朱亭组织了百多人的武装。通过这些武装，广泛开展攻打团防局，消灭清乡队，以及镇压恶霸地主的活动。例如，在株洲击溃了恶霸雷英带领的清乡队；在十一都镇压了恶霸宋鹤皋；

在十五都镇压了恶霸阳秀岩；在东二区和东三区，分别镇压了黄十一和唐甫升，大大减煞了敌人的凶焰，逼得湘江沿岸的土豪劣绅，又开始东躲西藏起来。

到了一九二八年三月间，反革命的疯狂反扑和屠杀又加剧了。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党的干部张仪、黄逸夫等同志被枪杀；罗学瓚打扮成厨工，才安全脱险。后来，反动政府还悬赏五百块银元捉拿他，团防局经常来他家里搜查。有位叫张云的贫农，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一个只有五岁的儿子藏了起来。这时，他在湘潭地区已经难以活动。一九二八年五月，党中央调他去上海工作。他同在株洲从事地下工作的汪超凤同志，从马家河下游湾圻港雇一小篷船去长沙，然后搭上外轮离开湖南。

罗学瓚到上海后，曾被派往山东工作，并在齐鲁大学任教。一九二九年二月四日，正是他三十五岁的生日，他从上海寄回两张全身照片，附有一信，要儿女在家自重，并说因日本侵略山东，进占济南，组织上已将他调回上海。他在上海同何孟雄同志工作了一个时期，由党中央派去浙江任省委书记。由于省委机关出了一个叫沈定毅的叛徒，把浙江省委的全部组织都出卖给敌人，罗学瓚到杭州不久就被捕了。一九三〇年夏，他被敌人秘密杀害。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谢觉哉曾写诗赞美罗学瓚和陈佑魁两烈士，诗如下：

浑身是劲陈佑魁，	鞭辟入里罗学瓚；
远瞩高瞻天下小，	出生入死一边站。
忠义之血不自流，	阶级之仇彻底算，
三十年前恶战场，	巍然两个英雄汉！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罗学瓚未发表的诗文、日记、家信及著述。
2. 李维汉、何长工、罗章龙、肖三、易礼容、贺果、龙淑、张琼、周世钊、罗学绘、李秀泉、丁维善、柳甫成、王亚文、肖杰五、肖子凤等老人的回忆和访问记录。
3. 罗学瓚发表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新时代》、《新民周报》、《湘江半月刊》上的书信和文章，以及湘潭地区调查资料的有关记载。
4. 当时长沙《大公报》、《湖南民报》、《通俗日报》、《战士报》的有关报道。

吴 焕 先

侯志英 陈士农 尹俊忠

吴焕先，河南新县人。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生于箭河四角曹门村^①，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光荣牺牲于甘肃泾川的泾水河畔。他短暂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立志投身革命 坚信马列主义

吴焕先的父亲吴子华兄弟三人，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分家后，有水田十四亩、旱地八亩。吴子华有子五人，焕先排行第三，全家十口人除经营农业外，还开有小杂货铺，是一个小康之家。

吴焕先七岁时开始在四角曹门附近的朝阳寺读私塾，一九二〇年，又就读于大湾村。那时，尽管还在童年，他已负有壮志，刻苦好学，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器重与钦佩。

一九二三年，吴焕先进入湖北麻城职业学校。在该校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游行示威、街头宣传和张贴标语等革命活动。在麻城教育局掌握领导

^①新县箭河的四角曹门村，原属湖北省黄安县的紫云区。

权的共产党员王幼安影响下，麻城职业学校是该县传播马列主义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吴焕先在这里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产生了热烈的革命感情。一九二四年寒假回家过年，他把马克思像贴在供桌上方。父亲看到后申斥说：“这是敬祖宗的地方，你怎么将这张像贴在这里？”他回答道：“他是革命的导师，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个新社会来！”在该校上学的第三年即一九二五年，吴焕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个立志投身革命、坚信马列主义的青年。

一九二五年夏，吴焕先从麻城职业学校毕业。回家以后，他的父亲让他出门找事干。吴焕先说：“我做事就要做大事，绝不贪官污吏，落个臭名声。”他在家乡住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除参加劳动外，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在村里粉刷墙壁张贴马克思、列宁像，挂上自己画的中国地图，向贫苦农民进行武装起来保卫祖国的教育。他说：“现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有亡国的危险。因此，不当兵卫国，就出不了头，我们当长工的人就要受一辈子苦。”有些老年人问他：“目前，国家无主，民不聊生，怎样爱国？”他说：“将来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不靠皇帝。宣统三岁继位，有什么用？”他还把本村的青少年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排，下分三个班，并为他们做了许多军帽、木枪、木刀，利用夜晚时间习操练武，指导他们学习打仗，培养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和机智勇敢的性格，准备将来保卫祖国。吴焕先教他们唱《战争歌》、《兵操歌》、《国耻歌》，大大激发了青少年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还用纸做了一面五色大旗，上写“爱国”、“还我山河”六个大字。在吴焕先的发动、组织和带领下，青少年们喊着“一二一，一二一”的口令进行操练，四角曹门村热闹起来了。一些有保守思想的老

人嚷道：“你们起反了！要练到河滩上练去！”焕先说：“我们就是要起反，不起反我们子子孙孙就要当奴隶。”这些活动说明，当时吴焕先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已有了初步的理解，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一定认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在武汉读书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戴克敏、戴季伦、曹学楷、陈定侯、郑位三等三十多人趁暑假回到家乡黄安。他们宣传党的主张，传播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思想，并准备发展一批优秀工农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吴焕先和戴克敏、戴季伦是姑表兄弟，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成了他们发展党员的首批培养对象。他们经过秘密串连后，以歇伏为名，挑着干粮，到天台山开会，畅谈革命理想。焕先看到奇峰突兀、甚为壮观的天台山，心情非常激动，满怀豪情地写了一首“四望众山低，昂然独出奇，白云分左右，独与占天齐”的诗篇，借歌颂山的雄伟气势抒发崇高的革命理想。一九二五年冬，吴焕先由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在黄安的七里坪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上级党组织以读书的名义派他到武汉工人运动研究所学习，一九二六年夏季结业。同年秋，吴焕先同曹学楷、陈定侯、戴克敏等，回到箭河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扎根群众之中 发展革命组织

吴焕先回到家乡四角曹门以后，剃光了头，脚穿草鞋，身着破长衫，深入贫苦农民之中，和他们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秘密串连发动，为在箭河一带建立、发展党的组织，成立农民协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有一天，吴焕先碰到正在田边望着谷子发愁的吴先恩，便凑拢去问：“今年谷子长得好吗？”先恩说：“长得不错哩，一缴租就剩不多了。”焕先问：“你家要缴多少石？”先恩说：“要缴二十石啊！”焕先问：“不缴不行吗？”他说着，坐在吴先恩的身旁，拍拍先恩的肩膀，滔滔地讲着：“现在全国各地都在闹革命，快参加吧，分了地主的土地就不用缴租了。谁种的田归谁……。”还讲了北伐军打来了，共产党要领导穷人闹革命等事理。吴焕先对其他不少贫苦农民和知识青年也进行了同样的宣传。在宣传中，他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农民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我们穷人没有地种，没有房住，吃不饱，穿不暖，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我们要翻身得解放，必须组织起来。我们穷人多，组织起来力量就大。没有组织起来的穷人就象一盘散沙；组织起来就象泥巴，捏成一块，打击敌人就有力量。富人少力量小，穷人团结起来就不怕富人。吴焕先的宣传，在四角曹门的广大贫苦农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议论，焕先这次回家，全变了，说话总靠着穷人；焕先入了共产党啦，共产党，就是分财主的东西，种地不缴租。还有的人说，要是真的，那就好了！吴焕先所宣传的革命道理，虽然有些人还不能完全懂，但他们听了，心里都是痛快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吴焕先不再是一个“孩子头”，已经成为一个“改革世道”的领路人。经过吴焕先的串连、发动和培养，一九二六年秋，在四角曹门附近的头石河村，先后吸收了吴先筹、石生才、詹以贤、毛国兴、萧崇善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箭河地区第一个党小组。随后，吴焕先又在四角曹门、郑家边等村吸收了程儒香、吴立启等十余人入党。在入党宣誓会上，吴焕先要求他们积极为党工作，遵守

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表示永远跟党闹革命的决心。

箭河地区党组织建立以后，吴焕先把新入党的同志分配到箭河附近各村庄，深入到贫苦农民特别是长工中间去扩大党的队伍。到一九二七年春，箭河一带大部分村庄都有了共产党员，并在四角曹门建立了箭河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与党组织建立的同时，吴焕先还利用国共合作的合法形式，着手建立农民协会。一九二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四角曹门召开了箭河地区第一个农民协会的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是来自附近七个村庄的一百多名贫苦农民。吴焕先主持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天参加会的都是穷苦人，都是信得过的人。我们没有地种，没有房住，没有衣穿，上无片瓦，下无一垅地，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却吃不上穿不上，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现在我们要组织起来，建立农会，实行“耕者有其田”。他并以商量的口气说：今天大家看，参加这个农民协会对不对，愿意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意参加的不勉强。吴焕先讲罢，大家都拍手称赞讲得好，并说，焕先为咱穷人着想，跟着他我们放心。结果，有五十余人报名参加农民协会，并推选竹林巷村的缝纫工人耿继荣为农协主席。

四角曹门农民协会建立不久，吴焕先又亲赴箭河地区的斗笠冲村，主持召开了该村的农协成立大会。会后，他召集各村参加大会的代表开了小会，要求他们回去后，按这个村办农协的样子，把自己村的农协也建立起来。到一九二七年春，箭河地区共建立了九十七个村农协，会员达到三千四百余人。在村农协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在龙王山成立了箭河地区农民协会，吴焕先为负责人之一。农协的活动也由半公开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吴焕先常利用农协会员开会的机会，讲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

况，指出俄国革命胜利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马列主义是穷人革命的理论，我们现在实行三民主义，将来要搞共产主义。吴焕先的讲解，使农民群众对当时的任务和未来的美好远景有了一定的了解，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在建立农协的同时，吴焕先等同志还发动建立了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创办“三堂红学” 建立农民武装

随着农民协会的建立，吴焕先等共产党员带领贫苦农民向地主阶级开展了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发起了抗捐、抗债、抗租、抗税、抗课的“五抗”运动。吴焕先亲自点名，要旧港村的一个称“山大王”的财主把高利贷帐本全部交出来烧掉，要箭河大地主吴惠存等家各设二十桌酒席宴请农民，以示对他们的初步惩罚。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走进了地主的院子，扬眉吐气地坐在椅子上；平时作威作福骑在人民头上的大地主吴惠存，吓得不敢着家。农民还清算了方湾恶霸地主方晓亭霸占的公田公产。吴焕先等共产党员领导的反封建斗争，破坏了箭河一带的旧秩序，给了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一九二六年冬，极端仇视农协的方晓亭，勾结袁英的土匪武装来箭河一带进行报复，吴焕先家的房屋被烧，父亲、大哥、大嫂、二哥及小弟弟等五位亲人全被杀害，受害群众不计其数。血的教训使吴焕先等共产党员认识到，要对付地主武装的进攻，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在吴焕先、吴先筹等领导下，箭河地区的四角曹门、郑家边和詹湾，利用红枪会的旧形式办起了革命的红学。

一九二五年，箭河一带的吴惠存、吴美山等几家地主，为了保家、保产，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在大湾建立了地主武装“红枪会”。参加“红枪会”的，一部分为地主子弟，有一部分是被骗去的贫苦农民。他们上阵时，头扎红布，口念咒语，手持灵符和红缨枪，故称“红枪会”。吴焕先也以“防匪”为名，找伯父吴维干商量，在他家能容纳八十多人的堂屋，办起了一堂红学。吴焕先对其伯父讲：“办红学、防土匪，保大家的财产。你管祖^①，祖上要出钱出粮。”吴焕先指派他伯父的大儿子吴盛先当管经费开支的“学东”，他自己担任“学长”，掌握兵权，指挥操练。吴焕先通过这种办法，从他伯父手里搞了三百串钱和几十石粮食，在他家办起了两座烘炉，打红枪矛子，还买了雁枪、三眼铳等武器。与此同时，吴焕先派吴先筹打入郑家边“红枪会”内部，夺取领导权，将反动武装改造成为革命武装。吴焕先深入贫苦农民中进行宣传发动，以“郑三泰”为红学党组织联络暗号，在红学中秘密发展党员，扩大革命力量。开始，这堂红学只有三十七人，月余后搬到箭河，又在箭河附近的六个湾子发展学员，学员迅速增至一百零三人。在改造郑家边红枪会之后，吴焕先又让詹以贤也采用四角曹门的办法在詹湾办起了一堂红学。据红军老战士戴德归回忆，吴焕先为三堂红学的总负责人。郑家边的红枪会经过改造，领导权已被我掌握，但红学的武器仍在地富子弟之手。用什么办法把武器夺过来呢？一九二七年元月下旬，光山县土匪王小山一伙来箭河骚扰。这时，吴焕先带着四角曹门红学的人到郑家边红学集合，动员他们去打土匪。那些怕死的地富听说

^①吴姓宗祠中分管祖业和祭祖的人。

土匪已经到了离箭河不远的大坳口，纷纷找吴焕先和吴先筹等说明他们的孩子不能去。焕先、先筹将计就计，对那些地富子弟说：“你们怕死不愿去算了，你们出钱出粮，我们出人出力，把你们的枪交给我们，我们不怕死，我们去。”地富子弟求之不得，纷纷把枪交出来。这样，武器就落到了贫苦农民手里。在吴焕先、吴先筹和詹以贤的率领下，经过英勇奋战，在詹湾对面的山上，打退了土匪王小山的进攻，并缴获钢枪一支。从这以后，地富子弟从红学中被清除出去，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学队伍迅速扩大到一百九十余人。吴焕先一方面向贫苦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帮助他们破除迷信，在红学中发展党员，树立党在红学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又组织学员苦练红缨枪对刺本领，使三堂红学成为新县最早的一支与地主豪绅反动红枪会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农民革命武装。在三堂红学的影响下，周围七八个村子都轰轰烈烈地闹了起来。

箭河是“鸡叫听两省，狗咬三县惊”^①的地方。这一闹，惊动了光山县桥南八保首户大地主陈日辉，他依仗手下的三十堂红枪会，声言要进攻箭河，同箭河一带的三堂红学打仗。消息传来，吴焕先召集红学学员研究对策。有一个贫农说：“咱打脚鱼叉，叉他个王八蛋！”这个意见被吴焕先接受了。他请了十多个铁匠，在家门口架起二十盘铁匠炉，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碎铁的捐碎铁，连夜赶制脚鱼叉、大刀武装群众，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为了击退地主武装的进犯，吴焕先组织参加红学的人，赤背光膀刻苦地练武。休息时，他就给大家讲革命

^①两省指湖北、河南；三县指湖北的黄安、麻城和河南的光山。

道理，教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有一次，吴焕先向红学学员讲：我们办红学就是要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一根小竹子一折就断，捆成了扫帚，就百折不断。地主豪绅好比大树，一个人搬不倒，大家一齐搬，就可以把它搬倒。在吴焕先的具体指导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有力地推动了箭河一带农民运动的发展。

镇压土豪劣绅 铲除反动盐卡

党组织的建立和党的队伍的不断壮大，使箭河地区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农民协会和三堂红学的创办和发展，在箭河地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其势如破竹，迅猛异常。

吴焕先首先领导箭河农民开展了向土豪劣绅“借粮”的经济斗争。一九二七年旧历年关快要来临的时候，接连遭受两个荒年的箭河人民，更感到粮食不足。在吴焕先发动下，闹腾了一个冬天的箭河人民，迫切要求过一个好年。一天晚上，吴焕先向几位农会的人说：“你们想不想过个丰年？”大家说：“怎么不想啊！可没有钱，没有粮，怎么过啊！”吴焕先又问：“咱们向地主借粮过年好不好？”往年过年，地主总要催租逼债，今年反要向地主去借，有人怕借不来，就问：“地主不借怎么办？”吴焕先顺手拿起脚鱼叉，用劲地晃一晃说：“哪家不借，就让他看看这个！”大家听了以后，认为这个办法好，都表示同意。过了一两天，经过串连发动，四角曹门和附近几个村的农民，在吴焕先的带领下，背着筐，拿着布袋，扛着大刀、脚鱼叉，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地主家走去。平时骑在

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箭河几家大地主，见此情景都吓得不敢露面。他们对农民“借粮”，没有一个敢说个“不”字，纷纷打开粮仓，将粮食“借”给贫苦农民。仅石子谦一家就“借”出了几百石粮食。在四角曹门的历史上，广大农民第一次过上一个好年。“借粮”的胜利，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

为了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吴焕先还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是旧历元宵节。按照箭河地区的习惯，这一天，群众的各种传统玩艺儿如笼灯、花船、高跷、狮子等等，都纷纷出动。吴焕先组织了一班青年人，化装成地主、军阀和大鼻子“洋人”，吹着洋号，打着洋鼓，也到附近各村进行宣传。每到一地，吴焕先就发表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罪行，并指着“洋人”、“地主”问大家：“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大家说行不行？”“地主剥削咱们穷人合理不合理？”大家都一致地回答：“不行！”“不合理！”接着他还领着大家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

箭河一带的革命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贫苦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完全是由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造成的，纷纷要求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讨还血债。吴焕先和黄安县农协常委王健等，根据三月二日湖北省政府颁发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在箭河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捕杀土豪劣绅的高潮。首先镇压的，是黄安北乡最大的土豪劣绅吴惠存。

吴惠存，箭河地区郑家边村人，担任着伪长水会会首、县民团团总等职，又是吴姓的族长。长期以来，他依仗权势，勾

结官府，包揽词讼，制造假印，鱼肉人民，无恶不作，是箭河地区的“地头蛇”，全县有名的大土豪劣绅，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就是新上任的县官，也要先来拜访他，否则，就有丢掉乌纱帽的危险。农民运动兴起后，他又疯狂反对农会，咒骂农会会员，破坏革命武装，甚至暗中杀害农会干部及其家属，民愤极大。广大农民纷纷要求镇压吴惠存，搬掉压在他们身上的这块大石头。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王健与吴焕先对箭河一带的土豪劣绅的情况进行了排队，确定首先镇压大土豪吴惠存。一天下午，在吴焕先家召开了有詹以贤、周业臣、吴维龙等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研究捕捉吴惠存的办法。当天晚上，又在四角曹门红学法堂召开三堂红学联席会议，到会的有一百五十多人，吴焕先说：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及反动军阀。封建势力在箭河地区的代表就是吴惠存，我们要翻身就得除掉他。吴焕先还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吴惠存的罪行，启发大家的觉悟。王健在讲了吴惠存的十几条罪状之后，代表上级党组织宣布捉拿吴惠存的具体部署。

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三月十七日清早，三堂红学的学员在王健、吴焕先的率领下，怀着兴奋的心情，向吴惠存住地走去。吴惠存一见来了这么多人，就忙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一个红学学员答道：“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来捉拿你的！”吴焕先当场宣布了他的罪状，汪宗明、吴维如等一把抓住吴惠存，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押到吴氏祠堂，召开了斗争大会。会后，组织了一支由七十人组成的押送队，直往七里坪走去。吴惠存被捉，大快人心，跟着围观的群众上千人。他们和扛着长矛、背着大刀或肩荷锄头的押送队伍一起振臂高呼，

“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吴惠存！”口号声响彻云霄。吴惠存的亲信、爪牙们不甘心失败，纠集在一起准备劫案。吴焕先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愤慨地说：“今天准备打，谁来劫就杀谁！”大家也摩拳擦掌，准备投入战斗。当走到离七里坪只有三、四里路的王锡九村时，王健、吴焕先等分析了七里坪的复杂情况，当机立断，决定不再前进，把吴惠存就地处决。当这个决定宣布以后，大家拍手称快。一个大个子农民奋勇上前，用锄头把吴惠存打倒在地，其他人一涌而上，你一锄头我一棍，处死了这个大坏蛋。

处死吴惠存，震动了四乡。广大农民受到鼓舞，斗争勇气倍增，纷纷行动起来，出现了一个捕捉土豪劣绅的高潮。在这一高潮中，吴焕先又领导箭河人民镇压了方思焰、詹道坤、高玉皆等土豪劣绅。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在吴焕先的组织领导下，又发动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攻打“缉私营盐卡”的革命行动。

在使用原始武器同地主豪绅反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吴焕先深刻认识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盼望着能从敌人手中夺取钢枪来武装农民。一天晚上，在吴焕先主持召开的农民协会会议上，有人提出消灭“缉私营盐卡”的建议。“缉私营盐卡”设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黄安县石岗村。^①当时，在湖北销售的川盐，销售权完全被军阀和资本家所垄断。由于川盐味苦价高，湖北人不喜欢吃，而喜欢吃味美价廉的河南淮盐。箭河的不少群众利用农闲时间，从河南光山贩运淮盐到湖北去卖。湖北军阀为垄断食盐市场，制止淮盐南运，就设此盐卡，并派一个班

^①石岗村今属河南新县。

的兵力驻守。他们手持钢枪，以盘查私盐为借口，搜刮过路人，甚至闯进附近群众家里，进行敲诈勒索，广大群众恨之入骨，决心除掉这个盐卡。但也有人担心守卡士兵手中有钢枪打不下来。一提钢枪，倒给吴焕先解开了心上的一块疙瘩。他想：现在正愁没有钢枪用，要能夺来钢枪，不是很好吗？他就鼓动说：“钢枪不可怕，咱们有这么多人，岂能怕他的几杆钢枪！”他的发言，消除了个别人的顾虑，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会后，王健、吴焕先、吴先筹从三堂红学学员中挑选三十名精干人员，组织二百余名农民，手拿锄头、棍棒、脚鱼叉，在一天清晨，悄悄地包围了盐卡士兵驻地石家庙，首先摸掉了岗哨。王健、吴焕先带领几个队员，越窗而入，趁着敌人正在酣睡，轻轻地将屋里的枪刀从窗口递出，然后打开大门，红学学员一涌而入，十二个匪徒在睡梦中做了俘虏，一枪未发就结束了战斗。这次战斗缴获大刀、钢枪等武器八件，广大群众都为从敌人手中夺到钢枪而兴高采烈。

处死吴惠存，打掉“缉私营盐卡”，是鄂豫边区农民暴动的头一个重大行动，它为箭河人民除了大害，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使箭河地区的农民运动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大大鼓舞和推动了鄂豫边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后来土地革命时期的几次暴动作了预演，练了兵，准备了力量，积累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武装反抗屠杀 发动黄麻起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政权，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顿时，全国乌云密布，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在蒋介石公开叛变前夕，吴焕先就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有所认识。他在四角曹门召开的一次农协会会员会上，曾揭露蒋介石要杀工农的反动阴谋，要求大家团结起来，提高警惕，准备打退敌人的进攻。四月中旬，为了防备蒋介石叛变后各地地主武装的反扑，根据省委关于允许成立脱产的农民自卫武装的指示和反击反动地主武装进攻的迫切需要，箭河三堂红学从学员中挑选一百多人，组成常备农民自卫军，吴焕先任总指挥，石生才任副总指挥。这支农民武装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最早的基础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箭河的农民和学生在程湾召开了反蒋大会。吴焕先主持大会，农民和学生代表都在大会上发言，一致表示要打倒蒋介石新军阀。会后，吴焕先在普济寺主持成立了箭河地区防务委员会。

五月初，光山县柴山保大地主陈日辉率反动红枪会数千人向箭河进犯。他们沿途抢劫，无恶不作。箭河三千余名农民赤卫队员由吴焕先、石生才率领，在由麻城来箭河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三百名学生军和湖北省国民革命政府警卫营的援助下，分五路向侵犯箭河的地主武装反击。在木城寨至道士山一线，与敌激战七天七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木城寨反击战的胜利。

汪精卫集团于七月十五日叛变革命后，使革命闹得非常炽热的黄安，成了敌人“清剿”、血洗的重点，全县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就有九十二人之多。这时，陈独秀右倾投降的“停止六个月，不准活动”的指示也传到了箭河。吴焕先坚决抵制。他认为“农协还是要办”，“不打不能安身”，表示了要依靠广大农民坚持武装斗争的决心，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在鄂豫边领导

人民坚持斗争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他和吴先筹一起在箭河整顿了农民协会，坚持领导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逃往光山县的麻城大恶霸王庭芝纠集新集^①的反动民团和红枪会，企图打回麻城乘马区，重建其反动统治。吴焕先、吴先筹奉命率箭河一带农民自卫军数千人，配合麻城农民武装，埋伏在黄安、麻城、光山县边界上，分三路伏击敌人。这一仗，击毙敌人数百，俘敌两千，活捉了大恶霸王庭芝。这是“七·一五”后黄麻人民反击敌人进攻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震撼了鄂豫边的封建势力，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黄、麻、光人民对敌斗争的信心。吴焕先和其他领导人的名字，在广大人民中间更加响亮地传开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中共黄安县委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宣读中共湖北省委拟定的暴动计划。吴焕先以县委委员、县委组织部长兼紫云区（即今新县箭河地区）区委书记的身份出席会议。听了传达之后，他欢欣鼓舞，信心倍增，坚决拥护“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暴动计划。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传达省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指示和具体的暴动计划两个文件。

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箭河防务委员会在普济寺进行整顿和加强，吴焕先是该会的领导人之一。黄安县防务委员会成立时，他又被选为委员。

考虑到黄安、麻城两县有相当数量的革命武装和很好的群众基础，十月间湖北省委决定派王志仁和吴光浩等同志到黄

^①新集原属河南光山，现为新县县城。

安，发动黄麻起义。他们到黄安后，成立了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改组了黄安县委，王志仁任县委书记，吴焕先仍担任县委组织部长。

为了贯彻湖北省委关于在黄麻地区发动大规模起义的决定，十一月三日，中共鄂东特委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箭河出席会议的有吴焕先、石健民、吴立行等。会上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讨论制定了暴动计划。起义的部署和总目标是：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和黄安的七里、紫云（即箭河）一带以及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的农民武装为骨干，趁驻扎黄安县城的敌人西去未归之机，一举攻克黄安城，摧垮反动政府，建立工农政权和工农革命军。会议还产生了暴动总指挥部，由吴光浩、曹学楷、刘文蔚、戴季英、吴焕先五人组成。随后，省委又派潘忠汝任总指挥。会后，吴焕先等返回箭河，为参加武装暴动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他一方面深入各村，广泛宣传党的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另一方面，根据特委指示，把以三堂红学为骨干的农民赤卫军，按团、营、连、排、班进行整编和训练。又架起了十二座烘炉，昼夜不停地赶制土枪、撅把枪、大刀、长矛等武器，进一步把农民武装起来。箭河处处洋溢着革命激情，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议论着暴动，推翻反动政权的大事。十一月十三日，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吴焕先率领箭河赤卫军、三堂红学和农民赤卫队数千人参加起义。队伍出发前，他作了战斗动员，要求大家服从指挥，英勇作战。吴焕先率领的农民武装是攻城的主力，承担攻打北门的任务，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攻破北门，起义队伍象潮水般地向城里涌去，自卫军战士站在城墙上大声呼喊：“我们是农民起义军，是共产党领导

的队伍！”“杀贪官，诛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农民弟兄也跟着呼喊起来。吴焕先率领部队攻入北门后直捣县衙，活捉了伪县长贺守忠和许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群众。十四日早晨，战斗胜利结束，古老的黄安城获得了新生，红旗高高飘扬，人们欢欣鼓舞。十八日，成立了黄安工农革命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黄麻起义是党在鄂豫皖边区领导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它给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屠杀以有力的回击，大大鼓舞和支持了这个地区广大群众的斗争，对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坚持武装夺取政权，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鄂豫皖革命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黄麻起义胜利后，黄安大部分区乡先后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但是，黄安的南乡和东乡，反动势力仍很猖獗，龟缩在那里的豪绅地主，利用反动的民团和红枪会与革命政府对抗。根据这种情况，吴焕先在一次党和工农政府召集的会议上提出建议：加强南乡的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镇压土豪劣绅，分化红枪会，巩固、发展起义的胜利成果。建议得到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的赞扬和采纳。十一月下旬，潘忠汝率领鄂东军主力和宣传大队，带着大量的宣传品深入南乡，发动广大群众，打击反动民团和红枪会，捕捉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沉重地打击了这个地区的反动势力。

坚持老区斗争 创柴山根据地

黄麻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惊恐万状。

十一月二十七日，反动派趁鄂东军主力去南乡开辟工作之机，进犯黄安县城，因敌众我寡，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城重陷敌手。黄安失守后，敌人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又笼罩了整个黄麻地区。

吴焕先并没有为暂时的失败而灰心，他握着受重伤的吴先恩的手坚定地说：“死不了，就要干革命，总有一天我们还会打回去的。”

十二月下旬，鄂东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为避敌锋芒，实行战略转移，大部分起义军由吴光浩等率领到敌人后方的黄陂木兰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一小部分人由吴焕先率领在老区坚持斗争。留在箭河地区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在吴焕先、詹以贤、石生才等同志领导下，分别在段冲余岗、芦山、苦竹坳三处秘密召开党的会议。吴焕先主持段冲余岗的党员会议，号召大家“注意保存力量，坚持斗争，不当叛徒”。他让坚持老区斗争的全体同志化整为零，分散到天台山一带打游击，保卫革命军人家属、保卫生产，给工农革命军筹给养。随后，在敌人步步追逼、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吴焕先带领几个赤卫队员，携带撅把枪、匕首等武器，在箭河一带的大山上坚持革命斗争。

敌人侵占箭河后，吴焕先成了敌人通缉与捉拿的主要对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在油榨湾反革命分子吴先美告密之后，伪十二军一个营配合大恶霸方晓亭的一个班的反动武装，包围了四角曹门。他们架起机枪威逼群众交出吴焕先。村里的老老少少，面对着敌人的机枪，一句话也不说。敌人按照吴先美的指点，当场把吴先旺、吴东旺等八位农民捆绑起来，气势汹汹地吼叫：三天之内不把吴焕先交出来，要灭湾绝户，老少不

留。敌人走后，四角曹门的人带着鸡蛋、肉等熟食在西大山找到了吴焕先。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吴焕先听到敌人围湾抓人的前后后，悲愤异常，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回去！宁肯死我一个，也不能让群众受连累。”大家坚决不同意。他说：“那得想法子救人！”时隔不久，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突然传开：焕先的人贴出了标语，标语上写着：“吴先美和伪民团勾结，诬告穷苦百姓，实属罪大难容，业经我们处决。再若有吴先美这样的人，也莫想活。你们若不把四角曹门的八位农民保出来，你们也和吴先美一样，不会有好下场。”群众暗暗地拍手称快，而吴先美的近族则慌了手脚。他们几次找方晓亭，要求释放四角曹门的八位农民。但在他们跑出结果时，吴先旺、吴东旺已被敌人杀害了，其余六个农民被全部释放，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敌人为了捉拿吴焕先，强令群众带路搜山。知道吴焕先隐蔽地点的带路群众，总是想各种办法，向吴焕先等打招呼。有一次，眼看敌人就要搜到吴焕先躲藏的地方毛狗洞，一个带路搜山的群众就高音大嗓地说：“这下看你吴焕先往哪里跑，今天逮住你，非杀你的头不可！”焕先他们一听就马上转移了。后来，敌人派重兵封锁所有的要道，企图把吴焕先他们饿死在山上。但箭河的群众总是采用各种办法给他们送饭，使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吴焕先仍充满着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他在一个叫“死人沟”的山洞的石壁上写了一首诗：“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不管敌人多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赤胆忠心为工农，气壮山河志不移，何畏今日艰难苦，坚持斗争定胜利。”

一九二八年春，吴焕先等同志到柴山保一带从事革命活

动。在胡湾发展胡庆胜等入党，在谭龛建立了以朱国元为书记的党支部，为以后开辟柴山保革命根据地打下了组织基础。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敌十二军任应岐部与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任部撤回河南，鄂豫边界一带成为军阀割据的空隙。在木兰山坚持斗争的鄂东军主力，开始转回老家。戴克敏率领部分武装返回黄安北部，四月七日，一举消灭紫云区上戴家“清乡团”，缴枪二十余支，檀树岗团匪闻风逃窜。一仗打响，振奋了广大群众。接着，工农革命军全部返回七里、箭河、乘马、酒店等地。留下坚持老区斗争的吴焕先、吴先筹等同志立即领导广大农民配合工农革命军，向土豪劣绅、反动民团全面展开进攻，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又出现活跃局面。群众兴奋地把这一胜利称为“二次暴动”，并到处唱着：“游击转回还，先打‘清乡团’，铲土豪除劣绅，一心要‘共产’！谁敢来抵抗，叫他狗命完，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徐朋人等在光山县柴山保河南湾附近的清水塘举行会议，决定开辟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这个决定，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鄂豫边区最初的体现，是继黄麻起义之后，鄂豫边区革命斗争的重要转折点。会后，工农革命军进驻柴山保。同年冬，鄂东特委根据创立柴山保革命根据地胜利的实践，又进一步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来建立鄂豫皖边界武装割据的战略计划。为了实现上述决定和计划，创建柴山政权，巩固革命摇篮，吴焕先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二八年七月，鄂东特委尹家嘴会议后，吴焕先负责恢复和开辟箭河地区工作，担任区委书记职务。他根据上级指示，首先抓了箭河地区的党政建设。

八月，他在黄谷畈发现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着成分不纯的问题，立即在杨家洼召开会议，决定清除不纯成分，吸收真正愿意革命的同志入党，巩固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九年春夏，他又在箭河地区普遍建立区乡苏维埃。五月，吴焕先以区代表的身份出席该区第三乡苏维埃在油扎湾村召开的成立大会。他在讲话中阐明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意义，指出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还有住山洞的可能，号召大家提高警惕，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巩固胜利成果。在选举乡苏维埃干部时，他提出了干部不应兼职过多的正确主张。

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开辟之后，河南光山县的反动势力为了阻止革命向北发展，指使白沙关北面的胡、范、成、寇四家大地主拼凑起一支三、四百人的地主武装，配合光山县反动民团，麇集在柴山保西北的白沙关上。他们拦劫过往行人，四处进行烧杀、抢掠，甚至乘隙窜入柴山保地区进行破坏活动。为了消灭这个顽固的反动据点，在鄂东特委的领导下，吴焕先、吴先筹率领箭河农民和郭家河、柴山保、柳林河等地农民一起，在红十一军三十一师的配合下，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一举攻占了白沙关。占领白沙关后，召开了万人大会，吴焕先、曹学楷、徐向前^①等同志出席了大会。会上宣布了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各项政策，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头子。白沙关暴动的胜利，使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从此，鄂豫边界出现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别山区的反动势力，成为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①1929年5月红11军军长兼红31师师长吴光浩牺牲后，徐向前奉党中央之命来鄂豫边接替吴光浩的工作。

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旬，吴焕先、徐朋人等在新县卡房东面的高山岗开会，根据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已经确立和稳定的情况，确定调红三十一师三队配合卡房农民消灭这一地区的大恶霸黄吉安、林用之，把根据地 toward 卡房扩展。经过在黄冲和卡房两地的激烈战斗，掀掉了压在卡房人民头上的这两块大石头。接着，吴焕先、曹学楷等在老叶湾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实行二五减租。从此，卡房的天空豁然开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翌年春，戴季英、陈子洲、吴焕先等在卡房的谭象、车堂庙、牛冲和胡湾分别建立了三个乡苏维埃政权，吴焕先亲自主持在车堂庙召开由五个村组成的第一乡苏维埃成立大会。当时在庙门上贴着：“推翻封建陈规，振作精神来革命；按照苏俄新法，解除痛苦为穷人”的对联。这三个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光山南部细吴家召开了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边最高革命政权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曹学楷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吴焕先当选为土地委员会主席。吴焕先在任职期间，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这年冬天，他在箭河搞土改试点，在黄谷畈开办了土地改革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除箭河地区各乡的代表外，还有七里的代表。吴焕先和郑位三两人具体领导了这个训练班的工作。代表们根据会前调查的情况，具体讨论了如何贯彻鄂豫边特委制订的《鄂豫边土地法纲领实施细则》，并由吴焕先执笔起草了贯彻《细则》的计划。会后，在吴焕先的具体指导下，在箭河等地开始了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在分配土地的基础上，吴焕先号召翻身农民起来保卫胜利成果，掀起了拥军参战的热潮。箭河

等土改试点工作的开展，推动了鄂豫边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大大巩固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吴焕先非常关心革命教育事业，他多次到箭河列宁小学讲课，向学生们说明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和土豪劣绅，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并向学生们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他的讲课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〇年，鄂豫皖特委成立以后，吴焕先先后担任特委委员、中共黄安县委书记和苏维埃党团书记等职。他虽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仍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地执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法规。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是他结婚的大喜日子。他按照苏维埃政府新婚姻法的规定，在经过乡苏维埃政府批准后，不用轿，不要人接也不要送，移风易俗地办了婚事。他爱人曹干先（曹学楷之妹）一个人手提花布包从娘家一步一步走来。他们的新式结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群众中传为佳话。

一九三一年四月，正当鄂豫皖边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的代表张国焘来到鄂豫皖。他根据中央指示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开始在鄂豫皖贯彻王明左倾错误。同年十月，红军进行整编，红二十五军组成于麻埠，吴焕先担任该军七十三师政委。十一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担任二十五军政委，不久，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他着力抓了部队的思想建设，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他每到一地，就立即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展宣传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在他主持领导下，部队宣传工作取得显著效果。部队每到一地，他都要求把打土豪得到的东西，除军需品交部队外，其余均分给贫苦农民。他十分注意群

众纪律，发现有铺草没有打扫，东西没有还清时，就让他们做好后再走。

吴焕先与徐向前、徐朋人、曹学楷、陈文候等同张国焘在军事、政治、经济路线上作过多次斗争。张国焘一到鄂豫皖，就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在新集召开强令贯彻他的土地分配政策的会议。吴焕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地主不分田，叫他们搞什么？”回箭河以后，他没有贯彻这一错误政策。张国焘为了把鄂豫皖党政军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借“肃反”之机，把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残酷地杀害了。吴焕先对此极为不满，他说：“哪有这样多反革命？”当张国焘杀害对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有卓著功勋的王秀松等同志时，他坚决反对。由于坚持斗争，他同样遭到打击和迫害。后来，张国焘把他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上撤下来，降职调任鄂东北游击司令。

重建红二十五军 举大别山红旗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向鄂豫皖苏区发动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先左后右的错误领导，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十月，他惊惶失措地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西去后，敌人以十五个师的兵力对苏区进行反复“清剿”，鄂豫皖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留在根据地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处于分散斗争的状态。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为了加强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坚持根据地斗争，担任省委委员和鄂东北游击司令的吴焕先，向鄂豫皖省委建议迅速把分散的红军、游击队、伤病员集中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十一月二十九日，省委在

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接受吴焕先的建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负责组建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吴焕先就把军部、两个师、五个团、两个特务营组织起来。红二十五军的重建，初步结束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革命力量分散和混乱的局面，开始了一个保卫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新时期。

这时，蒋介石以二十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狂叫要“彻底肃清”鄂豫皖红军。一九三三年三月初，敌三十五师一〇四旅进占郭家河。根据省委指示，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从新集以南的野鸡楼出发，向敌人发起猛攻，经几小时激战，将敌全部歼灭，俘敌两千余名，缴获长短枪两千多支，取得了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第一次大胜利。四月间，又在潘家河歼敌十三师的一个多团，在杨四寨附近歼敌三百多。这些接连不断的胜利，使蒋介石“彻底肃清”鄂豫皖红军的计划成了泡影，红二十五军也由七千人扩大到一万三千余人，军威大振。全军指战员都为自己有吴焕先这样一位指挥才能出众的军长，而感到无比自豪和兴奋。

红二十五军的胜利，使根据地局势开始好转。但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却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在“夺回中心城镇”的思想指导下，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决定夺回坚固设防的敌人据点七里坪。在讨论这一决定时，吴焕先、徐海东就认为：“我军兵力不足，给养困难，不能冒然行动”。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战役打响十天以后，由于敌人封锁，后方粮食供应不上，战士们只得以野菜、树叶充饥，而敌人靠飞机空运，粮食弹药源源不断。吴焕先当面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撤围七里坪的意见，但得到的答复是：“一个月不行就再围一个月，非

把敌人围垮不可。”尽管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结果，不仅七里坪没有夺回来，部队也受到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作出撤围的决定。到六月十三日，围攻四十三天的七里坪战役宣告结束。

在七里坪战役前后，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大搞肃反扩大化，特别是在战斗过程中更为严重，弄得人心惶惶。吴焕先从实践中逐步看清了肃反扩大化的危害，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有一次突围时，他发现一个被绳子捆绑的人，跟着部队从敌人包围圈中冲出来。当他知道这人是前几天肃反“肃”出来的“反革命”时，气愤地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并亲自给那个同志解开了绳子。又一次，吴焕先到七十三师布置战斗任务，听见隔壁房间有哭声，他过去一看，是一个十四岁的红小鬼，被打成了“改组派”。他批评了逼供信倾向，把那个小同志领出来留在自己身边工作。当时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的郭述申因为反对轻信口供，反对杀害两个师的干部，被定为“右倾”，撤了职，后来，又被定为“反革命”要处决。负责肃反的人让表态时，吴焕先坚决反对。他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保护了不少同志。

一九三三年七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向皖西转移。因敌兵力强大，又重返鄂东北。在通过黄麻公路时，遭敌阻击，省委和吴焕先率七十五师大部和七十四师一部共二千余人通过公路，徐海东所率后续部队被阻于路东，红二十五军被分割于鄂东北、皖西两地，斗争更加艰难，处境更为险恶。吴焕先率部转战于鄂豫边界之老君山、天台山一带分散打游击。敌人以搜山、烧山、沿途投放毒药、推行保甲制度等手段，妄图使红军与人民分开，把红军困

死、饿死。吴焕先始终神态镇静，无所畏惧。他经常到战士中间，讲全国革命形势，讲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讲得大家喜笑颜开。当时弄不到药，吴焕先就和医务人员研究，用山涧水洗伤，用南瓜瓢敷伤口。部队吃粮很困难，吴焕先饿得脸都浮肿了。警卫员发现后，用小锅给他熬了点稀饭，但他没有吃，端着小锅把稀饭送给了伤员。他这种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

一九三四年元月，为了巩固和扩大天台山游击区，解决粮食问题，红二十五军决定向北在光山陵云寺一带开辟工作。当红二十五军在陵云寺以南之仰天窝活动时，突遭敌三个团的围攻，在敌众我寡和弹药奇缺的情况下，吴焕先亲临前线指挥部队英勇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在红二十五军突围至老君山以南和宣化店附近时，敌人又以四个团的兵力围攻过来。这时，我军的弹药已经打光，只能用大刀、刺刀与敌人搏斗。接着，敌人又放火烧山，我军陷于浓烟烈火之中。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吴焕先镇静地把指挥员找来，将攻围方向、时间、集合地点作了安排。随后，他亲率一个排，一举抢占了洪家河北岸高地，吸引敌人主力，掩护部队突围。两个敌人抓住吴焕先的大衣领子，喊叫着：“缴枪，缴枪！”焕先用力一甩，一个敌人把他身上保存公款的钱袋子撕破了，白花花的银元撒落一地，两个敌兵便急忙去抢。警卫员廖辉和几个战士都机智地扯开自己身上的钱袋子，见钱眼红的敌兵，互相厮打起来，吴焕先乘机带领全排七十三名战士向山下冲去。第二天，突围部队全部在宣化店以东之黑狗寨集中时，他十分高兴地说：这次突围的胜利，证明我们每个同志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都是革命的火种！有这样的火种，红军就会发展壮大。

徐海东副军长所率的部分红军被阻于皖西以后，与皖西的红八十二师合编成立红二十八军，徐海东任军长，在皖西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东南的豹子岩会师。战友相逢，分外亲热。吴焕先和徐海东整整谈了一夜。他们谈分别后的情况，谈战斗的经验教训，当谈到七里坪战役中的损失时，都非常沉痛。根据省委决定，两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军长。他们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今后红军和游击队的行动要“灵活、慎重，不要机械！”作战方针要从实际出发，“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打就打歼灭战！”两军合编后，吴焕先向全军指战员讲话。他说：红二十五军前一时期的斗争，由于领导上的错误，碰了很大的钉子，这是很痛心的。但是，我们从血的教训里面提高了认识，找到了新的、有效的斗争方针，我们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他号召全军团结一致，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而斗争。

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把东北军的半数以上从华北开到鄂豫皖地区，红二十五军遭到敌人总兵力共八十多个团的进攻。为了战胜强大的敌军，吴焕先亲自同从敌占区来的商贩谈话，亲自审问俘虏，对东北军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了解到，东北军的装备虽较我军好，但他们在鄂豫皖人地生疏，不善于山地作战；不少官兵思乡怀土，对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极力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使东北全境在三个月内就沦于日本之手的行径极为不满。吴焕先要求我军采取各种方式对敌军进行政治瓦解工作。他召开瓦解敌军工作的会议，领导制定《哗变士兵优待条例》，组织哗变士兵委员

会，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我军的俘虏政策。根据东北军的情况，战场上喊什么话，他都具体地做了安排。

四月中旬，在我军到达沙窝以南的高山寨时，敌一〇九师一个团又两个营从沙窝出发向我军进攻。我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的指挥下，占据有利地形，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后，一个反击打出去，全歼敌两个营，缴获机枪七十七挺，取得了会师后的第一次大胜利。

当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走到罗山县长岭岗附近时，发现东北军一一五师三个团毫无戒备地摆在一条山坡上，而且所处地形也十分不利。于是，吴焕先和徐海东命令二四〇团团团长带一个营攻击敌人排哨，他俩分头各带两个营向敌人猛攻，集中力量打敌人前面的一个团。战士们边冲锋边高声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的兄弟不要上老蒋的当！”“枪口对外！”在军事压力和政治瓦解之下，敌人纷纷缴械投降。敌师长见势不妙，带一部分人逃命。此战，我军俘敌团长以下三千人，缴获机枪六十多挺，取得了豹子岩会师后的第二次大胜利。

长岭岗战斗之后，为扩大政治影响和解决部队的物资困难，红二十五军进军鄂东，打开了罗田县城，缴获很多。但在进攻英山时，发现敌人增加了兵力，而且碉堡坚固，设防严密，如果冒险硬攻，必然造成重大伤亡。吴焕先同徐海东商量，果断地决定放弃英山，改为奔袭太湖县城。为了达到突袭目的，留下一支小部队佯攻英山，主力昼夜兼程，连续行军二百华里，直趋太湖城。战士们不了解情况，有些埋怨情绪。焕先在行军行列里跑前跑后，边走边做战斗动员。他风趣地说：“同志们，东北军给我们换了装备，可是目前还是缺吃少穿，

英山的敌人又不肯给我们，可太湖的县太爷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大家愿不愿意去领啊？愿意领，就不能怕脚板痛！”焕先的讲话富有鼓动性，捧队的同志听说吴政委在前面讲话，也拄着棍子赶了上来。这天夜里，各部队都提前到达目的地。当敌人还没有摸清我军动向的时候，我军已攻占了太湖，全歼守敌，缴获大批布匹、药品、粮食和武器弹药。全军每人都发了一把雨伞和一块银元，还把许多粮食、衣物、食盐分给了当地群众。

吴焕先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他从地方调到部队后，主动地向进过黄埔军校由中央派来任师长的军事干部姚家芳学习。他又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胜仗和败仗中找出经验教训，所以很快就成为大家爱戴的军政领导人。

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途中献身

一九三四年九月，程子华带着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来到鄂东。十一月十一日，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在花山寨会议上，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

当红二十五军还在皖西时，就听到了要实行战略转移的消息，那时吴焕先说过：不打几个胜仗我们不能出鄂豫皖。转移前夕，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等，在罗山河家冲接见了罗（山）孝（愿）黄（陂）特委的徐诚基、何耀榜两个同志。吴焕先在向他们交待了地下党的关系和秘密联络点之后，着重讲了红二十五军走后鄂豫皖地区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如何坚持斗争

的问题。他说：“我们走后，鄂豫皖的斗争会更加艰苦，你们要以保存革命种子为原则；便衣队要设法向老区发展，等伤病员好后，可以组织几百支枪作为机动部队，打游击和配合便衣队活动，但要避免和敌人的正规军作战，主要对付地主豪绅的民团武装。”最后，吴焕先要他们多加照顾鄂豫皖的红军家属。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红二十五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全军二千九百余人在省委和吴焕先等军首长的率领下，从罗山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开始战略转移。

十一月十七日，我军越过京汉铁路后，由民团把守的寨子一路阻击我们。吴焕先很注意斗争策略，为了避免冲突，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和敌人的地方武装谈判，要求借路通过，互不侵犯。经过耐心说服，谈判成功了。他们让开大路，甚至让我军从寨中通过，大大缩短了行军时间，避免了损失。

十一月底，我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从七里岗通过许南公路，进入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这天正遇寒潮，风雨交加，战士们衣着单薄，冻得连枪栓都拉不开。东北军一一五师和骑兵团已先行到达，封锁了公路，把我军四面包围起来。这时，有个参谋主任贪生怕死，骑着一头黑骡子仓惶奔逃，并大喊大叫：“我们被包围了，过不去了，各自逃命吧！”一时少数部队出现了混乱。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吴焕先一手拿枪一手拿刀，站在公路上振臂高呼：“站住，冲上去顶住敌人，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随后，就举起大刀，喊着“共产党员跟我来！”率领战士冲杀过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红军战士在政委带领下，顶风雨，冒严寒，忍饥

渴，向敌人冲去，就连没有武器的脚夫也拿着扁担参加了战斗。经半日血战，我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突出了重围，绕道通过了许南公路，胜利进入了伏牛山区。这次战斗过后，吴焕先表彰了作战英勇的同志，痛斥参谋主任临阵脱逃的可耻行径，代表军领导做了立即枪决他的判决。这一宣判说明吴焕先治军严整，对损害革命的行为深恶痛绝，赢得了同志们的热烈拥护，使全军受到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

省委根据伏牛山区反动统治严密，围寨较多，创建根据地比较困难的情况，决定部队继续向陕南挺进。在过拐河时，吴焕先指定韩先楚率领队伍抢占河边的一个寨子，敌人也从另一条路上奔来。我军手榴弹、长短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全军安全过河。由于吴焕先的深谋远虑，我军摆脱了敌人步兵和骑兵的追击，跨过了长征路上危险的一步。十二月初，我军从铁锁关入陕，把尾追的敌人甩在后边。接着，在三要司消灭了前来阻击的陕军的一个营，又在洛南的庾家河与敌六十师激战。在这次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都负了重伤，吴焕先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九次冲锋，毙伤敌人八百余人。当吴焕先返回驻地时，发现有些伤员还没有得到安置，而另一位领导干部却在农民家里睡大觉，他十分恼火，亲自把这个干部喊了出来，当场给以严厉批评。

在行军途中，吴焕先骑在马上不是看报就是读书，到达宿营地就察看地形，布置警戒，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他和各级政治工作人员耐心而亲切地向全体战士解释部队的行动计划和作战意图，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对实现从罗山到陕南的转移，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吴焕先出席了在葛牌镇举行的省委

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和其他同志一道，批判了主张红二十五军入川的右倾观点，主张准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加紧建设根据地。会议改选了省委，吴焕先当选为新的鄂豫陕省委副书记。

四月二十日，蒋介石用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向我鄂豫陕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限令三个月内将我军全部消灭。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吴焕先等决定在陕南龙驹寨进行战备整训。五月九日，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遗职由吴焕先代理。

五月上旬，敌人向鄂豫陕根据地发动进攻。吴焕先根据鄂豫皖时期军事斗争的成功经验和程子华所谈的中央根据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战法，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他率领红军战士，每天以八十里、一百里、一百二十里的速度，日夜与敌人周旋，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些战士对这种打法想不通，说：“敌人一条命，我们命一条，为什么不和他们拚？”“敌人跟在屁股后面不打，我们的枪是打兔子的？”吴焕先深入连队和战士交谈，反复向大家解释：敌人多，我们少，不能和敌人硬拚。多跑几步路算什么，我们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叫它听我们的指挥，等把敌人拖疲劳了再回头揍它！到那时谁想再跑也不让跑了。吴焕先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了大家对新的作战方针的认识，使部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六、七月间，接连取得了远程袭占荆紫关，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的重大胜利。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又破产了。

吴焕先十分关心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的行踪。他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也不如缴获一部电台，有了电台就可以听到中

央的指示了。部队打出终南山以后，从缴获的敌人报纸上和交通员带来的消息中，了解到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合，并有北上的动向。根据上述情况，吴焕先于七月十五日在长安县丰峪口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带领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急速向甘肃方向挺进，牵制敌人，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并决定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会后，在吴焕先等的率领下，全军四千余人，怀着“会见党中央，会见毛主席”的强烈愿望，离开陕南向西挺进。

在西进甘肃途中，吴焕先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他要求部队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把红军的优良作风带到哪里，让新区人民群众晓得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工农武装。路过留坝县时，部队住在一座大庙里，当时卫生搞得不好，纪律也差，吴焕先就把有关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进行教育。他说，这座庙宇是我们国家的名胜古迹，我们红军队伍一定要爱护它，搞好卫生，对庙内的一切陈列物品，都不得随便拿动。大家都按照政委的要求做。临走时，把庙内收拾得干干净净。当大家知道这座庙就是西汉名士张良庙时，都说吴焕先这样做法对。

八月中旬，我军进至甘肃的兴隆镇。兴隆镇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在到达之前，部队专门进行了民族政策的教育。吴焕先对全军指战员作了多次讲话，他说：“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民族人民，反对大汉族主义。”并规定了宿营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民经典，不在回民家吃大肉，不打回族土豪，不在回民面前说“猪”等等。部队到兴隆镇之后，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热情帮助群众干活、扫地。吴焕先首先拜访了清真寺，并赠送匾额和礼物。我军的实际行动，扩大了党与红

军的影响，教育并感动了回民群众，当时就有几个青年参加红军，清真寺的阿訇也头顶礼品到军部作了回拜。我军离开时，全镇的男女老少齐集街头，街道两旁摆设香案供桌，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依依不舍地为我军送行。在整个陇东，“红军好”的消息就很快地传开了。

艰难的历程，枪林弹雨的生活，使吴焕先更加热爱自己的部属。他常说，要好好保存我们的骨干，有一天，这些骨干都要成为担负重任的领导干部。在行军途中，他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徒步行军。有一天，他老远见一个战士快走不动了，就关心地问他：“小鬼，怎么样啊，走不动了？再坚持一会吧，快宿营罗！”他走近一看，发现是一个病号，就让通讯员把他的马牵来给那个小病号骑。后来，吴焕先又发现一个病号，就让两个病号轮流骑。他还教育全军营以上干部都这样做。走到西凉一带，他命令营以上干部的马全部集中，让病号和身体较弱的同志骑。有一次，他发现二二三团政委不愿把自己的马给负伤的战士骑，就在全军大会上批评那个政委为“骑马大王”，只顾个人，不关心战士的痛苦。从此，全军干部，以军首长为榜样，更加关心爱护战士，官兵关系进一步密切了。

在胜利进军途中，吴焕先渴望见到党中央、毛主席。他曾向徐海东说：“见了毛主席，咱们还不认识呢！”不幸的是，他在愿望实现之前，就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我军离白水镇东进，冒雨来到泾川城西南渡河。部队刚过一半，山洪暴发，河水陡涨，军部直属队和后卫二二三团被阻于泾河北岸，吴焕先因指挥部队过河也被隔在北岸。这时，敌二〇八团千余人趁着倾盆大雨由

泾川方向突然袭来，企图把我后卫部队压在河边背水作战。在此危急情况下，吴焕先率军部交通队一百五十七人，插向敌人腰部。他向战士们高声呼喊：“同志们，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在他的率领下，战士们不顾泥泞路滑，一鼓作气地冲上前去，抢占了一座制高点，把敌人截成两段。然而就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的吴焕先身负重伤，不久光荣牺牲。战士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人人悲痛落泪，个个怒火万丈，发誓要为政委报仇。他们噙着眼泪与敌肉搏，血战达四五个小时，终于打垮了敌人的进攻，击毙敌团长马开基，活捉四百余人，缴获许多马匹和军用品。部队过了泾河，全军指战员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把吴焕先的遗体掩埋在陇东高原。

吴焕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鄂豫皖边区的早期革命斗争中，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重建红二十五军和实现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的长征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善于作政治工作，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红军的思想建设；他英勇善战，坚定果断，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屡立战功；他以身作则，公而忘私，团结干部，关心士兵，实事求是，执行政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党我军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吴先恩：《难忘的岁月》；《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2. 郑位三：《红色的黄安》；《皖西革命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徐海东：《保卫红色土地》、《会师陕北》；《星火燎原》（二）、（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961年版。

4. 程子华：《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胜利》；《红旗》1978年第8期、1979年第8期。
5. 程子华、郭述申、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回忆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1981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6. 胡树胜、徐春南：《忆军长》；《烈士永生》（第二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
8. 湖北红安革命博物馆、河南新县文管会、河南师范大学政教系调查整理和收藏保存的《红安革命简史》、《回忆鄂豫皖红军的产生》、《忆吴焕先的早期革命活动》、《关于箭河地区党组织建立及发展情况调查》、《箭河四角曹门农民协会建立情况的调查》、《箭河人民参加黄麻起义情况座谈会纪要》等材料。
9. 访问郑位三、郭述申、吴先恩、程坦、张波、林维先、周业臣、汪建中、李金德、王青山、戴德归、周可实、萧德明、戴季英和烈士之弟吴先书等的谈话纪录。

续范亭

药 英 续约斋 郝树侯

十八岁的远征队队长

续范亭，名培模。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日出生在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西社村（现划归定襄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续范亭童年时聪明伶俐，他的父亲由村塾送他到宏道镇川路两级小学堂读书，这学堂是范亭的族兄续桐溪（西峰）筹办的，范亭是这个学校第一班的学生。

一九〇九年，续范亭十六岁，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堂^①，同期入学的还有傅作义等。就在这一年，范亭加入了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纷纷响应。西峰在原平秘密筹办忻代宁公团，并给续范亭去信，要他速归，参加起事。阴历九月初八日，太原新军起义，范亭立即同他的同学赵承授、李生达、王靖国、史宗法、张德枢、续庭梅、樊赓灿等，赶回宏道镇。西峰把他们编入公团，派他们四处招兵，仅十余日，就招募到两千多人。阴历十月初八日，续西峰率部北上，直指大同。年仅十八岁的续范亭被任命为镇远队队长，率兵一

^①陆军小学第五期学生，见荣鸿庐等：《太原解放前山西历届军事学校概况》。

营为前锋。时值隆冬，北风刺骨，山路崎岖，积雪齐膝，公团棉衣给养匮乏，饥寒成为这支新军的最大威胁。战士大都是从四方刚招来的新兵，遇到这样大的困难，思想相当混乱。范亭排除万难，以身作则，走在部队的前边，同战士们一起翻山越岭，经过三天急行军，行程五百里，如期到达大同城下。十月十五日下午，西峰的大部队赶到，浩浩荡荡开进了大同城。在此次军事行动中，续范亭初出茅庐，便显示出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

清兵侦察到公团只有二千余人，且系新兵，立即将大同重重包围，用重炮日夜向城内猛攻。续西峰沉着应战，指挥若定，不断地消灭爬城进攻的敌人。夜间，范亭常常率领敢死队出城袭击敌营，屡有斩获。范亭随公团在大同孤军作战四十余日，机智勇敢，初著战功。

讨 袁 伐 阎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春节，公团回到忻州城内，人民夹道欢迎。这时阎锡山也急急赶回忻州。当阎部到忻州时，公团部队已分散驻扎周围各地。阎见公团军势甚盛，心怀忌惧，遂调西峰到太原任巡警道^①，解散了公团。

范亭对阎锡山解散公团非常气愤，主张将部队拉到口外，重整旗鼓。一九一二年九月孙中山来晋时，劝西峰暂时忍耐养晦。西峰于是辞职回乡，开广济渠，采西山矿，表示不再过问政治。范亭这时也随西峰返乡，到宏道川路小学从事教育工作。

^①袁世凯于辛亥革命后修改官制，改巡警道为警察厅。

范亭在办学期间，注意爱国主义教育，重视实践。教材是他自己编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他的经历和抱负。后来为了深造，范亭于一九一三年考入保定陆军中学。这时，袁世凯的反革命面目已暴露无遗，惨杀革命党人。山西巡按使金永伙同阎锡山秘密派遣警备队一营，到西社村捉拿西峰。一九一四年阴历三月十八日，西峰从家乡逃出，经保德渡黄河，到达陕西榆林井崧生处。范亭闻讯仓卒离校，同行者还有他的同学胡德夫、史宗法等人。五月初，他们与西峰相会于蒲城。范亭随同西峰等到华山居住。

这时，陕西名儒郭希仁在华山讲学。陕西的革命志士，相继而来，共谋革命大事。先后聚集华山的志士们有：陕西的郭希仁、刘守中、刘蔼如、胡景翼、井勿幕、岳维峻、曹俊夫、董振武、史宗法等人；山西的有续西峰、续范亭、李岐山、胡德夫等人。之后，陆续追踪而至者，还有孙岳、何遂、刘冠山、邓宝珊等人。这就是有名的华山聚义。这次聚会，对于年仅二十二岁的范亭来说，受益很大。他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说：“华山数月居，胜读十年书。”西峰、范亭被大家尊为良师益友。

一九一五年初，袁世凯加紧了称帝的准备工作。华山志士分赴各地，集合讨袁力量。续西峰同井勿幕赶赴日本，向孙中山请示。续范亭留在渭北，与邓宝珊、董振武、张义安等人率部联合向西安进军，赶走了袁世凯的忠实爪牙陆建章。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的蔡锷、唐继尧以“护国军”名义起兵反袁。西峰、范亭和李岐山等组织西北护国讨袁军。其计划是：直趋太原，打倒袁世凯的走狗阎锡山，然后协同川滇军直捣北京。

护国军由西峰统率，范亭、岐山指挥。一九一六年四月，

由陕西郃阳(今合阳)渡河。岐山的旧部前来参军的很多，部队的力量大大加强，数日内连克猗氏、临晋、万泉、柴河四城。护国军乘胜北上。但原定计划为陈树藩所侦知，密报阎锡山。阎遂将准备内应的民军和平遥等县的警察先行除灭，并在义军北上途中预作埋伏。当义军通过虞乡时，正值深夜，突然遭到袭击，全军被包围。结果大部分被冲散，牺牲甚多。范亭等突围从潼关返回陕西。这支护国军虽遭阎锡山的镇压失败，但此举震动华北，成为北方反袁战斗中首举义旗独树一帜的部队。

与北洋军阀斗争

袁世凯死后，民国共和国体算是恢复。西峰当选为国会议员。范亭决心在军事方面继续深造，一九一八年，乃进入保定漕河军官教育团学习。

一九一七年冬，陕西胡景翼、曹俊夫响应孙中山，组织靖国军。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特邀西峰到三原策划。一九一九年二月，西峰回陕，寄函保定，促范亭速来。范亭和同学吕季良、楚则先等来陕，任靖国军第四路军参谋，协助岳维峻在渭北一带与陈树藩交战。接着，范亭与弓富魁、续明甫等受西峰委派，前往绥远，帮助卢占魁整编训练，编为靖国军第六路，这支部队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陕西战争前后相持两年之久，范亭时而在前线指挥，时而调兵整训，他胃病时发，仍坚持战斗。一九二一年七月，冯玉祥率第十一师来到陕西，配合靖国军消灭了陈树藩，陕西局面粗定，靖国军改为暂编第一师。范亭这时往返于潼关、洛阳、北京、保定之间，负责联络各军和窥察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动向，因长期奔波，肺病复发，

经同志相劝，到北京西山疗养院医治。

范亭在养病期间，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广泛交结了一些爱国人士，又得到西峰和景梅九等人的赞助，在北京和王振钧、郭春涛、于建琦等筹办《国民新报》，宣传孙中山的进步思想，并组织北京大学学生赵守耿等回晋，筹办平民中学。后来，平民中学成为国民党在山西的一个革命中心。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十月二十三日，原属直系的冯玉祥、胡景翼从滦州前线回师北京，通电主张和平。北京政府曹、吴倒台。段祺瑞在奉系军阀拥护下，十一月二十四日组成临时执政府。孙中山十二月四日到达天津，局势已难挽回。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范亭待孙中山葬事完毕，即到保定，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二混成大队参谋长。这时，关于国民军的下一步战略问题，发生了分歧。冯玉祥要先讨奉，取直隶；西峰则主张先取山西。范亭支持西峰意见，认为国民军的主攻方向应指向山西。西峰商请孙岳任命范亭为国民军第三军第六混成旅旅长。一九二六年初，他率领混成旅攻入晋北，先入广灵，又克应县。这支队伍纪律严明，连战皆捷。但由于国民军其它几路都受到强敌牵制，无法增援，范亭孤军奋战一个多月，被迫撤出山西，转战张北，向大沙漠地带进发，经过千辛万苦，于八月间同冯玉祥部在五原会合。到五原后，得知西峰已于三月二十九日病故于天津，范亭十分悲痛。

这时在五原的兵力，冯玉祥部约六、七万人，追随之来的国民军二、三军约两三万人。九月十七日，在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向陕甘宁进发。部队南下至磴口、石嘴子之间，冯玉祥听信了石友三、韩复榘的谗言，利用石嘴

子地形险要，将国民军二、三军大部缴械。范亭对此很不满意。十一月国民军进入西安后，范亭称病回三原，不愿再与冯玉祥共事。

看穿蒋的真面目

冯玉祥的弱点，正如鹿钟麟、薛笃弼所指出的：“孤行己意。凡事不与左右商酌。不征求高级将领同意。唯以一人一时之盛怒行之。”^①冯玉祥对范亭离去此事后悔不及。他认为范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到西安后，再三请范亭担任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一九二七年，范亭全力以赴地办好军事学校。学校的政治课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主课，政治课与军事课并重。他亲自讲课和带领学生操练。后北伐军打到河南，冯玉祥率部出潼关，部分学生随军东征，范亭暂留西安。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范亭抱着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想法，于一九二八年去南京两次见蒋介石，劝他改弦更张。蒋介石笑他迂腐；但他看到范亭卓犖出众，要聘范亭作参议。范亭看穿了蒋的反动面目，断然拒绝。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后，他愤然离开南京，返回北平居住，心情极度苦闷。

一九三〇年十月，阎锡山反蒋失败，逃往大连。范亭从北平返回太原，联络各方人士，准备召开续西峰追悼大会，并周旋

^①这是1929年5月冯蒋关系破裂后，冯部韩复榘离冯拥蒋，鹿钟麟、薛笃弼从上海用无线电报联名致冯密电中的话。

于驻晋各军之间，企图另辟革命局面。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日本人用飞机把阎锡山送回大同，范亭于是离开太原，回原籍崞县西社村居住。他在失望中曾作过终老林泉的打算。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范亭抛弃了息影家园的生活，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和他的至友兰州绥靖行署主任邓宝珊偕行到兰州，就任了邓的参谋长。

血祭中山陵

邓宝珊、续范亭到达兰州，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惨淡经营，于一九三三年底建立了新编第一军，范亭任参谋长。

邓、续在兰州建军，蒋介石深为疑惧。范亭多次同杨虎城、邓宝珊商议，不听蒋介石关于不准抗日的命令，扛起抗日旗帜，挽救民族危亡，并劝杨、邓对蒋介石不要抱幻想。范亭这些言论被特务发现。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电令免去续范亭的参谋长职务，改委为第一军总参议。从此，他不再有指挥军队的权力。

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范亭对这次大会本寄以希望，要以一个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当局呼吁，要求他们抗日救国。他去南京途中，路过北京，恰遇“一二·九”运动爆发。范亭亲眼看到青年学生可歌可泣的爱国行动，深受感动，因而仗义执言，给宋哲元留了一信，劝他不要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不然将成为千古罪人。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范亭来到南京。在东北沦丧、华北危急，日寇深入国土的严重关头，南京城内却是遍地笙歌，一片“升平景象”，与强敌压境、凄风苦雨的北平，俨然是两

个世界。国民党的五届代表大会已经开幕，范亭和同来的刘定庵、郝梦九住在国民饭店。当时南京的各大饭店都住满了前来开会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他们为了竞选下届委员，互相拉拢，不是请客吃饭，就是看戏跳舞。续范亭和刘定庵想摆脱这令人厌恶的环境，专门搬到一家较小的东亚饭店。范亭为了要求抗日，会见国民党的一些要人。有一次他见到汪精卫，对汪谈了民族危机，希望政府采取抗日措施。汪竟说是夸大事实。国民党的“五大”快要收场了，对于抗战救国的大事却只字不提。范亭对此极为悲愤和失望。刘定庵提议：找几个朋友，一起到孙(中山)总理陵前去哭陵。范亭慨然回答道：“不行！党的堕落，国家的垂危，哭有什么用呢？！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只有热血才能把这些败类冲刷到人类行列之外！”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范亭身穿干净的蓝布细棉袍，外面披着黑色呢大衣，戴上礼帽，手提崭新的手杖，神态十分端庄，说要到某一朋友家谈话。他出门叫了一辆汽车，急驰至中山陵园，然后步入园内。汽车司机在停车场上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钟，仍不见范亭走出陵园，便开车返回城内东亚饭店，询问他是否已经回来。刘定庵和郝梦九知事不好，急坐汽车到中山陵园，跑到总理灵堂之前，看到范亭躺在血泊之中，当即扶他上车，送到中央医院抢救。在他的大衣口袋里，发现在一张血迹斑斑的纸上，写着他的亲笔绝命诗①：

(一)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与世何所求？

① <续范亭诗文集> 第8页、第9页。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二)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
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颯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三)

剑有锋芒刃，士有智勇仁。
自古人与物，体用若君臣。
霍霍小匕首，锐利似军兵。
无求绝东海，宁肯刺国人。

(四)

三岛切腹士，东海大和魂。
悲壮牺牲者，不出王侯门。
宇宙谁为贵，大地我独尊。
无畏精神在，身死国犹存。

(五)

灭却虚荣气，斩删儿女情。
涤除尘垢洁，为世作牺牲。

范亭的壮烈行动，使南京政府十分惊恐。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禁止记者发表此项新闻。不料当天晚上，上海有些晚

报却抢先发表了。中央社不得不在当晚发出一条新闻电报，大意是国民党中将续范亭因忧国忧民，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杀，因抢救得力，幸未殒命，但仍处在昏迷状态中，未脱险境。次日，《中央日报》也不得不发表续范亭自杀经过和有关评论。全国各大报纸相继以显著地位进行了报道，并附刊照片、简历和他的绝命诗。范亭住院期间，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慰问信及慰问电。当年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亲自来院慰问，杨虎城、邓宝珊等都派来代表，协助抢救。宋哲元也来信慰问。次年一月，张学良也到医院看望了范亭。

范亭日渐痊愈，在朋友的劝解和资助下，去杭州西湖休养，刘定庵和范亭妻女陪同前往。一九三六年三月，他在临离南京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感谢各方面人士对他的关切慰问：

国士相期敢客头，
大同世界梦悠悠。
爱人君子将何报？
牛马精神死不休！^①

范亭自杀事件，是对国民党蒋汪集团投降卖国、坚持内战的反动方针的揭露和抗议，激励了人民的抗日热情。

对党的追求

范亭在西湖疗养期间，念念不忘的不是个人的健康恢复问题，而是密切注视着日本帝国主义日甚一日的入侵和全国人民

^① 《续范亭诗文集》第10页。

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在养病的日子里，他买了许多关于辩证法、唯物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是他第一次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使他了解到共产党关于消灭阶级、消灭压迫，使全世界人类走向大同之路的道理；而在中国，即应从抗日救国开始。他联想到他从兰州去南京时，正是红军北上抗日路过甘肃的时候，他在绥署看到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心中同情红军的抗日号召。目下红军已到达陕北，他感到前途无限光明，赞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

这年深秋，杨虎城将军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来杭州香山精舍看范亭，并请他到西北共事。续范亭慨然答应，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由西湖乘车北上。车过南京时，他特意下车又到中山陵园谒拜，作诗一首：

羞见先生面，陵园我又来。
何日擒海寇，献捷祭灵台！^①

车过洛阳时，他听到傅作义在百灵庙打了胜仗的消息，十分高兴；但又听到蒋介石在洛阳调集大军，准备进攻陕北红军，便到洛阳要见蒋介石。蒋介石拒绝见面。范亭气愤地说：“他怕我来一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②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你不要再唱武丑了，已经没人爱听你的戏了！”^③十一月底，范亭到达西安。

①②③ <续范亭诗文集> 第13页、第163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日子，也是范亭一生中的分水岭。这天清晨，忽听枪声，初以为是军事演习。八时左右有号外发出，原来是张、杨二将军举行兵谏，捉住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范亭看到号外，即刻去问杨虎城：是否通知了共产党？能否取得一致行动？杨告诉他蒋介石已被拘留新城，东北军同西北军团结一致，坚如磐石；今晨已给陕北发电报，请共产党速派代表来，共同商议。范亭回到住处，立即写了《拥护张、杨二将军八大主张，呼吁全国团结抗日》一文，登在西安《解放日报》创刊号上。事件发生后，西安全市欢腾，而南京政府亲日派竟下令讨伐张、杨，并进兵潼关，声言要扫平西安。范亭怒火冲天，再提笔写了《讨何应钦》一文，刊于《解放日报》。此后，他又在《解放日报》连续著文，拥护“双十二”的正义行动，反对南京政府亲日派。

在西安事变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同张、杨联合对南京亲日派作了坚决斗争，对被捉的蒋介石也进行了说服教育和斗争，要他答应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在这关键时刻，负责守卫潼关的四十二师冯钦哉，态度暧昧。杨虎城请范亭去说服。范亭于二十日抵同州，知南京政府以西安绥靖主任和陕西省主席的职位作为冯通电反对张、杨的条件。范亭慷慨严肃地忠告冯钦哉：张、杨此次举动，是伟大的事业，必可垂诸史册，永世不朽；你岂可卖友求荣？冯受范亭大义凛然的开导，十分感动，因此没有发出反对张、杨的通电。

在西安事变中，中共代表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战，就放他回南京。范亭起初很不理解，他的老友南汉宸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专从天津赶来协助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南汉宸

给范亭解开疑团，使范亭认识到原来是和平解决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内战，一致抗日，因而深受感动。他直接看到并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大公无私，不念旧恶，仁至义尽的伟大精神。他由此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抗日战争才能胜利，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西安事变解决以后，在范亭要求下，经南汉宸介绍，他在七贤庄同周恩来副主席会晤。周恩来首先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希望他为国为民保重身体，接着向他畅谈了当时的局势和党的方针政策。范亭十分悦服和兴奋。

战斗在抗日反顽前线

双十二事变后，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都很困难。阎锡山在事变时态度暧昧，现在又高喊守土抗战。杨虎城请范亭回太原看看阎的态度究竟如何。范亭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前往山西与阎锡山见面，表达了杨虎城团结抗日的意愿和希望。阎唯唯诺诺。不久，杨虎城被蒋介石胁迫出国，范亭便暂留太原。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委任范亭为第二战区高级参谋，随同阎赴前线督师。当时，日寇大举南进，守卫大同的阎锡山部李服膺军不战而退，日军直逼长城线上。在范亭随阎锡山赶到前线时，日军坂垣师团已进攻平型关。八路军一一五师出敌不意地自灵邱南山向敌人发起攻击，把日寇团团围在十余里长的一条山沟里，消灭了日军精锐的坂垣师团。但是，正当八路军乘胜前进的时候，正面的晋绥军郭宗汾部却迎合阎锡山“保存实力”的意旨，不肯发兵增援，致使敌人的另一股冲破

茹越口，进入关南漏网逃跑了。范亭对此非常痛恨，力主严惩民族败类。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在国民党军队大退却之际，挺进山西前线，并号召全民抗战总动员。在党的支持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了，各党派、各团体一致推选续范亭为主任委员，南汉宸为副主任委员。阎锡山虽然同意成立“动委会”，但只准在他指定的几个县内动员。不久，日寇由石家庄进入山西，阎锡山本人于十一月四日晚间退出太原，太原城于十一月八日陷落。

“动委会”在敌后很快建立了一支抗战武装力量，还收编了一些阎锡山撤退时的溃散兵力。范亭把这些部队编成十个支队，亲自训练，亲自给战士上课。正当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壮大时候，阎锡山却命令把十个支队缩编成六个支队，只准在岢岚、五寨、神池、河曲、保德五个县内活动，又任命续范亭为第二战区保安司令。一九三八年，范亭在岢岚一带团结官兵，抓紧训练，积极作战。五寨驻扎的敌军主力，筑有坚固的工事，范亭率部深夜袭击。顶条坡一战，消灭了敌人数百名，其余龟缩在五寨城内，不敢外出。这时，阎锡山来电，要范亭参加秋林会议。

秋林会议召开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参加会议的主要是阎的高级将领，新军决死纵队负责人薄一波、韩钧等也应召出席。会议的第一天，阎锡山大讲“唯中论”哲学和“无条件存在”、“狡兔三窟”的谬论。范亭当面驳斥，大声疾呼：只有坚持抗战，中华民族才能存在；不坚决抗战，不抗战到底，根本谈不到存在。薄一波和韩钧等人在会上都拥护续范亭的主张，和他一致行动。会场上斗争十分激烈。范亭痛哭流涕，慷

慨陈辞。阎锡山十分尴尬，会议草草收场。事后，阎锡山对他的亲信们说：“续范亭是背上棺材抗战的，我们不能背上棺材抗战”。^①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为了打击革命力量，命令解散“动委会”，取消第二战区保安司令部，将司令部所属六个支队缩编为暂编第一师，下辖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十四四个团。任命续范亭为师长，郝梦九为政治部主任，并密令二区专员杨集贤严密监视暂一师的动向。阎锡山把续范亭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进一步缩小，地方的政事也不能过问了。为了抗日大局，范亭领会毛泽东同志关于“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教导，着手改编军队。他请求八路军派来一批政工干部，协助暂一师进行整编。

阎锡山对暂一师的打击并未停止，不仅从外部施加压力，而且从内部分化瓦解。他首先收买了政治部主任郝梦九和四十四团团团长冀聘之，在暂一师内部制造摩擦，挑动四十四团哗变。后来四十四团终于被拉走叛变了，范亭非常气愤，他选了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深夜，率领三十六团和三十七团包围了四十四团。冀聘之一听枪声就翻墙逃跑了。四十四团士兵跟随续师长，当晚返回原驻地。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十二月十六日，阎声言要亲来兴县蔡家崖主持紧急军事会议，电邀范亭参加。这个会议是极端秘密的，事实上阎并没有来，仅由赵承授传达了阎的命令：在消灭决死二纵队的同时，要在“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的基础上，进一步消灭八路军一二〇师驻在

^① 《续范亭诗文集》第98页。

晋西北的部队以及地方抗日武装，把共产党在山西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范亭听到此处，义愤填膺。当会议讨论具体部署兵力时，他乘赵承授、郭宗汾去观察地图之机，离开了会场，看看四周无人，便跃上战马，奔向临县史家庄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彭绍辉的旅部。他见到旅政委罗贵波，即将军事会议的内容告诉他。旅部当时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罗贵波很是焦急。范亭看到这种情况，即向罗表示：把暂一师开上去打。他说，暂一师是在中国共产党具体协助下组织起来、成长壮大的抗日武装，彭旅和暂一师是亲兄弟，岂能坐视不救！范亭驰回师部，立即发出命令：所有各团立即星夜出发，经岢岚急速开往临县，支援三五八旅，反击顽固军。

范亭全师前进。刚入临县境内，就和大批顽军遭遇。顽军的先遣队正是续的侄儿续靖夫师。续靖夫发现前边和他对垒的不是八路军，而是叔父续范亭部，急忙下令：“各路停止前进，按原路向后撤退！”顽军很快撤走。我军在此事件中没有受到丝毫损失，续范亭在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有力地打击日寇，防止顽固军袭击，续范亭根据上述形势，决定把队伍集中到地势险要的赤坚岭。赤坚岭位于方山、岚县之间，是通往临县的要道。范亭率领三十六团、三十七团占领了赤坚岭。这时彭绍辉、罗贵波率领的八路军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决死四纵队，也先后到达赤坚岭，这是晋西北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会师。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各部队的负责人共同研究决定：成立山西新军临时总指挥部，续范亭担任总指挥，罗贵波担任政委。

一九四〇年元旦，新军总指挥下令向顽军赵承授、郭宗汾等部反击。新军以赤坚岭为基地，分左右两路：一路是决死纵

队三个团，先攻方山，后打临县；一路是暂一师，直捣临县。范亭为了民族的利益，同他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赵承授开战了。他日夜坚守在指挥部，带病指挥战斗。

一月十四日，八路军和新军在临县胜利会师，续范亭率领新军总指挥部进驻临县城。在临县城召开的庆祝胜利会师大会上，范亭报告了战斗经过和反顽胜利的重大意义。新军总指挥部宣告正式成立，直辖决死二、四纵队，暂一师和工卫旅，由续范亭担任总指挥。不久，一二〇师的主力部队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的带领下，从冀中平原赶来，在临县县城和范亭会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路军和新军的艰苦奋斗，创建、巩固和发展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初成立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贺龙为主任委员，关向应、罗贵波、续范亭为常委。接着成立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范亭被推选为行署主任。其后晋西军区成立，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贺龙为司令员，续范亭为副司令员。

这年冬天，日寇向根据地开始冬季大扫荡。范亭率领行署机关日夜行军，艰苦奋斗，积劳成疾，胃病、肺病复发，终于病倒了。后来，根据党的决定，他到延安疗养。

在 延 安

一九四一年五月，党中央接范亭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疗养。经医生详细检查，发现他的左肺已经大部分溃烂，加上严重的肠胃病，情况相当危险，必须长期疗养。党中央对范亭的病情十分关注。同志们听了也都很焦急。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医药极端困难。周恩来、彭真等，都设法给他购买

药品。所有这一切都使范亭感到极大安慰和鼓舞。经过医生精心治疗，到十月份，他的肺叶溃烂部分有了钙化点，病情有所好转，饭前饭后已经能下床散步。党中央为了使他早日康复，请他从白求恩国际医院移住枣园休养。

一九四二年“七七”纪念后三日，朱德总司令来枣园看望续范亭，并请他到总部所在地南泥湾休养。他随总司令一道，乘车离开延安。同车偕行休养的还有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诸位老人。续范亭在延安医院养病期间，曾同徐、吴、谢以及林伯渠共同学习，互相鼓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德把范亭等四老安排在南泥湾陶宝峪休养所。范亭休养了半年，大见成效，一九四三年又回到延安附近的少陵川口梅园。这一年，党把范亭的夫人由西安接到延安以便照顾。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已经能骑马慢行。

这年“五一”节前一日，范亭度过了他一生中难忘的一天。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邀请范亭和几位同志，到他的窑洞中小宴。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范亭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并讲了些有效的疗养方法。饭后，范亭坐在毛泽东身旁，两人畅谈身世，并讨论大局。范亭问毛主席年岁几何？毛泽东回答：今年已过五十周岁。范亭说：“三十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①即席赋诗一首：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②

①② 《续范亭诗文集》，第27页。

五一节过后，前方军事形势日益紧张，日寇和阎锡山顽固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战斗激烈。范亭得知后，忧心如焚，加之连日劳累，身体大不如以前，因此于七月份又返回和平医院治疗。医生要范亭整天躺在床上静养，特为他准备了一副带风篷的担架，有时把他抬到阳光下面，晒晒太阳，舒舒心境。

一九四六年秋冬，蒋介石命令他的嫡系胡宗南部，准备进攻延安。延安的一部分机关人员向后方疏散。毛泽东来到和平医院，劝范亭暂时离开延安。十一月间范亭由延安转移到绥德。年底随部队渡河到山西的临县都督村居住。这里属晋绥边区，环境幽静，有山有水，是一处养病的好地方。直到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他逝世之前，就在这个地方休养。

范亭在延安养病，前后达六年之久。疾病使他不能再出入疆场，冲锋陷阵，但他从未离开战斗岗位。即使在伏枕咯血之时，也没有忘怀国难的深重以及晋绥根据地人民的艰苦战斗。一九四二年春，日寇连续向我晋西北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我根据地的人民夜以继日地同敌人激战。这一年，贺龙曾两次返回延安，看望范亭，向他陈述战地情况。范亭听了心情激动，提笔写道：

我亦能驰马，足迹遍汾河。
我亦能杀贼，誓不渡黄河。
中途掉队人，久病奈如何？
.....
遥望管涔山，使我恨无端。

多少英雄去，多少英雄还。①

一九四三年七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用碉堡政策围困边区。调集重兵直指延安，范亭强撑病体，写下了《警告中国抗战营垒内的奸细分子》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解放日报》记者在篇首写了按语说：“我们读了范亭先生的文章和这封信，心里非常感动。……血泪之富，不敢更动一字，以存其真”。② 一九四四年八月，阎锡山勾结日寇投降卖国，事已垂成，范亭发表了著名的《寄山西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痛斥阎贼出卖民族，压迫人民的罪行。毛泽东看后说：“廉顽立儒振奋人心，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他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一面流泪，一面吐血，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汗流如雨。他把一个矮桌放在床上，伏在上面写一会儿，支持不住时，便躺下休息一会，又挣扎坐起来，再写几句。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候又气愤，又痛苦，按身体情形，本来是应该搁笔的，可是搁不下来。”③ 《寄山西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这篇文章写完之后，他又吐了血，一直经过两个月之后，才慢慢恢复。医生劝他暂时停止写文章，他说：“那怎么行啊，我看到蒋介石、阎锡山每一个卖国罪行，又是气愤又是痛苦。你们看，我躺在床上，不能走，不能喊，不能动枪杆子，如果再不动一下笔杆子，难道我不管抗战，袖手旁观么！？”“我气愤，我不能不写。”④ 这几年里，他写了《三年不言之言》、《忠告国民党当局及其画策者》、《号召

①② 《续范亭诗文集》第 35、36、81 页。

③④ 《续范亭诗文集》第 165、166 页。

山西人民推翻万恶无耻军阀阎锡山》、《抗战六周年七七感言》、《寄晋西北同胞及诸同志》、《秦桧归来》等文章。这些文章充满了热血战斗的精神，淋漓尽致，义正辞严，为全国人民传诵一时。他在病中，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其它论抗日战争的文章。他相信，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在他写的文章里，充分反映了这种信念和一往无前的气魄。在他从延安转移的那天，他还对同志们说：“毛主席写《论持久战》，没有一句是落了空的，这一次战争，一定也脱不出毛主席的论断。”^①他就是这样充满信心地展望着未来。

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伟大的整风运动。续范亭自觉自愿地参加了这次整风。他随身带着二十二个文件，细心研究，成为自己改造思想的武器。他说：“出身于小资，遍体多油腻，湖水涤难尽，延河洗不去。二十二文件，是我新武器，革命称至宝，应比匕首利。”^②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整顿三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关于调查研究、自我批评等文章，和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他把学习马列主义以及毛泽东等的文章视之为“大文如大餐，丰富复精美，使我饥肠人，欲罢不能已。厨师费匠心，消化全凭你。本是百年粮，贪多怨自己。”^③在边区六年，他深受党的信任和人民的爱戴，一直是参议会议员。一九四五年夏季，他又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他亲眼看到解放区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当家做主的情景。通过学习，通过现实的对比，使他更加坚定明确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①②③}《续范亭诗文集》第169、55、51页。

国，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人类终究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我觉得世界上除了真理之外，再没有任何权威可以使我们屈服。”^①他彻底否定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明确坚定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如他的诗篇中说：“立场不定求真理，差以毫厘谬万里”，“羞为权门称大将，原来穷汉是知己”^②，“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③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一九四七年八月底，范亭在都督村休养，病情不断恶化。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许多首长，纷纷来信慰问，询问病情，并把解放战争的胜利捷报告诉他，希望他安心养病。晋绥党政军各方面，都派来了中西名医为他医治，均不见效。九月十二日，范亭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七岁。

范亭临终前写给党中央的遗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

范亭自辛亥革命以来，即摸索为民族和人民解放的真理，奋勇前进，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和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七七抗战之后，即欣然接受领导，参加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建设工作，想从

①②③ 《续范亭诗文集》第52、12、45页。

此更好为人民服务，以偿平生夙愿。孰料范亭方奋力以赴之时，竟以身染重病，去延休养。在延数年，蒙党百般爱护，尤觉欣幸者，得以时常聆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范亭奋斗一生，始于今日目睹解放区广大人民的真正翻身，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荣前途，每自不禁感奋，热泪夺眶而出。屡欲请求入党，作一名革命军的马前卒，以终余年，但以久病床褥，迄未提出。现范亭已病入膏肓，恨不能亲睹卖国贼蒋介石集团之行将受审，美帝国主义之滚蛋，与全国人民之彻底解放，是为憾耳。范亭数年来愧无贡献，然追求真理之志未尝一日或懈也。在此弥留之际，我以毕生至诚敬谨请求入党，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历史，是否合格，如承追认入党，实生平之大愿也。专此谨致布尔什维克敬礼！

续 范 亭^①

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复电接受续范亭的要求，追认范亭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电文如下：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分区司令部并请转范亭同志家属：

接电惊悉范亭同志病故噩耗，至深哀悼。范亭同志早年参加同盟会，即献身民族民主的革命事业，百折不挠。在抗日民族战争期间，领导山西新军为坚持

① <续范亭诗文集> 第4页。

山西抗战与山西民主化而奋斗，功在国家。范亭同志在弥留之际，遗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革命忠忱，实令人感奋。本党决定接受范亭同志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以此引为党的光荣。望我晋绥边区党政军各方同志一致努力，继承范亭同志遗志与晋绥人民团结前进，发展与巩固晋绥解放区，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并望范亭同志家属节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十三日^①

同一天，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发出通告，决定各机关停止娱乐一周致哀，并成立了续范亭治丧委员会，由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吴玉章、谢觉哉、王维舟、马明方、张稼夫、武新宇、周士弟、甘泗淇、陈漫远、赵林、罗贵波、陈希云等为委员。

九月二十六日，西北各界在临县都督村举行了追悼大会，由林伯渠主祭，杨明轩读祭文，谢觉哉报告了续范亭的生平，贺龙、吴玉章、赵寿山等讲了话。

十月十八日，在临县庄严地举行了续范亭的葬礼，吴玉章主祭，并冒着大雨步行送灵。各机关的同志争着抬灵柩，送灵队伍长达数里。周围几十里路的群众，赶来参加到送灵的行列内。农民和退伍军人都纷纷路祭，他们都十分悲痛地低垂着头。到达墓园后，按当地的风俗习惯，一排排跪在范亭的灵前，有的点点垂泪。墓前放着毛泽东派专人从河西送来的花圈

^① 《续范亭诗文集》第3页。

和挽联，上面写着：

范亭同志千古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毛泽东敬①

毛泽东的挽词，高度概括地评价了续范亭的一生。

全国解放后，山西省人民政府将续范亭的遗体安葬于太原南郊双塔烈士陵园。为纪念先烈，教育青年，还将原崞县中学改为范亭中学，在校中特设纪念堂，朱德委员长为纪念堂亲笔题字，以志荣哀。

续范亭既是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的革命将军，又是一个热情横溢、朝气蓬勃、慷慨悲歌的革命诗人。他不仅用军人的刀剑和枪炮冲杀敌人，同时又用他那枝犀利的笔作为向反革命进行战斗的武器。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而且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诗篇。他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① <续范亭诗文集>第1页。

古大存

杨清 杨苗丽 杨森

正直的少年

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古大存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梅林乡优行径村。他原名永鑫，别字斛咸，读中学时才改为大存。

大存的父亲名叫古化，初时生活十分贫困，后做小贩赚了些钱，在梅林墟镇开了一间“恒昌”店，经营杂货，兼酿酒、磨豆腐和宰猪，逐渐富裕起来，还买了十几亩田地，每年可收三百多担稻谷，成为当地较大的地主。古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前妻刘氏，生下儿女六人；刘氏死后续娶陈氏，又生下儿女三人。大存是陈氏所生，排行第七。

大存的母亲陈氏，出身于贫农家庭，是个勤劳能干的农家女。她到古家后，由于出身贫寒，常常受到歧视。家中其他成员往往制造各种事端，恣意辱骂她。她常常教育大存长大了不要象他们那样，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陈氏平日同情穷人的疾苦，有时还背着家人将家中米饭送给他们。乡亲们都很敬重她，称她为陈四叔婆。母亲的言行，在大存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九〇二年，大存开始读书，先进本村私塾，后转入梅岗

寺学堂。他喜欢跟穷苦人家的子弟结交朋友，一起上学，一起游戏。穷孩子们碰到困难，大存总是热心帮助。

一九〇六年秋收时节的一天，大存与同学古伯欧一起放学回家，路上看见古伯欧稻田里有鸡吃谷，便说：“伯欧，你家稻田里有鸡吃谷，快把它赶走！”古伯欧说：“这是‘德国王’的鸡，我不敢赶。”原来，村里有个恶霸地主古锡侯，自称“德国王”，依仗钱势，在村里横行霸道，欺压人民。许多人对他的胡作非为都敢怒不敢言。大存想了想，说：“不要怕，我来处置它！”他急忙回到村子里借了一支火药枪，对准鸡群接连开枪，打死一只，其余的也吓跑了。“德国王”闻讯赶来，怒气冲冲地斥问大存：“我的鸡头上长有‘王’字，你不怕王法，竟敢把它打死？”并声言要大存加倍赔偿鸡钱。大存和围观的群众一起愤怒指责“德国王”。他自知理亏，只好装腔作势地骂了几句便溜走了。

当时，封建势力的房姓斗争（即封建宗族斗争）很严重。在学校，强房大姓的学生常常欺负弱房小姓的同学。大存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满，他虽然出身于强房的家庭，但他主持公道，反对强房大姓的同学欺压弱房小姓的同学。一次，大存的同学魏德琴和两个姓甘的同学，在池塘里捞到一些鱼虾。姓甘的两个同学自恃是大姓，想独占鱼虾，不分给魏德琴。魏德琴不服气，互相争执起来。大存见到了，便主张说：“鱼虾是三人捞回来的，应当三人平分。”姓甘的同学开始不愿意，大存气愤地说：“你们想恃势欺人吗？办不到！”说罢，便主持公道，将鱼虾平分给三人。

一九〇七年，大存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兄嫂们随即将大存和他的母亲分了出去，给他们“三斗种田，几块坝地，

二个房间”，要他们“自行过活。”^①由于交不起学费，大存只得停学在家放牛、打柴、种地。十三岁那年，他又到梅林墟一间中药店当了一年司药学徒。两个狠心的哥哥嫂嫂对大存和母亲的虐待，加深了大存对权势者们的不满。

大存的六哥古柳春，曾在广州读过高级师范学校，受过新思想的影响。他在五华县安流镇三江书院教书，为人正直诚恳，对兄嫂们虐待后母和弟弟极为不满。他见大存聪明好学却失去读书机会，感到十分惋惜，便于一九一〇年把大存接到三江书院读书。古柳春对大存学习要求很严。他学识渊博，教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大存发奋读书，成为该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很受师长器重，经常把他的作文贴在学校墙壁上，供全校同学观摩学习。一次，大存写了一篇论五华县城从华城搬迁到水寨的文章——《迁启》，被选到五华县城张贴，受到普遍好评。

在学校，大存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他喜欢吹笛子，踢足球，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三江书院有些教师曾到过广州读书，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比较进步，经常在学生中散发进步报刊《民报》，传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大存对《民报》上的文章十分感兴趣，如饥似渴阅读，从而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一定的了解。当三江书院发动剪辫运动时，大存首先剪去辫子，然后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动员群众剪辫。后来，大存还带领几个同学到学校附近的鹅池塘、梅子坪等村庄开展调查，了解农村封建特权的种种表现，并将调查材料综合起来，在学校和农村中宣讲。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农村调查，使大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回忆说：

^①古大存《自传》，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由于反对秀才、绅士的特殊权利，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和贫苦农民结合在一起”。^①从此，大存更加憎恨横行霸道的地主豪绅，同情贫苦农民，关心群众疾苦。

踏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一四年，大存在三江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原想继续升学，但因家贫交不起学费，只好回家种田。同年，他与童养媳徐妙娇结婚。后来，他在家乡担任了两年小学教师。

为了继续升学，大存向哥哥嫂嫂开展斗争。他指责哥哥嫂嫂以分家为借口，独吞父亲留下的家财产业。他表明自己并不想重分家财，只要求供给升学学费。在大存的斗争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兄嫂们只得答应大存的要求。一九一七年春，大存进入梅县梅州中学继续读书。

梅州中学从一九一四年起定为省立学校。学校大权由顽固的封建保守势力掌握，他们不准学生过问政治，不准学生谈论新思想。但是，大存不顾学校当局的禁止，经常组织一些爱国学生讨论社会问题。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梅县县城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开展了反帝爱国活动。大存和其他爱国学生一起，积极参加上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声讨北洋军阀卖国罪行，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广州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也开始创办刊物，组织团体，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存对此十分向往。他在梅州中学毕业后，决定到

^①古大存《自传》。

广州继续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是，他要求兄长继续供给读书费用。他的五哥古永铎答应让他继续升学，但要以报考法政学校为条件。大存虽然不想读法政课，但为了达到去广州学习的目的，只好答应报考这所学校。

一九二一年春，大存考进了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法律科。由于在学习法律条文时，往往可以联系到人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现象，使大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他认为繁琐的法律条文，只能起到维护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作用。学校除了学习法律外，还学习政治经济学。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成员陈公博，兼任法政学校的教员，他在讲授政治经济学一课中，有时联系社会中的具体问题，向学生讲解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大存很感兴趣。特别是当时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先后三次到法政学校演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几种社会主义？”“应该采用何种社会主义？”使大存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他开始信仰社会主义。此后，大存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劳动者》、《群报》等，思想觉悟逐步提高。

在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对古大存影响最大的是共产党员沈春雨。^①大存与春雨本是同班同学，但初时接触交往并不多，只是在一次假设法庭辩论后，他们才逐渐结成至交朋友。法政专门学校每星期举办一次假设法庭，让学生根据法律和自己的观点进行审判和辩护。有一次，假设法庭处理这样一宗案件：一群上山砍柴的贫苦农民抢劫了一个过路商人所带食物，构成了强盗罪。这个案件涉及到保护私有财产权及人的生存权问

^①沈春雨，又名沈厚培，中共党员，1927年牺牲。

题。假设法庭审判时，古大存担任被告的辩护人。按照法律规定，以强盗手段侵犯他人财物者，就要构成强盗罪。但大存在辩护中却认为，在山上砍柴的贫苦农民，由于饥饿才夺了商人的食物，在生存权利上不应称为犯罪行为。在这次辩护中，古大存虽然没有最后得到申诉，却得到沈春雨的支持和鼓励。春雨认为大存为人耿直，富于正义感，便决定争取大存参加革命。他向大存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大存十分钦佩春雨的见识。此后，他们的交往逐渐多了。在春雨指导下，大存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书籍，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他坚信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古大存逐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于一九二四年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忘我的战斗精神，投身到党的事业中去。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党组织派古大存等人到广州的五华籍青年学生组织的同乡会中开展活动，组织了一个五华青年同志会。古大存负责主编《春雷》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同时，古大存等人还通过五华青年同志会和五华同乡会的关系，跟五华的中学教师、学生和农民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活动。在广州的古姓人经常在古家祠集会聚谈，古大存便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宣传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古大存在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学校推荐古大存到广东南雄县任推事法官。但是，古大存不愿当官，决心投身革命斗争。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

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决定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盘据于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为了发动东江广大群众积极支持东征，广东政府招考一批东征军战地宣传员，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杨匏安通过沈春雨动员古大存报考，古大存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同时参加应考的共有四十多人，最后录取了古大存、吴雄华、方云程、辛子基等七人。

一九二五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式任命古大存等七人为东征军战地宣传员，组成中央政治宣传队，以古大存为负责人，随粤军张民达师出发前线，到达淡水。这时，淡水镇已被东征军攻克。但敌军仍在附近集结残余力量，企图反扑，淡水仍在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之中。古大存不顾疲劳和危险，带领宣传队进入该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和各界群众大会，号召各界人民组织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陈炯明军阀。宣传队沿途还协助组织农会、工会和商民协会等组织。东江人民群众迅速发动起来，大力支援东征，为东征军运输武器、粮食，为东征军作向导、侦察敌情。在东江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东征军先后攻克了东江各县，击溃了陈炯明的主力，陈军残部逃入福建。

古大存随东征军抵达梅县后，向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军校代表廖仲凯汇报了工作。此后，宣传队分散到各地活动。大存到五华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主办的训练班学习。由于东征军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回师广州，讨伐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被击败的陈炯明残部又乘机重占东江。七月，党组织派古大存回五华县，组织群众武装，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

一九二五年十月，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当时，陈

炯明所辖林虎部陈兵在五华锡坑一带，妄图阻击东征军前进。东征军想强渡五华琴江袭击敌军，但因敌军炮火猛烈无法实现。这时，古大存向东征军建议派兵一部，取小道绕大田、潭下、湖田包抄华城。东征军在农民军的带领下，迅速攻占了华城。锡坑一带敌军因腹背受击，被东征军击溃。

早期农民运动的领导者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党组织决定古大存回五华县领导农民运动。

还在一九二五年底，五华县已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宋青为特支书记。古大存返回五华工作后，担任了五华特支的组织委员。当时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许多决定都利用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去贯彻。古大存对县党部进行了整顿。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华县代表大会上，古大存等共产党员被选为县党部委员。国民党五华县党部里，共产党的力量占了优势。古大存与宋青一起，还对县农民协会进行整顿。在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全县大部分区乡都成立了农会；一九二五年六月，五华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由于农会里混进了一些不纯分子，特别是农会长魏宗元脱离群众，利用农会的名义推荐自己的兄弟当官，并贪污农会公款，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从而影响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二月，古大存、宋青等主持召开了五华县农民代表大会，将魏宗元开除出农会，选举宋青为农会长，古大存为副会长兼军事部长。为了加强农民运动的工作，县农会在各区设立了农会办事处，整顿和发展乡农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并严密和扩展了农会的核心组织——“大

同会”。古大存认识到，只有加强农民武装，才能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农民运动才能得到发展，因此把第二次东征前成立的农民自卫军加以整编，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第一大队。此后，五华县农民自卫军在古大存的领导下，积极支持各地农民开展“二五减租”等斗争，惩办破坏农民运动的地主分子。

农民运动的发展，使地主阶级十分痛恨。一九二六年春，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地主豪绅依仗县长胡諄的支持，勾结奸商，提高粮价，大量运输粮食出境。为了打击地主阶级的阴谋活动，中共五华特支和五华县农会领导全县农民，开展了一场禁止米谷出口的斗争。

四月，古大存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在五华城万寿宫主持召开了各区乡农、工、商代表大会，决定由县农会发布“禁止米谷出口，不准抬高粮价”的布告。但是，地主奸商违抗农会的禁令，千方百计偷运米谷出境。古大存当机立断，决定进行武装阻拦。他带领农民自卫军三个中队二百多人到河口驻守，严加查缉，扣留了私运粮食出境的四百多艘船只。地主奸商见水路封锁严密，又由陆路偷运，但古大存早已布置农民自卫军戒备，陆路偷运的粮食亦被截获。这时，反动县长胡諄竟联合豪绅地主、不法商人向东江各属行政专员公署和省政府诬告农会非法拦劫运输粮食，破坏工商，扰乱民生。国民党派了涂思宗团到农会拦阻谷米出境的河口坐阵，准备镇压，与古大存率领的农民自卫军隔河对峙。

面对这一情况，古大存冷静地采取对策。他一方面增派一千多名农军加强驻守河口，一方面写信给涂思宗说明真实情况，争取涂思宗同情农民。涂思宗见农军势大，不敢轻举妄动。他收到古大存的信后，即过河与古大存商谈，决定由各方

派代表在五华县城开会解决。会上，地主奸商诬蔑农会，胡淳指责农会行使政府职权是僭越行为。古大存针对这些诬蔑攻击，一一加以驳斥。他指出：农会是在县长支持地主奸商贩运粮食、哄抬粮价的情况下，帮助政府维持社会秩序，这是不容指责的正义行为。经过三天的辩论，胡淳和地主奸商被驳得哑口无言，涂思宗最后也只好说：“农会做得对，对维持社会秩序有利。”^①会议中，古大存进一步提出：“禁止米谷出口事，应由县长解决，具体办法由农会提出。”^②狡猾而又愚蠢的地主和县长，一听到由县长解决，立即表示赞成；但当他们弄清楚“具体办法由农会提出”是什么意思时，已经晚了。结果，县长只得按照农会的规定办理：扣留的粮食凡属本县地主奸商的一律没收，并以低于一般市价卖给农民，所得款项一半归农会安排使用，一半拨给县政府做经费。斗争遂以胜利告终。通过这一斗争，农会的威信空前提高，农民自卫军也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广大农民把农会看成自己的靠山，五华农民运动于是进一步发展起来。

一九二六年五月，古大存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后，中共广东区委委员杨匏安召集代表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提出在农民斗争中注意发展共产党员，并介绍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的形势变化情况，要求大家警惕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对他们的各种破坏，必须作坚决的斗争。古大存联系到五华县长胡淳对于农民运动所采取仇视态度，进一步认

① <1961年11月古大存同志访问老苏区谈话记录>，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② <古大存回忆录>，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2期，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识到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面目，意识到进一步加强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的重要。会后，古大存根据胡淳所犯罪行，以县党部名义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报告，控告“胡县长摧残党务及不法行为”。广东省党部认为古大存的报告“有充分理由”，便致函“省政府将该县长撤职”。^①后来，胡淳的县长职务虽未被撤，但已狠狠地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

这一年夏收时，五华县农会领导农民全面开展了“二五减租”的斗争。以张谷山为首的地主豪绅组织了“资本团”，由大地主李树眉任团长，进行顽抗。他们把流散在附近的陈炯明残兵收集起来，组成一千多人的反革命武装，在流氓小头目张九华指挥下，为地主进行武装收租。

为了反击地主阶级的进攻，五华县农会决定由古大存负责建立农民自卫军常备大队，从各乡农民武装中精选了五百多青壮年组成。各区乡接着成立常备中队。全县共组织了农民常备武装二千多人。古大存还写信给彭湃，汇报五华农民斗争情况。彭湃复信说：“资本团”在全国还未见过，可见五华地主是最反动猖狂的。表示支持他们同“资本团”作坚决斗争。十月间，中共广东区委派出黄埔军校毕业生李斌、贺教民等到五华县担任农军的领导或教官。十一月，古大存又建立了五华县农民自卫军模范队共五十多人，任命李斌为队长，以训练农军骨干。为使农军得到武器，古大存又带领农民自卫军收缴了地主的一些枪枝，并办起了小兵工厂，修理和制造枪弹。

地主武装收租，农民则进行武装抗租，斗争日趋激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张九华带着反动武装开始对农民武装进攻，

^①1926年《中国国民党省党部党务月刊》第6期。

所到之处实行烧杀抢掠，从双头步步进迫华城。古大存即率领农民自卫军予以迎击，不仅打退了敌军，还将敌军追赶至双头。敌人龟缩在双头一座大屋“道安楼”里，凭险固守。农军一时无法攻坚，古大存当即传令对敌军实行围困。后来敌军趁春节期间农军放松警惕半夜逃跑出来，接着在潭下村对农会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古大存乃率农军移扎于百安，与敌军对峙。

农军与张九华匪军经过几次交锋，双方伤亡很大。由于长期两军相持，农军的武器、粮食供给发生困难，而且大批农民参加战斗，影响农业生产。针对斗争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五华特支开会研究，决定派人跟“资本团”策划者张谷山和反动县长胡淳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功，则待机扣押张谷山。古大存根据特支的决定，对张谷山和胡淳发出邀请。

古大存首先对县长胡淳说明农军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而组织的，为避免双方损失，农军愿意停火撤出，但必须首先解散陈炯明军队残余，并由县长向“资本团”募集八万元救济被害农民。胡淳是个财迷，听到募集八万元，认为可以从中捞一把，便欣然同意。张谷山绰号“土皇帝”，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曾任胡汉民的秘书、增城县县长，一贯依势逞强、包揽五华县政。此人诡计多端，估计请他参加谈判可能不来，古大存便亲自出马，直入张谷山家中，向他说明来意。张谷山毫无准备，不知所措，只好答应同往华城“与县长共谋”。^①会上，古大存提出关于解散张九华武装等方案，指出这支陈炯明残部的存在是非法的。张谷山支吾其词，不肯答应，胡淳则又改口

^①《古大存回忆录》。

诬蔑农会种种不是。古大存义正词严地指责胡璋、张谷山违反民意，纵匪残民。张谷山见势不妙，转身想走。古大存高喊一声：“贺教官！”早已作好准备的贺教民带领农军立即冲进会场，生擒了张谷山，押往农军指挥部。但张谷山仍然拒绝解除张九华反动武装。最后，农民自卫军处决了张谷山，人心大快，军威大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农民自卫军又连续打了几个胜仗。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广东区委和东江特委指示各县要加强武装，培养武装骨干。古大存坚决执行上级指示，扩大了农民自卫军模范队，加强农军的军事训练。四月上旬，陈延年派交通员送信给古大存，指出“国民党快要叛变革命了……”。^①古大存预感到形势越来越紧张，要加紧采取应变措施。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继“四·一二”政变之后，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就在这一天，古大存主持的五华县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农会所在地横陂召开了。四月十九日黎明，国民党团长宋世科率领八百多人包围了横陂，企图逮捕古大存等农会负责人。

面对这一反革命逆流，古大存镇静地指挥大会代表疏散撤退，然后带领仅有的一个班农民自卫军转移到一间“益和”当铺，同敌人展开激战，吸引了敌人的主要兵力，使大会代表能够安全转移隐蔽在农民家里。

当铺楼高墙坚，敌人攻不进。一名敌排长冲到门边撞门，被古大存一枪击毙。敌屡攻不下，便搬来煤油和柴草，准备放火

^① 《访问梁复然先生记录稿》（油印件），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焚烧当铺。古大存决定采用缓兵之计，想拖延时间，以便寻机冲出重围。于是他让当铺的帐房先生向敌人喊话说：“古大存不在铺内！当铺是魏姓全族人的，开门少了东西我不能负责，如果叫齐魏姓族长来，我就立即开门！”^① 宋世科估计古大存肯定在当铺内，便想乘机敲竹杠，答应叫齐魏姓族长前来。结果拖延了二个多小时。

在此期间，附近村庄农民知悉古大存被围消息，手持刀枪、木棒，从四面八方直奔横陂墟，对敌军进行反包围。敌军见农军势大，慌忙撤退。古大存便率农军冲出当铺，追击逃敌，取得了东江人民反击国民党叛变革命的第一回合的胜利。

横陂战斗结束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古大存率领农民自卫军六百多人，转移到梅林、安流、龙村一带进行休整，同时进一步扩大部队，发展党团组织。

五月，海陆丰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建立的“十日政权”失败后，海陆丰工农讨逆军在总队长吴振民、党代表杨石魂率领下驻扎在陆丰县河口。东江特委在河口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由杨石魂主持，古大存也参加了。会上，对斗争形势及今后的军事行动作了讨论，有几种主张：杨石魂提议率领农民武装经湖南北上武汉；古大存不同意孤军冒险长征，主张在毗邻江西的兴梅一带山区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最后，杨石魂仍决定北上武汉，并命令古大存筹款二万元作为北上费用。古大存回五华率领农军打下安流镇，建立人民政权，筹足二万元给杨石魂、吴振民北上。后来，这支队伍在经湖南的途中被敌

^① <1961年11月古大存同志访问老苏区谈话记录>。

人消灭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根据上级的指示，九月，党在五华龙村成立五华县革命委员会，选举古大存为主席，农民自卫军改为工农革命军。这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惠州警备司令胡谦是五华伪县长胡淳的哥哥，他派出军队四出“清剿”，到处张贴、书写“活捉古大存，赏银五万元”的标语。但是，古大存毫不畏惧，继续领导五华农民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在龙村、安流、梅林一带打击反动武装。十一月，彭湃在海陆丰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后，兴梅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十、十二、十四等团，古大存被任命七团团长。十一月下旬，古大存到海丰向彭湃请示汇报工作，彭湃赠给他一把大马刀。

十二月，五华县“资本团”在对镜窝村组织所谓“讨赤团”，与工农革命军对抗。古大存带领工农革命军攻入对镜窝，活捉了“资本团”团长李树眉。县委决定处决李树眉。李树眉是古大存侄女的家翁，地主豪绅企图利用亲戚关系软化古大存，派人说情，遭到古大存严词拒绝。后来，他们又苦苦哀求说：“我们愿用三箩光洋赎回李树眉。”古大存毫不动摇，坚决地说：“百万家财也保不了他的命！”^①中共五华县委书记宋青听说三箩光洋便动摇了。古大存不顾宋青的反对，命令李斌立即枪毙了李树眉，为五华人民除一大害，给五华地主阶级以狠狠打击。

一九二七年底，地主“讨赤团”以塘湖恶霸钟问陶为头

^①古大存《自传》。

子，在塘湖村筑起碉堡，垒起围栅厚墙，气焰嚣张地给县革命委员会下战书，声称：“本月二十八日与你决一胜负。你若不来，我去解决你农会的武装”。^①古大存接到战书后，当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把这股气焰嚣张的敌人坚决消灭掉。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古大存亲自率领农军兵分三路进攻塘湖。经过二天的战斗，打得钟问陶招架不住，率残部乘夜向陆丰上砂逃窜。第三天上午，农军在追击中完全击溃了钟问陶的“讨赤团”，占领了塘湖村。这次战役歼敌四十多名，缴获敌人枪枝弹药一批，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

正当东江各县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时候，两广地方军阀余汉谋、黄绍竑、黄旭初、邓彦苇等率领军队分路向东江各县大举进剿。一九二八年二月，黄旭初带领一师兵力开向五华，成立“五华‘剿共’委员会”，还成立了“灭古委员会”，企图把所有古姓革命群众斩尽杀绝。他们分三路向安流、大都、周江等地“进剿”。敌军所到之处，施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使人民群众遭到了空前浩劫。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古大存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动撤出安流，退到琴口。为了继续跟敌军作斗争，古大存根据县委的决定，到各乡活动，以便扩充武装队伍。可是，他离开部队不久，宋青竟私自解散了队伍，挟带公款潜逃。古大存回来后，见此情况，坚定地说：“队伍解散了还有广大群众，一定要同敌人干到底！”

^① <五华县志>（卷二），1959年12月编印。

开辟东江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二月，古大存同坚持下来的二十多名武装人员开会，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决定分成几个小组分散转移到五华、丰顺、揭阳三县交界的山区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重新发展革命力量，建立新的牢固的革命据点。

这时，五华全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古大存带领一个三人小组从琴口出发，机智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封锁，走向山区，几经曲折，终于到了丰顺、揭阳交界的观音山、埔田、五房、栋下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首先通过五华打石工人在石厂搞串联，然后又到农民中去活动；有的到石厂打石，有的到富农家当雇工；每天挣到的工钱除了解决吃饭外，剩下的凑起来买纸笔写宣传标语，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不久，古大存在栋下建立了立足点。从五华分散到各地的李斌、古清海、古宜权、廖候嶽、古公鲁等二十多人，都先后到了栋下集中，并在栋下成立起临时党组织，推选古大存为党组织负责人。党组织建立后，重新作了工作部署，决定留少数同志在栋下、观音山一带继续活动，并准备向汤坑一带发展，其余大多数同志由古大存带领上八乡山，以八乡山为中心逐步建立革命根据地。

八乡山是横跨五华、丰顺、揭阳三县的大山脉，山峦重叠，路险林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这里群众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阶级对立尖锐，因此，对于发动组织农民，建立农民武装具备良好条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古大存带领十多个人到了八乡山下的南溪村，在大革命时期的农会骨干杨职

修家里，建立了秘密“交通站”，随后到八乡山的苦竹溜、马屋山、黄竹坪等地活动。

古大存深入农村调查，对当时农民的思想状况作了具体分析。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各地农会都解散了，农会的积极分子都受到迫害，如果重新公开号召组织农会，许多农民不敢参加，而且这时的富农反动，中农动摇，只有贫农和雇农仍然是坚定的。必须首先把革命性最强的贫农和雇农组织起来，革命斗争才能逐渐开展。因此，他与古清海、李斌等人商量，决定成立贫农自救会。五月二十三日，古大存串联了马屋山、雷公墓等村寨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二十七人，在苦竹溜烧炭棚里成立了第一个贫农自救会，选举马运为自救会的组长。自救会会员们又接受任务，进一步扩大宣传和组织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八乡山贫农自救会迅速从马屋山发展到黄竹坪、小溪、贵人村、大竹园，邻近几十个村寨的农民，都纷纷加入了贫农自救会。

八乡山普遍建立了贫农自救会后，革命活动从秘密转向公开。古大存根据革命斗争的发展，又引导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许多中农、富裕中农看见组织起来的贫农革命斗争高涨，也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参加了农民的斗争。组织起来的农民首先在夏收中开展抗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农民得到了经济利益，又进一步巩固了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古大存又在各乡村的农民协会中普遍建立了农民赤卫队，规定男人十八岁至五十岁自愿报名参加赤卫队，妇女则自愿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等等。

六月间，八乡山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派出一批干部到五华县、丰顺县、梅县的九龙嶂、明山嶂、铜鼓嶂、兴宁水口等

地加强活动，协助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以便建立八乡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古大存代表党组织，对派出的干部，提出如下几项任务：一、了解群众受敌人迫害的情况；二、调查党团员、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敌人白色恐怖下的表现；三、向群众宣布取消“救党会”名称（因救党会内部发现叛徒），组织贫农自救会，并积极发展会员；四、经查实在对敌斗争中忠诚、勇敢、坚强的党团员、干部和群众，一律恢复过去的工作，并注意挑选忠于革命、工作积极、斗争坚决的优秀分子，发展成为党团员，建立党团支部；五、工作同志所到之处，建立交通站，指定专人负责情报工作。同时，古大存在马屋山观音坐莲设立了“总交通站”，负责与各地的党组织联系。不久，他们与五华、丰顺、梅县、兴宁、大埔五个县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七月，五县党组织派出负责人集中在梅县、丰顺交界的九龙嶂开会，研究如何加强联系，开展革命活动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五县暴动委员会，推选古大存为委员会主席。八月，他们在梅县畚坑举行了暴动，并取得了胜利。

畚坑暴动象一声巨雷，震惊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敌人在《岭东民国日报》上，曾专门发表了畚坑暴动的消息。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看到报纸，不久便与古大存取得了联系。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贫苦农民，听说古大存继续在八乡山九龙嶂领导革命，十分兴奋，奔走相告。从此，八乡山根据地象黑云缝里的太阳一样，有力地吸引着广大贫苦农民，许多革命同志从四面八方秘密到八乡山，革命队伍迅速壮大。畚坑暴动后不久，揭阳县和潮安县的党组织负责人也来到九龙嶂。为了更好地领导各地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取消五县暴动委员会，成立党的七县联合委员会（包括兴宁、五华、丰顺、梅县、大埔、揭

阳、潮安），推选古大存担任中共七县联委书记。

在中共七县联委的领导下，各县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仅五华一个县已拥有党员四百七十多名。二月十九日，中共五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八乡山石崑坑召开，古大存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作了工作报告。东江特委书记陈魁亚、委员卢笃茂和东江团委书记卢伟良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了新县委，并决定各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八乡山革命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使反动派惊慌不安，一心想扑灭这股烈火。同年三月至四月，国民党集结了五华、丰顺、揭阳三县匪军一千多人，分五路向八乡山“围剿”。为了组织群众，更有效地打击来犯之敌，中共五华县委及时召开了干部会议，具体分析了形势和敌我力量情况，周密地研究了伏击敌人的计划。当时，敌军无论在人数上和装备上，都远远超过了农民武装。面对这种情况，古大存提出，利用各路敌军行动时间不一而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并首先集中力量打击第一、二路敌军。会后，古大存组织了三支精干的农民赤卫队，分三路夹击敌人，同时派人到各村寨动员群众参战。

三月三十日晚上，敌黄夺标部分二路向八乡山小溪进攻。埋伏在附近的三路农民武装奋起迎击，吓得敌人魂不附体，纷纷逃命。古大存带领农民赤卫队紧紧追赶，打得敌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是役生擒反动首领黄夺标，获敌人长枪二十余枝，杀死警卫队和兵士二十余名。”^①

击退第一、二路敌军的进攻后，八乡山农民武装又接连击

^①1929年5月22日《丰顺县委给省委报告》，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破了第三、四、五路敌军的进犯。

四月六日，国民党又派广东军阀郭师演部为主力，汇合地方反动武装，第二次进犯八乡山。敌军从河西、水口、双头分三路扑向八乡山。由于农军事先做好了准备，当各路敌军进入伏击圈时，一声令下，纷纷割断捆绑石堆的木藤，大石从山上滚滚而下，四周锣声震天，号角齐鸣，如山崩地裂，敌人一片慌乱，不打自溃。埋伏在附近的农民群众手持刀枪，勇敢冲杀，敌军大部分被击毙或被大石压死，剩下的四处逃命。

四月九日，敌人对八乡山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在中共五华县委和古大存等人的领导下，八乡山农民武装接连奋战了半个月，终于再次把敌军击退了。

粉碎敌人的连续围攻后，八乡山的革命斗争更深入发展。一九二九年五月，赤卫队员达四千余人，有长短枪九百余支。这一年夏天，八乡山建立了区工农民主政府，领导农民废除债务，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八乡山上还建起了贫民医疗所、贫民学校、供销社、贸易合作社、缝衣社和制造枪弹、炸药的小型兵工厂。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东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丰顺县王礮召开。东江十一个县三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选出了新的东江特委，卢济任特委书记，古大存当选为特委常委，担任军委书记。为了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东江特委又在梅县梅南区顺里村设立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部，古大存任总指挥。此后，古大存根据党的决定逐步扩大农民武装，建立东江红军。这一年夏收中，他领导五华、丰顺、兴宁、梅县等地开展抗租斗争，并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民赤卫队。不久，五华、丰顺、梅县的工农革命军常备队已达三百多人。古大存根据上级指示，将这些武

装改编为东江红军四十六团^①，任命李斌担任团长，龚介池担任政委。接着，古大存又奉命将潮阳、惠来、普宁三县的农民赤卫队三百多人编为红军四十七团，任命何石为团长，陈开勤为政委。

十月一日，东江军委召集了大埔、蕉岭、丰顺、五华、兴宁、潮阳、普宁、揭阳、惠来、潮安、澄海、饶平等十多个县的武装干部开会。会上，古大存与大家研究了各地在秋收斗争中发展工农武装，建立红军的问题。此后，古大存又派出干部到五华、兴宁等地罗致铁匠、技工，在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部附近建立了一座百余人的新兵工厂，日夜赶工，制造单响枪、五响枪及弹药。为了扩大军事斗争，他还派出干部到梅县水尾开办军事学校，培训军事干部。

十月下旬，朱德率领红四军由闽入粤，二十五日抵达梅城，古大存接到梅县县委的报告后，立即派出干部和传令兵，奔赴各地通知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的主力在指定地点集中待命，准备配合红四军行动。他准备亲自去梅城会见朱德，从指挥部出发走了三十五华里，来到梅江边，叫了一条木船，顺流直驶梅城。到了梅城附近的湾下村时，知道红四军已撤出梅城。他估计红四军必然会到梅南，便迅速通知梅南群众迎接红四军。当晚，红四军果然到了梅南，群众举起火把，敲锣打鼓，热烈欢迎红四军。第二天，古大存带领当地革命武装和群众几百人与朱德会见。古大存向朱德汇报了东江革命斗争和红军发展情况，并共同研究了发展东江武装斗争的问题。后来，红四

^①中央军委原计划在东江成立第6军，按三三制编制，故东江红军番号从46团编起。

军袭击了梅城敌人后，主动撤退，经梅县大坪、平远向闽赣方向转移。

红四军到梅县期间，发布了由毛泽东、朱德、古大存、刘光夏、朱子干、陈魁亚、陈海云等七人签署的《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土地政纲规定：“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农民使用。”^①打这以后，东江各地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镇压敢于反抗的地主分子。

朱德在离开梅县时，从各连队中抽调了一百二十名战士支援东江红军，红四军政工人员谭汉卿等三十多人，因没有跟上队伍，也留在东江工作。古大存把一百二十名战士编成特务连，归四十六团，三十多名政工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在工农武装队伍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东江工农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了。经过秋收斗争后，东江工农武装发展到三千多人。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和上级指示，古大存将这些武装统一改编为东江红军。饶平、大埔武装编为四十八团，团长冯子林，政委李明光；海陆丰武装编为四十九团，团长彭桂，政委黄强；兴宁武装改编为五十团，团长刘光夏，政委唐天际。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古大存又在八乡山成立教导团，任命古宜权为团长。

一九三〇年三月，东江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在八乡山召开，选举颜汉章为特委书记。在这次会议上，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方向问题展开了讨论。颜汉章认为：潮汕群众基础好，大南山石洞多，供应丰富，靠近海边，接近香港，容易与省委取

^①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1929年10月），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得联系。因此，革命根据地应向潮汕方向发展，以大南山为中心。古大存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潮汕是平原，大南山是孤立的山，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回旋余地。他主张革命根据地应向西北方向发展，以“八乡山为中心，向外发展与江西中共苏区联成一片。”^①因为西北山多，与闽赣边区毗邻，而八乡山峰峦重叠，连绵数县，适宜于游击战争。当时，省委支持古大存的意见。党代会确定了发展方向之后，古大存亲自率领红军向五华、梅县、大埔等地开展军事行动，打击反动军队，帮助西北各县成立赤卫队，协助各地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民主政府。没用多长时间，东江大部分区乡都成立了赤卫队，开展了土地革命；五华、梅县、丰顺、兴宁、龙川、寻邬^②、大埔、潮安、惠来、普宁、潮阳等十一个县建立了县工农民主政府；东江红军也已发展到五千多人。

五月十九日，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八乡山滩下村召开，来自东江十九个县的三百二十六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广州、琼崖、粤北各地也派人参加。大会历时十二天，讨论了国内外形势，总结和研究了东江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通过了工农民主专政十大纲领。大会成立了东江工农民主政府，选举陈魁亚为主席，古大存为副主席。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下辖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团，任命古大存为军长，颜汉章为政委，罗欣然为政治部主任，龚楷为参谋长。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以八乡山为中心的东江革命根据地已经正式建立。

^①古大存：《回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片断》，载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编《党史教研资料》第16期。

^②寻邬县属江西省，当时该县党组织划归东江特委领导。

同“左”倾错误作斗争

东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后，由于受立三左倾思想影响，东江特委、团委、军委被取消了，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颜汉章任主席，古大存任前敌总指挥。这时，东江行动委员会计划发动惠（惠阳）潮（潮汕）梅（兴宁、梅县）总暴动，提出“打到汕头去”等“左”倾冒险口号。

起初，古大存由于对“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十分愤恨，“产生了复仇情绪”，从而“迎合了立三路线”。^①他贯彻执行了行动委员会的决定，指挥红十一军所属各团分别攻打各县的城镇，使红军频频遭受损失，一些优秀的指挥员也牺牲了，李斌就是在率领四十七团攻打惠来重镇江墟时不幸牺牲的。斗争实践使古大存认识到，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城镇，特别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硬拼，是极其错误的。他决心改正这些错误做法，避免革命遭受无谓损失。

一九三〇年六月，行动委员会命令古宜权带领教导团攻打安流。当时，安流墟镇驻敌二营，兵力、武器装备都比教导团强，仅由教导团去攻打是难于取胜的。古大存研究分析了敌情之后，便主动带领四十六团协助教导团作战，结果一举攻破了安流，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却说古宜权没有执行命令，要立即把他押送行动委员会。古大存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陪同古宜权到了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下令枪毙古宜权。古大存站出来说：“为什么打胜仗还要

^① 《古大存回忆录》。

杀头？要杀则先杀我。”^①他严肃批评了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直接命令教导团行动而不通过前敌总指挥是错误的，不调查分析敌我力量情况而发布作战行动命令是瞎指挥。说得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无言以对。

七月，行动委员会根据广东省委及中央军委〔委〕南方办事处关于“集中攻坚”，“向重要城市进攻”^②的指示，决定攻打敌军力量较强的潮州城。古大存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情况，认为潮州城驻敌两个团，邻近的枫溪驻敌一个师，隍隍驻敌一个师；只有几个团的红军，要去打敌人几个师，肯定无取胜希望，因而主张先袭击力量较弱的五华、丰顺敌军。但是，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听不进这些正确意见，反而说古大存是怕死。继续坚持“集中攻坚”的错误主张。古大存只得执行命令。第一次攻打，经过激烈战斗，虽歼敌一营，但打不进去，红军牺牲了二百多人，被迫撤退回来。行动委员会批评了古大存，并立即命令古大存发动第二次进攻。古大存感到硬拼实在是不行了了，但又不能不执行命令，只好带兵去打了一阵又撤回。行动委员会命令红军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红军遭受更大损失。古大存眼看红军牺牲这样大，不顾行动委员会的一再批评，果敢地带领红军撤回八乡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敌人旋即又对八乡山“围剿”。行动委员会决定迁往大南山，一部分红军也跟随转移到大南山。古大存率领四十六团和当地赤卫队则继续留在八乡山，依靠当地群众，开展游击战。他们打了许多胜仗，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中央苏区红军和大南山红军开

① 《古大存回忆录》。

② 《广东省委及中央军委〔委〕南方办事处给东江惠属两县及十一军十二军委信》（1930年6月15日）。

展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党张瑞贵部纠集了兴宁、梅县、揭阳、丰顺、五华的反动武装近万人进攻八乡山。古大存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决定主动撤退，率部转移到紫金县炮仔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在转移途中，古大存的妻子徐妙娇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抓获，惨遭杀害。

从这一年夏季开始，东江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上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利用运动制造事端，使肃反出现了扩大化，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红军干部惨遭杀害。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黄强为了搞垮东江红军，千方百计诬陷深受群众拥护的东江红军领导人古大存。这时，东江特委重新成立了，袁仲贤任特委书记。黄强在东江特委负责人面前挑拨离间，诬告古大存。

入秋，东江特委通知古大存回大南山。古大存接到命令后即从紫金向大南山进发。黄强在海丰途中设下埋伏，准备古大存路过时加以杀害。后见古大存随身带有两个连的武装，不敢下手，转而假意迎接，并花言巧语骗古大存把连队留下。古大存到了大南山，东江特委负责人对他说：特委决定免去你的红十一军军长职务，改任军委参谋长。然后，东江特委负责人又把他带进一间房屋，说：这是参谋部，你就在这里办公。当古大存走进了房间时，特委负责人派来的警卫立即把守住了门口。这时，古大存才明白：自己被软禁了。他联想到红十一军政委吴炳泰^①一贯对革命忠心耿耿，在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做出许多成绩，但数月前突然被调到大南山，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

^①吴炳泰，中共优秀党员，1931年在大南山被当作A B团误杀。

是受到陷害。他感到问题很严重，不顾卫兵的阻拦，前往质问东江特委负责人把吴炳泰等人弄到哪里去了？接着，他严肃地说：“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就不应该这样对待革命同志；如果你是反革命，请立即把我杀掉，死无怨言！”^①东江特委负责人因轻信坏人挑拨而怀疑古大存，但无充分证据，便召开特委会议，宣布古大存是立三“左”倾错误思想的代表，给予撤销红十一军军长职务，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会上，古大存诚恳地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最初对“立三路线”认识不清，但后来碰了钉子，逐渐觉悟了，所以在三打潮安时就没有强行进攻。他还说：当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一直坚持执行立三路线，应该检讨错误，受到批评处分，才能真正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东江特委负责人没有认真听取古大存的意见，反而说古大存认错态度不好，决定加重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三个月。

受处分后，古大存被派到陆惠县^②工作。陆惠县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各区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来，由于肃反扩大化，许多优秀干部被杀害，加上县委犯了右倾错误，主张用所谓树白旗“欺骗国民党”的办法，结果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古大存到了陆惠县后，与县委领导人一起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工作，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武装，成立一个独立营，并恢复了各区乡苏维埃政权。“群众勇气相当提高，苏区的土地革命亦较深入不少，过去反水的乡村逐渐恢复”，各地得到“稳定的巩固与逐渐的发展”。^③由于古大存

① <古大存回忆录>。

② 惠陆县，即今陆丰县、惠来县。

③ <东江特委给两广区委的报告>（1932年1月4日），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出色地开展工作，东江特委消除了对他的怀疑，提前取消了他的留党察看处分，并任命他为陆惠县委书记。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古大存没有出席大会，但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

一九三二年八月，敌人对大南山发动了新的进攻，实行所谓“围剿”和“驻剿”相结合的办法，既派兵驻扎在南山周围，又派兵分驻山内各地，企图一举“剿灭”红军。为了粉碎敌人对大南山的“围剿”，东江特委调古大存回大南山，担任东江红军第一路总指挥。古大存回到大南山后，分析了敌我力量，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东江特委负责人说：如果采取硬攻硬打，南山之围无法解除，只有在南山外围开展游击战争，调虎离山，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于是，他带领十二名红军战士，突破敌人的封锁，挺进大北山，在丰顺、梅县、揭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的兵力。为了吸引敌人，虚张声势，古大存带领这支红军小部队到处张贴布告，揭露敌人的罪恶，号召群众斗争。他们每到一地，把传单交给革命群众，四处散发。传单布告都署名“东江红军第一路总指挥古大存”。敌人见状，议论说：“古大存过去是红十一军军长，现在是红军第一路总指挥，是军长大还是总指挥大？”^①敌人正犹疑不定时，古大存又叫已打进敌人伪联防的老贫农马运，向伪联防报告：古大存带领几百名红军在八乡山活动。这样，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已转移到八乡山，便放松了对大南山的“驻剿”，派兵

^① 《广东省老革命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历史资料》，1958年12月广东省老革命根据地建设委员会编印。

到丰顺、梅县围剿古大存，大南山之围便解除了。

古大存率领红军游击队(即东江红军第一路)继续在丰顺、揭阳、梅县一带山区活动，与敌周旋，把大批敌军拖得精疲力竭。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为了“围剿”苏区，修筑丰顺县汤坑至丰良公路，丰顺县反动县长林彬，每天乘坐汽车前往工地巡视。古大存得知这一情况后，于五月三十一日派陈华带领红军游击队十二人伏击林彬，林彬“中枪多处，当场毙命。”^①群众闻讯拍手称快，反动当局大为震惊。

在开展游击战争中，东江红军得到了发展壮大。到一九三三年十月，已发展到四百多人，东江特委开会决定建立东江游击总队。中央派周友初任总队长，古大存任政委，卢笃茂任参谋长。

一九三四年，古大存调任东江特委常委、东江政治保卫局局长。东江政治保卫局自一九三一年夏开始担负肃反工作，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关押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古大存继任东江保卫局局长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调查研究，重新审查了被关押的党员、干部，改正了所有错案，释放了二百多名被诬告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

坚持斗争 红旗不倒

一九三五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把驻防在闽粤赣的兵力集中起来，“围剿”大南山游击队。敌军在惠来县葵潭经普宁县流沙至潮阳这条公路上，连营七十里，把大南山围得水泄不通，

^① <丰顺县志> 卷四，1946年编印。

并将群众全部赶下山去，断绝游击队的粮食供应，妄图消灭大南山红军游击队。

同年五月，东江特委在大南山大流石洞召开东江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当时，在大南山的东江特委主要负责人只剩下李崇三（特委书记）和古大存，机关干部剩下一百多人，红军游击队只有二百多人。大会针对敌人重兵压境的困难局面，讨论采取相应措施。古大存提出，要根据新的情况改变斗争方式，建议把所有干部分成若干个工作组到平原的群众中去开展秘密工作，游击队也分成机动小组，开展游击战斗。会议最后决定李崇三负责带领工作组下平原活动，古大存负责领导游击队。

敌军层层包围了大南山之后，经常派兵搜山。古大存带领游击队利用当地山深林密，在山上东跑西转或昼伏夜出，打了就跑，搞得敌人懵头转向，疲于奔命。敌人抓不到红军，更加紧围困封锁，严禁粮食、食盐和必需日用品上山。同时，加紧宣传攻势，到处张贴标语，散发劝降书，妄想瓦解革命队伍。古大存毫不动摇。他把敌人的“劝降书”当作“教材”，教育游击队坚持斗争。有一次，古大存路过一座大山，看见大石上敌人写了一首劝降诗，他微微一笑，随后也顺口吟诗一首，捡起木炭，写在大石上：

幼习兵戎未习诗，诸君何必强留题。
江南美味你先食，塞北寒风我自知。
解带结纆牵战马，扯袍割袖补征旗。
百万雄师临城下，且问先生几首诗？①

①1979年9月13日《汕头日报》。

这首充满革命豪情的诗篇，表达了古大存不畏艰难困苦，誓与敌人决战到底的决心，鼓舞了大南山红军坚持斗争的信心。

由于敌军加强封锁，山上粮尽弹绝。古大存决定摆脱敌人的围困，转移到其他地方坚持斗争。他选择民团防守空虚的地方，率领游击队突围。由于计划周密，行动迅速，游击队不发一枪，便悄悄地出了重围。敌军还蒙在鼓里，在山上声嘶力竭地大喊“活捉古大存……”

游击队突出敌军重围后，分成十六个小分队，分散活动。古大存带领一支十多人的队伍，到丰顺、梅县等地传达东江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不久，李崇三被捕叛变，带领敌人破坏了党的组织，一支支红军游击小分队先后被消灭了。古大存面临巨大的困难和考验。他毫不动摇，于一九三五年夏带领剩下的十多个游击队员到了丰顺县桐梓洋，与丰（顺）梅（梅县）游击队会合，坚持斗争。

艰苦的环境和斗争，考验着每一个人。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一些人经不起考验离开了革命队伍，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又经过了一段波折之后，东江红军游击队连同古大存在内，只剩下十七人了。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们又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加上古大存患病，脑后长了个大痈，流脓不止，常常剧痛。战士们心情都很沉重。古大存忍痛鼓励大家战胜困难，坚持下去。他说：“现在跟党组织失去联系是暂时的，只要党还在，我们就一定能联系上。”他针对有的战士存在悲观情绪，进行耐心说服，用生动的比喻说：“革命好比炼钢炉，杂质跑掉了，剩下的就是好钢材，只要大家团结战斗，革命一定能成功！”战士们听后受到很大鼓舞，决心克服暂时

困难，夺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斗争，古大存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带领十七名战士离开丰顺县桐梓洋，到了大埔县，准备向闽西寻找党组织。他们在大埔县塘卜里村住下以后，古大存原来打算亲自到闽西去，但因脑毒痲疼痛不已，无法行动，改为派战士去联系。但是，多次派出的战士都不见回来，也无信息。

找不到党组织，得不到党的指示，古大存只得带领余下的战士，在大埔县内独立地开展革命活动。他教育红军战士学会做群众工作，说：“我们要同老百姓建立鱼水关系，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就能存在下去，就能发展。我们一定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战士们深入到群众中去，有的上山烧炭，有的在碗厂做工，向群众开展宣传，取得群众的支持帮助。不久，他们在群众中秘密组织起贫民团、陶瓷工会，开展对土豪地主的斗争。他们组织群众武装，伺机袭击小股国民党匪军。有一次袭击了敌人一个炊事班，收缴了十多支枪。接着散发传单，号召群众起来开展斗争。传单署名东江苏维埃政府。设在香港的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发现这些传单后，估计可能是古大存在大埔组织的活动，便派人到大埔联系。但是，由于派去的联络员寻找方法不当，没有跟古大存接上头。

由于失去与党的联系，他们不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的新形势，直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古大存才在报纸上看到国共合作和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于是，他不顾身有重病，安排了工作后，立即动身到武汉寻找党组织。古大存经汕头、香港、广州，到达武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向他作了详细的工作汇报，要求组织给予工作指示。周

恩来叫他先好好治病，待毒痢治愈后再谈工作。

古大存找到了党组织，明确了当前的斗争方向，便急于将新的形势、新的斗争任务传达给东江红军战士，尽快带领他们参加抗日斗争。因此，便不顾病痛，赶回大埔。到达大埔隘隍镇，他在旅店投宿时，引起敌人注意，只好折到广州，在市立医院做了毒痢切除手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命古大存为广东省委统战部长。

参加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

一九三九年秋，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各地选派代表。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选举古大存、区梦觉、朱荣、方华和唐初为广东出席“七大”的代表。十一月，古大存带领代表们从曲江启程，经广西、湖南、江西、浙江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广西、湖南、江西、上海、浙江、福建、闽西南等地的“七大”代表也汇集在那里，共有四十人，组成了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团。古大存担任团长和临时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〇年春节后不久，代表们到达驻在皖中定远县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古大存到指挥部向党的中原局报到，第一次见到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刘少奇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当时抗日形势，嘱咐代表们要加强学习，并给每个代表送一本他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还建议代表团对外改称“南方参观团”，在路上学习各地的群众工作、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等经验。这些代表大多数是来自白区的地下工作者，对根据地情况不熟悉。古大存每到一地，都请根据地的领导人作报告，然后组织

参观。代表们先后听了陈毅、罗荣桓、彭德怀、陈赓等军政领导人的报告，还听了许多根据地的经验介绍，深受教育和鼓舞。

从新四军军部出发，古大存与代表们一起步行。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领导给他配了马，可是他还是跟大伙一起，继续坚持步行，而把马让给生病的代表骑。那时，粮食供应很紧，古大存与代表们一起吃高粱、豆饼，有时还到山上采野菜充饥。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古大存率领四十名党的“七大”代表安全到达延安。中央领导高度赞扬了古大存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当时，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并首先组织一百多人的高级干部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古大存也参加了，并担任学习小组长。一九四二年二月，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古大存在中央党校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一部主任，参加整风运动的具体领导工作。在运动中，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党内不正之风，敢于批评，不讲情面。新四军一位领导干部执行王明右倾路线，在战斗中临阵退缩，古大存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他自我解剖更严，对自己一度执行左倾错误，使红军蒙受损失的事，主动作了深刻的检讨。这种敢于坚持原则，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大家树立了榜样，受到了普遍好评。毛泽东称赞他是“带刺的玫瑰花”。

党校一部有十多个党支部，几百个学员。古大存与学员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经常与学员一起学

习、讨论，有说有笑。他还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和学员一起上山开荒种地，同志们都很尊敬他，见面总是热情地叫他“古老”。

在延安整风中，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古大存所在的中央党校第一部负有审查“七大”代表的重任。由于受康生“抢救运动”的影响，一部的审干工作也曾出现“左”的偏向，搞错了一些干部，后来党中央及时作了纠正。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古大存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在延安期间，古大存还受党中央委托，参与了成立广东临时省委的工作。还在一九四二年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郭潜被捕叛变，广东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央决定广东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通知广东党组织重新恢复活动。古大存与吴有恒按照中央指示，研究成立广东临时省委的具体意见，并代中央起草了给曾生、尹林平的电报指示。广东临时省委成立后，迅速开展工作，使东江、海南岛、珠江、北江等地抗日斗争蓬勃发展起来。

参加建立东北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日宣战以后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领导东北人民向敌占区展开全面的反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使用飞机、军舰等向东北大举运兵，企图抢占抗日胜利果实。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古大存

党的“七大”闭幕后，原定回广东工作，后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党中央决定改派他参加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古大存奉命带领第三批派往东北的干部从延安出发，十二月十九日到达张家口。这时，因为通往东北的交通线已被国民党军队抢占，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发出电报指示：派往东北的干部停止前进，就地待命。于是，他们在张家口住了下来。古大存和杨献珍暂时在晋察冀中央局帮助办党校，部分干部也就地安排了临时工作。办党校连校舍也没有，古大存到宣化县龙烟铁矿公司，在职工宿舍中找到几栋房子，就在那里筹建起党校。古大存任校长，杨献珍任副校长，开始举办第一期干部训练班。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央发出新的指示，命令派往东北而停留在张家口的干部继续前进，古大存于是集合了队伍，绕道内蒙古奔赴东北。杨献珍则按中央的指示留在晋察冀继续办党校。

到东北后，古大存被任命为中共西满分局常委、秘书长。七月，东北各地贯彻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动员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分局决定由古大存组织西满分局土改工作团，并担任团长。他带领工作团三十多人和一个武装连队，到嫩江省肇州县（今属黑龙江省）搞土改试点。下乡前，古大存认真做好工作团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团员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政策，明确党的阶级路线和基本工作方针。工作团员基本是从延安带来的干部，对东北的地理民情不熟，古大存专门请来了当地干部介绍情况，并在下到肇州之前，组织工作团成员到附近农村，了解农民的风俗习惯，初步调查阶级状况。同时，他还组织团员深入分析农村形势和各种有利条件，使工作团成员满怀胜利信心奔赴农村。

肇州县过去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群众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了解，要发动群众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古大存带领工作团首先集中力量突破孙家屯。这个屯有个大恶霸地主，外号叫“孙大马棒”，欺压人民，无恶不作，群众对他又恨又怕。古大存同工作队员一起到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先发动贫农积极分子，再串连发动群众，掀起了斗争高潮。此后，又组织农会，开展分田地等工作，运动搞得扎扎实实。在土改中，古大存经常向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等汇报情况，把点上的经验推广到西满各地。肇州各地土匪很多，常常袭击村庄，抢劫钱财，强奸妇女，破坏土改，群众莫不痛恨。为了替民除害，巩固土改的成果，古大存一边领导土改运动，一边积极组织工作团和民兵，消灭土匪，保卫村庄。与此同时，他还十分注意发动当地青年参加基层工作，参加军队，亲自到肇州中学等学校做报告，宣传党的政策，取得了较大成效。

一九四七年秋，古大存调任中共东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随着东北革命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干部调动比较频繁，古大存领导组织部的干部认真细致的做好调动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招待所里住着许多来来往往的干部，古大存经常到那里去看望他们，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一些干部有思想问题，组织部某些干部不深入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动不动就批评，古大存发现后，教育这些干部要深入调查研究，针对干部的思想实际做工作，把党的关怀送到干部的心坎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古大存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交通部是新成立的单位，负责管辖各种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百事待理，工作量很大。古大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共同做好工作，使东北交通邮电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一九四九年十月，广州解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古大存重返阔别十年的广东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底，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改为广东省委，古大存担任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主管省人民政府工作。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同时，广东省委组织党内开展关于广东历史问题的大辩论，接着又开展了反地方主义运动，使许多地方干部受到了打击。古大存也因此受到了撤销省委书记和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的不恰当的处分。一九五八年八月，下放到广东增城县任县委书记职务。一九五九年冬，因为患高血压病，从增城县返回广州治病疗养。一九六六年九月，他因眼睛患白内障，到医院做了摘除手术。手术后，血压一直很高，至十月底，病情恶化，送进医院抢救无效，十一月四日，与世长辞，时年六十九岁。

作者附记： 本文经周德光同志修改。

冯白驹

胡提春 许春宏 王煊秋

青少年时期

冯白驹乳名公孙，派名裕球，别名继周，又名布文，一九〇三年六月七日（农历五月十二日）出生在海南岛琼山县大山乡长泰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大革命时期，家里有七口人（父、母、姐、弟、弟妹和白驹夫妇），生活来源以农业为主。自家有一些田地，每年勉强可以维持十个月的口粮，不足部分，由父亲兼营打石业补贴，全年收入除吃用之外，略有节余，在当时长泰村算是生活比较好的一户。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全家遭到敌人的摧残，彻底破产。

母亲吴氏，是一个贫农的女儿。白驹参加革命后，她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掩护革命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亲人中，父亲冯运熙对白驹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较深刻影响。冯运熙是乡村中一个有名的拳师，参加过清末反抗封建压迫的群众组织——“三点会”。他为人有正义感，深受乡亲的尊敬，有事多找他出头解决。

一九一一年春，白驹到岭脚乡的私塾里读书。一九一六年考入云龙高等小学，一九一九年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琼山中学，读了四年，一九二三年毕业。

白驹自幼勤奋好学，追求真理，性格沉静，爱思考问题，深得老师好评。在家中还经常帮助母亲做家务，农忙时参加割禾、插秧、放牛等农活，农闲时则帮助父亲打石。

白驹在这段期间，受到乡村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思想渐渐倾向进步，对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欺压剥削中国人民的倒行逆施不满。后与云龙小学的李爱春、丁庆鸾、丁绍周等十几位兴趣相投、立志改革社会的同学组织起同志互助社的团体，以互相帮助，反对坏人做坏事和改革陋习等为宗旨。^①

白驹十七岁的时候，由父母包办和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周玉兰（后改名周惠兰）结婚。婚后，周玉兰按旧俗回到娘家居住。为了履行同志互助社的宗旨，白驹便跑到岳父家，要领玉兰回去，遭到那位古板的老先生拒绝，双方争吵起来。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海南岛后，各界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反日爱国运动。白驹是琼山中学的学运骨干，还担任府海学生联合会的一部分领导工作，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加上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白驹受到了一次新思潮的教育，使他更积极地参加新文化运动。学校有个国文教师，是前清贡生，抱残守阙，思想落后，坚持要学生学习八股文。学生们非常讨厌他。白驹是班里的“学生头”，乃发动全班同学罢课。这个老师只好灰溜溜的走了。白驹用这个办法，前后赶走了几个顽固老师。

一九二三年，白驹在中学毕业了。当时，他有个族兄想招筹股份，买个县长的职位。白驹的父亲也买了股份，希望这位

^①徐霖：《琼崖人民领袖冯白驹》，新民主报社1946年10月出版。

本家日后当上县长能为白驹谋个好差事。白驹知道后极力反对。有一姓李的同学，用钱买到了一个营长职位，他看中了白驹的才能，要聘请他任连长，也被白驹拒绝。白驹一心一意想到上海念大学，以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新思想。父亲看到儿子求学心切，只好满足他的要求。

一九二四年秋，白驹前往上海投考大学途中，碰上了一位姓孙的同学，两人一起去南京投考东南大学，都没有考上，便留在东南大学补习了半年。这次考试落选，对白驹的精神刺激很大。他说：“在到南京进学半年中，因考未被录取，自觉有点惭愧，为了适应于考学的要求，只爱念书不爱他事，但是这样一来，和我原来具有接近先进思想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这就使新旧思想在我脑子中发生了斗争，可以说我在南京念书的半年，是思想上处于混乱与苦闷的半年”。^①

一九二五年春，白驹离开南京到上海，考入大夏大学预科。在上海半年多时间，使他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化。那时上海正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许多到上海求学的琼崖青年，如王文明、许侠夫、黄昌炜、陈垂斌、罗文淹等，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白驹与这些进步同学接近过程中，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和《琼崖新青年》等传播马列主义的刊物，并逐步认识到：要使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挽救国家于危亡，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学期还未结束，因家庭经济恶化，无力负担他的读书费用，他只好抛弃继续读书的念头，“回乡参加革命去，就成为我既定的行动。”^②一九

^{①②}冯白驹：《我的自传》（1956年4月25日），存普惠予处。

二五年冬，他动身回海南岛，途经广州时，遇到了高小的同学李爱春（已参加中国共产党）。李受党组织的委派正准备返回故乡领导革命斗争，担任国民党琼山县党部书记长，又是中共琼山县支部书记。李爱春对白驹讲述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和共产党的知识，还介绍一些革命书籍给白驹看，并动员他一起回海南从事革命活动。白驹受到很大的启发，在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于一九二五年冬高兴地与李爱春一起回到家乡。

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二六年初，白驹回到海南岛后，觉得一切都在变，统治海南的小军阀邓本殷已被国民革命军赶跑，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已经成立，不久召开琼崖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琼崖地委，王文明担任书记，委员有冯平、罗汉、李爱春、许侠夫、陈垂斌、周逸、黄昌炜、陈德华、罗文淹、何毅、陈兰花、何德裕、柯嘉予等。白驹受李爱春的委派，担任了海口市郊区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对白驹来说，这是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但对于“望子成龙”的父母来说，却是一个打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没出息的胡闹”，对白驹表示失望，但白驹并没因此动摇革命信念。

白驹担任农民协会主任后，一方面认真学习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从中吸取农运工作经验；另一方面，深入农民中间，与农民交知心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当时不少农民受了封建迷信的毒害，认为自己受苦是命运不好。白驹用农民亲身经历的事实，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同土豪劣绅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发

动工作，农民们开始觉悟，陆续参加农民协会。为了壮大农运的声势，坚定农民斗争的信心，白驹发动和领导了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五村乡领导农民与吴为藩的斗争。吴为藩是个大资本家，又是恶霸地主，曾勾结邓本殷，串通土豪奸商贩卖鸦片，破坏南征战争。农民要求白驹为他们作主，保护他们的利益。白驹便因势利导，组织几千农民示威，并到琼山县政府请愿静坐，要求县长何春帆将其捉拿惩办。何春帆存心袒护吴为藩，多方为之辩护开脱。白驹带领请愿农民同县长面对面进行斗争，驳得县长理屈词穷。吴为藩慑于农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不得不答应农民的要求，当众向农民赔礼道歉，退还全部强占的土地。这次反吴斗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争情绪，使农民认识到只要团结一致进行斗争，就能产生巨大力量，这为以后的武装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当时上级领导机关检查农民运动的成果时，认为海口市郊的工作做得最有成绩，这是对初出“茅庐”的白驹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一九二六年九月，经李爱春介绍，冯白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到十一月转为正式党员。他由一个充满救国救民思想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从此，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正当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却公开叛变了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实行大屠杀，接着，广州、琼崖也先后开始反革命大屠杀。四月二十一日，驻琼崖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突然包围了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和学校等单位。事件发生前几小时，中共琼崖地委才接到省委通知，要求主要领导同志立即向农村转移。由于时间紧迫，大批共产党人

和革命进步分子，来不及通知撤退，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和屠杀，白驹的入党介绍人李爱春也因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白色恐怖顿时笼罩着整个海南岛！

“四·二一”事变那天，白驹正风尘扑扑地从乡下回到海口郊区农协办事处。海口市农讲所党支部书记王文源赶来把省委的紧急通知告诉他，催促他立即转移。白驹刚离开不久，反动军警就把办事处包围了。白驹一口气跑到郊区一个农民家里隐蔽起来。几天后，他和三、四个农会会员化装成回乡扫墓的人（当时正值清明节），一路上机智地摆脱敌人的盘问检查，平安地回到长泰村。他暂时和党失去了联系。

组建琼山县委 开展武装斗争

正当海南革命斗争遇到了极大困难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五月，省委派杨善集秘密回琼，成立琼崖特委，由杨善集担任特委书记（后由王文明接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以加强对零星的武装斗争的领导。是年冬，杨殷来琼，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进一步为海南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白驹住在长泰村，一面观察外边动静，一面打听失散的同志，并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有一天，在本里湖村终于找到了刚从海口逃出来的地委书记王文明。劫后余生，患难相见，他们紧紧地握手，悲喜交集。面对第一次失败，王文明毫无悲观情绪，坚定地告诉白驹：这次事变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没有什么奇怪的，只要坚定信心，依靠和领导群众继续斗争，革命就能取得胜利。此时琼山县党支部已被破坏，王文明便指定由白驹和陈秋辅、冯裕江三人组成县委。白驹为书记，负责组建县

委工作。

白驹为了重建琼山县党组织，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到处秘访自己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农历端午节）那天，白驹在十六区（甲子地方）找到琼山县农民训练所主任冯建能，一起讨论恢复区委和开展活动办法等问题。以后又恢复了十七区委（在树德地方），接着在十二区（三江地方）找到了陈秋辅和冯裕江，向他们传达了王文明的指示，成立了琼山县委。

县委成立后，立即讨论如何开展工作。根据白驹的建议，县委确定了工作方针：加快建立各区委和基层党的支部；组织短枪队，进行红色恐怖，伺机打击敌人；编组武装队伍；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等。^①会后，县委三人作了分工，分头到各地去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有的党员叛变了，有的退坡回家了，有的逃到南洋谋生。为了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白驹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小型会议，讲明革命的形势、任务和光明的前途，并对党员提出坚定革命决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要求。他还经常穿着农民服装，出没在村头巷尾，向群众宣传革命一定要胜利的道理，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

由于白驹和战友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很短时间里，整顿和恢复了琼山县所有党的组织，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枪枝。白驹除集中海口郊区的短枪队几条枪外，还发动各地党组织开展借枪活动，收集私人枪枝，从恶霸民团手里夺取武器，终于组

^①冯白驹：《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1968年6月25日），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成了一支二十多人的短枪队。短枪队最初采取麻雀战术，专门选择一些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据点作为打击的目标。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白驹指挥短枪队偷袭道崇团局，化装攻打大致坡，获得胜利，消灭了一批国民党反动武装，队伍迅速发展一百多人。不久，特委决定把这支部队调到特委驻地乐会县。白驹又在琼山重新组织武装队伍。

武装斗争的烈火，在海南岛燃烧起来了。除白驹领导的队伍外，王文明、杨善集等在定安、万宁、琼东、乐会、儋县一带领导农民武装，冯平在澄迈、临高一带领导农民武装。各路农民武装互相支援，互为犄角，有力地推动革命浪潮滚滚向前。农会、妇女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搞得敌人不得安宁。在革命的热潮中，琼山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白驹担任主席。

特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决定将各县的工农讨逆军统一改编为琼崖工农革命军，冯平为司令员，下设东、中、西三路总指挥部，辖十一路军（每个县为一路军），全军约二千余人，十月举行总暴动。白驹任中路第六路军的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琼崖形势发展很快，但由于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开始出现逆转。一九二八年初，特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依照海陆丰办法将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以乐会、万宁、陵水和崖县四县为中心，实行土地革命，督促各县市积极去干，实现两个月夺取全琼崖的计划。^①于是决定

^① 《琼崖特委报告——工作计划，暴动情况，请求事项——》（1928年2月3日），原件存在中央档案馆。

在全琼发动一次大暴动，命令红军和各地人民武装向城市进攻，企图夺取海口、加积等海南岛的主要城市。一九二八年五月，蔡廷锴师抵达海南，“围剿”年轻的琼崖红军。各乡也成立反动的民团，配合蔡部“围剿”红军，并从革命根据地琼山、文昌两县开始“扫荡”。白驹领导的第六路军和根据地人民，奋起抵抗，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到乐会一带。敌人跟踪而来，向我乐会县苏区进犯。在我中路红军失败的同时，东路红军和西路红军也先后遭到蔡军疯狂攻击，主力受到严重损失。工农红军的主要干部，如杨善集、冯平、陈永芹、符节、徐成章、周逸等先后壮烈牺牲。

杨善集在椰子寨战斗中牺牲之后，一九二八年二月省委派李源、黄雍到海南工作，主持召开第二次琼崖党代表大会，选举李源为书记（不久就调走）。一九二八年夏省委派黄学增到海南主持特委工作，召开第三次琼崖党代表大会，改组特委，由黄学增担任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底，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仅存下一百三十多人，改编为琼崖独立团，梁秉枢任团长，王文字任副团长。由王文明、梁秉枢等领导转移到定安母瑞山区建立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海南革命形势进入低潮。白驹考虑到在琼文一带人熟地熟，群众基础比较好，便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留下坚持斗争。当敌人“扫荡”过后，他又一点一滴地重新做组织和发动工作，逐步把琼山东部被敌人破坏的党和群众组织恢复起来，不久又向琼山西部新的地区发展，直到海口郊区。他还在羊山地区争取了一股土匪，改编为我们的武装力量。

一九二八年冬，根据省委指示，特委书记黄学增和其他特委常委、青年团特委一些同志，决定把特委机关（包括团特委

机关)迁到海口市,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准备以城市为中心,策动士兵暴动,企图通过夺取海口等城市达到夺取全琼的目的。特委要求琼山县委和白驹协助做好特委机关迁往海口的工作。虽然当时白驹对这个决定有保留意见,但在行动上仍坚决执行。大约经过两个月的筹划,白驹和琼山县委的同志,在海口租了房子,选派住机关的女同志,以职业作掩护,帮助特委领导机关迁入了海口市。这时澄迈县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陷于瘫痪状态。特委决定派白驹到澄迈县担任县委书记,恢复和开展那里的工作。

同年十二月,白驹刚到澄迈时,连找个食宿地方都很困难,恢复工作是异常艰苦的。但他已经有了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有了对付敌人迫害的应变手段。他首先找到澄迈县委的蒙汉强、蒙开胜和苏扶夫等同志,恢复了县委,然后又分头去寻找一些失散的同志,逐步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党的乡支部和区委。然后又组织了精干的短枪队,在各个基本村中编成游击小组,打杀反动派,振奋人心,推动斗争。经过短短半年时间,澄迈县的工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九二九年七月,在海口市的特委机关被国民党军警破获,除个别脱险外,几乎所有的干部,包括特委书记黄学增,特委委员黄照麟、陈大基,团特委书记官天民等十余人先后被捕牺牲。黄学增牺牲后,海南整个斗争失掉了统一的领导,各地的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

高擎革命火炬 顶着风浪前进

正在澄迈工作的冯白驹,当获悉特委被破坏的不幸消息

后，在哀悼被害战友的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重建特委领导机关的问题上。他同澄迈县委研究后，以县委名义火速将特委被破坏的情况告知各县委，并亲自去找各县委负责人研究重建特委事宜。回到琼山县找到了陈秋辅（琼山县委书记），然后又去琼东县找符明经（县委负责人）。就在这个时候，陈秋辅又不幸被敌人伏击牺牲。白驹与明经心情更加沉重，两人决定到母瑞山找全琼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王文明重病在身，白驹把特委机关被破坏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建议：“立即召集各县联席会议，重建特委领导机关。”王文明和其他同志都支持这个意见。

一九二九年九月，各县委联席会议在定安县内洞山区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琼东县的符明经、琼山县的张志军、定安县的王志超、澄迈县的冯白驹，还有红军代表梁秉枢和苏维埃政府、党团代表王文明。王文明抱病主持了这次会议。同志们经过两天紧张讨论，选出了新的琼崖特委临委共十一人，由王文明、冯白驹、傅佑山、王志超等为常委。原来大家推选王文明为书记，但当时王文明病已沉重（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中旬病逝），他提议由冯白驹担任临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获得与会同志一致通过。^①

这次会议，在海南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新的特委提出了当前工作的要点：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迅速恢复被敌人摧残破坏的各级党组织，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坚持武装斗争，恢复各

^① 《中共海南党组织革命斗争简史》（征求意见稿），中共海南区党委党史研究小组 1981 年编印。

种群众组织，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在冯白驹的领导下，琼崖党和革命事业有了新的起色。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冯白驹，已经“成为党内很好的干部”，“成为琼崖党的领导核心。”^①

一九三〇年春节，白驹化装成商人，带着交通员 坏发同志，到上海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由定安乘民船沿南渡江先到海口，又由海口转往香港，同其他代表一起抵达上海。广东省第三次党代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和讨论中央领导关于当前形势、任务和工作方针的报告，选举新的省委委员。会议期间，白驹见到了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李立三和周恩来，也听取了省委对琼崖工作的指示。白驹一直在孤岛苦斗，这次能有机会在上海同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人交谈，他自己觉得实在得益不浅。

一九三〇年三月，白驹回到琼崖。四月，他在母瑞山主持了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二十一人。邓发受省委委托，前来向大会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符明经作特委工作的总结报告；冯白驹传达上海会议精神。会议集中讨论了革命亟需解决的问题：制定开展红五月攻势计划，在全琼实行武装暴动；普遍建立人民政权（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策动白军兵变和组织士兵暴动，成立红军独立师；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各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大会选出冯白驹、梁秉枢、冯国卿、陈骏业、王业熹、王志超、林树芹、符明经等十三人为特委委员，冯白驹等五人为特委常委，冯白驹为特委书记。

^①琼崖特委：《给南委的综合报告》（1937年7月2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海南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当时广东省委还未摆脱“左”的影响，在五月来信中对海南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加紧组织海口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使城市的罢工与农村斗争力量密切汇合起来完成琼崖地方暴动，实现全岛的夺取。”“不仅要完成全岛夺取，完成全琼地方暴动，而且要与全省各地斗争力量汇合起来以争取一省和几省政权的首先胜利。”^①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海南地区的工作虽然也造成了损失，但白驹和特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后，没有去攻打海口、加积这样的城镇，重点仍然放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开展土地革命上面，并紧紧团结同志，认真整顿各县党组织，充实和加强特委机关，因此，革命力量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苏维埃政权在琼山、澄迈、临高、乐万、琼东、定安、陵水、崖县、文昌等县，普遍建立起来。苏区人口约一百万人。母瑞山和其他苏区办有供销合作社、军械局、医院、女子师范学校、红军干部学校、列宁学校等。

在同年的红五月杀敌运动中，我游击队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围攻“团猪”（民团），处死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打得敌人提心吊胆，红军的影响迅速扩大。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一九三〇年七月，特委决定扩大红军编制，在定安内洞山成立琼崖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由梁秉枢为师长，王文宇为副师长，后因梁秉枢调往东江工作，由王文宇升任师长，师政委是陈振亚（后为郑大理），参谋长是谭明新，政治部主任是潘霖。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个独立营（即警卫营）和一

^①《广东省委致琼崖特委信》（1930年5月21日），原件存于中央档案馆。

个女子军特务连（即后来人们所称的红色娘子军连），全师共三、四千人。此外，琼东、乐会、万宁、定安、澄迈县苏维埃政府都有一个中队的赤卫队；还有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配合红军作战，保卫革命政权。乐会、万宁、陵水等县还进行土改。这样，不仅恢复了革命高潮时期的地区，并发展了新区，扩大了苏维埃政权。

母瑞山的艰苦岁月

正当琼崖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一九三二年初，在琼崖特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开展反对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的肃反运动。

这次肃反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执行了左的方针和政策，对什么是AB团、社会民主党、取消派等组织都不清楚，又采取“逼、供、信”等简单粗暴的方法，乱打乱杀，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或只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光是独立师就处死了二百多人，乐会、万宁两县也错杀了不少基层干部。白驹作为主要负责人，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负有责任。后来他沉痛地说：“在肃反工作中，我们的损失实在太惨重了，党政军的干部几乎损失了一半，领导上工作上都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对此“我是一生不忘的。”^①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后果还没有很好消除，反动派就调兵遣将，向琼崖苏区大举进攻。

^①徐羣：《琼崖人民领袖冯白驹》，新民主报社1946年10月出版。

一九三二年七月，由陈汉光率领的警卫旅和空军中队，气势汹汹地直扑海南。八月一日，战争从“围剿”琼山、澄迈边境的羊山地区的红二团开始。敌军陆空配合，猛攻五昼夜，我军除二百余人脱险外，其余全部指战员阵亡。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向特委机关和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琼东县第四区一带进犯。我军留下一部分红军和女子军连坚持原地斗争，领导机关向母瑞山撤退。当时白驹和红军负责人缺乏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将各地红军集中母瑞山，想从内线打破敌人的进攻，结果正好中了敌人寻找我主力决战的诡计。我军主力集中在母瑞山十多天之后，觉察到这样做与外界断绝联系，没有回旋的余地，又缺粮食弹药等物资，于是特委重新决定，除特委、琼苏机关和一个警卫连由白驹领导在母瑞山坚持斗争外，红军主力由师长王文宇、政委冯国卿率领分散突围。但是，敌人已布置好了层层包围圈，正等待阻击我突围的部队。我主力经过浴血奋战，左冲右突，都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线，终于全军覆没，王文宇因病被叛徒出卖牺牲，冯国卿在突围过程中也光荣牺牲。

陈汉光部队对我苏区人民群众实行极端野蛮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步步为营，强迫人民出钱出力出物构筑碉堡炮楼，加强联防。陈汉光疯狂“围剿”的结果，苏区和红军受到了严重摧残，琼崖党和苏维埃各级组织解体了，琼崖党和省委、党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整个琼崖的革命斗争又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是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留在母瑞山的特委书记冯白驹、苏维埃政府主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熹共一百多人，继续坚持斗争。这些同志后来不断遭到敌人袭击，也大部分牺牲了，只剩下二十六个人。其中四个干部，即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和一位名叫三爹的澄迈县的干部，十八名短枪

手，还有四个女同志，其中包括白驹的爱人王惠周。此时，敌人的大部队虽已撤退，但仍留少数部队不断地前来搜山。

母瑞山形势十分险峻，林木参天，毒蛇猛兽经常出没，在草丛里和积水中，还有许多吸血的水蛭（俗称山螭）。山里交通不便，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隐没在丛林之中，敌人不敢轻易深入。还在一九二八年冬，王文明、梁秉枢等已率领琼苏政府直属机关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三个革命村庄，村民多数是移民和革命战士的家属。因此有革命摇篮之称。白驹等二十多人到这里时，移民已走光了，茅屋也被烧光了，没有吃的和住的，斗争的艰苦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但是他们凭着一颗忠于革命的心，想尽办法同各种困难作斗争，度过了十个月的艰难岁月。先是靠移民逃走之前未收获的蕃薯和留下的一些食盐，勉强度日。后来蕃薯挖光了，盐也没有了，他们又靠采摘野果野菜充饥。山中有一种野菜叶嫩柄脆，外形有点似菠菜，大家就靠采摘这种野菜来度日，并且称这种野菜为“革命菜”。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住宿，经常转移，有一次被敌人袭击，各人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什么都丢光了。时值隆冬，为了抵御寒风冷雨，大家只好用芭蕉叶当席和被。说也奇怪，这二十几人一直到最后突围，却没有一个人病倒。

这个小小的战斗集体，虽然过着象野人般的生活，却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白驹同大伙一起去摘“革命菜”，挖蕃薯，拾柴，挑水，烹煮东西，有了好点的东西大家一起吃，没有谁受到特殊照顾。空闲的时候，白驹就向短枪班及女同志讲革命道理，坚定他们的信心，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有时敌人骚扰少些，在安全的地方，大家就唱唱海南戏和革命歌曲。王业熹用竹子做了一枝箫，吹起娓娓动听的小曲子，这就是他们的

文娱生活。大家甘苦与共，不分彼此，二十六个人在十个月的艰苦岁月里，团结战斗，没有一个人叛变或逃跑。

一九三三年夏，冯白驹和王惠周、符明经、王业熹、嫫忠、吴天贵、林天德、林茂松等二十多人，突围下山。他们沿着公路线日伏夜行，经过三个昼夜终于回到了白驹的家。家里的大屋已被烧毁了，只剩下一间做厨房和牛栏的横屋。母亲见到他们回来，悲喜交集。白驹带同志们到村边小山休息，吩咐母亲煮饭，送到山上给同志们吃，并设法寻找当地同志。经过查访，找到了琼山县的五位同志——李黎明、刘秋菊、李汉、朱克平、冯安全，被打散的老战友重逢，大家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多么高兴啊！

全琼有组织活动的革命力量只剩下五、六十人，三十多支枪。但白驹和同志们并没有灰心，仍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决心一切从头做起。而当时最为痛苦的莫过于与上级失去了联系。特委虽曾几次派人出去寻找上级，但在上海找不到党中央，在香港找不到省委。白驹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胸怀，始终抱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首先设法联系各县幸存下来的党员和干部，积极恢复老区的工作，并向新的地区发展，迎接新的斗争和胜利。

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李黎明、李汉和刘秋菊等会合后，交换了情况，决定分头到其他县寻找潜伏的同志。经过一段时间，把找到的同志集中开会。白驹向大家分析了斗争形势，说明敌人想消灭革命力量是办不到的，有群众的存在，就有革命的存在，眼下力量虽小，但分散到各县去，以各种职业为掩护，联络自己的同志，重新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红军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用胜利的战斗告诉人民，共产党和红军还

存在，革命形势就会一天天好转的。大家同意白驹的意见和工作部署，分头到各地去开展工作。

一九三六年五月，特委又选出冯白驹、王伯伦、黄魂、吴一清、肖焕辉、朱克平（运泽）、陈坚七人为委员，冯白驹、王伯伦、黄魂三人为常委，冯白驹为书记。恢复和开展工作过程中，困难极大，在新区连个落脚点都难找到，并且经常遇到危险。一次，白驹和王惠周、李黎明、王爱珠（李黎明的爱人）、王伯伦、朱克平以及警卫员等人，在琼山县咸来乡一个小小的灌木林里休息时，女同志打起洋伞，遮着炎热的阳光。恰巧被一个在高处放牛的孩子看见了，他不知道是什么人，便回去报告民团。当敌人走到很近的地方，白驹等人才发觉，当即边打边逃，李黎明、朱克平和王伯伦受了轻伤，白驹的爱人王惠周和王爱珠两同志英勇牺牲，白驹幸好脱险。

分散在其他地区的同志，同样艰苦地开展活动。几股革命武装，互相配合，时而在这个县突击民团，时而在那个县伏击敌军，搞得敌人昏头昏脑，以为到处有红军。战斗的枪声向群众宣告，共产党和红军还继续活动着。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琼山、文昌、琼东、乐万、澄迈、临高、儋县、昌感等县的革命工作又逐渐恢复起来，县、区、乡和村的党组织也开始建立。一九三六年，在琼山成立了琼崖游击司令部，下辖三个队，朱运泽（朱克平）为司令，王伯伦是政委。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前，红军游击队发展到六十人左右。

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

琼崖特委长时间失去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对国内外情况

了解极少，直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白驹才从华侨带回来的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中共中央公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了解到中央正在号召全国各个政治集团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于是，白驹和特委研究决定，根据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向国民党海南当局发出停止内战，实现全琼团结抗日的宣言。同时，他又在《党团生活》、《布尔什维克》、《救亡旬报》等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宣传党的主张，给人民群众指明斗争的方向。党的宣传鼓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琼崖中学、琼海六师等学校的师生，走出学校，深入到县和市镇进行宣传，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开展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初，琼崖特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恢复了联系。白驹就象失散了的儿子又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那样高兴。他亲自到香港向南委汇报，并带回了南委负责同志提出的工作意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开展工作。一九三七年五月，白驹致函国民党一五二师师长陈章及行政专员黄强等，表示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愿意改编红军，并要他们在报刊上作出公开答复。数天后，陈章就在琼崖《民国日报》上公开答复，同意我派代表去海口市进行谈判。这时，冯白驹有点顾虑，怕中奸计，没有立即派出谈判代表。后来鉴于形势变化，“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局势动荡不安，便于八月派乐万县委书记李黎明前去谈判。

但是，陈章没有诚意谈判，不肯出面见我代表，只派了他们的军训主任林序东出来接谈。林序东横蛮地提出先要冯白驹把队伍带出来，方才正式谈判。李黎明立即反驳，表示如不同

意我们的条件，红军就不出来。第二次再去，也没有结果，谈判遂陷入僵局。

正当谈判的时候，白驹在琼山县塔市乡烟村不慎被捕。白驹被捕后，由王伯伦代理特委书记，立即进行营救活动。一方面将冯白驹被捕情况火速报告省委、中央，通过报纸公布白驹被捕的消息，揭露国民党破坏国共谈判的阴谋，并发动各界人士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冯白驹；另一方面派塔市党支部书记邓文进和海口市工委书记林克泽暗中负责保护白驹的安全，防止意外。

此时，张达、陈章、王毅和陈炜章等对白驹进行“审讯”，而且威迫中学校长王政等一起“陪审”，要他们出面规劝白驹“悔过自新”，交出武装以换取官职。但“陪审”的校长等都不作声，张达、陈章一伙只好亲自对白驹威迫利诱。白驹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们破坏团结抗日，重申我党关于通过谈判解决改编游击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但没有结果。后来在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张达才被迫派人同白驹谈判。白驹说，我一个人作不了主，要同特委联系，并要求先行释放与他一齐被捕的爱人曾惠予。惠予出狱后，白驹就通过她同特委联系。当时狱中还关着几十个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中共海口市工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张开泰为书记，符哥洛、林诗润为支委。白驹入狱后不久，支部决定派符哥洛专门与白驹联系，经常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白驹也通过符哥洛转达意见，指导狱中斗争。看管监狱的小队长吴克之，是我党的秘密党员，他暗中负责保护白驹的工作。国共合作后，大陆各地先后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而海南反动地方当局还在继续捕杀共产党人。狱中的同志对琼崖国共合作的前途大失所望。白驹知道

后，向狱中同志讲明党中央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前途是光明的；并指出：“琼崖要实现两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还需要时间。”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要灰心。当时在狱中还关押着一个叛徒——王昭夷，这个家伙叛变革命后，当了国民党的县长，杀害过我许多同志。后因敌人内部互相倾轧，才被关在监狱。支部考虑要惩办王昭夷，为死难烈士报仇，但又怕影响“统一战线”，便请示白驹。白驹笑着说：“咳！监狱里犯人打架嘛，怎么会影响统一战线呢？”同意惩罚这个败类，但嘱咐“不要打死”。于是狱中支部几个同志利用王昭夷放风时，突然用麻袋从他头上套去，推倒在地，狠狠地把他揍得半死。王昭夷由于害怕再次受到惩罚，也不敢向狱官告状。这次“麻袋打狗”，为大家出了一口气，人心大快。

党中央得知白驹被捕的消息后，十分关心他的安全。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在各阶层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经党中央方面向蒋介石交涉，由蒋介石下令，白驹同志才无条件释放出来。”^①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天中午，冯白驹被释放出狱。临走前张达会见白驹时表示愿意合作抗日，要求白驹继续派代表和海南国民党政府谈判，改编武装，参加抗战。白驹同意派出代表继续谈判。白驹被捕期间，省委已派了李明（即林李明）任特委书记，白驹出狱后，担任特委常委作为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住在府城。谈判拖延一年多，白驹始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我党我军独立自主的原则，揭露国民党企图借谈判消

^①李黎明：《关于琼崖部队情况的报告》（1940年4月10日）；
《琼崖党的斗争过程略记》（1944年5月25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灭红军的阴谋。由于经过多方做工作，组织府城和海口地区的群众，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呼吁国共合作，争取了各阶层人民、海外华侨，以及进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利用六十二军调离琼崖，王毅担任琼崖守备司令兼专员的机会，积极做争取王毅的工作。当时日机疯狂轰炸海口、琼山一带，敌舰封锁海上通道，王毅兵力薄弱，这才不得不接受特委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海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建立，从此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崭新局面。

根据协议，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广东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简称为琼崖独立队，白驹担任独立队队长。

改编前，我军只有六十多人，长短枪五十余支，如果国民党知道这个情况，就会背信弃义地歼灭我们。因此，特委在谈判成功后，立即通知各地党组织，发动党员和青年参军，动员群众捐献枪枝，收缴土匪武装。一个月时间，我军迅速地扩大到三百多人，二百多支枪。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琼崖抗日独立队在琼山县云龙市正式宣告成立。独立队的军饷，一方面依靠群众支持，一方面由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千元。南洋华侨、港澳的琼崖同胞，积极响应我党“支援祖国，保卫家乡”的号召，成立了“援冯（白驹）委员会”、“援八（路军）援四（新四军）委员会”、华侨救济总会、华侨回乡服务团、工商友爱社等团体，捐献大量金钱、物资和药品，支援海南抗日军民。白驹对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给予高度的评价。

我军改编的成功，保持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以种种手段并吞直至消灭我军的阴谋，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从此，独立队在党的领导和白驹的率领下，日益

发展壮大，成为海南人民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利用敌寇登陆前的短暂时机，独立队抓紧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白驹把主要精力放在培育这支人民子弟兵上面。他向战士们讲解我党的军事思想，上政治课；他还以身作则，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进行军事训练。

日本帝国主义攻陷广州后，为了切断河内和缅甸两条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建立对华南及东南亚的海、空作战基地，掠夺资源，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陆海空三军互相配合，大举进犯海南岛。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闻风而逃，约六千名国民党官兵一枪不发地溃退到五指山去了。

同国民党军队截然相反，年轻的独立队一直在前线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日军登陆后，白驹命令黄大猷、符荣鼎率领部队立即开往南渡江的潭口，阻击日寇，掩护向内地逃难的人民群众。敌机向人群俯冲扫射，独立队战士就用步枪对空射击，并带领逃难群众到独立队驻地，然后再往内地转移。在这次潭口阻击战胜利喜讯传出后，人心振奋，海南人民把抗日救琼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独立队身上。

日寇登陆后，很快地占领了海口、府城、榆林、三亚等城镇，继续向腹地推进。在白驹亲自指挥下，独立队英勇抗战，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一月，打了六十多次仗，击毙日军五百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六月，白驹得知永兴市据点只有一个班的日军，便派二大队中队长林天德带着短枪班，化妆赶集的农民，出其不意，把这个班日军全部消灭了，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五支，掷弹筒一门。奇袭永兴的胜利，震动整个海南岛。蒋介石为了标榜自己是抗日救国的“领袖”，特传令嘉奖冯白

驹；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策亦致函冯白驹，表示赞扬。

由于白驹和独立队的同志们正确执行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人民战争，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一九三九年五月，独立队扩编为独立总队，下辖三个大队，自初建时的三百人发展到一千四百人。王毅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我军扩大，并拨给步枪一百多支和一批子弹及给养。扩编后白驹任总队长，马白山、符振中任总队副。

白驹率领独立队，一直站在抗日的最前列，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当独立队撤离云龙分散转入农村活动的过程中，那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在自己家乡收集枪枝，组织抗日队伍，主动派代表到独立队来，要求派干部去领导。甚至有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地方行政人员以及部分不满国民党不抗日而自行脱离的零散部队，也要求我们收编，愿意接受我党领导共同抗战。可是当时我们党内，特别是特委主要领导人，存在着右倾错误，认为收编那些武装力量会破坏统一战线，因而把主动要求我们收编的一些地方武装拒之门外，对一些失掉联系的国民党警察部队，还规劝他们返回国民党的原建制去，对于民间的枪枝也不敢大量收集；不仅如此，还借口“解决经济困难”，主张把我独立队一个中队改编为琼山县国民党第三区区属武装，理由是该区区长韦义光是我党秘密党员，这样做可以减少经济负担。白驹对特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意见，表示异议。尤其是把我军的一个中队改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认为是原则立场问题。由于白驹和其他同志的反对，这个错误主张才没有执行。

党的信赖 人民的重托

一九三九年冬，特委书记林李明和独立总队党委书记李黎明到延安参加“七大”（后改期），由白驹代理特委书记。他根据当时抗日斗争的形势，向特委提出“必须在敌后创造我们的根据地”。十二月，特委召开了第八次扩大会议，白驹代表特委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总结了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分析抗战的形势。白驹指出，在敌伪顽走向联合，而革命力量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坚持长期抗战，必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讨论后，特委决定：向琼西地区的澄迈、临高、儋县、白沙、昌江、感恩等县发展。除了符振中和陈乃石等领导一部分部队留在琼文地区活动外，白驹，王伯伦带领特委机关和总队部开始向西转移，在美合建立抗日根据地。

为了培养各种干部，在根据地内创办了琼崖抗日公学和党校、农训班、军事干部学校等。琼崖抗日公学于一九四〇年夏开办，白驹兼任校长，史丹为副校长。学生五百人，分为军事班、政治班、普通班、行政班、工农班、妇女班、儿童班。很多革命的知识分子，爬山涉水，自愿来到公学任教，许多青年，不怕困难，从各地踊跃前来学习。白驹经常向学生讲政治课，与学生谈心。这些学员后来很多成为琼崖革命的骨干。独立总队在斗争中也发展成为一支有三千多人的队伍。

此时，海南形势开始逆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大幅度地减少独立总队的军饷，同时限制我军的发展，要独立总队的编制，缩小为一个大队，三、四百人。顽固派公开

扬言：“要留下子弹清共，和冯白驹算账。”年底，他们企图挑动军事冲突，消灭独立总队。在这种情况下，白驹打算先发制人，打击行政专员吴道南的顽固派势力。后来，由于得到省委指示，说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和自卫的原则，先进攻别人，不能做到“有理”，所以才没有动手。但是国民党顽固派诡计多端，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他们一面积极进行攻打美合的军事部署，一面派出保七团的中校副团长林荟材以“谈判”为名，到美合根据地窥看我军虚实和地形，为他们进攻作准备。

十二月十五日拂晓，保七团和西路几个县的反动武装共三千多人，偷袭我美合抗日根据地。对这突然事变，白驹沉着地指挥部队应战。经过两天激战，我军撤出美合。顽固军进占美合后，大肆屠杀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独立总队及琼崖公学来不及撤退的伤病员，被惨杀的达百余人，这就是震动琼崖的“美合事件”。

特委机关和独立总队撤出美合后向何处去？特委在讨论时有所争论。有的主张向西走，说那里山高林密，可以隐蔽活动；但白驹和多数同志主张转回琼山、文昌地区。白驹说：“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琼文地区群众基础好，情报灵通，物产丰富，有回旋余地，可进可退，只有东返琼文，革命才有出路。经过讨论后，特委就决定向琼文地区转移。琼文群众看到独立总队回来了，高兴得奔走相告。当时生活很困难，但群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支援部队，事迹十分动人，充分证明了白驹关于“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的论断多么正确。

美合事变以后，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琼崖特委在琼山县树德乡召开第四届第三次执委会议。会议首先集中总结美合

事变的经验教训，白驹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认为，美舍保卫战所以失利，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思想麻痹，给他们钻了空子；其次是军事上犯了消极防御的错误，再加上负责正面防御的特务大队长朱克平临阵退缩，不服从指挥而使整个战役处于被动。会议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由林李明传达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

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关心海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一九四〇年三、四月间，林李明和李黎明在延安时，中央听取了他们关于海南革命斗争情况的详细汇报，经过研究后，作了很多极为正确的指示。林李明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同他谈话并作了指示。毛泽东说：“琼崖特委书记和独立总队的队长，还是由冯白驹同志担任好，因为他在海南搞了这么久，情况熟悉，和群众关系密切。”同时希望冯白驹要多帮助同志，要抽出时间学习，并提供了学习的书目。关于琼崖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问题，毛泽东十分强调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军队，建立抗日政权。他说：“要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阶层，打击顽固派。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争取华侨的援助。军队要发展到一万人。琼崖有党，有军队，也有群众，但缺少政权。要坚持长期斗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干部政策方面，要通过办训练班、党校，大力培养干部，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觉悟，考试要考统战策略。要关心干部，琼崖干部的优点是忠诚于党、勇敢，缺点是狭隘、个性强。还要教育群众，提高对抗战胜利的信心。”^①党中央考虑

^① 《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议记录》，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到海南军事干部和技术干部比较缺乏，先后派李振亚、庄田等来到海南。周恩来还指示廖承志为海南购买电台设备及派去报务技术员。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使到会同志受到极大鼓舞，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改选了特委。冯白驹复任特委书记，林李明为副书记，王伯伦、欧照汉、黄魂为特委常委。白驹对党中央的指示表示坚决拥护，并感谢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和信赖。他说：“党中央给我们的指示很及时，它象一盏明灯，给我们照亮了斗争的前程。”^①

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调整了部队的编制，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冯白驹为总队长兼政委，庄田为副总队长，李振亚为参谋长，王业熹为政治部主任。为了加强对各地部队的领导，还改编了部队。独立总队下辖四个支队。

白驹复任特委书记后，爱护干部，解决干部家庭和生活困难，加强干部团结，共同对敌。对中央和省委派来的干部，白驹都表示欢迎，根据各人的特长，委以重任，很好发挥他们的才干。在领导方法上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贯彻群众路线，凡是重大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再作决定；凡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了的事，他就坚决执行。这就保证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指示得到正确的贯彻，使海南党组织真正成为带领海南各族人民去夺取胜利的先锋队。

^①庄田：《琼岛烽烟》，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同敌顽作战中打出新局面

特委领导机关回到琼文根据地后，国民党顽固军跟踪而来。白驹和庄田、李振亚以及一支队队长吴克之等研究后，一致认为要狠狠地给予回击。在反内战的军民动员大会上，白驹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必须以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来坚决回击反共军。为了实现团结抗战，为了孤岛抗日战争的胜利，任何牺牲损失我们都可以忍受，同志们，前进吧！胜利在等待着我们。”

一九四一年三月，国民党保七团两个连及伪琼山县游击大队，奔袭我谭来乡的第一支队。为了打胜这一仗，白驹和他的助手们作了周密的布置。他领导五个中队的兵力，埋伏在箩蓬坡，迎击反共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消灭了保安七团二营五连五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四十余支。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坚定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胜利信心。但是，伪保安副司令兼保七团团团长李春农仍想玩弄两面手法，一面来函说要派员与我谈判，一面指挥其反动军队向我进攻。但我们不再上当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当李春农率部到达斗门村时，白驹指挥我军立即发起猛攻，打得敌人慌作一团。李春农牵着坐骑准备逃跑时，为我二支队神枪手黄可则击毙。这一仗共消灭顽固军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李春农以下的十多名军官。胜利的消息传开后，琼崖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次日，保七团二营营长李紫明率败军向琼山逃窜时，又被我军围困于咸来乡大水村。冯白驹、吴克之和马白山直接指挥这场海南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战斗。我方参战的兵力达二千五

百人，琼山、文昌两县的六、七千人民群众参加支前工作。由于顽军占据了比较坚固的房屋负隅顽抗，白驹为了避免我军付出过大的代价，没有下足决心攻坚，而是实行围困战术，但没料到被围困的李紫明通过电台求救，吴道南、王毅便调遣部队前来增援。我军既要打围，又要打援，兵力分散，结果被李紫明突围逃窜了，未能达到全歼的目的。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打退敌军多次增援，毙伤顽固军四百余人，保安七团副团长董伯然受重伤。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基本上打退了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保卫了抗日根据地。但在作战中，我唯一的手摇发电收发报机落到了敌人手里，从此特委又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各地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纷纷成立民主政权。一九四〇年十月，文昌县举行数万人的大会，民主选举詹鏞当县长，建立起县至区乡的民主政权。白驹返抵东路后，帮助成立了琼东县民主政权。接着万宁、琼山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等部分地区也建立了民主政权。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日，在琼山县树德乡召开了琼崖东北区人民代表大会，西路、南路各县都派有代表列席，一致决定成立琼崖东北区人民政府，选举冯白驹为主席，史丹、刘秋菊、吴耀南、吴乾鹏、林柏熙、潘云秋等为委员，体现了“三三制”的民主建政原则。琼崖东北区民主政府颁布了施政纲领、组织纲领、土地条例、选举条例、婚姻条例、优待抗属条例、基层组织条例、救国公粮征收法、危害抗战紧急治罪法。这些法令条例的颁布执行，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惩治了汉奸卖国贼。在农村，还实行减租减息，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政策。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和组织

下，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和儿童团等各种民众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这个东北区人民政府实际上是领导全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活跃市场，还发行了琼崖东北区民主政府代用券。

从一九四二年起，海南抗战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日寇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扫荡，而勾结顽固军，向我抗日队伍进攻。国民党海南守备司令王毅、保七团团董伯然和何定之等民族败类，竟和日寇订立了“共同防共协定”，划地分防，共同“围剿”我独立总队和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日寇动员了警备队和绥靖队、自警队共六千余人，国民党反共军两个保安团，一个游击大队共三千多人，在空军配合下，以装甲车和坦克开路，从东路开始，接着从西路和南路，向全琼抗日根据地开展大“扫荡”。海南人民又遭到空前未有的一场大屠杀。但侵略者及其帮凶的血腥暴行，决不能使人民屈服，只能激起人民的愤怒和坚决反抗。白驹当时曾经明确地指出：“我们虽然在反共军的进攻下，但是我们必须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击我们唯一的凶恶的敌人。”特委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起，连续发出三次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号召全琼军民坚持抗击日寇的伟大斗争。为了打退敌人的“扫荡”和“蚕食”，白驹熬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同战友们一起分析战情，制定作战方案，部署兵力，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经过我军的英勇抗战，终于粉碎了日伪的五月大“扫荡”。

在粉碎了日伪大“扫荡”的形势下，一九四二年九月六日，琼崖特委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四十四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冯白驹、林李明、黄魂、王业熹、王月波五人当选为主席

团。冯白驹作了《一切为了反攻》的政治报告，林李明作了统战工作报告，庄田作了军事报告，王业熹作了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报告，史丹作了政权工作的报告。会议进行了十九天，于九月二十五日结束。^①

白驹在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国内外和海南的斗争形势，提出琼崖党的奋斗总方针是一切为了实施反攻，争取明年打败侵略者建设新琼崖。他还提出了三个具体任务：（1）按照互助互让、共同发展的原则来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战党派的关系，以加强团结，不给敌人以任何离间的机会；（2）按照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改善内政，使人民更踊跃的为抗战服务，才能克服困难，最后战胜日寇；（3）坚定全体军民胜利信心，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清除侥幸等待心理，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反攻实施而奋斗。白驹的报告，对于认清抗战形势，明确任务，执行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最广泛地争取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粉碎日寇“扫荡”和“蚕食”琼文游击中心根据地的阴谋，最初是把主力组成野战军，在根据地和日敌周旋，进行内线作战。后来特委和白驹改变了对策，取消野战军的建制，把人员和装备分散到各支队，除留下一部分武装力量在琼文根据地配合群众进行游击战外，主力于一九四三年夏秋间撤出琼文根据地，发展新区。但对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应该向何处转移的问题在特委内部有争论。多数同志主张应向琼东南地区（乐会、万宁、琼东、陵水等县）发展，在定安的内洞山区建立根据

^① 《琼崖特委第九次扩大会议记录》，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地。白驹不赞同这个意见，认为该地区经过长期反动派烧杀摧残，损失很重，缺乏群众基础，又接近日敌重要据点加积，在此建立根据地不适合，而琼西南地区即澄迈、儋县、白沙、感恩、昌江、崖县等县地域辽阔，有五指山作屏障，人口较多，第四支队在这个地区活动，且有一定群众基础，适合建立根据地。可是，白驹的意见得不到支持，他只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情况下，服从向琼东南地区发展的集体决定。从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各抽一个装备好、战斗力强的大队组成第五支队，向内洞山转移。结果第五支队五百多人进入内洞山地区后，碰到许多困难，不仅遭到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袭击，而且因疾病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当不得不撤离内洞山地区时，只剩下百余人。实践使特委统一了认识，重新肯定了白驹的正确意见，改变原来的决定，特委领导机关和主力向琼西南发展，创造绿现山地区根据地。

支持黎苗族人民的斗争

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和红军就在黎、苗族人民中留下较深的影响。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白沙县黎、苗族人民，不堪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爆发了一次震动全岛的英勇起义。

日军侵占海南后，国民党海南的政府机关、军队和家属五千多人纷纷逃入五指山区。他们躲在山区，仍然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而一切负担都落在黎、苗族人民身上，引起黎、苗族人民的极端不满。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三日，王毅和保六团团团长杨开东，诱骗苗族人民在基督教堂开会，用机枪疯狂扫射群众，半天时间，一千九百多同胞被杀害。这桩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激起黎、苗族人民无比愤怒。为了摆脱绝境，他们在黎族首领王

国兴、王玉锦、符中龄等十多人的领导下，于一九四三年农历七月十二日和十八日先后揭竿起义，攻占了县府和守备团，赶走了国民党派驻的军队和官员。一个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向黎、苗族起义人民进行反扑，集中主力部队几千人，多路向白沙人民进攻，起义终于失败。“七月起义”失败后，王国兴三次派出代表，到处寻找共产党来解救黎、苗族人民的苦难，但又不知道共产党在哪里。第三批黎族代表王文松、王高定、王家芳三人，几经周折，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那大找到了临高县委书记李汉和第四支队长马白山。过了几天，白驹在绿现山热情接见这三位黎族人民的代表，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并派出一个武装工作组，跟代表们回什寒山和鹦歌岭见王玉锦、王国兴等人。一九四四年春，为了加强对黎民的领导，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黎族工作委员会，朱家玖为主任，郑放、许世淮、王昌和廖志雄等为委员。黎族工委的同志带着冯白驹的信件和武器物资前往鹦歌岭见王国兴。王国兴等非常感激。这时全国抗日的形势发展很快，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经中央批准，一九四四年秋琼崖特委将独立总队改为琼崖纵队。冯白驹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庄田为副司令，李振亚为参谋长。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王国兴亲自前往绿现山会见白驹。他们虽是初次相见，却谈得很融洽，并按照黎民的风俗习惯，共饮鸡血酒立誓结盟。白驹表示坚决支持黎、苗族人民反抗国贼（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国兴则表示黎、苗族人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为了满足国兴的迫切要求，特委和琼纵决定帮助成立一支以黎民起义士兵为核心的白（沙）、保（亭）、乐（东）人民解放团，任命王国兴为团长，郑放、许世淮为副团长，王玉锦为参谋长，并送给一批武器弹药和钱粮物资。王

国兴还把自己年仅十三岁的孩子送往琼特，以示对共产党的信赖，这个孩子后来被安排做刘秋菊的警卫员，充分体现了汉族和黎族人民生死与共的关系。为了扩大白沙中心根据地，支援黎、苗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一九四五年春特委决定成立挺进支队，由李振亚兼任支队长，符荣鼎为政委，挺进五指山腹地。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挺进支队消灭了守备二团的残余势力，白沙县基本上获得解放。随即特委和琼纵司令部由阜龙迁往白沙县城牙叉，并成立白沙县人民政府，詹力行为县长，王国兴、王昌为副县长。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首先改善人民生活，对贫苦农民进行救济，帮助黎、苗族人民解决粮食、种子和耕牛等困难，发展农业生产。特委和琼崖纵队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黎、苗族同胞的爱戴，称琼纵为“父母军”，称冯白驹等为“父母同志”，称共产党为黎、苗族人民的“救星”、“父母党”。白沙县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很快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

一九四五年七、八月，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县民主政权纷纷建立的基础上，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任务，成立了琼崖临时人民民主政府，冯白驹当选为主席。

当时由于没有电台，加上日寇和国民党政府对我们进行严密封锁，以致象日本投降这样的大事件，也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即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白驹等才知道的。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海南人民，听到日本投降这个特大的喜讯，顿时欢腾雀

跃起来，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白驹连夜召开特委紧急会议，会后当即发出了一个紧急指示：（1）立即展开军事的全面动作，命令日寇投降，如果反抗投降命令，凡吃得下的就把它吃掉；（2）摧毁一切敌伪组织，安定民众，建立民主秩序，组织民主政权；（3）放手发动民众，规模越大越好；（4）把反攻后备队大批动员到琼崖纵队去，扩大部队，扩大地区；（5）命令各支队，向那大、三亚、榆林、北黎、海口前进，相机占领这些城市。这些指示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可惜在执行这一指示过程中，有些干部不够坚决，贻误了时机。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用巨大代价所换来的。琼崖独立队成立后的六年中，共歼灭日伪军五千八百四十八人，击毁日机一架，缴获大量武器以及军用物资和弹药。日寇投降时，我军已解放了全岛三分之二的土地、一百多座城镇、一百多万人口的广大地区。琼崖人民武装也从云龙改编时的三百人发展到七千七百余人，还有地方武装二千余人。我军的力量，连当时的美国盟军和日寇都不得不承认。日本投降后，美国一联络官在日寇西路那大军部参谋长陪同下，到南丰市拜访琼纵司令员冯白驹、副司令员庄田等时，日寇参谋长问：“你们琼纵到底有多少人呀！”庄田答道：“琼纵指战员有三万人”（其实没那么多），日寇参谋长举起大姆指说：“厉害！厉害！我皇军五万多人就没有办法战胜你们！”美国联络官给冯白驹写下了这样的题词：“我以最诚挚的心情，向领导海南军民坚持长期斗争的冯白驹将军致以最崇高的敬礼！”^①

^①郑放：《海南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简史资料》（1976年4月21日），油印本。

抗日战争中躲在五指山上的国民党顽固派，这时却下山来抢占胜利果实了。抗日刚刚胜利不久，蒋介石就密电广东省反动头目李汉魂，“限期在三个月内消灭海南共党，迅速占领沿海据点及交通要镇。”企图窃取抗战的胜利成果。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全部美式装备的四十六军抵琼，执行受降、推翻抗日民主政权和消灭我力量的三位一体的任务。

以冯白驹为首的琼崖特委，根据上级指示，一手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一手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特委发出了《关于成立琼崖人民民主政府的通知》，要求在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双十协定”签字后，特委曾两次致函国民党海南军政当局，再三指出：在战后的海南，不应有痛心的内战，应根据“双十协定”精神，实现海南的全面和平。以后，特委还发出了《关于制止内战，保障和平的工作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全琼人民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行动起来，制止内战，保卫和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南党内曾一度产生和平幻想，特别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停战协议公布后，这种幻想有所滋长。为此，白驹在白沙县牙叉召集党政军群科级以上干部座谈会，统一对形势的认识，提出海南战争是主流，还是和平是主流的问题，让大家讨论。多数干部认为琼崖即将爆发全面战争，但也有一部分同志和个别领导认为和平仍是主流，应当尽力去争取和平发展。两种意见争论不休。

白驹细心倾听同志们的争论，深感党内和平麻痹思想的危险性。他在总结发言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共方针，着重指出：

“目前的情况，并不是什么和平为主流的问题，而是急需准备战争、应付战争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必

然会犯错误。”他还强调，必须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不然就要吃亏。会议期间，正好黄康从广州回琼，传达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我们，千万不可麻痹”。党中央的指示，帮助特委统一了思想，并认真研究了对策，决定立足于打，分析敌人最大可能性是集中力量，向白沙根据地围攻和合击。我们必须以分散对付敌人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打击敌人。主力伸到外线后，白驹领导少数部队和地方武装，仍留在澄迈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

完成自卫反击布置后第三天，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四日，敌四十六军即集中三个团以上的兵力，分五路围攻白沙县城，企图聚歼我主力及领导机关，但是扑了空，一无所获，于是迅速转回澄迈，采取“填空格”式的大“扫荡”。在特委的领导下，全体军民团结战斗，进行游击战和麻雀战，内外线密切配合，开展全琼性的自卫反击战争，给敌以狠狠打击。经过十个月的反“清剿”作战，粉碎了四十六军的全面进攻，取得歼敌三千、缴获大批武器的重大胜利。但我军亦付出了巨大代价，解放区缩小了三分之二，牺牲了五百余名战士。

敌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同我党一直保持着联系。他这次奉命率部渡海之前，周恩来曾给他写过一封机密信件，信上说：“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力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作多少作多少，由你酌定……”^①

渡海后，韩练成以个人名义给琼纵和冯白驹发信，说国共

^①引自《韩练成同志谈话记录》（1981年4月）。

两党已签订“双十协定”，海南应双方谈判，实现和平等等。特委由于没有接到中央指示，不了解韩练成的身份，在讨论韩提出的建议时，白驹认为谈判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结果，但从政治斗争方面考虑还是要去，以便揭露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要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绝不能因此放松警惕。于是派史丹前往谈判。白驹特别吩咐史丹要多带些钱，以便举行记者招待会，搞宣传，扩大影响。

白天公开谈判和晚上私下谈话完全是两种态度。白天韩练成说琼纵没有多少力量，只有收编遣散，没有受降任务。晚上，韩则用小汽车把史丹接到自己家中向史丹交底：“我和共产党是老朋友，早在北伐大革命时代，我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队）时，就和许多共产党员一块工作过。我对共产党有认识，党对我也有了解，至今党和我的关系还是很密的”^①，还说：你们可通过电台问中共中央韩练成是个什么人？这就可知我的为人了。^②他并请转告白驹，不要出来破坏公路桥梁，不要割断电线，把部队撤到五指山地区，好好休养生息，这样上面派人来视察时，我好应付他们。

史丹回到琼纵司令部所在地临高南丰市，向冯白驹、林李明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大家都不敢轻易相信。当时琼崖纵队没有电台，无法和中央联系，但又不能完全排除韩是类似高树勋式的人物。怎么办呢？白驹建议再派史丹去与韩谈判，提出一些如要电台等具体要求，用实际行动来考验他的话是真是假。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①访问韩练成谈话记录。引自《韩练成同志谈话记录》（1981年4月）。

②史丹：《关于同韩练成谈判的情况》，访问记录稿。

我第二支队获悉有一支国民党军队由北黎向石碌开拔，便在两地之间的昌江设伏，准备歼灭该敌。二支队埋伏到第三天，正好韩练成领着副官、医生和六个警卫员外出视察，路过昌江，遭到猛烈伏击。韩练成乘坐的火车被搞翻，随员死伤过半，韩本人的腰椎也摔伤了。

史丹不知道发生了这个情况。第二次谈判时，韩练成大发雷霆，骂琼纵不守信义，差点把我这个军长打死，等等。但晚上，韩练成仍把史丹接到楼上密谈，他说：我向部下做好了工作，说共产党不会出来捣乱，这次打了火车，我的工作不好做了，你回去请冯白驹写封信来，说这次打火车是个误会，把缴获的武器送还，便于我向上级交代。他还说近日国民党派了五个少将来琼亲自督战，要向琼纵大规模进攻；并建议和冯白驹两人在那大附近的和舍市外的公路边，单独相会，不许带枪。白驹听了史丹汇报后，认为韩是两面派，把韩的建议看作是阴谋而不予理会。不久四十六军果然大举进攻，就这样双方度过了十个月的敌对生活。

解放后韩练成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为了解除练成与白驹之间的误会，一九五〇年冬周恩来特地召见他们，在座的还有贺龙、陈毅等。陈毅问白驹和练成：“昨晚怀仁堂晚会你们去了吗？《三岔口》这出戏你们看了吗？”白驹说：“看了，看不懂。”陈毅说：“两个互不相识的自己人，在漆黑的夜里恶战了一夜，天亮了才认识，真有趣呵！”练成说：“惭愧，没有完成任务。”周周来说：“这是我没有给你们接上线。”“为什么没有给你们接上线，只是单独向练成同志打了个招呼呢？这个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说吧！”这场历史误会之谜就这样解开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我军自卫反击战刚取得胜利时，林树兰回琼向特委传达南方局关于广东贯彻国共谈判协议的有关指示：琼纵在广东之协议中，决定北撤山东，人数一千九百人，由美舰运去，从儋县下舰，主要是撤干部，但应留一些干部，另组一套新的机关，来支持撤退工作；其余人员设法复员，如自己有法子出洋谋生的，可同意去，只要不反党，到什么地方党都要承认他。对上级这个指示，白驹周密地进行了考虑，认为“双十协定”是毛泽东亲自率领代表团在重庆同蒋介石举行“谈判”而签订的，作为一个地区的领导，当然应该贯彻执行。因此，特委派出庄田参加广东问题的谈判，研究琼纵北撤问题，但张发奎不承认海南共产党和琼崖纵队有资格参加北撤，骂琼纵是“土匪”，企图把我留在孤岛，以“狮子搏兔的力量”一举消灭掉。这就引起了白驹的警惕，同时作好两手准备，一面准备坚持斗争，一面准备北撤，而以坚持海南斗争为主。他与特委在认真研究撤退干部和留下干部名单，以及主力撤走后留下人员的活动方式方法的时候，强调指出，没有接到北撤命令之前，应坚持斗争，保存力量，并规定暂时只传达到支队和县级领导。但是有些干部走漏了消息，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混乱思想。七月底，特委发出了“坚持自卫斗争的新指示”，检讨了半年来的和平幻想，指出在全国内战情况下，要全心全意坚持自卫战争，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从思想上扫清和平幻想，禁止谈论北撤问题；在组织上建立东西南北四个临委，实行县级党政工作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在军事上组织各支队的主力大队，重点配合，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内部团结；在群众运动中，积极开展反清乡，反抽丁，反放哨，反征粮，反购枪，反迫害，反劳役等斗争，并纠正正在执行政策中

“左”的倾向，这样才扭转了局势。

北撤所产生的风波刚过去，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南方局又先后派张创和张瑞民回琼传达指示，要琼崖特委将琼纵撤往越南。对这个关系到海南革命存亡的重大决策，白驹一开始就怀疑它的正确性。他说：“要干部撤到越南，实际上就是把全部力量丢在海中，这个指示我没法执行，宁愿接受任何处分。”同时吸取北撤风波的教训，只限几个特委知道。特委经过研究后，作出《坚持自卫反击再决议》。十月二十六日由冯白驹、林李明、黄康联合署名电报中央，表示要在海南“坚持斗争，绝不给敌人打垮”，并要求重新考虑琼纵南撤的问题。党中央接电后，由毛泽东拟稿，朱德、彭德怀、廖承志等签阅，于十月三十日电复说：“琼特冯白驹同志：十月二十六日电悉，你们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决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灭敌军一营一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琼崖为目标，将来再向南路发展。你们的《坚持自卫反击再决议》是正确的。”^①中央的指示，为海南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自此，白驹和特委的同志更放手地坚持斗争。为此，特委还发出了一个《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而奋斗的决议》，强调指出，中央的指示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南，为了完成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必须彻底扫除和平幻想，扩大部队，扩大解放区，恢复和扩大军火生产，并乘四十六军北调，敌人兵力空虚之机，积极出击歼灭敌人，展开工作。^②在中央指示的鼓舞下，白驹指挥各支队协同作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自卫战争以来琼崖党各个时期的工作决定及对策》（1948年），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战,互相配合,又消灭了一批敌人,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全面进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冯白驹召开临委书记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开辟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总结十个月的斗争经验,部署当前的工作。会议进一步批评了幻想和平的错误。白驹作了《自卫战争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政治报告,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和平正告绝望,内战已达到顶点”,战争的结局必定是“蒋败我胜”,并列举蒋军必败和我军必胜的根据和条件。^①白驹和特委总结美合和内洞山两个根据地建设经验,认识到要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一要靠发动群众,二要靠巩固的根据地。会议决定创建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中心革命根据地。

会后,白驹在领导军民抵抗蔡劲军的反动军队“围剿”的同时,组织一部分军事力量,开辟这个革命根据地。当中央得知琼特领导机关进入白沙之后,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来电指出:“海南根据地在五指山初步建立是一大胜利”。从此,琼崖自卫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很快又进入反攻阶段。一九四七年八月份,白驹主持召开特委干部会议,学习中央有关指示,结合海南实际情况作出了有关土地改革的若干规定,开始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白驹在谈到土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时深刻指出:“土改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就是农民基本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就是农民翻身解放运动,农民翻了身,农村根据地就会建立,革命就会顺利发展以至于成功。”^②同时,对土改的原则,土改的路线,土改的对

^①原件存广东档案馆。

^②冯白驹:《猛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指南》(1947年),油印本。

象，土改的步骤，以及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农民对土地要求十分迫切，由清算斗争迅速走向分田地的高潮。在土改的乡村，组织起贫农团，农会和农军，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和财产，生产热情极为高涨，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改善了人民生活。

组织战略大反攻

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白沙县红毛乡胜利召开。这次大会是海南革命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党中央给大会发来贺电并对海南工作提出了九项要求。白驹代表特委作了政治报告。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组织战略大反攻，把解放战争推向新的阶段，进而解放全琼崖，他要求做好五项工作：（1）巩固与扩大白沙、保亭、乐东中心根据地；（2）在军事上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重建参谋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3）在民运上，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放手发动群众诉苦翻身，在军民兼顾，公私两利的原则下，发展生产合作社，破仓分粮，打富济贫，给予民众以实际利益，组织农会，贫农团，保乡队，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4）在党的工作上，学习中共“七大”文件，弄通毛主席思想基本观点，改造作风，改进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命令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加强党性和群众观点，注意科学的领导方法；（5）展开反特务斗争，加强争取敌军的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大会将特委改为区党委，白驹为书记，林李明、何浚为副书记。

根据第五次党代会的决定，十月二十四日，又召开了全球

第一次全军代表大会。在会上，白驹总结建军以来，特别是从云龙改编以来的斗争经验和教训，从建军思想、作战原则、战术运用、管理教育、军民关系、内部团结、俘虏政策、生产节约，以至个人反省，都作了全面总结，并根据大陆兄弟部队的建军经验和琼纵的实际，提出今后十二条工作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扩大和发展武装力量，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作用，大量提拔干部，加强后勤工作，实行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孤立分散之敌的作战方针等。^①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将“琼崖纵队”归入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任命冯白驹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振亚、吴克之为副司令员，黄康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马白山为参谋长，符荣鼎、陈青山为政治部副主任。部队整编后，纵队党委和白驹领导了近万人的琼纵开展了一次新式整军运动，进行“三查”、“诉苦”，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增强纵队的素质，提高战斗力。

五指山根据地的胜利重建，党、军两个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并且在自卫反击战中取得巨大胜利，我军战略大反攻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了，于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动了秋季攻势。我军集中了二十一个中队（相当于二十一个连）的兵力，在李振亚副司令员率领下，从保亭出发，向陵水、万宁、乐会、定安之边沿地区伸展，经过六十八天的进攻，共作战二十次，歼敌一千五百余名，解放市镇十八

^①海南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发展史》（1952年）第44页。

座。李振亚在牛漏战斗中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为了配合大军渡长江，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区党委和琼纵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至六月五日又发动了春季攻势，解放了儋县、昌江、感恩、白沙、澄迈、琼山、文北、文南等大块地方。

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紧接着又于七月间发起夏季攻势。但是，由于全国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四月解放了国民党老巢南京之后，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在大陆上的残兵败将便退到海南岛，国民党在琼之兵力一下子就超过琼纵十倍以上。白驹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未能完全预见到的。根据形势的突变，不得不停止刚开始的夏季攻势。海南解放战争又处于暂时艰巨的阶段。

落荒海南的国民党残敌，以陈济棠和余汉谋为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的正副长官，薛岳为海南岛防卫司令部的总司令，大力加强包括雷州半岛、海南岛沿海在内的防御工事，海陆空机动配合，构成一条所谓“伯陵防线”，吹嘘这条防线“固若金汤”，是“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企图以此阻止我军主力渡海。他们还调动部队千方百计对琼纵进行围攻，妄图击溃我军，

但是，海南人民的斗争是与祖国大陆的斗争密切联系的，海南人民暂时遇到的困难，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在十倍于我的强敌面前，海南军民并没有被吓倒。白驹和琼纵其他领导人，充分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敌我情况，提出“杀伤敌人，保存自己”的作战方针，决定第一总队在西区，第三总队在东区，第五总队在南区，独立团在北区，协同作战，动员根据地群

众，开展人民游击战，觅机打杀敌人，拔除分散、孤立之敌据点，保卫秋收冬种，巩固农村阵地。白驹经常深入战斗第一线，了解情况，选择有利地形，配备力量，作出周密、慎重、主动的战斗部署，力争每战必胜。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的几个月中，我军就歼敌四千多人。一九五〇年一月，薛岳准备发动所谓“二月清剿”，由东西两面夹击我军。白驹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人民游击战，粉碎了敌人“两个月剿灭琼崖土共计划”，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从而为迎接主力渡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指出解放海南岛具有非常有利条件：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并要求在一九五〇年春夏之间解放海南岛，还任命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组成解放海南作战指挥部。白驹一九四九年七月接到华南分局关于迎接大军南下的密电后，立即作出部署，开展广泛的对敌斗争，配合主力作战。十二月接到中央关于“接应大军登陆”电报后，又立即组织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认真讨论，把迎接和支援大军渡海作战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白驹派遣参谋长符振中渡海向叶剑英、邓华等报告军情，并向首长转达他的两条建议：一是乘敌人防线不严，军心混乱之际，先潜渡一批部队来琼，加强琼纵的接应力量；二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就派一批干部和技术员，把枪枝弹药物资偷运过海，充实琼纵实力。之后，白驹又连续派军队和地方干部二十多名，偷渡到雷州半岛，向大军介绍敌情，为渡海部队提供有关登陆地点和渡海时机。

为了迎接主力解放海南，白驹以最大的决心，不惜一切代

价，动员全琼人民做好支前工作。从琼崖临时人民民主政府到乡村基层政权，都组织了支援前线委员会，紧急筹备粮食。支前委员会成立仅两个月，就征集了五万市担粮食，组织了六万多的民工运输队，解放区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参加了支前组织，捐献了大批的慰问品。为了解决经费困难，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琼崖临时人民民主政府发行了四十万元的解放公债。还动员了数百名熟悉航海的船工和身体强壮的水手，驾着一百七十多艘木帆船，分批到达雷州半岛，协助大军进行海上作战练习和担负渡海作战的领航员。海南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为解放海南贡献一切力量。

渡海作战指挥部的首长们经过缜密的研究，采纳了冯白驹的建议，决定我军分期分批潜渡，然后大军跨海南征，解放海南。

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下午七时，我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二团一个加强营，由雷州半岛的灯楼角起航，向海南岛潜渡。白驹接到十五兵团关于接应渡海先锋营的电报后，立即派第一总队到琼西接应渡海登陆部队，第三总队和独立团到琼山接应四十三军渡海部队。六日下午二时，渡海先锋营在儋县白马井登陆，遭到敌海防部队在飞机支援下的拚命顽抗。我一总队当即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敌人在我两面夹攻下溃败了，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八日，为了庆祝两支兄弟部队历史性的会师，海南区党委和琼纵分别为渡海先锋营及琼纵第一总队发来贺电，称：“这是我们长期奋战的结果，是值得热烈庆祝的伟大胜利！”^①

^①转引自郑放：《海南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简史》（1976年4月21日油印本）。

同时，华南分局，十五兵团兼广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对白驹和琼纵胜利接应部队致电嘉奖。

渡海先锋营登陆成功之后，大军于三月下旬又连续三次渡海，均获成功，我军兵力迅速增长。白驹指示琼纵全体指战员戒骄戒躁，严明纪律，虚心向野战部队学习，继续英勇作战，准备接应更多的主力部队渡海作战。但是这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大军激增，部队供应成为严重的困难，有的战士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打仗。于是白驹以琼崖临时人民民主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筹粮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必须深刻认识，掌握筹粮工作是我们在战争中最迫切的任务”，“以突击精神，全力以赴，解决粮食”。

我十五兵团总结了四次渡海登陆的经验后，决定在四月份，利用风向，实行大规模夜间渡海。白驹四月十日十七时接到十五兵团的电报后，立即同吴克之、马白山、黄康等琼纵主要领导人研究部署接应工作。四月十六日，我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共八个团，分乘帆船三百余只，实行大规模强渡。在琼纵和先遣队的配合下，冲破敌海空封锁，强渡、强攻、强行登陆。十七日在临高、澄迈海岸突破“伯陵防线”。二十三日解放了海口，四月三十日榆林、三亚相继解放，五月一日全岛宣告解放。

在海南人民沉浸于胜利欢乐之中的时刻，饱经风霜、为海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灌注了全部精力的冯白驹，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啊！他回顾了战斗的历程，把一切归于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他说：“海南党的组织二十多年来，远离中央，在摸索中创造了一些成绩。但我们必须懂得，我们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如果没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全国革命的发

展和胜利，海南是不可能单独得到胜利的。”^①这个出自白驹的肺腑之言，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在喜悦的日子里，白驹紧紧地握着战友们的手，又兴奋又激动，意味深长地说：“现在，还有残匪需要肃清，还有建立政权、土地改革、经济建设等许许多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啊！”^②

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解放后，白驹担任海南岛党政军的主要领导职务。一九五〇年九月中旬，他离开海南，经广州随叶剑英一道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首长一起在北京饭店的大厅里接见了冯白驹，对坚持孤岛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冯白驹进行慰勉，听取了冯白驹对海南情况的汇报，还邀请他观看京戏。之后，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又分别接见他。公务已毕，周恩来特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白驹到医院全面检查身体。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革命是人干出来的，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为革命多做工作，你一定要把痔疮治好，才能回去。”在医院经过十多天的精心治疗，白驹已解除了痔疮的痛苦，恢复了健康。他离开北京前毛泽东又特地派人告诉他：“回去后必须抓好练兵与土改这两件事，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帝国主义胆敢来侵犯，我们就可以主动地对付。”白驹回

^①冯白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载《中国共产党在中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42页。

^②《琼岛星火》第1期第34页。

到海南后，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把党中央的指示和关怀，告诉广大干部和群众。生活困难的群众领取了中央人民政府特别拨给的救济款，海南各族人民和干部无不欢欣鼓舞，对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无限感激。

一九五一年初召开的海南解放后第一次党代会上，把“练兵与土改”两大任务作为主要议题，白驹对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作了传达，并提出具体贯彻的方案。

接着，海南岛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练兵运动和土改运动。由于白驹缺乏搞大规模土改运动的经验，加上海南岛解放较晚，情况复杂，土改进度较慢。到一九五二年七月，全岛土改才完成七十七个乡，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弱。叶剑英到中央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指示，广东土改的重点应转到海南。同时，中央同意中南局所提出的“依靠南下干部，依靠大军，完成土改”这个口号，并抽调一大批富有土改经验的外省干部和南下大军，来到广东搞土改。为了解决对别地经验不重视，对外来和南下干部重用不够的问题，一九五二年夏，广东党内开展了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有人抓住海南土改进度慢，在区党委礼堂内挂冯白驹像和当时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南代表，准备提出海南成为一个省的建制的议案（后来因意见不一致没有提出）等问题，指责白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并对他进行了批评，他被迫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一九五二年冬，白驹调到华南分局工作。

白驹调华南分局工作后，担任分局委员兼统战部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候，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白驹以巨大的革命热忱，学习和宣传党的总路线，并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在统战部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私

营工商业的改造上。为了把这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比较复杂的工作搞好，他除了认真学习党中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和各地试点的做法和经验外，他还深入基层搞试点，及时总结经验，解决存在问题。在分局领导下，白驹主持的广东的“私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白驹对少数民族的工作也很重视，认为广东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是老（老根据地）、边（边防地区）、灾（水旱风虫害）地区，搞好这些地区的工作是党的一项重大任务，它不仅是民族问题，而且关系到国防是否巩固的问题。在他的努力下，这方面的工作也做出了很大成绩。

一九五四年底，白驹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分工主管工业。对打仗，搞政治工作，白驹是熟悉的，而对工业生产却是外行，但他并不害怕困难。他一方面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经济建设的指示；另一方面向工人、干部学习企业管理知识，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一九五五年初，他到顺德、东莞、紫泥、市桥、中山等糖厂检查工作。每到一厂，都逐个车间仔细地看，从甘蔗进厂到出糖，整个生产流程，都要弄个明白。

进城以后，白驹注意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牢记毛泽东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教导，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解放后，白驹的职务不断提升，一九五四年九月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九五五年九月又授予他中将军衔，国务院还任命他为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但他不因此而骄

傲，仍然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到基层单位检查工作时，经常与警卫员、秘书等同住在一个房子里，在集体饭堂吃饭，不要特殊照顾。他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不当特殊党员，按时交纳党费和参加组织生活。处处以身作则，给党小组的同志以很大教育。

白驹同群众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他念念不忘在战争年代支援过革命的老区人民。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他带领慰问团到海南慰问时，走遍了琼东县、文昌县和琼山县的老区。每到一地方都关心群众的疾苦，问寒问暖，耐心听取意见。在琼山县的老根据地与“老屋主”座谈，一谈就几个小时，群众越来越多，那些群众怎么都不让他走，只好在群众家里过夜。离别时，群众依依不舍，远程相送。

一九五七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运动，广东紧接着还进行了反所谓地方主义的斗争。这年春季，广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白驹被选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并准备在会上作关于工业整编问题的报告。但到第三天，白驹却成为大会批判斗争的对象。此后，用了大半年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对白驹进行批判斗争，并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同志的错误的决议》，给予他撤销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的处分。冯白驹在受处分后，思想一直不通，自付打了几十年的仗，解放后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忠实执行，既没有反党思想，更没有反党的行为，为什么却被戴上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白驹忍痛接受了省委对自己错误的结论和处分。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日，白驹被下放到三水县劳动锻炼。

他名义上担任县委书记，但县委分工他到河口乡魁岗农业合作社“蹲点”，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基层参加劳动。

白驹由于过分劳累，得了肝炎，一九五八年九月回广州治疗。在三水劳动八个多月里，他的感触是很深的，总的是觉得主观主义、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十分严重，党内生活不正常，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动不动就抓辫子，大会压、小会挤，使得大家不敢讲真心话。

一九五九年七月，白驹到江西庐山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当火车进入湖南境内，白驹突然心肌梗塞，被留在南昌医院进行抢救，整天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垂危。广东省委对白驹的病情十分关心，立即派出医疗小组偕同曾惠予赶往南昌协同抢救。经过党组织和医务人员的努力，白驹性命方才得救，在南昌治疗了五个月之后，转到上海继续医治。

1961年初，白驹回海南岛渡春节。

这次故乡之行，在鹿回头招待所意外地遇见了郭沫若。二月十八日清晨，白驹邀请郭老漫游地处海南岛南端的天涯海角，欣赏海洋景色。渔民们拉着缆，打着号子，劳动热情感染了两位老人，他们兴致勃勃地一起参加牵缆行列，同渔民一起劳动。郭老为了感谢白驹的深情厚谊，次日展纸挥毫，作了两首诗赠送白驹。其一：海角尚非尖，天涯更有天。波清湾面广，沙白磊头园。劳动同群众，雄心藐大千。南天一柱立，相与共盘旋。其二：云看有奇鹰，清晨化为石。待到黄昏后，雄鹰看又活。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三月一日，广东省委在从化温泉召开了一次扩大的省委常委谈心会，省委常委和党员副省长参加，主要是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总结经验教训，号召每个党

员向党汇报思想讲真心话，实行“三不主义”。白驹觉得自己受处分后，有很多话想向党说，但没有机会，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领导要听党员的真心话了，应当如实地向党汇报，可是又担心说出来，会被人家误认为是翻案，怎么办？经过思想斗争后，他“坚信我们的党是光明正大的，真理是客观的存在，党内是有错必纠的。我的问题，虽然一时弄不清楚，但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便打消了顾虑，实事求是地把压抑在内心的话说出来。二月下旬，他先后在四个下午讲了八个多小时，重新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向党申诉。但是，他的申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能起什么作用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白驹离开曾经度过六十个春秋的广东，来到东海之滨的浙江省工作，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晚年。当时的职务除了保留候补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外，在省里的职务和广东一样，是省委委员，副省长，主要分管文教卫生，实际上重点是抓血防和计划生育工作。白驹来到浙江后，曾对一些同志倾吐了自己的心情：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来浙江的唯一心愿是想在有生之年，能为浙江人民办一两件有益的事。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省委的领导下，他和广大干部一起，战斗在文教卫生战线上，忘我地工作。

正当白驹振奋精神，放开手脚，把自己有生之年贡献给人民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他受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后来又身陷囹圄，在武装看管下，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一直到林彪自我爆炸的前五天，即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通知浙江省委：“解除冯白驹同志的隔离审查”，并要求派人照顾，住院治疗，无药给药，无医派医，允许亲人探望和陪医。十日，已奄奄一息的白驹才获得自由，一九

七二年五月初，周恩来总理得知冯白驹在关押期间得了重病，立即指示浙江省革委会派公务车送到北京治病，并为他安排特护病房。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白驹病情有了好转，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出院，在北京又住了两个月才回浙江去。这时白驹已近七十高龄，受过严重的摧残又重病在身，所以继续治疗，没有工作，但他还是以坚强的毅力，天天锻炼身体，希望治好病之后，再干它几年。在他精神稍好时，就写揭发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送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真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九日冯白驹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岁。

七月二十八日，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冯白驹同志追悼会。叶剑英、李德生、江华、廖承志等参加了追悼会，周恩来、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浙江和广东的党政军各部门、海南区党委和海南军区送了花圈。悼词说：“冯白驹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坚持海南的革命战争中，贯彻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克服种种困难，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为人民服务，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101

定 价： 1.05 元